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恩 格 斯



恩 格 斯

刘国柱 田款 李胜凯 编著

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列宁

前 言

恩格斯是一位传奇人物，是人类智者。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是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共同创立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恰当的。”

恩格斯的成长历程是独特的。他出生在德国莱茵工业区一个工厂主的家庭，父亲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家，笃信宗教，渴望发家致富，并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尽管老弗里德里希费尽了心血，恩格斯最终还是未能成为他所期望的工业家或商人，而是走向了本阶级的对立面，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对于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恩格斯，读者一般比较熟悉，但是，对于恩格斯人生的其它侧面，人们了解的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过去过分强调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一面，并且有些神化。

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但他又是一个

食人间烟火的肉体凡胎。纵观恩格斯的人生历程，他既是摧毁旧世界的坚强斗士，又是柔情似水的忠诚丈夫。恩格斯把自己的爱情献给爱尔兰女工玛丽·白恩士，玛丽去世后则献给她的妹妹莉迪娅·白恩士。在恩格斯看来，白氏姐妹在感情上给他的支持，比起那些有教养的，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可能给予的要多得多。

恩格斯的世界观与家庭其他成员相去甚远，但这并不能影响他们之间的亲情。恩格斯对母亲的热爱，对弟妹的爱护和谦让，对子侄的关心，连那些不理解恩格斯所做所为的亲戚对他也充满由衷的敬佩。

恩格斯极其珍视友谊，他与马克思的友谊更可称得上是人类友谊的典范，英国工人运动领导人哈尼称这种友谊只有在古代神话中才能找到。恩格斯对待朋友是极其慷慨的，他总是能及时向处于危难中的朋友伸出援助之手而不思回报。对马克思及其全家的支援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对同志和战友，恩格斯有着一颗火热的心，他的住所是各国革命者向往的“麦加”，在这里，恩格斯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恩格斯是朋友们的欢乐伙伴，每一次聚会，他的诙谐和幽默都要给友人们留下难忘的

回忆。

恩格斯还是一名战士和军事家。他曾经驰骋于1848年革命的战场，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所有在战火中见过他的人，很久以后还在谈论他那种非凡的镇静和漠视一切危险的气魄”。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创始人，他的军事论文分析透彻，论述精辟，往往能正确预测战争和战场形势的变化，他因此被马克思的长女燕妮称为我们的“总参谋部”。熟悉他的朋友们更是尊称他为“将军”。

恩格斯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语言大师，他通晓25种语言，能流利表达的就有16种，即便是语种相近的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他在使用时也能准确地分开。像恩格斯这样的语言天赋和才能可以说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亦颇有造诣，任何一个读过《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人，如果不了解恩格斯的过去，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些著作是一个连中学都没毕业的人写成的。一个拜访过恩格斯的自然科学博士曾对人说：“我去拜访的那个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但是我没有想到，在我的专业方面我还可以向他学习。”

恩格斯有着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格。为了从经济上帮助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曼彻斯特经

商 20 年，整天与之打交道的都是些沾满铜臭气的资产者，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混迹于资产阶级中间，却能始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斗志和精神。什么叫“出淤泥而不染”？看看恩格斯吧！

恩格斯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去世后连坟墓都没有留下，他的骨灰撒到了大海。然而，他留给世界人民的，又岂是言语和笔墨所能表达得出来的。

我们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写这部传记的，我相信读者阅读后，也会被恩格斯的伟大人格所感染。

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同时代人撰写的回忆录，另外还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恩格斯的一些论著。本书第 1—7 章由田款撰写，第 8—14 章由李胜凯撰写，第 15—21 章由李素霞撰写，第 22—28 章由刘国柱撰写。全书由刘国柱定稿。

河北师院历史系教授张兹署先生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于秀君，尹金兰，经卫宏三位同学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誊抄了全部稿件，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业务水平有限，资料掌握有一定欠缺，错误和不当在所难免，恕请读者批评、指正。

刘国柱

一九九七年三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巴门的富家子弟	(1)
第二章 宗教与自由	(23)
第三章 兵营和大学	(45)
第四章 走进工人运动	(70)
第五章 友谊和爱情	(93)
第六章 良朋和战友	(115)
第七章 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	(136)
第八章 从布鲁塞尔到巴黎	(157)
第九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 宣言》	(183)
第十章 革命风暴	(206)
第十一章 浴血沙场	(227)
第十二章 总结经验	(250)
第十三章 欧门—恩格斯公司	(273)

第十四章	总参谋部	(294)
第十五章	朋友和家庭	(314)
第十六章	国际的诞生	(336)
第十七章	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 炮弹	(358)
第十八章	伟人重聚	(377)
第十九章	巴黎公社和总委员会	(399)
第二十章	收拾无聊的杜林	(421)
第二十一章	研究自然科学	(448)
第二十二章	与摩尔共处的最后几年	(469)
第二十三章	国际伟人	(491)
第二十四章	完成《资本论》	(516)
第二十五章	好客之家和欢乐伙伴	(542)
第二十六章	第二国际	(565)
第二十七章	反对战争	(588)
第二十八章	巨星不落	(608)

第一章 巴门的富家子弟

他的肩膀上长的是自己的脑袋

——克劳森博士

1820 年 11 月 30 日，普鲁士《爱北斐特日报》刊登了一则不太引人注目的通告：

出生通告：

昨晚，我亲爱的妻子幸运地生产一健康男婴。

弗里德时希·恩格斯

1820 年 11 月 29 日于巴门

这则通告宣告了一代伟人的降临。对于 19 世纪 20 年代的巴门人来说，这则通告意味着当地最大的资本家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老板有了财产继承人。

恩格斯出生在德意志莱茵省巴门市。巴门市位于莱茵河支流乌培河谷地，四周山峦起伏，林木苍

翠，谷地平川则是大片的葡萄园和绿茵茵的草地，那里有成群的牛羊，还有老式的风磨，称得上是世外桃源。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拿破仑的大军席卷了德意志，拿破仑把资本主义制度也带到了乌培河谷。大陆封锁时期，这里的手工业和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巴门和爱北斐特成为当时德国著名的纺织中心。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就是当地著名的纺织工厂主。而且，老弗里德里希还与欧门家族合资，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开设了一家纺织公司。

老弗里德里希是个意志坚强，性格严厉的人，他有着一幅典型的日尔曼人的仪表：胖乎乎的圆脸庞，松软的、棕黄色的连鬓胡子，蓝眼睛里露出一种富于才智的神情和自我优越感。他与乌培河谷的许多虔诚派教徒一样笃信上帝，他认为：基督教信仰，与其说是纯净灵魂的原则规范，不如说是整治社会的原则规范。人应当有所信仰，否则会造成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宗教犹如葡萄酒，不能不喝，但要适量，一旦过量便会引起精神错乱。因此恩格斯老板从不多喝一口。作为资本家，他对现实美好生活的追求远甚于虚无缥缈的天堂，尽管如此，在宗教方面他对子女的要求还是格外严厉的，他要求子女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都要认真听讲宗教教义，并无条件地

相信圣经。可以说，恩格斯就是在宗教戒规森严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

与老弗里德里希相比，恩格斯的母亲伊丽莎白·弗兰契斯卡·毛里齐娅·恩格斯则是一位温柔乐观，心地善良的妇女。她出生于荷兰的一位中学校长家里，父亲范·哈尔是哈姆理科学学校的校长，也是出色的语言学家。毛里齐娅年轻时很像格林童话中描绘的甘泪卿，成年后又像易卜生戏剧中的索尔维格。金黄色的披肩发，红润的嘴唇，纤细的腰身……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柔和光彩照人。即使成为八个孩子的母亲，她依然被看作乌培河谷最可爱的妇女。

由于家庭的影响，毛里齐娅同她父亲一样，热情奔放，仇视任何社会不公正现象，酷爱文学和音乐。在她看来，艺术，特别是文学，是最美好的思想感情的源泉。因此，这位纯洁、善良的母亲总是告诫子女，在学会经商之前，首先要理解诗的奥秘。

恩格斯老板喜欢旅行，但是，他总是作为一个商人去旅行。对他来讲，巴黎郊区的纺织工厂比巴黎的林荫大道更迷人，伦敦的贸易公司比它古老的公园更令人神往。出门时，他的旅行箱里塞满了棉纱、丝织品或染料的样品。回来时，皮包里装满了合同和订单。也正是由于老弗里德里希不太顾家，所以，子女的教育主要是由毛里齐娅操劳。

恩格斯是家中的长子，他的三个弟弟先后走上经商办企业之路，四个妹妹也都嫁给了有钱人，只有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而他的这种选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奠定了基础。

儿童时代的恩格斯有很长时间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他的外祖父范·哈尔是位和蔼、明哲的老人，这位慈祥而博学的老人给他的外孙辅导功课，讲述优美动听的希腊神话故事：从前，在我们德意志南边有一个国家，我们的祖先把它叫做埃拉多斯。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神创造的。每一个居民都有一个神，每一个人都都是英雄，宙斯是诸神之父，它住在奥林匹亚山的雪堆上，太阳神是太阳的保护者，它住在辽阔的天空。三大美神的美丽，体现在人间的弗利娜的形象中；雅典娜的智慧，体现在德谟克利特的思想中；阿波罗的优雅，体现在斐济岛的雕塑上；维纳斯的热情体现在沙孚的诗篇中。那里的人们同诸神展开了竞赛。

恩格斯也十分乐意同外祖父在一起，在外祖父家就像过节那样快乐。外祖父的美丽辞藻对恩格斯的意识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外祖父以艺术家的广阔视野，在恩格斯面前展现出形象 and 思想的古老世界，也就是被莎士比亚称为智慧和美的世界。

从外祖父那里，恩格斯第一次听到了普罗米修

斯的英雄悲剧，听到了关于罗马诞生的传说。外祖父心境舒畅时，还为他朗诵西塞罗的演说和罗兰之歌，讲述伊壁鸠鲁的哲学和孟德斯鸠的学说。范·哈尔的个性非常令恩格斯神往，恩格斯也对外祖父充满敬意和亲情，十三岁时，恩格斯还写了一首诗向外祖父祝贺新年：

我亲爱的外祖父，你总给我们指点帮忙；
你给我们讲过多少动听的故事，
从克尔基昂、提秀斯到百眼哨兵阿尔古斯；
从明诺托尔、阿莉阿德尼和投海而死的爱琴，
从金羊毛、约逊到亚尔古船英雄，
你讲过强悍的海格立斯，以及同他一道
的但纳士和卡德摩斯，
我记不住你一共给我们讲了多少！
外祖父，祝你新年幸福，
长寿、愉快、无忧无虑，
愿你吉祥如意，万事亨通——
这是您的外孙衷心的祝愿。

在宗教教育方面，外祖父对恩格斯的影响也很大。与一般的宗教信徒不同，范·哈尔对上帝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他不是在人类幻想中的

天堂里，也不在牧师宗教仪式中寻找上帝。在他看来，一个善良的基督教徒只有在对精神的创造性探索中，只有在对自身的坦率思考中，或者说在没有丝毫虔诚主义的虚伪和残忍中才能感觉到上帝的存在。据此，范·哈尔把上帝称为“伟大的理性先生”。有一次，恩格斯非要外祖父说出上帝在哪里，老人用手指点着恩格斯的额头，一字一顿地说道：“上帝就在这里，就在你的头脑里！……，只有那些草包脑袋才会到教堂的虚无缥缈和神奇的荒诞故事中寻求上帝的影子。”外祖父对待宗教和上帝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恩格斯，据恩格斯自己承认，是外祖父把他带入了理性宗教的世界，使他找到了宗教史上最纯洁和最迷人的东西，找到了使人成为诗人和智者，而不是成为宗教狂的虏虐。

十三岁以前，恩格斯在巴门市的理科中学读书。在那里和在他家中一样，虔诚主义精神占居统治地位，掌管学校的是一批不学无术，盲目维护圣经教义的人，他们希望把学生培养成蒙昧主义者。已深受外祖父启蒙的恩格斯在学校开始与教师发生冲突。

有一次，一个学生问老师：“歌德是什么人？”宗教学校毕业的老师冷冷地回答说：“一个不信神的人，一个在魔鬼的提示下写书的骗子。”这时，恩格斯站了起来：“老师，我有点不大明白！刚才说的那

位诗人是很有才华的，据说，天堂里是很器重有才华的人的……”

“我觉得，小恩格斯先生所袒护的正是他并不很了解的东西。”

“老师，我是德国人的儿子，我决不袒护我所不知道的东西。为了使您相信这一点，我可以为您朗诵他的《浮士德》中的几段诗。”

老师尚未来得及制止，歌德的诗句已如泄闸的洪水喷涌而出：

哲理呀，法律呀，医典，
甚至于神学的一切简篇，
我如今，啊！都已努力钻研遍。
毕竟是措大依然，
毫未见聪明半点；
称什么导师，更叫什么博士，
 颐指了一群弟子东西南北十余年，
我心焦欲燃，究竟所知有限！
我比那不值钱的博士导师，文人方士，
总算稍加优贤；
纵使是无疑无惑，
不怕地狱；不怕恶魔——
但我一切的欢娱从此远去，

再不想、求得什么卓识真知，
再不想，以口舌宣传，
能把黎民于变。

尴尬的老师在讲台上不停地踱步，手在胸前画着十字，似乎在企求上帝饶恕这“可怜的孩子”。

尽管巴门中学被虔诚派教徒所控制，授课内容也充满了宗教色彩，恩格斯在这里还是学到了相当踏实的物理、化学和法语知识，为他以后进一步学习自然科学打下了基础。另外，还有两位老师给恩格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法语教师希弗林博士，他精通现代法文文法，对古代拉丁文也很有研究，他被恩格斯称为该校最有才干的教员。另一位老师是科斯特尔，是年轻教员中最好的一个。科斯特尔教诗学概论，他取消了诗学中说教性诗歌，富于创新，且思路清晰。由于他反对一切虔诚主义，最后被排挤到杜塞尔多夫任教。恩格斯从这两人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1834 年秋天，恩格斯被父亲送到爱北斐特中学上学，这是一所公认的普鲁士最好的中学。这种做法是恩格斯家族的老传统；送长子进入高级中学接受良好的全面教育，为的是他日后能管理企业。恩格斯先是寄宿在父亲的好友——爱北斐特中学校长约翰·汉契克家中，后来又住在汉契克领导下的巴门福

音教会的一所提供膳宿的宿舍里。

尽管爱北斐特中学是宗教改革协会的财产但它却很少受这个协会神秘主义的影响。与巴门中学相比，这里的宗教色彩很淡。学校的教学内容丰富，一般每周要安排 34—36 节课，其中 8—9 学时为数学、物理、地理等自然科学，其它为拉丁语、希腊语、德语、宗教、历史、绘画等人文学科课程，高年级还要讲授哲学导论。

在学校，恩格斯是一位非常用功的学生，他以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掌握知识而博得众多老师的青睐。他非凡的语言学才能和基础，使他很快就掌握了拉丁文、法文和希腊文。在中学时，恩格斯已经能够顺利地阅读古罗马史学家李维的著作，诵读著名的荷马史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作品更是使他爱不释手。懂得多国语言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不同的文化，大大开拓了恩格斯的思路。

历史课是恩格斯最爱学习的课程之一，因为讲授这门课的是爱北斐特中学最令恩格斯尊敬的老师克劳森博士。离开学校两年后，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中回忆起这位老师时说：“他无疑是全校最能干的一个，学识渊博，精通历史和文学。他讲课非常吸引人；他是唯一善于使学生对诗发生兴趣的人，否则乌培河谷的庸夫俗子就会完全失掉这种兴趣。”在

恩格斯的一个历史作业本上，可以看到恩格斯画的许多文物古迹，其中有迦太基和耶路撒冷的风景；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和人面狮身像；巴比伦王国的武士等等。由此可见当年恩格斯学习历史的兴致。

最令克劳森博士难忘的是恩格斯独立思考问题的精神。在学习德国文学史这门课时，恩格斯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他翻着教科书只是为了给它挑毛病。一次上课时，克劳森博士把恩格斯叫到了讲台上。

“恩格斯同学，你是否已掌握了学过的东西？”

“老师，这得由您来作出判断！”

“那你就说一说伊苏之战吧！”

恩格斯转过来，面对黑板上的挂图，略带羞怯地讲了起来。

“在格兰尼卡大捷之后，伊苏之战又一次证明了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军事天才。”随后，恩格斯越来越自信地谈起了达利亚的巴比伦之梦，亚历山大患病，通过“叙利亚门”，波斯人的策略，赫梯人的攻击，马其顿王受伤，希腊雇佣军的溃败。恩格斯情绪激昂，好像在讲述自己亲历的战事。最后，恩格斯毫不客气地对伊苏之战及其后果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使得克劳森及教室内的同学们很感意外，

“恩格斯同学，请等一等，你离开课本是不是太

远了？”

“老师，课本上写的东西有很多是不对的。”

“那你是怀疑根据克劳塞维茨将军的讲稿编的教材？”

“帝国将军克劳塞维茨是非常值得尊敬，不过真理……”。

“请问。你的真理的根据是什么呢？”

“根据阿利安、狄摩西尼、普鲁塔克、狄奥多洛斯、卡里斯廷和托勒密的原著。”

克劳森带着怀疑的目光凝视着恩格斯，“好！我再考考你，你背诵一下马其顿王在格兰尼卡战役前的演说。”

恩格斯点了点头，他的慷慨激昂的声音又在教室里回荡起来：

“我之所以到亚洲来，不是为了灭绝各族人民，把半个世界变为荒漠，也不是为了压迫战败者。用剑获得领地是不牢固的，只有对作出好事所表示的谢忱才是永恒的……有人会责备我，我把波斯的风俗习惯搬到了马其顿。我认为许多民族都有值得仿效的东西。如果不互相交换既有的财富，那就不能管理一个大国……。”

天啊，多么非凡的记忆力！克劳森博士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如此丰富的知识完全可以胜

任历史教员的角色。他神色激动地拍着恩格斯的肩膀说：“恩格斯同学，今天应给你打满分，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历史科学的希望。”

恩格斯有点儿不好意思了，然而，他的回答又令克劳森略感失望：

“对不起，老师，我只是对历史感兴趣，我希望从事另外的学科。”

“另外的学科？”

“对，我想成为一名诗人。”

克劳森沮丧地拍了一下手掌。

“诗与马其顿的演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一切伟大的东西都与诗有许多共同之处。”

“有意思，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

“是我自己的想法。”

下课后，克劳森博士回到办公室，对自己的同行自豪地宣布：“小弗里德里希是我的骄傲，他的不可遏止的独立思考精神为我平生所仅见，我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在他的肩膀上长的是自己的脑袋。”

在爱北斐特中学，恩格斯利用课余时间广泛阅读了各种文学作品、历史典籍和科学书籍。他赞赏德国文学作品中的齐格弗里特，瑞士民间故事中的神射手退尔以及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这几位英雄人物体现了德意志人民反对专制暴政，追求光明与自由

的英勇斗争，他们是勇敢和无畏的化身。这三位英雄人物在恩格斯心灵深处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决心像他们那样忠实于高尚的，热爱自由理想，并为实现这些理想而奋斗。1836年。恩格斯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对这些英雄人物的崇敬。同时，这首诗也表现出恩格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满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他写道：

“有许多美丽的形象，在远处招唤，
犹如繁星点点，透过云雾，
给我们送来亮光，优美柔和。
他们越来越近——我已经认出来了，
这是退尔，拿弯弓，
那是齐格弗里特，他降服过巨龙。
执拗的浮士德也来了，
阿基里斯当先锋，
光荣的布尔昂的哥特弗里德
号召骑士们战斗要英勇。
瞧！——兄弟们，请不要笑——
还有那英雄唐·吉诃德
骑着一匹骏马，
到处厮杀。
这支队伍来了，又消失了，

只留下一片闪闪的金光，
啊，怎样才能把他们挽留？
又有谁把他们赶上？
诗一般的梦幻还会再现，
当你再次看见他们；
欢乐充满心田。

对于恩格斯思想的变化，特别是向自由主义方向转变，老弗里德里希是很担心的。他在给妻子毛里齐娅的一封信中谈到，“他表面上变得彬彬有礼，尽管先前对他进行过严厉的训斥，看来他即使害怕惩罚也没学会无条件服从。例如，令我感到懊恼的是，今天我又在他的书桌里发现了一本从图书馆租来的坏书——一本关于十三世纪的骑士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类书籍摆在书柜里而满不在乎。愿上帝保佑他心灵吧！我常常为这个总的来说还很不错的孩子感到担心。”但是，他担心又有什么用呢？外祖父早期的熏陶，学校里学习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再加上恩格斯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已使他完全进入了另一种思想境界和精神状态，一种父亲无法理解，而又无法扭转的精神世界。

恩格斯本来准备中学毕业后去大学深造，老弗里德里希也想把儿子送到大学专门从事经济学研

究，以便将来继承自己的事业。1837 年，老弗里德里希在巴门新开了一家公司，他要为这家新开张企业的兴盛而奋斗，对儿子的培养也必须服从这一目的，这就决定了恩格斯学业上的命运。

1837 年 9 月 25 日，离中学毕业还有 9 个月的时间，恩格斯怀着怨愤而又无奈的心情办理了退学手续。老师们，包括校长汉契克博士都为这个才华横溢、思路敏捷的学生感到惋惜。校长汉契克博士怀着遗憾的心情亲笔签发了恩格斯的肄业证书，上面写道：

该生在高年级学习期间操行优异，特别他的谦虚，真诚，热情引起教师们的重视；该生不仅资质很高，而且表现出一种力求扩大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值得赞许的愿望，因此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在无可奈何中，恩格斯离开了曾给予他丰富知识和无限快乐的学校，很不满意地去从事自己并无半点兴趣的商业活动。此时，他就像一只笼中的小鸟，还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一旦打破了牢笼，练就了一双坚硬的翅膀，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振翼长空呢？

恩格斯被迫辍学经商，然而，在巴门的商业所

里，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如何赚钱，而是社会问题。乌培河谷当时是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很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切问题在这里都有所表现，可以说，这里是资本主义德国的一个缩影。商业活动使恩格斯广泛地接触社会，使他有更多的时间，更全面地了解这个社会，逐步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政治价值观。

与恩格斯打交道最多的是小商人，这些人白天埋头做生意，而且是那么专心致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到了晚上，就三五成群，打牌消遣，或者抽着烟谈论着政治，直到九点钟各自回家。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生活着，没有丝毫变化，而且谁要破坏了这种生活方式，谁就会倒霉。父亲热心地把儿子引到这条道路上去，儿子也希望步父亲的后尘。这些人谈论的话题非常单调，巴门人喜欢谈马，爱北斐特人喜欢谈狗，当没有东西可谈的时候就品评漂亮女人的外表或者聊聊生意情况。

一次，恩格斯参加了父亲同公司合伙人欧门兄弟的一场业务谈判，使他更加清醒地认识了自己出身的这个阶级的本质。

恩格斯家族同欧门家族商议的是如何把一吨半废棉纱销售出去。老恩格斯建议重新加工，而英国人欧门主张将其供给普鲁士军队，以收取一笔佣金。

“欧门先生，你得考虑一下公司的牌子啊！”

“亲爱的恩格斯老板，你也要考虑一下我们可能赚的钱啊！”

谈判在继续着，老恩格斯不太情愿做肮脏的交易，欧门则不想蚀本。

“先生，只有笨蛋才会买这样糟糕的棉纱。”老恩格斯最后说。

“并不是所有笨蛋都会笨到与自己过不去，亲爱的！”欧门笑答道：“只要给国王的军需长官写封信，你就会相信这一点。”

“那信怎么写呢？”

“只需写上这么一句：欧门——恩格斯公司通过柏林国家银行给您的名下汇去所得款项的百分之二十以表示对阁下的敬意，这就足够了。”

“这不是行贿吗？”老恩格斯困惑地说。

欧门双手一摊，耸了耸并不宽阔的肩膀说：“您有点言过其辞了，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点儿薄礼罢了。”

恩格斯老板也难以抵抗金钱的诱惑，最终同意了欧门的建议。恩格斯十分厌恶欧门的商业欺诈行为，他冲着欧门冷笑了一声，但在父亲严厉的目光下恩格斯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恩格斯非常同情乌培河谷的工人，这些人天刚

蒙蒙亮就从自己的栖身之所——干草棚、马厩、楼梯甚至粪堆上爬起来，到低矮的房子里进行工作。在这里，他们吸进的煤烟和灰尘比氧气还要多。每到晚上，工人们涌进酒店，借酒消愁，当然他们只能喝那种低劣的烧酒。晚上 11 点酒店关门时，工人们才成群结队从酒店里钻出来，一个个酩酊大醉，大部分掉到路边的水沟里才能醒过来。此时，恩格斯已经朦胧地认识到，这里的人正向两极营垒分化，尽管此时恩格斯还不明白这两个营垒是现代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也不明白他们各自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但是，早期对工人状况的研究和了解，为他以后深入研究工人运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工人的境遇使恩格斯感到震惊；大量使用童工，造成大批工人失业的社会现象使恩格斯感到不满；大腹便便的工厂主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这又使恩格斯感到忿怒。但是，恩格斯还不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也想不出消除这种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他在不停地思索，又在不停地学习，以寻求建立他理想社会的道路和方法。

为了让恩格斯对商业工作的前景发生兴趣，并使他获得从事商业活动所必须的本领，一年之后，老弗里德里希把恩格斯送到了不来梅，在他的合伙人

洛伊波德的营业所里工作。

不来梅是德意志地区四大自由城市之一，当时约有五万人口。虽然这里也流行虔诚主义宗教，但比起乌培河谷要开明得多。在这里，政治上和哲学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通过报刊和书籍得到广泛传播。

洛伊波德是一个出口商，同时又是萨克森王国派驻不来梅的领事。受故友之托，他对恩格斯自然十分关心，精心培养。他的贸易公司与欧美各国都有商务往来，恩格斯的工作主要是抄写商务票据，收发信函，去海关装卸货箱，兼办检查库存。可以说，他的工作并不轻松。

恩格斯住在圣马丁教堂牧师长特雷维拉努斯家中。尽管特雷维拉努斯属于正统教派，但他并不是一个目光狭隘的宗教偏执狂。他是从事实际工作的牧师，主要精力放在慈善事业上。恩格斯与牧师一家相处得很融洽，他甚至被当作这个家庭的一员。在这里，恩格斯住了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清晨，东方刚刚露出晨曦，恩格斯就坐在教堂花园的长凳上读书了。对他来说，早读是一种享受。他在给朋友格雷培的信中说：“在春光明媚的早晨，坐在花园里，嘴里衔着烟斗，让阳光把背晒得暖和和的，再也没有比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更舒服了。”

不来梅是一个几乎同世界各地进行贸易的国际

大商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使恩格斯大开眼界，他有了更多的机会阅读外国报刊和文学作品。在工作之余，恩格斯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阅读文学作品和政治著作。尽管中学时已打下了坚实的外语基础，但实际应用时还远远不够，恩格斯买了许多有关语法的书籍，借助辞典认真阅读英文、法文、土耳其文、西班牙文报纸。很快，他通晓了多达 25 种语言，并且可以归纳出各种语言的特点，“荷兰的语言犹如大海的波涛……，意大利人的年轻语言十分温柔美好，它把诗人带到南方绚丽多彩的花园……，葡萄牙语是拍击着鲜花盛开的海岸的细浪，在那儿还听到轻风带走水神的低吟。法兰克福人的语言仿佛是哗哗的小溪湍急地奔流，永不停息的流水把顽石磨洗。古老的英语是一座雄伟的勇士纪念碑”。而德语则是这些语言的集大成者。

繁忙的工作和紧张的学习，并没有使恩格斯忘记丰富多彩的生活，他绝对不是一个书呆子。他认为，“工作，生活，青年人的朝气，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恩格斯的业余爱好十分广泛，对音乐尤其钟爱。他参加了歌咏小组，经常去歌剧院听音乐，看戏。他喜欢莫扎特的作品，特别欣赏莫扎特的《魔笛》。不过，最令他着迷的是贝多芬，他能以永不厌倦的热情去倾听贝多芬的奏鸣曲和交响乐，认为这是德国音

乐的顶峰。《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是他最喜爱的作品。在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谈到《第五交响曲》时说：“昨天晚上听的才是真正的交响乐呢！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部宏伟壮丽的作品，那么你一生就根本没有听过任何音乐。在第一乐章中这种充满绝望的悲哀，柔板中表现的那种哀诗般的忧伤，那种温柔的爱的倾诉，而在第三和第四乐章中由长号奏出的这种坚强有力的，充满青春气息的自由的欢乐。”1840年冬天，他还同公司里的一名同事一起去上舞蹈课，他要让自己笨拙的双腿跳出优美的华尔兹来。

不来梅这座城市以它的海港和近郊为旅游者提供了许多饶有兴趣的风景。恩格斯具有绘画的才能，他参观船舶，在市场上观察商人、马车夫和其他各阶层人物，画了许多写生画。他还把自己生活的某一个片断用画笔勾勒出来。恩格斯往往用栩栩如生的素描和维妙维肖的漫画把他写给亲戚、朋友的信装饰的绚丽多彩，收信人从这些插图中，能观赏到不来梅的风土人情和恩格斯的生活情趣。

闲暇时，恩格斯经常去不来梅城郊的威悉河游泳，他可以一口气游四个来回，使他感到自豪的是，当时没有人能陪他游这么远。冬天，他在威悉河上滑冰，从不来梅到费格萨克，近五个小时的路，他可以溜冰前往。恩格斯经常向玛丽亚炫耀自己是个无畏

的人，他最瞧不起那种“像狂犬一样害怕冷水，稍微有点凉，便穿上三、四层衣服，还以体弱免兵役为荣的人”。

为了练习击剑，恩格斯特意买了两把轻剑和一副手套，他非常乐于在击剑中显示一下自己的战斗精神，并为击败某个傲慢的年轻人感到高兴。

在不来梅，恩格斯开始从事一项直到 70 高龄还喜爱的运动——骑马远游，在荒郊野外策马纵横驰骋是他最得意的事情，这时，他忘记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恼，也忘却了虚伪的上帝，仿佛前面就是通向人类理想社会的坦途。

然而，恩格斯并不喜欢不来梅的城市生活，有时甚至感到非常伤感，正如他在给好友格雷培的信中所写：“这里没有人可以与我对酌，他们都是些庸人，我哼着记忆犹新的学生时代的活泼歌曲，怀着傲慢不羁的大学生的自负心情，独自坐在广漠的荒野里，没有酒友，没有爱情，没有欢乐，只有烟酒和两个不善饮酒的熟人。”

当时，很少有人能体会到恩格斯复杂的内心世界，德意志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使他感到茫然，理想中的宗教和上帝与现实社会状况的巨大反差又使他困惑。恩格斯要用“长在自己肩膀上的脑袋”去思索，去探求……

第二章 宗教与自由

只要我们还年轻，还富有火热的力量，我们就要为自由而斗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从小生活在一个宗教统治森严的环境里。在他出生不久，父母就把他送到教堂里接受洗礼，并给他领了受洗证书。从开始懂事之日起，父亲、老师、牧师就开始给他灌输宗教思想。尽管外祖父也曾告诫他，上帝在他的头脑里。然而，恩格斯的整个成长环境，家庭、学校、社会等等，无处不被宗教气氛，特别是虔诚主义宗教气氛所笼罩，虽然他也曾对宗教产生朦胧的怀疑，但上帝的存在一直左右着他的思想。

十七岁那年，恩格斯在教堂里行了坚信礼，牧师领着他背诵了这样一句宗教箴言：“忘掉那以往的一切，求取那未来的东西，我要努力前进，实现上帝赋

予基督的神圣使命。”这句话使他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他幻想万能的上帝有一天会把人类从痛苦的深渊解救出来，自己也可以承担起上帝的某种使命，从而成为上帝的优秀选民。1837年初，他甚至赋诗一首，赞美上帝：

主耶稣，上帝之子，请你下凡，
我在苦难的尘世把你祈盼，
啊，请你带走一切灾难！
请我主赐福，你的霞光把我笼罩，
好让我亲睹圣容。
一旦灵魂快乐，内心幸福，永无痛苦，
救世主啊，我将为你赞颂。

.....

当生命的痕迹消失，
我将欣然向你走去。
我的心灵赞美你，永远赞美你，
因为你主宰着我的心灵。

然而，这种天真的幻想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残酷的现实世界体现不出一点儿上帝的仁慈，整天辛勤劳动的人总是挨饿受冻，露宿街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反而美味珍肴，灯红酒

绿；那些作恶多端，多行不义的人，上帝从未加以惩罚；而那些淳朴善良，虔诚敬仰上帝的人却灾祸连连。对于恩格斯来说，现在的问题不像在巴门的家中，把自己宣布为齐格弗里特、退尔或浮士德的忠实拥护者就够了，面临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世界，他需要做出理性的思考，对宗教进行全面的批判。

19 世纪 30 年代，普鲁士在政治上日趋反动，国王威廉三世是政治上和精神上各种反动势力的核心，他既是教会的首领，又是一切进步势力的死敌。同时，为维护贵族利益，他又使教会成为统治的精神工具，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对付宗教上的反对派。普鲁士政府力图在一切领域内遏制进步势力，使科学从属于宗教，理性从属于咬文嚼字的信条。

在当时的反政府运动中，有两位杰出的作家和政治家即亨利希·海涅和路德维希·白尔尼。以他们两人为核心形成了“青年德意志派”。他们歌颂法国大革命，抨击德意志的封建专制统治、天主教会的蒙昧主义和窒息自由思想的书报检查制度。恩格斯特别推崇白尔尼，认为他是一个在政治上采取实际行动的人物，是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伟大战士。白尔尼反对农奴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宗教黑暗势力的号召，鼓舞着血气方刚的恩格斯，他逐渐成为“青年德意志派”的一员，并接受了他们的进步思想。

1839年4月，恩格斯在给格雷培的信中说：“我已经是一个诚心诚意的青年德意志派了。所有这些本世纪的观念使我夜不能寐，当我站在邮局旁，望着普鲁士国徽时，我浑身都充满了自由的精神；每当我拿起一份杂志阅读时，我都感受到自由的进步。这些观念正在渗入我的诗篇，并且正在嘲弄那些戴僧帽、身穿银鼠皮裘的蒙昧主义者。”

1839年3月—4日，恩格斯以弗里德里希·奥斯特涅特为笔名在《德意志电讯》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总标题为《乌培河谷来信》的文章，开始对宗教蒙昧主义进行公开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他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宗教上的神秘主义在乌培河谷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强烈谴责了虔诚主义的正统教派的本质。可贵的是，恩格斯还揭示了虔诚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工人贫困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工人贫困的原因在于虔诚派工厂主。恩格斯指出：

“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取代的成年工人。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虔诚派教徒的灵魂还不致因为一个儿童如何衰弱而下地狱，假如这个灵魂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没有事了。因为我们知道，厂

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乌培河谷的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可是，如果不是工厂主胡作非为，如果神秘主义不是像现在这样流行并且不会更广泛地流行的话，这一切也不会达到这样骇人听闻的程度。”

宗教神秘主义对人们思想和精神的禁锢，对乌培河谷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异教徒被无理审讯；不参加教会活动的人遭到谴责；甚至边界基督教小说也被说成是宣扬无神论的书籍；人们穿的衣服也必须是正统颜色，稍有越轨，那就活该倒霉。这里的人们“不管在什么场合，总是拿某个永远被称为是正统传教士的话来胡乱判断一切”。而说这些话的人却“不学无术，连圣经是用哪种文字——中文、犹太文还是希腊文——写的都未必知道”。“这块地方全都沉浸在虔诚主义的和善主义的海洋里，但从这个海洋里露出的不是鲜花遍野的绮丽的岛屿，而只是光秃秃的草木不生的峭壁，或是委蛇多沙的浅滩”。这就是恩格斯从小生活的那种环境，恩格斯生活于这种环境中，深感精神窒息。在《乌培河谷来信》中，他对这种宗教蒙昧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向宗教神学提出了挑战，他说：“很难想象，我们这个时代还会搞出这样一些名堂

来；但总可以相信，就是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这是恩格斯第一次向传统宗教神学提出挑战。

《乌培河谷来信》是恩格斯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这篇文章在爱北斐特和巴门轰动一时，载有《乌培河谷来信》的那几期《德意志电讯》成为非常抢手的杂志，一上市便销售一空。这篇文章在乌培河谷资产阶级和宗教卫道士圈子里引起轩然大波，《爱北斐特日报》主编亲自出马，写文章指责《乌培河谷来信》歪曲事实。“奥斯渥特”立即写信责问该报主编，要他指出文章中哪一点不符合事实，并明确告诉他：“我在乌培河谷度过的时间大概是您的一倍：我在爱北斐特和巴门住过，并且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就近观察各阶层的生活。”于是，那些凡夫俗子们开始猜测“奥斯渥特到底是谁？然而，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篇文章的作者竟会是巴门赫赫有名的笃信宗教的老弗里德里希老板的儿子。

此时，恩格斯对宗教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超自然主义的影响，他在给格雷培的信中说：“我一度是个神秘主义者，但这是过去的事，我现在是一个诚实的、对人宽宏大量的超自然主义者；我不知道我这个超自然主义者能当多久，但我希望继续当下去，

尽管有时候或多或少也倾向于唯理论。”而且，恩格斯对宗教的批判，也仅仅局限于批判宗教蒙昧主义，他所抛弃是正统神学。对于宗教，他认为：“宗教之树生长于心灵，它荫蔽着整个人，并从理性的呼吸中吸取养料。而它的果实，包含着最珍贵的心血的果实，是教义。”但是，恩格斯又指出：“我所以信教是因为我懂得了再也不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

1873年7月27日，恩格斯在给格雷培的信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宗教教义的欺骗性，他写道：“当人们把正统的福音基督教称作爱的宗教时，我觉得这是莫大的讽刺。按照你们基督教的说法，人类有十分之九是会永远不幸的，只有十分之一会得到幸福。弗兰茨，（格雷培的名——引者注）难道这一点能表明上帝的无穷无尽的爱吗？你想想要是上帝的爱仅此而已，他会显得多么渺小啊？”此时，上帝在恩格斯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动摇，他的思想正在进行一场激烈斗争。在给格雷培的信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恩格斯的复杂心情：“当然，你在你的信仰中就象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那么舒适，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为了解决有无上帝这个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你不了解一个人随着最初的怀疑而开始感觉到的那种负担即旧信仰的负担是何等沉重，当时他必须决定对旧信仰维护还是反对，是承担它还是将它抛弃。”

正当恩格斯在宗教信仰与无神论的十字路口苦闷彷徨时，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就象一盏明灯，为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大卫·施特劳斯是青年黑格尔派。1835年—1836年，施特劳斯出版了《耶稣传》，他力图从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出无神论的结论。黑格尔认为，宗教是“绝对精神”发展到“人类精神”的某一阶段的产物。据此，施特劳斯断言，圣经起源于神话传说，耶稣也不是神，而是一个平凡的人。关于耶稣的神话并非个别人有意识的虚构，而是整个民族或宗教团体无意识形成的，它反映了饱受沧桑的犹太民族早已形成的对救世主的信仰，把自古以来关于救世主创造种种奇迹的神话集中于耶稣身上，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神奇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施特劳斯的结论是，圣经中关于耶稣的传说是早期基督教团体无意识的集体创造的结果，福音书也不是神灵的产物，而只是一部神话。这样，施特劳斯通过对基督教起源的研究，巧妙地撕去耶稣是“上帝之子”那件神圣的外衣，排除了《圣经》神圣起源的可能性，推翻了《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这一传统说法。

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动摇了恩格斯对《圣经》神圣性质的概念，他痛苦思索的问题终于有了圆满的答案。“是谁赋予我们盲目地信仰圣经的权利呢？

不过是在我们以前就这样做的那些人的威望而已……，圣经是由许多作者写的许多片断组成的，而作者很多人自己也对神性无所要求。难道仅仅因为父母对我们讲过，我们就必须违背自己的理性而相信它吗”？

“上帝”这个神圣的偶像在恩格斯头脑中终于被推翻了，他兴奋地对朋友格雷培说：“威廉，威廉，威廉啊！终于有了你的消息！小伙子，你现在就听我说；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了。你们这就来吧，现在我可有了武器，有了盾牌和盔甲，现在我有把握了；你们就来吧，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也能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你们不知该往哪儿逃。真的威廉，*Jacta est alea*（已成定局），我是施特劳斯主义者，我是个微不足道的诗人，在天才的大卫·施特劳斯的羽翼下藏身……，这里有芜杂和离奇的四福音书；神秘主义拜倒在它们面前，对它们顶礼膜拜——看，突然间大卫·施特劳斯像一位年轻的神一样出现了，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A—diuos*（永别了）宗教信仰！——它原来就象海绵一样漏洞百出……要是你能驳倒施特劳斯——那好吧，我将再度成为虔诚主义者。”

恩格斯还认识到，宗教和科学是对立的，宗教的反动实质在于它的反科学，反理性，它要把科学变成

自己的奴婢。圣经上有这样一个故事：上帝因世人行恶，降下滔滔洪水淹没大地，只有诺亚事先得到上帝的启示，造了一艘大方舟避难，人类才免灭绝。恩格斯指出：“如果地质学家作出的结论不同于摩西的创世史，它就会遭到诽谤；如果他作出的结论似乎和圣经所讲的相同，就会被引用。比方说，如果某个地质学家讲，地球和化石证明了曾经发生过一次洪水，这就会被引用，但是如果另一个地质学家发现这些化石属于不同时期，并证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都发生过洪水，那么地质学家就会遭到谴责。”他反问道，“这样做难道正当吗？”

为了歌颂科学，反对宗教蒙昧，恩格斯于 1840 年翻译发表了西班牙诗人，政治活动家努埃尔、霍塞、金塔纳的诗《咏印刷术的发明》，诗中咏道：

哥白尼飞上星光灿烂的苍穹；
那儿曾一度充满稠密的以太，
他透过无限的太空，
观察那把光明带给我们的最耀眼的星球。
伽利略感到地球在脚下转动，
惊慌失措的罗马，却把他投入牢笼。
但地球一如既往的飞行，不知疲劳，
在无边的宇宙大海中飘浮，

光辉灿烂的诸天体同它一起，
在火光中不停地飞翔。
这时又来了牛顿的敏捷精灵，
紧跟着它们，
他指出他描绘的运动永远循环不停。

这首诗赞美了同宗教愚昧顽强抗争的科学巨擘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指出，科学是客观存在的真理，是任何宗教力量所无法阻挡的，就如同“塔霍河的波浪，既然涌入大海，难道还会倒流？纵然迎面矗立着崇山峻岭，也挡不住奔驰的飓风，命运带着它越过重重障碍，送往那汹涌澎湃的海洋。”

恩格斯在研究施特劳斯主义的过程中，了解到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为了彻底弄懂黑格尔哲学，他一连几个星期，每天夜里钻研黑格尔深奥难懂，文风晦涩的哲学，他完全被黑格尔哲学博大精深的体系和辩证法吸引住了，为此，他反复阅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1839年11月中旬，恩格斯在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说：“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在12月21日的信中，

恩格斯又谈到：“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像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博大精深体系中最重要要素。”

1840 年春天，恩格斯去英国旅行。在横渡英吉利海峡时，他站在船头，望着那遥远的绿色海面。那时，波涛汹涌，永不停息；那里，阳光从千千万万舞动的小明镜中，反射出一道道耀眼的光芒；那里，碧绿的海水同蔚蓝的天空以及金色的阳光交融成一片奇妙的色彩。这时，恩格斯感慨万千，浮想联翩。他想：当 19 世纪最了不起的一位哲学家（指黑格尔）的最宏伟的思想第一次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一阵幸福的战栗在我身上掠过，宛如从晴空飘来一阵清新的海风吹拂在我身上，思辩哲学的深邃，宛如无底的大海展现在我面前，使那究根寻底的视线，怎么也无法从海上移开。”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特别是辩证法思想，使恩格斯深受鼓舞，他甚至把黑格尔的思想比作思想的宫殿，青年的试金石。从此以后，这位已是 20 岁的青年就把自己的业余时间用来研究内容丰富的哲学，在他看来，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灵魂。”他致力于研究伊曼努尔·康德和约翰·费希特的思想，并在研究过程中熟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哲

学思想。

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恩格斯深深感到，在宗教蒙昧主义盛行的今天，哲学对青年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认识到，“我们的未来比任何时期都更多地取决于正在成长的一代，因为他们必需解决日益增长的矛盾”。因而，应该让青年人走自己的路，他们会找到自己道路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青年人“要以顽强的劳动去掌握新的哲学，同时又不丧失青年人的热情。谁害怕思想之宫所在的密林，谁不敢持利剑冲进密林又不敢以热吻唤醒沉睡的公主，谁就得不到公主和它的王国”。恩格斯鼓励自己的同代人，要像“苍鹰一样，不怕思辩的乌云和抽象顶峰的稀薄空气，朝着真理的太阳飞去”。

恩格斯崇拜黑格尔，崇拜黑格尔的哲学，但他并不是机械地接受黑格尔的理论。恩格斯是一位有分析能力和批判能力的青年，从他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恩格斯主要是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不完全受其哲学体系约束。1840年2月，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时代的倒退征兆》的文章，该文就是运用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向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错误观点提出挑战。黑格尔认为，等级君主政体是人类历史的顶峰，是既不会发展也不会消灭的理想国家。对此恩格斯提出异议，他

说：“我宁愿把历史比作信手画成的螺线，它的弯曲绝不是很精确的。历史从看不见的一点徐徐开始自己的行程，缓慢盘旋移动；但是，它的圈子越转越大，飞行越来越迅速，越来越灵活，最后，简直象耀眼的彗星一样，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不时擦过它的旧路程。而且，每转一圈就更加接近于无限。谁能预见到终点呢？”由此可见恩格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不彻底性。

因而，恩格斯不可能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黑格尔派，一方面，黑格尔的学说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不能使恩格斯感到满意。更重要的一点，无论是黑格尔的学说，还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说，基本上局限于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远远地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实践，特别是脱离了政治。在恩格斯看来，“争取自由和权利的伟大战士”路德维希·白尔尼的思想正是弥补了这一缺陷。因此，恩格斯提出，应该把黑格尔深刻的哲学理论同白尔尼大胆的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他说，“这就是德国政治精神发展的最新阶段，而我们时代的任务就在于完成黑格尔思想和白尔尼思想的相互渗透。”

恩格斯之所以希望把白尔尼和黑格尔的思想相结合，是因为他看到了德国革命斗争不仅需要深刻的理论，更需要勇敢斗士，因而白尔尼和黑格尔是相

辅相成的。白尔尼是个政治实践家，“他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完全实现了这个使命……，他用西得的话提醒德国人，只有舌头没有手，你怎么敢说呢？谁也没有象白尔尼那样描绘事业的伟大，他浑身都是生命，他浑身都是力量，只有他的著作可以称得上争取自由的行动。”与白尔尼并驾齐驱的是黑格尔——“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的哲学“竟敢从理论的风平浪静的港湾驶向事件的波涛汹涌的海洋……，这种哲学正是为了抨击现存事物的实际状况而已剑拔弩张？”所以恩格斯认为，白尔尼和黑格尔可以取长补短，两者的结合是德国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

在德意志，封建王朝不仅是宗教迷信的卫道士，而且是遏制人民自由、进行专制统治的堡垒。要清除宗教蒙昧主义，争取自由、民主把人民从专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就必须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专制王朝。

这一时期，恩格斯在精心研究哲学的同时，还以巨大的热情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此时，他的文学创作已经完全同他所从事的事业结合起来，即向封建专制制度、宗教蒙昧主义宣战。为此，他重点阅读海涅和白尔尼的作品，他认为，从他们的风格中可以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同长长的，平铺直叙的描写相互交织；简洁的语言同闪闪

发光的形象和迸发出耀眼火花的妙语相互交织。”

1840 年底，恩格斯写了一首题为《夜行》的诗，叙述了他在被奴役的德意志国土上夜游，并且梦想着早晨会被宣告自由的钟声所惊醒：

黑夜里，我独自驱车，
行驶在我们熟悉的德意志国土上，
这里到处都被强权压制，
人们胸中燃烧着怒火万丈——
因为历尽艰辛赢得的梦寐以求的自由
又被剥夺，
那些恶毒的舌头，正当众把它辱骂。
……夜空明澈，新月如镰，
像达摩克利斯的利剑，
高悬在黑沉沉的首都上空，
圣怒远震四方，不可阻挡。
……
瞧，东方正在破晓，清晨即将来临，
它委派启明星作先行，
自由的钟声把世人催醒
钟声预告：不是暴风雨，是欢乐的和平……。

在诗中，恩格斯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在另一首

题为《黄昏》的组诗中，他开头便引用了英国进步诗人雪莱的诗句“明天一定会到来”

表达了他对祖国美好明天的信心。在这首诗中，恩格斯明确宣布：

我就是这样一个自由的歌手，
白尔尼就是那株巨橡，
当压迫者给德意志带上枷锁，横加蹂躏时，
我曾依偎在它的树干上。
是的，我就是这样一只勇敢的小鸟，
在自由的以太大海中翱翔；
尽管在他们眼中我只是一只雀儿，——
但我宁愿做一只遨游世界的雀儿，
也不愿做一只笼中的夜莺，
为老爷们寻欢作乐而歌唱。
恩格斯期待将把整个大地变为一座美丽花园的
自由曙光的来临：
西方的霞光已经泛，再等一等——
自由曙光就会出现白；
黑夜正在消失，带走了它的苦难，
旭日东升，喷吐出不灭的火焰。
那时，不仅在我们播种的地方，
初生的蓓蕾竞相开放，

整个大地都变成花园，万紫千红吐露芬芳。

而且，恩格斯还预言，这个新的曙光将会为人们带来自由和幸福：

那时候，大船乘风破浪，
不为财主运载储存的财货，
不是为商人运载致富的商品，
只是运载幸福和自由的美果。

1839年，恩格斯在法国七月革命九周年时，赋诗一首，希望发生在法兰西的暴风骤雨很快能席卷德意志大地，荡涤封建势力：

狂风卷起千堆浪，暴风雨袭来，狂烈凶猛！
怒海波涛如人立，小舟逐浪，起伏颤动。
旋风从莱茵河呼啸而来，把乌云聚集在天空，
它摧裂橡树，扬起尘柱，推波助澜澎湃奔腾。
我在颠簸的小舟中不由得想起你们——德意志
各邦君主！
忍辱负重的人们曾经肩负着你们高踞的黄金宝座，
胜利地走遍祖国大地，赶走了冒险的征服者；

就在那时，你们胆大妄为，你们背弃了一切诺言。

现在，暴风雨从法兰西向我们袭来，
人民群众此伏彼起，

你们的宝座如小舟在暴风雨中飘摇，
你们的权杖即将落地。

恩斯特——奥古斯特，你首当其中，
我愤怒的目光要盯住你：

你这愚顽的暴君践踏法律，
听，暴风雨在咆哮！

瞧，人民怒目相视，剑将出鞘。

你说！你能安坐黄金宝座，正象我稳坐小船中，
任其飘摇？

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封建统治阶级决不会把自由、平等恩赐给人民，更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用温良恭顺的态度是什么也办不成的，这些侏儒——奴性、贵族的统治、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必须用剑来铲除”。他又说，人民期待着反对专制制度的暴风雨的来临，就像“声音响亮的出猎号角正期待着猎人来吹奏，以猎取暴君。”恩格斯仿佛已看到革命的烈火在熊熊燃烧，人民已经拿起武器正同专制王权作斗争，使得“王座摇

摇欲坠，祭坛颤动不已。”

恩格斯对封建专制王朝无比痛恨，他把“公正大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比作恶棍，认为“没有哪个时期比 1816 年到 1830 年这个时期更充满王室罪行了；几乎每一个当时掌握统治权的国君都应处以死刑。”如阴险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只会签署死刑判决书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比法国革命的全体英雄还要伟大的流氓葡萄牙国王唐·米格尔；俄国的杀人犯亚历山大以及不愧为他弟弟的尼古拉。列举这些人骇人听闻的罪行简直是多费口舌，他进而提出，要把旧世界化为废墟，“把暴君们的淫威消灭干净”，“把旧时代的残余鞭成齑粉”。恩格斯告诫人民，不要对封建君主抱有任何幻想，即使是迫使统治者实行某些改良，也必须依靠人民的斗争，因为“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鹅卵石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

这一时期，恩格斯就是用手中的笔做武器，他的一篇篇政论文章、诗歌、通讯、书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就象掷向反动营垒的标枪。他要通过这些富于战斗精神的文学作品，把尚处于昏睡状态的人们唤醒，去从事争取人类自由和平等的斗争。在不来梅的两年多，他共发表三十多篇作品。恩格斯知道，书

报检查官决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这些文章，他也决不愿意扼杀自己的思想，尽管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减是令人不快的，但也是光荣的。“一个年已三十或写了三本书的作者竟然没有同书报检查机关发生过冲突，那他就不值一提；伤痕斑斑的战士才是最优秀的战士。”

由于恩格斯抛弃了“乌培河谷时代的信仰”，他与以前在爱北斐特中学时的朋友格雷培兄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现在恩格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观点更加深了这一裂痕。格雷培兄弟责备恩格斯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并试图“开导”他，使他回头。但遭到了恩格斯的驳斥和嘲笑。“我的政治信念不是你这个政治上的瞌睡虫所应指责的。如果不去扰乱你在乡村公馆的安宁——更高的目标你是不会有的——并且让你能每天晚上与牧师太太以及牧师的一些年轻儿子安逸地溜达一阵，免得遭到任何非难，那么你将会沉溺于安乐而不再想到胆敢非议现存制度的坏蛋弗·恩格斯了。嘿，你们真是英雄好汉！”

1841年春，恩格斯商业实习期满。在不来梅的两年，是恩格斯一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他抛弃了乌培河谷时代的信仰，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从一个朦胧的追求自由与进步的青年学

生成长为一个为人类自由和平等而奋斗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第三章 兵营与大学

凡是真的东西，都经得住火的
考验；

一切假的东西，我们甘愿与
它们一刀两断。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1年4月初，恩格斯结束了在不来梅商业所的实习生活，回到故乡巴门市。岁月流逝，故乡却依然如故。这里的生活，与恩格斯追求的相差太远。在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恩格斯道出了自己心中的苦闷：

“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参加婚礼，探亲访友。是啊，我去了，在那里又吃又喝，而事后又把这些事议论一番，这根本不是我的作风，况且你也不习惯从我这里听到这种事，现在我几乎整天在楼上，坐在我的房间里读书，象蒸汽机车头的烟囱那样喷吐烟雾，把剑舞得呼呼响，想尽一切办法来消遣。”

在巴门的几个月里，由于从事政治活动的机会比不来梅时要少得多，他便埋头在书堆里，继续努力学习新的语言，特别是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还有一些时间花在音乐方面，他曾非常忘我的演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偶尔也与自己的弟兄们练习击剑，指导他们学习。但总的来说，巴门对恩格斯是一个“乏味的巢穴”。为了打破家乡单调的生活，这年夏天，恩格斯去意大利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经过瑞士的巴塞尔和苏黎世，一直走到米兰。这次旅行对恩格斯特别适宜，因为他正需要新的经历和感受，一方面迅速忘掉失恋的痛苦，另一方面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做出选择。

在瑞士的苏黎世城，浏览了市容，登上被称作“小里加”的禹特利贝克峰，从山顶望去，整个湖面一览无遗，绿水青山，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在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可以看到绿草如茵的谷地，山坡上有翠绿的橡树林和黛绿的云杉林，一片绿色的海洋中，丘岭似波浪起伏，一幢幢房屋似大海中的航船；南面，闪光的冰川绵延天际，五月的阳光从上面，从蔚蓝的天空洒向盛装的世界，从而湖泊、田野和山峦竞相争辉，真是气象万千。

美丽的景色使恩格斯格外激动，他向大自然倾吐了自己单恋的痛苦，”……并不是就我一个人怀着

一个月以前无限幸福而现在却已破碎寂寞的心情站在这里。还有什么样的悲痛比一切个人痛苦中最高尚最崇高的痛苦即爱情的痛苦更有权利向美丽的大自然倾诉呢？”大自然的瑰丽景色驱散了郁积在他心头的惆怅，他重新振作起来。

第二天，恩格斯来到了苏黎世湖中心的岛屿——乌福瑙岛，凭吊了骑士胡登的陵墓。在英雄的墓前，恩格斯感慨万千：胡登生前是那样为自由思想而斗争，如今不再战斗，不再辛劳而长眠了，“——有谁会得到这样的赏赐啊？湖中的绿浪拍打着英雄陵墓，犹如远处传来的兵戈相击声和战斗呐喊声，守卫陵墓的是冰封雪裹，永葆青春的巨人——阿尔卑斯山脉！”

这次旅行结束后，恩格斯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屈从于父亲的意志，当一个工厂主，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或者坚持自己的政治思想，继续从事并献身于争取自由与进步的事业，恩格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1841年9月，征兵开始了，根据普鲁士法律，恩格斯要服一年兵役。尽管他并不喜欢充满着黩武主义气氛的军旅生活，而目前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花一笔钱就可以免服兵役。但是，为了摆脱父亲的约束和巴门令人窒息的生活气氛，恩格斯决定应征服兵

役。由于他只是当一年的志愿兵，所以可以自由选择服役的地点。恩格斯选中了柏林——普鲁士的首都，他准备全面考察一下普鲁士的政治、文化生活。

1841 年 9 月，恩格斯作为一年制志愿兵来到柏林，一年制志愿兵属于义务兵，是经过考核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志愿而不是强征入伍的，服役期一年，但制服和膳宿费自理；在炮兵或骑兵中服役，每人另需支付 32—34 塔勒的养马费。实行这种优惠的原因在于尽量少影响有文化的青年人的必要的学习，而且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无疑要比一般人更容易掌握军事知识。

柏林当时有 15 座兵营，恩格斯被编在库弗尔格班广场兵营，在第 12 近卫炮兵连当炮兵。在普鲁士，人们把炮兵当作资产阶级的兵种，军官团里只有少数几个贵族而且都是比较进步的。但是近卫军炮兵则是一个例外，恩格斯所在的第 12 炮兵连在全旅是一支以特别可靠和忠于国王而著称的军队。恩格斯服役期间，这个连队曾多次接受普鲁士国王的检阅。恩格斯在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写道，他对“在讨厌的宫廷广场上来回奔跑毫无兴趣”。

兵营的生活是十分严格的，崇尚军国主义的普鲁士军队尤其严格。每天上午在广场操练队列，或者跪在沙滩上练习射击。炮手们还要手持又长又粗的

大炮通条，抱起六磅重的炮弹，围着大炮的轮子不停打转，夜间有时要进行急行军。

最使恩格斯难以忍受的是每隔四个星期要到教堂去一次。去教堂的时候，士兵们首先要戴上沉重的带羽毛的高筒军帽，在院子里站上整整一个钟头，全身冻僵了，才进入冷冰冰的教堂。而且，教堂里的音响很差，牧师讲道时根本听不清楚。这个已抛弃上帝的士兵对此毫无兴趣，甚至感到厌烦。因而，他只去过一次，以后到去教堂的时候，他便设法溜掉。

一年的军营生活使恩格斯学到了不少军事知识，他很快便熟悉了普鲁士军队的情况。由于常常能出色地完成训练项目，因此恩格斯颇得“老上尉”连长冯·韦德尔的赏识。韦德尔十分关心那些一年制的志愿兵，在他看来，一年制志愿兵应该是连队的楷模。青年恩格斯和老上尉之间的私人关系非常融洽，当然，如果这位新兵在执行勤务时马虎草率的话，老上尉照样呵斥责备。

为了调节军营枯燥的生活，恩格斯从朋友那儿弄到了一条小猎犬，并给它起了一名字——“无名氏”。很快，恩格斯便将“无名氏”训练得服服贴贴，只是“无名氏”悟性不太强，只学会了一件事，当恩格斯指着一个人对它说：“无名氏”，这是一个贵族。“无名氏”便会对那个人表示无比忿怒，并且冲着他

汪汪大叫。

半年后，恩格斯被提升为下士炮手，当时普鲁士的炮手是一种士官军衔。炮手的制服镶着金边和金带，衣服是蓝色红边。在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恩格斯开玩笑说：“你对我可要毕恭毕敬才是，因为我当上了炮手，我就有权对整个普鲁士军队里所有的列兵发号施令，所有的列兵都要向我敬礼。”本来，恩格斯有一次机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在一年一度的射击考核中，由于眼睛高度近视未能得好成绩，恩格斯一直作为下士直到退役。

恩格斯同连队官兵关系十分融洽，训练时也倍受关照，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诅咒所谓“格吕茨马赫”——步兵训练场。后来他回忆说：“我们经常在一个很大的广场……进行一些很有趣的训练，我们要站在没膝深的沙土里。这种沙土具有一种令人愉快的特性，它是带电的。如果我所在的第12近卫重炮兵连同样也是带电的，不过要带阴电，如果它现在开到这里来，那么阳电和阴电就会相遇，造成空气紊乱，把乌云吸引过来。否则，至少我是怎么也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即每当我们连队前往格吕茨马赫的时候，不是下雨就是下雪。

服役六周后，他在离兵营不远的多罗特恩大街56号楼二楼租了一个房间。因为根据普鲁士军事条

例的规定，服一年兵役的志愿兵可以找一个私人住处，恩格斯讨厌住士兵的营房，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耻辱。更主要的是，他不愿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练兵场上和军营里，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来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恩格斯租的是一个相当雅致的房间，有三个窗子，十分明亮。

在柏林的一年中，恩格斯主要精力并没有放在兵营的训练场上，柏林为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他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于在柏林大学旁听和自学上。

柏林是欧洲的一个大城市，1841年时已有人口33万多。柏林有许多名胜古迹和文化设施，这里的古迹反映了日尔曼民族发展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外国人如果不仔细观察该城的全部名胜古迹，那么对他自己，对欣赏能力都是真正的犯罪。”然而，在恩格斯眼里，柏林最著名的地方却不是那名胜古迹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一所大学——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是柏林思想文化中心，大学里有很多讲堂，有机智和迂腐的教授，年纪轻的和年岁大的，活泼和严肃的大学生，新生和老生等多种多样的人。恩格斯认为，“柏林大学的荣誉就在于，任何大学都没有像它那样屹立于当代的思想运动之中并且像它那样使自己成为思想斗争的舞台”。德意志的其它大

学，如波恩大学、耶鲁大学、莱比锡大学以及海德堡大学等等，大都回避这种思想斗争而深深地陷入专搞学术的麻木不仁状态之中。这种麻木状态长久以来就是德国学术界的不幸和悲哀。“相反，柏林大学教师中却有各种派别的代表，从而造成活跃的辩论气氛，这种辩论使学生能够容易对当代的各种倾向进行比较，容易获得明确的认识。正是柏林大学宽松的学术环境，进一步开拓了恩格斯的思想。

恩格斯是以旁听生的身份在柏林大学听课的。其实他并没有旁听的权利，按照柏林大学的规章，只有那些因为进入正规部队而辍学的军人才允许去旁听；而恩格斯在服役前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所以在恩格斯听课的两个学期中，一直是属于偷听讲课的“黑户”。

根据柏林大学的规定，每个学生在听课期间只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座位上标有授课教师为他规定的号码，而且整个学期都有效，如果某个学生因故不能听课，他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占用该生的座位。所以，课堂上总是只有最后几排座位供旁听生使用。上公共课时，恩格斯随便坐哪一个座位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私人授课，即所谓的私有讲座时，听课人的范围是有限的，而且教授和听课人彼此都认识，如果有陌生人出现，马上就会引起骚动。而这类

讲座水平一般较高，所以也是恩格斯最愿意参加的。他第一次听私人讲座便给主讲人带来了小小的麻烦。

1841 年 12 月，恩格斯身着军服去听弗里德里希·吕凯特教授的课，吕凯特教授是恩格斯在巴门读中学时非常崇敬的诗人，所以吕凯特教授本学期第一次办私人讲座，恩格斯便早早来到教室等候，并且坐在了前排一个很显眼的地方。吕凯特眼睛朝天，口若悬河地讲了几分钟后，突然发现了身穿军服的恩格斯，并且目不转睛地看恩格斯军服上闪闪发光的纽扣，结果把思路打乱了。他不相信有人敢违背学校的“优良作风”。

“请问，尊敬的军人，你是否有校方发的听课证？”

“教授先生，没有。但是我在读中学时非常喜欢您的诗，所以得知您要开办私人讲座，便从兵营里赶来了，为此，我还特意请了假。教授先生，希望您能给我机会。”

看到这个年轻的军人对自己如此崇拜，吕凯特心花怒放，他答应恩格斯，“你以后可以旁听我讲的任何课程。”

恩格斯在柏林大学主要旁听哲学课，如韦尔德、谢林、马尔海奈凯、米希勒的哲学讲座，另外还参加

了贝纳瑞教授主持的宗教史研究班。其中马尔海奈凯教授及其哲学讲座引起了恩格斯的特别注意，他在《一个旁听生的日记》中写道：“他身材结实强壮；有一副思想家的严肃，果断的相貌；高高的前额上披散着因绞尽脑汁而斑白的头发。他讲课时，举止落落大方，没有那种埋头念讲稿的学究气，也没有戏剧性的、故作姿态的手势；他的姿态象年轻人那样豪爽，目光专注地望着听众；他讲得很平静、庄重，慢条斯理而又流畅通达；平铺直叙而又极富有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一个接一个地涌出来，后一个比前一个更能准确地击中目标”。

马尔海奈凯在课堂上严正批驳了基督教哲学家谢林对黑格尔哲学的攻击，把谢林比作是“和巨人搏斗的侏儒，或者像那位更加著名的、和风车搏斗的骑士”。马尔海奈凯的课博得恩格斯及所有听众的喝彩，因为他击中了谢林哲学的要害，捍卫了黑格尔哲学和科学与自由。

当时，正值著名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谢林讲授《启示哲学》。谢林是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他的早期政治思想是反封建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他的思想日趋反动，并和基督教正统思想结合在一起，为封建专制统治辩护。而基督教正统思想也希望谢林在

哲学领域给青年黑格尔派以打击，迅速地使无神论者哑口无言。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国王威廉四世诏年已 66 岁的谢林到柏林大学，让他主持哲学讲座。

为了亲眼目睹这场刚刚开始斗争，恩格斯于 1841 年 11 月 15 日来到柏林大学第六讲堂，听谢林讲授“启示哲学”第一课。约有 400 人聚集在这个教室，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各界名流；有从德国各地来的，也有来自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土耳其的政治家和留学生；有基督教徒，也有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他们是想听听基督教的启示是怎么回事。这么多不同身份、不同信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来听一个教授讲课，这在柏林大学也不多见。

上课的铃声响了，谢林登上了讲台，此人中等身材，白发苍苍，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眼睛的神情与其说威严，不如说快活，加上他那有一点儿发胖的身躯，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位天才哲学家，倒不如说是一位和蔼的家长。他声音并不悦耳，但却有力，操一口土瓦本——巴伐利亚方言。

谢林以哲学“权威”的架势，首先讲了一通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哲学的发展史。他以轻蔑的口吻谈到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咒骂他们是魔鬼的奴仆。他特别攻击黑格尔，说黑格尔把半个哲学变成了一个哲学，一生一无所获，“其实黑格尔根本就没

有自己的体系，他只不过是从我思想中收拾残羹剩饭以维持生存而已。”最后，谢林转入正题，煞有介事地宣传他的天才发现“启示哲学”：世界上万事万物以上帝为本源，最终以上帝为归宿；宗教高于科学，信仰高于理论……。

恩格斯听着听着，心头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忿怒，他对谢林为达到个人目的而毫无根据地攻击黑格尔感到极度愤慨。为了“保护死者”，恩格斯把谢林讲授的内容尽量多地记下来，下课后又找了两本笔记，回到多罗特恩大街 56 号楼二楼的房间里。这一夜，他思绪万千，无法入睡。威廉四世诏谢林到柏林，任他在柏林大学的讲坛上攻击黑格尔及其弟子，显然，谢林及其后台的攻击矛头并不仅仅指向黑格尔一个人，而是对着包括青年黑格尔派的所有进步力量。他的“启示哲学”就是普鲁士王国的御用哲学。面对谢林的攻击，必须予以坚决的回击。烛光下，恩格斯奋笔疾书。1841 年 12 月中旬，即谢林在柏林大学开讲四个星期后，《德意志电讯》杂志发表了恩格斯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的文章《谢林论黑格尔》，1842 年初，恩格斯又发表了《谢林的启示》和《谢林——基督教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两本批判谢林的小册子。对谢林进行全面回击。

恩格斯首先指出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谢林哲学

的实质，他说：“如果你们现在，在这里，即在柏林，随便向一个哪怕稍懂得一点精神统治世界的人，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争夺对德国舆论的统治地位即争夺对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的战场在哪里，他会回答你们说，这个战场在柏林大学，就在谢林讲授启示哲学的第六课堂。斗争的双方是两个青年时代的老朋友，一个在十年前已经离开人世，但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生气地活在他的学生中间；另一个，在这些学生看来，三十年来精神上早已死亡，如今却突如其来地自认为有充沛的生命力，要求得到公认。如果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看，谢林在柏林的讲演中对黑格尔所作的死刑判决……是对黑格尔当年给谢林所作的死刑判决的报复。”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谢林与普鲁士王朝的关系，指出：“他是为普鲁士国王维护自己的体系，因为过去无论如何也无法具有完备形式的东西，国王一声令下，马上就完成了。他就这样带了一箱装着信仰和知识调合物来到这里，让人家谈论他，最后，登上了讲台。他带来的新东西，他想要用来创造奇迹的闻所未闻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他‘自从1831年以来就以同样方式’在慕尼黑宣讲过的启示哲学，是源远流长的神话哲学。”

针对谢林贬低和篡改黑格尔哲学的恶劣行为，恩格斯旗帜鲜明地站出来维护黑格尔哲学的进步

性，特别是捍卫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恩格斯捍卫的是黑格尔“非静止的辩证法”，同时也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全部不彻底性和全部矛盾。他深刻指出：“黑格尔本人设置了界限，它们像堤坝一样拦蓄从他学说中得出的强有力的，有如急流般的结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则是彻底独立和自由的，但他的结论却是谨小慎微，甚至保守的。恩格斯认为。这正好应了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即“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黑格尔自己也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这表明，恩格斯在捍卫黑格尔哲学的斗争中，已开始褪去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向唯物主义转变。

恩格斯还揭露了谢林启示哲学的反理性主义实质。谢林认为，哲学是研究超越一切经验以外的事物，即“不可追溯的存在”。而存在先于思想，理性完全没有能力证实某物的实在，只有通过启示，在信仰中才能领悟到。恩格斯批驳说：“按照谢林的观点，由此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纯思维中，理性的研究对象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而是可能的事物；不是事物的存在，而是事物的本质。与此相应，只有上帝的本质而不是上帝的实在才能作为它的研究对象。”因而，谢林的启示哲学就是非理性主义的神学。因为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公开声明同纯理性一刀两

断。自从有经院哲学家以来，谢林是决心迈出这一步的第一人”。恩格斯又嘲讽说：“近五百年来，一位科学英雄第一次出现了，并宣布科学是信仰的奴仆。他这样做了，而且对后果承担责任。”

恩格斯认为，他同谢林作斗争是为了捍卫黑格尔。尽管他是一个年青人，“如果打算教训一位长者，本来就是一种无礼的行为，何况是教训谢林”。但是“我们这些得益于黑格尔要比黑格尔得益于谢林更多的人，难道能够容忍，在死者的墓碑上刻写这种侮辱性的话而不向他的敌人——不管这个敌人多么咄咄逼人——提出挑战以维护他的声誉吗？”进而他又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大师的茆墓不受侮辱。我们不怕斗争……凡是真的东西，都经得住火的考验；一切假的东西，我们甘愿与它们一刀两断。”恩格斯甚至向谢林提出挑战，“让谢林再作一次尝试吧，看他是否能在自己的周围聚集起一个学派”。

恩格斯坚信，尽管谢林来势很猛，并且有普鲁士国王做后台，但理性必将战胜迷信，真理终将驳倒谬误。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汇集到黑格尔的旗下，“那些支配着我们的思想，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得到更广泛的发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勇敢、坚定、才华横溢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恩格斯怀着必胜的信念呼吁“让我们勇敢地投入战斗，去反对新的

敌人吧；我们当中终将有人出来证明，热情之剑也像天才之剑一样锋利。”

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和小册子在德国文化思想界引起极大震动。保守的和反动的御用报刊，都对这些文章的发表怒不可遏，柏林的《福音派教会报》、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以及“奥斯渥特”家乡的《爱北斐特日报》等蜂拥而上，一起对恩格斯的匿名文章进行恶毒攻击。特别是《福音派教会报》大骂青年黑格尔派“宣传革命和反对大人物以谋求人的独立自主”，并从“奥斯渥特”的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最新的雅各宾派的明目张胆的目标”，指责作者是试图在德国煽动革命。谢林也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刚刚重出江湖便被猛击一拳，他更想不到自己的对手会是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靠自学和旁听而逐步崛起的一个 20 挂零的毛小伙，他只得草草地结束了自己在柏林大学的讲座。谢林结束讲座的当天，即 1842 年 3 月 18 日晚上，在恩格斯以及德国进步思想界的影响下，柏林大学的进步青年学生在谢林的住所莱比锡大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他们高呼口号，要谢林从柏林滚出去。谢林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哲学学说会这么令人讨厌，这么一钱不值。他无可奈何地辞去了柏林大学的教职，灰溜溜地离开了柏林。这时，谢林才明白，德国的哲学已无他的一席之地。

恩格斯的作品受到德国进步思想的欢迎，德国的进步报刊如《莱茵报》、《汉堡新闻》、《德意志年鉴》等都对作者表示支持。恩格斯的《谢林和启示》在阿·卢格出版的青年黑格尔派刊物《德国年鉴》上获得高度评价，认为作者的风格和观点充分体现了青年人的锐气，文章语言生动，富于战斗力，对谢林的批判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立场。当卢格得知文章的作者是恩格斯后，就给他写信，称他为“哲学博士”，还对恩格斯没把这篇极有价值的文章发表在他的刊物上表示惋惜。

恩格斯大胆的言论和激进的思想，在国外也引起了注意，彼得堡出版的《祖国纪事》1843年1月号上，发表了瓦·彼·波特金的《德国文萃》一文，对《谢林和启示》一文作了详尽的介绍。波兰的《科学评论》杂志于1842年10月号上发表了《谢林的柏林讲义》一文，对恩格斯的小册子赞赏不已。并称它的作者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之一”。

面对国内外的赞扬和喝彩，恩格斯并没有飘飘然，而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表现得十分谦虚。对于卢格称他为“哲学博士”，恩格斯在回信中也予以纠正：“我决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因此请您不要对我用这样的头衔。”

在同谢林论战的过程中，恩格斯感到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太多太多，因而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而更多地进行学习。他在给卢格的信中谈到“我还年轻，又是个哲学的自学者。为了使自己有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我所学的已经够了，但是要能有效地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够的。人们将会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兜售哲学的人’……我希望，当我再写点什么，同时署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在柏林大学，恩格斯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小组——博士俱乐部，他很快与俱乐部的主要成员施蒂纳、卡·科本、布鲁诺·鲍威尔等熟识。他们常常聚集在邮局大街的一家酒店——“老邮局”酒店里，共同度过许多无拘无束的欢乐时光。恩格斯以其坚定的革命信念，渊博的学识和雄辩的口才博得了大家的信任。在这里，他从朋友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马克思的情况，马克思是半年前离开柏林的，他也曾是博士俱乐部的一员。

1842年3月，普鲁士封建专制势力开始向进步势力反扑，在柏林大学，校方免去了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鲁诺·鲍威尔教研主任的职务，不久又把他驱逐出柏林大学。这件事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柏林青年黑格尔分子中间引起了极大愤慨，他们

把鲍威尔事件看作是普鲁士政策的一个象征。

为了表示抗议，恩格斯和埃德加尔·鲍威尔以讽刺诗的形式写了一篇论战性的作品《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这是关于仙逝的神学博士布鲁诺·鲍威尔的惊心动魄的而又真实有教益的故事。他为恶魔所惑，背叛真诚的信仰，成为魔王，终被免职》，在这篇讽刺诗中，他们刻画了青年黑格尔派同宗教的支持者、黑格尔哲学的敌人的斗争，特别是“黑暗的死敌，思想自由的代表”布鲁诺·鲍威尔的形象。

在这首讽刺性叙事诗中，恩格斯也揭露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致命弱点——革命的辞藻同实践活动之间的矛盾。如这首诗的主人之一——阿·卢格劝告他的战友们：“我们的行动只在口头上，从过去直至遥远的未来都是这样；实践的硕果会自动从抽象的树上坠落。”另一位主人公科本“严峻地紧锁双眉投入战斗，但是，鲜血，他却力求少流”。

恩格斯把自己看作青年黑格尔派最左和最富于战斗性及革命性的一员。

“最左边的那一个，穿着胡椒色的长裤，
怀着胡椒般辛辣的心，长着两条长腿，
他是谁？是奥斯渥特——山岳党人！”

不论何时何地，他都坚决而凶狠。
他只拨弄一种乐器，这就是断头台，
他只喜欢一种曲子，这就是抒情短调，
他只有一种叠句，这就是：
组织起你们的队伍！拿起武器，公民们！”

在这个青年黑格尔派圈子里，恩格斯最喜欢的是放荡不羁的埃德加尔·布鲁诺：

“是的，是他！茸毛盖满他这个恶人的嘴脸，
虽然年纪轻轻，却老谋深算，诡计多端。
蓝色的燕尾服挡不住他丑恶的灵魂，
华丽的装束掩盖不了他是个好斗的长裤汉。

恩格斯与埃德加尔来往较多，在欢乐的暇时他们就一起写作《信仰的凯旋》。

1841年春夏之交，费尔巴哈发表了《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一下子驱散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在德国的魅力。他的无神论，人本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在德国知识界引起极大轰动。当时正在同谢林论战的恩格斯读了这本书后，感觉就像“从沉睡中醒来，压在我们胸口的梦魇消失了，我们揉了揉眼睛，惊奇地环顾四周，一切都变了”。

费尔巴哈的《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既批判了宗教蒙昧主义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为这两者同世界的真实本质是不相容的。他要求人们唯物地观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他庄严宣告：世界和人的存在既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任何“绝对观念”。他们是由于自己本身并通过自己本身而成为必要的，并且是可以感觉到的。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自然界、物质是第一性的，它们的存在绝不依赖于人和人的知觉。在人和自然界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上帝。宗教是人的产物。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根据自己的形象和愿望创造了上帝。

如果说，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在恩格斯同宗教蒙昧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刻，帮助他冲破宗教迷信的束缚，促使他转向无神论，并引导他接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辩证法。那么，费尔巴哈的《论基督教的本质》则是在他与谢林的“启示哲学”论战时，帮助他摆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开始转向唯物主义。40年后，恩格斯谈到这部书对自己的影响时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恩格斯在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时，并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全部抛

弃了黑格尔哲学。他既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又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精华——辩证法。并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对两者进行改造，使之有机地结合起来，与马克思一起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恩格斯在转向唯物主义的同时，他与青年德意志运动和青年黑格尔派的矛盾也逐渐加深了。在柏林，他看到一些青年德意志作家整天泡在沙龙里，咬文嚼字，无病呻吟；他们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并且还自命不凡。1842年6月，恩格斯发表了《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文，他在批评“青年德意志派”脱离社会政治生活的抽象哲学原则时指出：“原则之间的斗争处于高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基督教，政治运动遍及一切方面，而善良的荣克还在天真地相信，民族除了急切等待谷兹科夫的新剧本，蒙特应诺的小说和劳贝老一套的离奇幻想外，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当整个德国都响起了战斗的号角的时候，当就在他的耳边讨论新的原则的时候，荣克先生却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啃笔杆，反复咀嚼‘现代事物’这个概念。”青年黑格尔派与青年德意志派一样，也是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甚至观点激进的施蒂纳在关键时刻也畏缩不前；无神论者，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在离开大学后，也脱离现实政治生活，隐居乡村离群索居。恩格斯对青年

德意志派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

1842年3月，恩格斯开始为《莱茵报》等报刊撰稿直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莱茵报》是莱茵省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于1842年初在科伦创办的，他们试图利用这家报纸维护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很短时间内，它就成为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中居领导地位的报纸。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了这家报纸的主编，使报纸的民主主义色彩更加鲜明。

恩格斯对普鲁士王国作出的最尖锐的论断，反映在他发表在《莱茵报》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这篇文章仍是以“奥斯渥特”的笔名发表的。文章开宗明义，把威廉四世与沙皇尼古拉、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比作一丘之貉。他指出，尼古拉是肆无忌惮地施行专制统治的暴君；路易·菲力普堪称当代的马基雅弗利；威廉四世在步前两者后尘，在德国建立一个基督教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即君主主教制。这种体制下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并迫使教会的权力服从国家的权力。这样，“君主集一切权力于己身，他这位人间上帝，就标志着宗教国家的登峰造极”。

恩格斯分析道：“这个制度本身是多么不稳固，

没根基，不彻底；真正实行起来一定会更加摇摆不定，矛盾百出。”他断言，只要威廉明目张胆地干起来，就不能不遭到失败。文章的最后，恩格斯意味深长地说：“普鲁士的现状非常像过去法国面临着……但是，我避免过早地做出任何结论来。”

显然，恩格斯是为了不给新闻检查官以任何口实，才没有写出最后的结论。实际上，他已敏锐地意识到，德意志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正在酝酿1789年法国式的大革命。这个结论，他的对手也已经得出来了。普鲁士政府的喉舌攻击这篇文章是“赤裸裸地鼓吹把基督教和君主政体作为人民切齿痛恨的天上和尘世的暴君加以扫除”。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也表明，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已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已和他们分手。正当恩格斯投身于革命并猛烈抨击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时，青年黑格尔派却从反对普鲁士专制国王的斗争中撤退下来，而以从事“纯理论”自夸。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之一布鲁诺·鲍威尔宣称：“人们不能知道什么是肯定要做的事，人们只能知道什么是应予以否定的事。”由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立场，恩格斯在柏林服役的最后几个月里，和他们越来越疏远了。

恩格斯从不隐瞒自己的无神论和革命民主主义

信念，当他到柏林的舅父家也公开谈论这些问题。恩格斯的这些“不安份”的观点大部分由他的舅父传到父亲耳朵里，使他们父子关系更加紧张。

恩格斯老板想不到，一年的兵营生活会使儿子变得如此不安份，甚至相当危险。他在给一个亲戚的信中伤心地说：“家里出了一个害群之马，竟然反对他祖辈的信仰，这是一件多么难堪的事啊！”

1842年10月8日，恩格斯服役期满，返回巴门故里，途中去科伦拜访了《莱茵报》编辑部。马克思当时还不在科伦，他同编辑部成员莫泽斯·赫斯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给赫斯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恩格斯是一位“勤奋的共产主义者，他不仅懂得政治，而且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一年后，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提到1842年秋青年黑格尔派许多人转到了共产主义立场上。毫无疑问，这些人中包括恩格斯本人。当然，这种共产主义还谈不上是科学共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性质。

结束了一年的军营生活，恩格斯又面临新的选择。

第四章 走进工人运动

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在柏林生活了一年后，恩格斯又回到了枯燥乏味的巴门。对于长子的归来，老弗里德里希又喜又忧，喜的是经过一年的军营生活，儿子变得更加魁武、英俊，已算得上是恩格斯家族的第一美男子了；然而，儿子的思想已如脱僵的野马，而德国的局势又是那么动荡不安，他又担心恩格斯会闯下什么塌天大祸。老弗里德里希开始为儿子的未来犯难了。

已是深夜时分，老弗里德里希屋子里的灯还亮着，恩格斯老板平生还没遇到过如此为难的事。他一只手搁在胸口上，另一只手端着又沉又大的三叉烛台，蓬头散发，哭丧着脸，他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用脚步量着宽大的卧室。爱利莎夫人则一言不

发，默默地注视着这没完没了的哈姆雷特式的散步。她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她知道，丈夫是不会听人劝告的，她也明白这一次丈夫真的犯了难，已经十几天了，他一言不发，只是叹息。老弗里德里希在为儿子寻找出路……

漫长的黑夜已快消尽，恩格斯老板突然把烛台放在桌上，脚步声也停息下来。他沉吟了片刻，对正在仰头望着自己的夫人说：“夫人，我已为儿子找到了出路。我的决定看上去可能很残忍，但它是正确的。亲爱的，准备同弗雷德分离一段时间吧……，我要把他送到远离德意志的英国去工作，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同不相识的人在一起，我想，这对他会有好处的，可以使他摆脱迷住他心窍的有害思想……”。

听完丈夫的话，爱利莎夫人一头扑在枕头上，轻声地哭了。她知道，丈夫决定的事，断无更改的可能。可是，弗雷德的翅膀毕竟还很嫩啊。

这一次，恩格斯并没有反对父亲的安排，因为英国是他很感兴趣的一个国度。在不来梅经商期间，恩格斯就曾到英国旅行过一次，英国的生活给恩格斯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这时的英国，封建专制主义已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已得到巩固，产业革命创造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是其它国家所无法想象的。由于第一次在英国逗留时间较短，

他没有来得及对这个正在蓬勃向上的资本主义王国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他很想再去那里，去亲自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接触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

恩格斯在赴英途中，又在科伦作了短暂停留，在《莱茵报》编辑部里，第一次会见了该报主编马克思。尽管以前两个人从未见过面，但彼此都阅读过对方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在很多地方也很接近，可以说，对对方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由于马克思对恩格斯还与之保持联系的青年黑格尔派持否定态度，决定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一次“十分冷淡”的会面。1895年，恩格斯在回忆那次会见时的情景时说：“马克思当时正在反对鲍威尔兄弟，即反对把《莱茵报》搞成主要是神学宣传和无神论等等的工具，而不作为一个进行政治性争论和活动的工具；他还反对埃德加尔·鲍威尔的清谈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仅仅以‘极端行动’的愿望作为基础……，因为当时我同鲍威尔兄弟有书信来往，所以被视为他们的盟友，并且由于他们的缘故，当时对马克思抱怀疑态度。”

不过，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文章还是很欣赏，他希望恩格斯到英国后，为《莱茵报》写一些关于英国的通讯稿。恩格斯愉快地答应了，并忠实地履行了自己

的诺言。到英国后不久，恩格斯便写了《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各个政党的立场》、《国内危机》等文章，发表在 1842 年 12 月份的《莱茵报》上。

到 1843 年 3 月 17 日，《莱茵报》股东们与反动政府妥协，报纸倾向右转，马克思忿而退出编辑部，恩格斯才停止为《莱茵报》撰稿，但是，他与马克思的联系却越来越密切了。

1842 年 11 月底，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恩格斯又一次登上泰晤士河码头。像 1840 年一样，此行也是由荷兰渡海西行，沿泰晤士河上溯伦敦，再由伦敦转乘火车去曼彻斯特。不过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不是短期旅行，而是要在曼彻斯特长期工作了。

英国是最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也是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机器和蒸汽机在短短几十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几个世纪的总还要多。英伦三岛的工业集中在几个大工业城市中如伦敦，利物浦，格拉斯哥，曼彻斯特等等。这几个工业中心的产品已占世界工业产品的 20%，这些工业城市由铁路和运河连接起来，并与海港相通。每天都有载满商品的货船驶向世界各地。当时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

恩格斯所去的曼彻斯特是当时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位于英格兰南部一群小山的南山坡下，艾尔克

河，艾尔威河和梅德洛克河流经全市。当时拥有 40 万人口，是英国的纺织业中心。当时那里已经有七层楼高的巨大工厂工房，有陈列各国商品的巨大超级市场。这个“现代城市的典型”，成了恩格斯的第二故乡，他对这个城市就像对自己的故乡一样，并且比该城的大多数居民还了解得更清楚。这个“金银财富数不尽，贫困痛苦使人愁”的城市为恩格斯了解和研究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橱窗。

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棉纺厂”即“维多利亚工厂”的办事处工作，他的父亲是这家工厂的股东。该厂座落在曼彻斯特市的城边，在 19 世纪 20 年代为出生于荷兰的彼得·艾伯特·欧门所有，它生产棉纱线，缝纫线和刺绣用线。1837 年，老弗里德里希在这里投资入股，这家工厂也改名为“欧门——恩格斯公司”。恩格斯在办事处里负责处理国际邮件，帮助收购原棉和出售各类品种的棉纱，监督库存等，他住在工厂附近的肖思沃斯区。

作为恩格斯老板的长子和业务代理人，恩格斯一到曼彻斯特就收到许多请柬和拜贴，多少工商业巨头等着他去拜访，多少企图飞黄腾达的人盼望与他结交，多少宴会舞厅等着他光临，又有多少富家小姐渴望得到他的青睐。然而，恩格斯并没有西装革履，假发扑粉，跨上豪华的马车，去参加资本家及其

太太小姐们的宴席和舞会。他换上了便装，离开了灯红酒绿的闹市区，去考察曼彻斯特的工人住宅区。正如他后来在致英国工人的信中所言：

工人们！

……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痛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客厅里的闲谈和讨厌的礼节中消磨掉；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人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于重重不利的地位，但仍然引起每个人的尊敬……。

恩格斯首先沿着艾尔克河来到曼彻斯特旧城的工人区，这里的街道又狭窄又弯曲，房屋又肮脏又破旧。在这里的一个大杂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非常脏，住户们出入都要跨过

一片满是大小便的臭气熏天的死水洼才行。在艾尔克河西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污水流到艾尔克河中，使之成为一条黝黑的，发臭的小河，臭气泡还不断地从河底冒上来，即使是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无法忍受。在霍乱流行的时候，卫生警察不得不命令居民搬出来，清扫一番，并用氯气将房子熏一遍。

在旧城的另一边是新城，又叫爱尔兰城。在这里，城市的一切特征都消失了。东一排西一排的房屋或一片片迷阵似的街道像小村庄一样，乱七八糟地散在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粘土地上。房屋，或者不如说是小宅子，情形都很糟，从来不修理……街道既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但却有无数的猪群，有的关在小院子里或猪圈里，有的则在山坡上自由自在地散步。这里街上的污泥竟这样厚，只有在天气很干燥的时候，才能希望走过这里而不致让烂泥淹没了脚背。然而，这还不是最差的地方。工人居住最悲惨的是在牛津路西南，叫做小爱尔兰，这里居住着约4000个爱尔兰人。小宅子都很破旧、肮脏，小得不能再小；街道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也没有污水沟。到处都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垃圾、废弃物和令作人呕的脏东西，不断地散发出臭味来污染四周本来已被工厂的烟污染的空气。

妇女和孩子们到处走来走去，穿的破破烂烂，就像在这里的垃圾堆和烂泥坑里打滚的猪一样肮脏。

室内的生活环境并不比室外好多少。很多家庭只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集卧室、厨房、起居室于一身。往往都是整家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往往是一堆肮脏的麦秸和一条用旧麻袋做成的被罩就当作全家共用的被褥。在霍普街恩格斯遇到了一个 60 岁左右的老人，老人住在一个牛棚里，一下雨，雨水就从破烂的屋顶往下漏个不停。这个老人已无法做经常性的工作，靠用手推车搬运粪便等维持生活。

恩格斯用了 20 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曼彻斯特的大街小巷，了解了 35 万工人的住宅情况，根本找不到清洁舒适的房间。另外，很多只住着一间房子的家庭，为了收取一定的费用还接纳搭伙食的和寄宿的人，这些寄宿人往往不分男女同房主全家同睡在一张铺上。

工人的饮食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在曼彻斯特，工资较高的技术熟练工人，特别是家里每个人都能挣点钱的那些工人，家庭餐桌上每天都有肉；挣钱少一点的只有星期日才吃一次肉，因为大多数工人星期六晚上才发工资；挣得再少的只有把肉切成小片夹放在土豆里。在工资最低的工人中，土豆是他们的主要食品。而且，利欲熏心的商人和厂主们还经常在

食品中掺假，其中把石膏粉和白垩掺到面粉里做面包是最常见的现象。

恩格斯还观察到，生活最悲惨的要数儿童和妇女。由于养家糊口的需要，父母白天都要去上班，孩子只能扔在家中，或者由哥哥姐姐看管弟弟妹妹。孩子们饿极了，四处乱跑，找东西充饥，由于无人照看，很多孩子死于各种事故。恩格斯为了弄清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和医疗状况，曾访问了许多医生，从曼彻斯特一验尸官那儿，恩格斯看到了一份儿童死亡报告：在 9 个月里，曼彻斯特有 69 个孩子被烧死、烫死，56 个被淹死，23 个被摔死，77 个因其它事故死亡。在曼彻斯特，工人的子女能活到五岁的还不到 50%。

女工占曼彻斯特工人总数的 25%，工厂劳动对妇女身体的影响也很严重。在“欧门—恩格斯”工厂里，恩格斯没有看到过一个发育良好、身体健壮的女工。其它工厂也大致如此。怀孕的女工由于害怕失去工作，一直到分娩前一瞬间还要在工厂里工作。女工们头天傍晚还在工作，第二天早上就生了孩子，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在工厂里，女工在机器旁生孩子也不稀罕。许多人在产后一星期甚至三四天就回工厂里整天做工了。有一次，恩格斯听到一个厂主问监工：

“某某人还没回来吗？”

“还没有。”

“他生了多久了？”

“一星期。”

“那她早就该回来了。别人在家里只住了三天。”

对资本家来说，工人的死与他们毫无关系，只要能赚到钱就行。

恩格斯参观过许多纺纱厂和纺麻厂，车间里飞舞着浓浓密密的纤维屑，使得工人，特别是梳棉车间和刮麻车间的工人容易得肺部疾病。但是，工人们并无选择的余地，正如一位工厂主对工人们说的：“你们不愿意在我的油锅里受煎熬，那你们可以到火里去散步。”长期从事这种工作，最普遍的结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声、胸部作痛、咳嗽，最严重的发展为肺结核。

除了这些疾病外，工人还会成为残废。在曼彻斯特可以看到大批的残废者，这个人缺一只或半只胳膊，另一个人缺一只脚，第三个人少半条腿，“简直就象生活在一批从战争中归来的残废者里面。”根据曼彻斯特医院的统计，1843年就发生因机器受伤或致残的事件2426件，其中最惨不忍睹的是奥尔丹一青年女工被传动皮带卷住转了五十转，死后没有一根骨头是完整的。

发生因工致伤事件后，工厂主们最多只付医疗

费，在治疗期间很少有照付工资的。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以后如何生活，资本家们是不愿意，也不会去考虑的。

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和态度，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有一次，恩格斯和一个资本家在曼彻斯特大街上走，和他谈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合卫生的建筑体系，谈到这些地区可怕的居住条件，恩格斯说：“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曼彻斯特建筑得更坏的城市。”

那个资本家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处与恩格斯告别时说了一句：“但是在这里的确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

恩格斯对这个以自由、平等、博爱、自诩，但却只关心自己钱袋的阶级表示了极大的蔑视，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恩格斯不可

能对工人阶级这种非人的境况置之不理，也不会把这些境况看作是不可改变的而加以容忍。在巴门和爱北斐特读中学时，他就曾把节省下来的钱给贫苦的工人；在不来梅经商时，他又痛斥过乌培河谷工厂主们的罪行；而今，他自己已长大成人，已经有了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他面对一个国家大多数人过着一种对人类尊严是一种极大讽刺的生活时，他考虑的是如何改变他们的状况。

恩格斯开始思考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的国家不管处于贫困中的工人阶级，甚至把他们一脚踢开。因此，男人进行抢劫或偷盗，女人偷窃或卖淫，还有谁能怪罪他们呢？但饥饿是什么滋味，是苦是甜，对国家来讲是无关痛痒的，它把这些挨饿的人抛进监狱，或是流放到罪犯放逐地去。而工人阶级应该怎么办才能从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1842 底，恩格斯在为《莱茵报》写的文章《国内危机》中第一次提出一个答案，一个并不太完美但已涉及到问题实质的答案。他在这篇文中提出：“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他预言，由于工人阶级人数众多，“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英国富翁们就

该倒霉了”。

现在他们的觉悟程度的确还没有这样高，英国无产者只是预感到了自己的威力。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不仅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还经常参加工人的集会和活动，把自己置身于英国工人运动中。恩格斯刚到英国时，恰好 1842 年 10 月爆发的 100 多万工人大罢工的高潮刚刚过去，余波尚未平息。英国工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给恩格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843 年 5 月，恩格斯亲眼目睹了保林——亨弗莱制砖厂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一场“真正的战斗”。这家工厂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遭到拒绝后，宣布举行罢工，同时工会向公司宣布抵制。晚上 10 点钟，一支以步枪为前锋的制砖工人战斗队冲进工厂，与护厂队发生了冲突，战斗持续了半个小时，工人们破坏了所有能破坏掉的东西，痛殴了一个监工的妻子。在当局军警的镇压下被迫撤出战斗，有一个工人大腿、小腿和肩上共中了三枪，他还一颠一蹶地跟着走了 4 英里，“这些人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勇气，是不怕枪弹的。”

欧文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和他的支持者建立了许多宣传团体和慈善机关，试图通过宣传和示范来实现社会主义，曼彻斯特有一个共产主义大厅就是由欧文主义者创办的，恩格斯

经常到这个大厅参加工人的集会和演讲。使恩格斯感到吃惊的是，很多工人在辩论政治、社会和宗教问题时都很内行，并且善于思考。他常常看到工人们手里拿着又好又便宜的小册子，主要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自然体系》、伏尔泰的各种著作，还有施特劳斯的著作以及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有些工人还参加在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举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辩论会，而且听众很多。恩格斯经常在那里见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它学科和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阶级还要多”。

恩格斯还发现，英国工人非常讲究实际，反对不着边际的空谈，例如有人提出，不应当用事实来证明上帝是否存在，工人演讲者会巧妙地回答他：

“您提出的论点多么可笑；如果上帝不是通过事实显示自己，那么，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根据您的论点恰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人们说来有没有上帝都一样。凡是不能用事实证明的东西，丝毫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是以真正的事实为立足点，因此上帝和其它宗教概念一类虚幻的东西根本不在话下。”

恩格斯津津有味地听完工人的讲演，留下来与

工人——不分男女、老少和身份一起吃便餐。晚上，欣赏工人合唱队在乐队伴奏下高唱社会颂——调子是教会的气味或十足的教会的调，而歌词是共产主义的。有时则与工人一起翩翩起舞。可以说，恩格斯同工人们在一起的时间要比同本来属于他的一个阶级的资本家在一起的时间要长得多。彼得·欧门的曾孙谈到他家对恩格斯在英国时的看法时说，“他并不是竭尽全力地在公司干活，而是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参加政治集会和研究曼彻斯特的情况。”

恩格斯的行为受到曼彻斯特资产阶级及其子弟们的责难，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恩格斯制造难堪。有一次，恩格斯受公司之托陪一位商业伙伴到一家俱乐部消遣，刚进大厅便有五六个富家子弟围了上来，其中一人劈头问道：“尊敬的小老板，昨天你又去参加工人的集会，和那些女工们跳舞，而拒绝了克莱斯顿小姐请你出席的舞会，难道你一定要自绝于我们之外吗？”

恩格斯早就注意到这帮人在背后指点和嘀咕，对于他们的公开挑战也早有预料，因此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反击：“高贵的先生们，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只是跟女工们跳舞，而你们呢？却把她们拖到灌木林中动手动脚。在你们看来，她们不过是用来试验的动物，在她们身上试验你们这些男人的品德，而在我看

来，她们和所有姑娘一样都是姑娘。”

一个大胖子打断了恩格斯的话：“对不起，等一等，弗里德里希先生，难道希望我们去吻她们的手，并把她领到自己的卧室吗？”

恩格斯轻蔑地看了那胖子一眼：“胖子先生，在谈论女人以前，你最好先减掉你的脂肪。难道你没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吗？”

大厅里一阵哄笑，大伙儿都转过身来望着胖子，仿佛第一次见到他似的，胖子满头大汗，面红耳赤，勉强地挤出几句话：“这是人身攻击……侮辱……我要到法院告你……”。

“随你便吧，不过，在法庭上我会把你所有的这些功绩公诸于众，你们在社会上将丧失名誉。那些贫苦的姑娘，若不是你们威胁利诱，若不是为了那一片面包，怎么会容忍你们恣意妄为，她们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把各位打倒在地。”

恩格斯的话语狠狠地鞭挞了这些自命不凡的先生，他们怒气冲冲但又无言以对，其中一人自寻台阶说：“跟他有什么好说的，他不是我们的人。”

恩格斯冷笑道：“我可从来没有奢望成为你们中的一员，我确实不是你们羊群中的羊……。”

一直在一旁静观这场交锋的店主雅各布插嘴说：“巴黎也曾有一位伯爵，他拒绝接受财产和爵位，

跟自己人进行斗争。”

“是的，确有其人，他的名字就是圣西门。或许，我的命运也将跟他差不多，因为我们具有共同的目标。”

这就是一个富商的儿子的选择。

曼彻斯特是英国宪章运动的中心。1836年6月，一批先进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在木匠洛维特的领导下，组织了“伦敦工人协会”，其宗旨是用一切合法手段废除统治阶级的各项反动立法，争取人民自由权利；使社会一切阶级处于平等地位，争取改善工人生活条件。1837年5月，协会拟定了一个关于争取普选权的纲领性文件——“人民宪章”，于1838年5月8日公布，他们的口号是：“政治权利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此后，为实现宪章内容的斗争称为“宪章运动”。恩格斯到达英国时，正值宪章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刚刚过去。1843年秋，为了深入了解宪章运动的情况，总结英国工人的斗争经验，恩格斯与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领导人朱利安·哈尼建立了联系。半个世纪后，哈尼在谈到恩格斯第一次访问编辑部的情景时说：“1843年的时候，恩格斯从布莱得福德来到《北极星报》编辑部去找过我。他个子很高，少年英俊，长着一副年轻得几乎像孩子一样的面孔。虽然他出身和受教育都在德国，但是当时

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对我说他常常读《北极星报》，对宪章运动非常关心。”恩格斯与哈尼结识后很快就建立起一种保持终生的友谊。

恩格斯与曼彻斯特宪章派的著名领袖詹姆斯·李奇也有很密切的交往。李奇是宪章派四人执行委员会委员，是一个纯朴、有才智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他曾在不同的部门中做工。一个出色的组织家和能言善辩的宣传家。在公开集会上，李奇与资产阶级政党头面人物辩论时，总是把对手驳得哑口无言，令其无地自容。恩格斯对这个革命工人很有好感，称赞他是一个诚实，可靠而且能干的人，是自己的挚友。李奇在1844年写的小册子《一位曼彻斯特工人所揭露的关于工厂的无可否认的事实》，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恩格斯后来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大量地引用了这本小册子中的材料。

恩格斯还同一些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门徒建立了联系，其中有当时曼彻斯特社会主义者领袖“裁缝兼哲学博士”约翰·瓦茨。依靠瓦茨，恩格斯熟悉了欧文主义者的活动情况，他定期参加他们的集会和活动。

由于对英国的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恩格斯在1843年5—6月给苏黎世的进步杂志《瑞士共和主义者》写的文章《伦敦来

信》中，更进一步确定了这个运动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他指出：“从工人群众，从无产者当中汲取自己力量的宪章派正在获得巨大的成功。“人民宪章联合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它现在已经成为各种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强有力的对手了。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恩格斯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为教育英国劳动阶级做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在英国工人中间宣传了 18 世纪法国启蒙哲学思想。

恩格斯在与英国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的交往中，发现他们对席卷欧洲大陆的社会运动很不理解，恩格斯本人对当时的社会运动极为关心，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十分关注，他想使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也了解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大陆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情况及社会主义思想。为此，他写了《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于 1843 年 11 月发表在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新道德世界》上。恩格斯根据他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由上述每个国家各自单独得出来的。这一事实雄辩地证

明了，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恩格斯在论述欧洲各国共产主义思想发展时，既指出了各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的优点，也揭示了它们各自的一些缺点和不足。在谈到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史时，恩格斯指出：圣西门主义的缺点是这个学说的神秘外壳和经济原则的脆弱；傅立叶的巨大功绩是创立一门以自由劳动的理论为其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哲学，但是，傅立叶在解决私有制问题上是不彻底的。这两种学说的共同弱点是没有接触政治领域，“所以他们的计划只成了一部分人的闲谈材料，没有成为全国人民共有的东西”。

恩格斯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比埃尔·普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评价很高，指出，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揭露了私有制及其所产生的后果——竞争、道德沦丧和贫困。显然，这正是恩格斯所观察到的英国社会的状况。当时，恩格斯尚未能看清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

恩格斯对祖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十分关注，特别是对“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威廉·魏特林的活动格外注意。他将黑格尔派的哲学共产主义说成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并指出，1842年秋天，

有些青年黑格尔派如赫斯·卢格、马克思，他本人都成为共产主义者了。

《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表明，尽管恩格斯在英国生活的这一年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并开始形成唯物主义和革命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但他还没有完全摒弃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没有完全与唯心主义决裂。他明显夸大了启蒙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主义思想家的哲学对德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影响，因为他认为他们为了原则可以忽视物质利益。

1843年五、六月间，恩格斯在伦敦作了短暂停留，在此期间，他会见了德国秘密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正义者同盟是德国工人的第一个政治组织，1836年创立于巴黎，它把流亡到国外的工人和手工业帮工联系在一起。同盟起初是一个半宣传、半密谋的组织，到40年代，开始在工人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当然是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在同盟中居领导地位的是思想家和宣传鼓动家威廉·魏特林。该组织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和密谋暴动，消灭私有制，在小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共享共有”的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与沙佩尔等人会面，是恩格斯第一次接触德国革命工人，双方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排字工人沙佩尔身材魁武，果断刚毅；钟表匠莫尔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工人活动家，善于从事组织和联络工作，并且有较深的理论素养；鲍威尔身材矮小，机智活泼。这几位工人革命家的献身精神给恩格斯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在几十年后，恩格斯还能回忆出他们初次会面时的情景，“1843 年我在伦敦认识了他们三个人，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尽管我们当时的观点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对于他们狭隘的平均共产主义，我当时还用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狭隘的哲学高傲态度与之对立——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人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人的时候留给我的良好印象。”

恩格斯显然也给这些工人革命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因为尽管恩格斯只是个 22 岁的年轻人，沙佩尔还是主动邀请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由于恩格斯在观点上与他们有着较严重的分歧，就婉言谢绝了。

恩格斯在英国的 21 个月中，走遍了曼彻斯特的大街小巷，还游历了伦敦、利物浦等工业城市，全面考察了工业革命后英国社会政治、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他看到了工业革命后现代两大阶级的对立，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从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中也得出结论，无论是欧文派的劝说，

还是宪章派的政治请愿，抑或是正义者同盟的密谋暴动，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一切社会问题。因此，恩格斯下决心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第五章 友谊和爱情

恩格斯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把他思想上、文笔上的成熟大胆同他去年的著作比较一下，这个奇迹就一目了然了。

——尤利乌斯·瓦尔德克

在英国，与恩格斯一起生活在工人中间的还有德国的青年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维尔特与恩格斯有着相似经历，他于1822年出生于德国莱茵地区的一个牧师家庭，没念完中学就去商行当了学徒。1842年，维尔特在波恩当店员时，在波恩大学旁听文学、文艺史、教会史、人类学等课程，并参加了一个青年诗人小组。在此期间，他还与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建立了联系。1843年12月，维尔特来到了英国，在曼彻斯特北部的小城市布莱德弗得工作。在这里，他与恩格斯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尽管旅费并不便宜，但到周末，维尔特便离开他

所厌倦的那个“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没有诗歌，没有音乐，什么也没有的”布莱德弗得，到曼彻斯特找恩格斯，同“这位蛰居在那个阴暗城市的德国哲学家交谈”。这种聚会对于维尔特来说已经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因为他讨厌资产阶级的生活，又和其他住在布莱德弗得的德国商人毫无联系。这些商人在他看来全是些“可悲的店员”，他们来这个地方只是为了赚钱，维尔特看到这些人终日无所事事，“或者像植物标本里的植物那样单调无聊地呆在那里，或者是极其轻浮地过着放荡的生活”。在这些人身上的找不到的东西，维尔特从恩格斯身上找到了。

在曼彻斯特，这两个来自异国的青年一起游览，切磋诗歌，探讨理论问题。恩格斯向维尔特介绍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帮助他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维尔特在诗中描述到：

“……啊！伟大的费尔巴哈，
你的话使我解除了最后的疑惑。
我摆脱了神仙鬼怪的层层魔障，
采得知识的最艳丽的花朵。

为了帮助维尔特了解英国工人状况，恩格斯陪着他走遍了曼彻斯特的各个角落，与他一起访问了

许多工人家庭，向他指出了工人阶级的种种困苦状况。在恩格斯的帮助下，维尔特越来越把自己的命运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维尔特写信给母亲说：“在英国必须关心贫民，为的是要知道人世间有什么样的不幸。……这可以使熊流泪，可以使绵羊变成猛虎。……我至死痛恨这些英国人，这些财主。”他自豪地说：“我感到由衷高兴的是，我是一个无产者。”

维尔特对恩格斯怀有深深的敬意。1845年，他在《莱茵年鉴》上发表了一篇随笔《英国的无产者》，谈到了当时正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恩格斯，他说：“……我……感到荣幸的是，当代德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已着手写一部阐述英国工人生活的巨著；这部著作的重要性是难以估计的。无论如何，这位作者将比我更善于把各种事情逼真地介绍出来；因为他曾长期住在曼彻斯特这个无产阶级的发源地，比我有更多的机会去观察工人……。”

后来，维尔特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8年革命风暴中与马克思、恩格斯并肩战斗。恩格斯也非常信赖和欣赏这位在曼彻斯特相识的战友，称赞他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期间，不仅在世界观上加快了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而且在思想感情上也进一步无产阶级化了，他把自己真挚爱情献给了来自爱尔

兰的女工玛丽·白恩士。

玛丽·白恩士于 1821 年出生于一个染色工人家庭，比恩格斯小一岁，由于家境贫穷，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恩格斯来曼彻斯特时，白恩士在欧门——恩格斯纺织厂当女工。白恩士性格爽朗，精神焕发。纺织厂里沉重的体力劳动并未使她的热情枯竭。她生得娇小玲珑，仅从外表看谁也难以相信她可以承受生活的重负。但她有着爱尔兰人特有的那种永不衰退的毅力。天真活泼的姿态和纯朴大方的举止。她那“野蔷薇”般的美丽而勇敢的目光，更是纺织厂里男工们谈论的话题。恩格斯到曼彻斯特不久，就注意到了这个纯朴、活泼的姑娘，并被那双美丽的眼睛所吸引。

玛丽也注意到了这位新来的少东家。恩格斯身材高大、魁武，一副标准的军人身材，特别是他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仿佛可以喷出火来，把一切东西都融化。尽管白恩士从心底里喜欢这位来自普鲁士的年轻的工厂主，但考虑到双方的身份和地位，玛丽还不敢去爱这位英俊倜傥的小伙子，也不奢望能获得他的爱。

这一天，恩格斯正在爱尔兰工人居住区走访工人家庭，在大街上看到了正在卖水果的玛丽·白恩士，恩格斯走上前去，问道：

“玛丽，你怎么会在这里卖水果”？

“老板，我们怎么能和您比，闲暇时想到哪转转就到哪转转，我要糊口，我要养家，当然还有别的什么。”玛丽在自己的老板面前毫无恐惧感，怎么想怎么说。

“不要叫我老板，叫弗雷德就行了。不过，我可不是随便转转。我已到过工人居住区的四分之一，在今后一年里，我将转遍曼彻斯特的大街小巷，转遍每一个工人居住区。”

玛丽·白恩士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工厂主，一个老板，不考虑如何赚钱，到我们这些工人中转什么？

恩格斯看出了玛丽的疑惑神情“好吧，咱们一边走一边谈，我还可以帮你卖水果，我的嗓门大，可以招来更多的顾客。”

两个人在大街上一边叫卖一边畅谈，恩格斯向玛丽讲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讲述了对工人阶层的看法。尽管有些问题玛丽并不理解，但是，有一点她很清楚，自己的老板想要维护的是工人利益，而不是资本家们的利益，这使玛丽颇为吃惊，并对恩格斯产生了敬意。

“刚才你说除了养家糊口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是指什么？”

第一次与恩格斯正面接触，玛丽不想谈得太多，她应付说：“这个，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此时，一群工人下班走了过来，其中几个人热情地跑过来跟恩格斯握手，寒暄，“弗雷德，再到家里坐一会儿吧！看，我打了一斤烧酒，咱们再喝个一醉方休。”

“谢谢，霍德尔，今天就免了吧，我还要到对面那个街区去看一看，等周末再到老地方聚吧。”

工人们走远了，恩格斯到了要去的工人居住区，“玛丽，再见吧，我的目的地到了。”

玛丽有点激动，“弗雷德，如果不介意，以后我可以陪你访问曼彻斯特的工人区，这里的情况我熟悉，对你可能会有帮助”。

“那太好了，只是希望不要影响你卖水果。”

“没关系，我觉得你做的事情更重要。”

以后，在恩格斯走访工人区和工人家庭时，身边就多了一位身材窈窕、热情奔放的爱尔兰姑娘。玛丽从小生活在曼彻斯特工人中间，熟知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和革命斗争精神。她陪同恩格斯走遍了曼彻斯特工人居住区，结识了很多工人家庭，使恩格斯更为详细地了解到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恩格斯还经常与玛丽一起，参加工人的社交集会，出席星期日曼彻斯特“共产主义大厅”里举行的

晚会，与工人们一起吃饭，一起饮茶，一起跳舞。

与玛丽在一起，恩格斯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这种快乐和愉快是与那些资产阶级小姐在一起时无法得到的。一看到那些高贵的小姐们的娇柔造作，嗲声嗲气，恩格斯就感到厌烦。而玛丽身上具有的是另一种气质，纯朴、活泼、热情奔放，这正是恩格斯所喜欢的。慢慢的，恩格斯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位爱尔兰姑娘。

同样，玛丽也爱上了恩格斯。吸引玛丽的，不仅是恩格斯标准日尔曼男子汉的外表，更在于这位出身资本家，却立志把自己投身于本阶级对立面——无产阶级的事业中。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甜言密语，共同的阶级感情把这一对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青年男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时，玛丽向恩格斯讲述了自己的家乡爱尔兰，讲述了爱尔兰美丽的岛国风光，讲述了英国殖民者在岛上的暴行和爱尔兰人民的悲惨生活。“我卖水果的钱一部分是为反抗英国统治的芬尼亚社募捐的，我希望我们的人民能早日获得自由。”

“这一天是不会太远的，我看到曼彻斯特的爱尔兰工人就象生气勃勃的大自然之子，如果所有爱尔兰人都能这样，英国人在爱尔兰就呆不长了。”恩格斯甚至放言：“给我二十万爱尔兰人，我就能把整个

不列颠君主制推翻。”

1843年，在经过热恋之后，恩格斯与玛丽开始了幸福的夫妻生活。他们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当时像他们这样自由恋爱，又不愿受封建的和宗教的法规束缚的青年人，都是这样做的。而恩格斯这样做有着更为充分的理由。首先，与一位工人结婚，不可能征得家庭的同意。恩格斯晚年在一封信中回忆说：“根据我自己家里的经验，父母很难（有时甚至不可能）公正地对待违背他们的意愿而进入家门的女婿或媳妇。不管父母怎样相信自己的意图是最好的，但是这些最好的意图也多半只会造成家庭新成员的痛苦，而且间接给自己的儿子或女儿造成痛苦。”为了不给自己心爱的人造成伤害，恩格斯对这桩婚事未作张扬。另外，正式结婚要到可恶的牧师那里举行宗教仪式，这是恩格斯和玛丽都十分不情愿的。

尽管恩格斯和白恩士是亲密无间的情侣，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作为商人和名门望族子弟的恩格斯，在公开场合下不得不遵守社交礼仪和商业界人士习惯，经常与玛丽分居，过着如他自己所说的“双重生活”。一方面，按照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他必须要有自己居住的单独住宅，以便同业务方面的合作伙伴交往商谈，并在那里接待他们。另一方面，他尽可能多地回到自己真正的家——海德

路 252 号，也就是他与玛丽的新家。在这里，恩格斯与白恩士交流思想，倾心长谈爱情的欢乐，使他把经商的疲劳一扫而光，在这里，他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在玛丽面前的，也不再是一个板着面孔讨价还价的商人，而是和蔼可亲的丈夫和工人阶级的朋友。

与一个女工的密切结合以及与自己资产阶级家庭的矛盾，使这个年青的具有革命思想的资本家的儿子更能亲身了解英国的工人阶级，与他们水乳交融，并与自己的阶级决裂。

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和他们不懈的反抗，激发恩格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这些研究最终促使恩格斯完全摆脱了唯心主义的观点，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恩格斯认为，要想了解英国的发展状况和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们不应“只注意眼前的事物，只注意接触到的现实和实际活动的表面。”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情况已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但仍有必要透过事物的表象，抓住它们的本质，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律。

恩格斯首先广泛地研究了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他阅读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的著作，恩格斯发现他们的思想中有不少有价值的东西。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尖锐地批

判和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圣西门将其称为“黑白颠倒的世界”，傅立叶把它称为“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恩格斯认为，傅立叶提出的未来社会实行协作劳动比资本主义的竞争优势的多。他还很赞成傅立叶关于自由劳动的观点，傅立叶认为，每个人天生就爱好或喜欢某种劳动，所以，这些个人爱好的全部总和就必然会形成一种能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力量。由此他得出结论：如果每个人的爱好都能得到满足，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愿意做的事，那么，即使没有现代社会的强制劳动，也同样可以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傅立叶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将二者割裂开来，因而不合理的；他进而提出，在未来社会中，劳动将成为一种享受。恩格斯也注意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错误，并指出这种思想最不彻底的地方是“它不主张废除私有制”，同时，它也不进行政治斗争，因而“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为了更彻底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潮，恩格斯还研究了法国和德国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渊源和发展。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德萨米以及后来的卡贝的著作，都成了恩格斯研究的对象。上述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财产公有，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正是傅立叶等人的社

会主义思想所欠缺的。恩格斯同时也指出：“他们想把世界变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作有害的危险的东西，当作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是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果。”对于德国带宗教色彩的托马斯·闵采尔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恩格斯肯定了他的反对私有制，主张财产公有和人类平等的原则，也指出其主张“充满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宗教和迷信的谬论”。

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共产主义思潮，这就是以青年黑格尔分子莫·赫斯为代表的哲学共产主义。恩格斯把马克思和自己也引入这种共产主义者的行列中。这种理论认为，光实行政治变革是不够的，只有经过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当时，恩格斯就看到了这种思想的致命弱点：言辞激烈，行动软弱，甚至那些领袖人物也不打算采取实际行动。

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大大开阔了恩格斯的眼界，他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放到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加以鉴别，吸收了各个流派合理的成份，抛弃了其错误的东西。他认为，法国的共产主义思潮在德国共产主义发展初期对德国共产主义起了推动作用，它的缺点是没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并把宗教带进新

的社会制度里。德国的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基础上，这是它的长处。但是它却产生于经济落后、工人运动不发达的德国，缺乏实践经验。在这方面，恩格斯认为应该向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学习。他说：“在一切有关实践，有关现代社会制度的实际事物方面，英国社会主义者大大超过了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所要做的就很少了。我想顺便提一下，就是我接触了一些英国社会主义者，几乎在所有问题上，我都同意他们的看法。”

1840年夏天，恩格斯第一次到英国做短暂旅行时，他曾以“欢呼和斟满的酒杯”向“自由的英国”表示祝贺。1842年11月底，当恩格斯再次逆泰晤士河而上的时候，心头又曾涌现出两年前的那种感觉。然而，在英国生活了仅仅一年，他就彻底地认清了这种制度的实质，资本主义制度带给劳动人民的既不是自由，也不是平等。它的自由是虚假的，它的平等是一种欺骗。恩格斯已在寻找代替这种曾经为之欢呼的制度的良方。

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任何一种政治变革”，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如法国七月革命后建立了七月王朝，工人被扔到一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劳动群众带来保证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为证明自己的设想，恩格斯重新分析了自己的两位哲学导师——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同时认真思索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和原理。他要从这些知识中吸取合理内核，论证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历史上包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思想家，都是用抽象的精神和原则来解释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认为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是由某种精神决定的，是上帝的意志和伟大人物的思想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恩格斯本人也深受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后来他虽然摒弃了宗教信仰，认识到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神的历史，应该从人类本身去探寻社会历史的发展。但是，在决定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动力问题上，恩格斯到英国的初期，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在英国初期，他曾感到很恼火：“对于一个执迷不悟的不列颠人，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在德国已是不言而喻的一点，那就是所谓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也不会是独立的和主导的目的，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指出历史进步方面的原则服务。”

但是，在英国经过短短数月的研究之后，恩格斯开始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在 1844 年 2 月为《前进报》写的《英国状况》一文中，详细考察了英国自 18 世纪以来工业革命的历史，清楚地看到了以蒸汽为

动力的机器生产给英国社会带来的变化：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挤垮了小手工厂，个体劳动者由于无力同大企业竞争而沦为产业工人。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巨变：在不毛之地崛起了新兴的工业城市；铁路拉近了全国各地的距离；产业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社会也日益明显地分化为三个阶级：土地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与此相适应，在英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大政治组织：代表土地贵族的托利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辉格党和代表工人阶级的宪章派。为了不同的经济利益，他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恩格斯根据英国社会的这些变化，对推动他进行研究的带根本性的问题——经济条件和经济利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什么样的作用？——作了第一个答案：“英国工业的这一番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几十年后，恩格斯在谈到自己新的科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时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特别是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

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

恩格斯根据这一结论迈出了战胜唯心主义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使他感到兴奋的是：一旦把浮在表面的各种现象简化归结到他们的本质时，早先呈现在他眼前的如此复杂的英国社会，现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

恩格斯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完成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第一次根据其新思想写成的。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各种主要现象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和政治事实的必然结论来论述，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论战。

恩格斯开宗明义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是“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距离我们时代越近的经济学家越不老实。时代每前进一步，要把政治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也必须提高一步”。这门学科仅仅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

恩格斯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祸害的真正根源。他写到：“因为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土地所有者可以靠土地过活，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

的土地来生活。因此，工人所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须的东西，仅仅是一些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所瓜分”。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引起的，“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分离和完成这一分离的人类分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分裂。而这一分裂正日益加剧，……它必然还会不断地加剧。”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和“利益对立”。

恩格斯在文章中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批判。重商主义学派把金、银等贵金属当作国家财富的源泉，以为只要保住本国贵金属不外流，同时通过贸易骗取那些与之贸易的国家的贵金属，就会产生和增加财富。恩格斯将这一概念称为“可笑的幻想”。他指出，这种理论不仅掩盖了资产阶级掠夺和贪婪的本性，而且未能从经济运动的客观必然规律去揭示商业的本质。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实际上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这种欺诈之所以取得合法的地位，是私有制发展的结果。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批判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派认为：竞争是人类自由的表现，通过竞争，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的纽带就能得到加强，因此，商业是人道的基础。对此，恩格斯予以猛烈抨击。他指出：“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来使敌对关系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利害相同而互相吞噬的凶恶的野兽（竞争者不是凶恶的野兽又是什么呢？）这种竞争和利害关系，使得财产的家庭共有制被工厂制度破坏了。在英国，有的孩子刚满 9 岁，也就是刚刚能劳动的时候，就靠自己的工钱过活，把父母家当作一个客栈，交给父母一定的膳宿费——人道又从何谈起呢？

恩格斯在无情地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时，并没有把在政治经济学上有重大贡献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跟那些庸俗的经济学家如萨伊和麦克库洛赫之流加以区别。此时，恩格斯还不理解劳动价值论，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可能存在任何抽象的和实际的价值，如果存在某种价值的话，那只能是交换价值；而市场价格的差异与水平完全取决于供求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利润则是从买卖双方尔虞我诈中产生出来的。恩格斯甚至还将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论看作是一种故意“颠倒黑白”，是不现实的，目的是掩盖商业的不道德和保留“一点价格和价值有些联系的样子”。

同样，恩格斯对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已臻于成熟的科学水平。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过剩”、贫困、饥饿均受自然界“永恒规律”的制约，根据这条

规律，人口按几何数 $1+2+4+8+16+32\cdots$ 增加，而土地的生产力只能按算术级数 $1+2+3+4+5+6\cdots$ 增加。因此，马尔萨斯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应由自己负责。在他看来，“人口过剩”可以用战争来消灭。恩格斯将这种仇视人类的理论斥之为“卑鄙下流的学说”，是对“自然和人类恶毒的诬蔑”。他论证说，制约着“人口过剩”的并不是自然界，而是资产阶级对过剩财富的不可遏止的欲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始终是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相联系的。只要有生产力巨大增长的地方，人口就会过剩。恩格斯不仅找到了人口过剩的原因，更找到解决人口过剩的途径：“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他还提出了在新的社会制度下，通过改革来教育群众，“从道德上限制生育的本能”。恩格斯在这里并未因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走上另一个极端。

恩格斯还第一次论证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来的知识量成比例。因此，在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正是农业科学的发展，使粮食成倍成倍的增长，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下，完全可以消灭贫困

的现象。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同时代人对他的注意，柏林的一位著名医生尤利乌斯·瓦尔德克在给科尼斯堡民主党人约翰·雅科比的信里写道：“恩格斯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把他思想上、文笔上的成熟大胆同他去年的著作比较一下，这个奇迹就一目了然了。”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大兴趣。这篇文章使马克思加强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了详细的摘要，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初版序言里，把恩格斯这篇文章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也正是在这篇文章发表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了通讯联系。

后来，恩格斯非常谦虚地评价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他在1871年4月13日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称这篇文章已经过时了，它是用黑格尔的风格写的，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作用。

不可否认，在恩格斯这部经济学著作里，还存在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伦理概念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的影响，对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济理论也还缺乏透彻的了解。但是，这部著作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它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从资本主义内在

矛盾的发展中得出了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结论。

在 1842 年 11 月《国内危机》一文中，恩格斯就提出了用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和贵族统治的设想，但当时他还没有认识到进行这种社会革命所依靠的阶级力量，经过近一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他终于找到了答案。1844 年 1 月，恩格斯在为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写的书评中，恩格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回答了这一问题。

卡莱尔是英国保守的托利党代言人，这个党代表了土地贵族的利益。卡莱尔站在土地贵族的立场上，从人道主义出发，抨击了资本剥削制度，他企图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即泛神论的英雄崇拜、劳动崇拜，作为新的人类灵魂来医治社会弊病。在卡莱尔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根源，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在于人们相信无神论，使人类失去了灵魂，只要信仰他的宗教——“劳动崇拜”，人们的“灵魂便会发生多么和谐的音律”，“恶狗也就只好狂吠着退到远远的地狱里去”，“生活就会沿着从人类贫困的死水滩开掘出来的运河，自由奔流”。恩格斯指出，卡莱尔的“劳动神”不但没有触动资本主义所有制，反而在“劳动”的美名下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卡莱尔思想方式的实质是泛神论的，而且是德国式的泛神论，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卡莱尔还鼓吹“英雄崇拜”，他认为广大工人群众是群氓，没有创造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仅仅是由于饥饿和绝望所致。为了实现人类的组织化，只能依靠天才人物的出现，并在他们领导下把工人组织起来。恩格斯针锋相对，指出：“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事业，他们还有前途。”

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断，否定了当时人道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两者都认为无产阶级不具备创造历史的力量，没有能力创造人类历史。恩格斯则反其道而行之，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他坚信：既然工人已经用事实证明自己有能力为争取本阶级利益进行反对个别资本家的斗争，举行过无数次的罢工、游行和起义，那么他们也一定能联合起来对付整个资产阶级。

为了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1844年春天，恩格斯加强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他深入探索自然科学发展同哲学史之间的历史上和逻辑上的关系。同时批判地研究了著名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培根、霍布斯、洛克、狄德罗、霍尔巴

赫、爱尔维新等。他密切注意数学、化学、古生物、物理、地理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并对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仅使恩格斯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恩格斯指出：18世纪以来，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

恩格斯在《德法年鉴》和《前进报》上发表的这些文章，是对自己在英国时期世界观转变的一个总结，是他精神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文章说明恩格斯已经完全彻底地从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到共产主义。

1844年8月，恩格斯离开英国回国，他的行李袋中装满了这两年的社会调查笔记，各种报刊、书籍，包括会议文件，出生、婚姻和死亡登记的报告，法医验尸报告，慈善机关统计等等，这是他在英国近两年生活的最大收获。回德国后，他打算写一本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向全世界全面介绍英国的工人阶级。

两年前，老弗里德里希把儿子送到英国，是想让儿子远离政治，成为出色的企业家。他自己做梦也想不到，他竟然造就了一个与自己阶级对立的革命家。

第六章 良朋与战友

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弗·伊·列宁

1844年8月末，恩格斯离开了曼彻斯特。在回国途中，他绕道法国去拜访已迁居巴黎的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比恩格斯大两岁半，他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摩塞河畔的特利尔城，父亲是一个接受新教的犹太人，从事律师职业。与恩格斯的充满虔诚宗教主义和家长制的家庭不同，马克思的家庭深受法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相对开明，其父亲亨利奇·马克思的头脑中充斥着资产阶级人道

主义思想。

马克思 12 岁进入特利尔中学，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他的理解力很强，常常能够解释和说明古典文学中最难懂的章节。他的作文，思想丰富且极为深刻，给任课教师留下深刻的印象。1835 年中学毕业，在马克思的毕业论文中，阅卷先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意见，这意见在我们今天看来，更是意味深长。作文的题目是“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写道：“我们往往不能择取我们觉得适合于我们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中的诸种关系是早已在我们能够决定它们之前就多少固定了的。”这是青年马克思头脑中闪烁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如果能够选择职业，马克思表示，他毕业的幸福和他所要选择的职业就是为人类服务，按人类的理想来塑造现实。

1835 年秋天，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一年后又转入柏林大学，在这两所大学，马克思念的都是法律系，老马克思的意图是让儿子在几年后继承父业。但是，在大学里，马克思不仅研究法律，而且还研究历史，特别是对哲学有着特殊的兴趣。刚开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想持反对态度，但很快便对黑格尔的思想着了迷。他“从头到尾地对黑格尔，连同他的大多数弟子”进行了研究，并且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非常热心的支持者和捍卫者。他还参加了青年黑

格尔派的小组“博士俱乐部”。在这个组织里面，马克思是最年轻的成员，由于他非凡的气质，坚强的意志和雄辩的口才，很快便成为这个团体最活跃的中心人物。

1841年春，马克思以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结束了他的大学生涯。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并未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但他已不再盲目崇拜黑格尔。在他论文脚注中，马克思指出，当宗师犯了随便附会的毛病的时候，他的门徒们不应该只是责备他，而应该从它所根据的原理的不适当之处解释这毛病的根源。这样才能进一步获得深思所能获得的教益。

在论文的序言中，体现着马克思坚强的斗争精神。“既不怕闪电，也不怕神威，更不怕天庭的惊雷……”。只要一滴血还流动在哲学的征服世界的和自由无羁的心胸里，哲学总是要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哲学的敌人挑战的：轻侮庸众的神祇的人不是不敬上帝的人，而承受庸众对于神祇的意见的人才是（不敬不帝的人）。在序言的结尾，马克思引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誓言：“简直说吧，我仇恨一切神祇，我决不愿改变我自己的不幸命运，来交换你们的卑贱的奴役。”马克思极富挑战性的语言，连当时他的朋友布鲁诺·鲍威尔也吃了一惊，他认为马克思

在此表现了“不必要的奋勇”，但他并不理解马克思成为人世间的普罗米修斯的决心。

1841年马克思毕业后，曾打算在波恩大学谋一教授职位，教授哲学。但是，这种打算注定不能实现。新即位的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不但没有执行反对派所期望的自由主义方针，反而更加广泛的镇压一切进步运动。大学讲坛也将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况下，波恩大学是没有马克思的位置的。1841年4月，马克思离开柏林，对自己的未来另作选择。

马克思离开柏林之后，恩格斯也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他经常听鲍威尔兄弟等人谈论马克思，因而心仰已久，在他的讽刺诗《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中，马克思是作为“黝黑的特利尔之子”和“引人注目的巨人”出现的：

“他不是走在，不是在跑，而是在风驰电掣般地
飞奔。

鹰隼般的眸子，大胆无畏地闪烁，
紧攥拳头的双手，愤怒地向上伸，
好像要把苍穹扯下埃尘。

不知疲倦的大力士一味猛冲，

好似一恶魔缠住了身!”

当时，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在科伦创办了《莱茵报》。在威廉四世的高压统治下，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反政府情绪很强烈，由于在新闻界找不到足以代表自己的人，他们便与极端激进的哲学派别——青年黑格尔派联合起来。马克思最初是为《莱茵报》撰稿，从1842年10月起又受聘担任该报主编。在马克思的努力和影响下，《莱茵报》愈来愈具有战斗的革命民主主义色彩。在此期间，马克思也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开始向唯物主义立场转变。但这种转变也离不开马克思的亲身社会实践。

在编辑过程中，马克思接触到下层人民的贫困生活，了解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产生怀疑。他先后在《莱茵报》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公开为社会上、政治上备受压迫的贫苦农民进行辩护，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他认为自己就是贫民阶级的辩护人，他要站在“还没有被有意识地划分了的国家里找到应有的地位……的贫民阶级的立场”。

《莱茵报》的激进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引起了普鲁士政府的恐慌，当局认为该报的言论威胁到自己的

统治秩序，因此，柏林政府 1843 年 1 月作出决定，从 3 月 31 日起禁止《莱茵报》出版，在此之前对《莱茵报》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报纸的股东们希望政府收回成命，乃决定把该报的色彩变得温和一些。马克思不同意向反动当局让步，遂于 1843 年 3 月 17 日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称：“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马克思决定离开容克贵族专制统治下的普鲁士，到国外去创办一份进行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的刊物。

马克思决定在出国之前先完婚。他的未婚妻燕妮·冯斯特华伦已经等候他七年了。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她出身于贵族官僚家庭，20 岁时与马克思相恋，尽管受到贵族亲戚的多方阻挠和反对，燕妮还是一直等着马克思。她对马克思的爱是那样的坚定，“纵然是皇太子也不能把她从他手里抢去”。1843 年夏，马克思同燕妮举行了结婚仪式，从此，燕妮成了马克思的爱妻和孩子们的慈母，同时也成为马克思的忠实战友。她帮助马克思收集资料，誊写稿件，代笔与友人通信，成为马克思不可缺少的秘书

1843 年 11 月，马克思携带爱妻迁居巴黎，在那里，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尔诺得·卢格共同创办了《德法年鉴》。

巴黎对于马克思犹如曼彻斯特对于恩格斯一

样。马克思在这里面对的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的世界，资产阶级战胜了封建势力，并通过工业革命在不断充实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在这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充分表现出来，现代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已经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大搏斗，尽管这种斗争尚处于初级阶段。另外，在法国，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法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对马克思世界观的进一步转变无疑具有重大作用。

《德法年鉴》的命运并不比《莱茵报》好，由于内部的分歧和外部的困难，它只在1844年2月出了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合刊。在唯一的一期《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发表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和由他聘为撰稿人的恩格斯一样，在这里迈出了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理论的第一步。不同的是，恩格斯主要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批判过程迈出的这一步，而马克思则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审查实现了这一转变。

《德法年鉴》上还刊登了恩格斯的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对推动马克思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起了很大作用。马克思早在《莱茵报》工作时就对经济问题产生了兴趣。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他进一步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

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可以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给了他一个直接的启示，从1844年初，马克思开始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首先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他综合了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从“现有的经济事实”出发，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脱离了劳动者，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者相对立。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自己也就越贫穷，劳动成为劳动者的一种自我折磨，资本家则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产品，从而造成劳动者同资本家的对立的加深。异化劳动的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理论的萌芽。

马克思还试图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全面考察，他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种表述已经包含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了理论论证，

他指出：“人与人的互相疏远和人对人的剥削，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要消除这种疏远和剥削现象，首先要建立社会主义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根子。”这样，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使社会主义开始具有了科学的性质。因此，《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试图建立自己完整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初尝试，但它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下完成的，尽管两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他们都重视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都正确地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私有制。

共同的信念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强了联系，特别是马克思在阅读了恩格斯寄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后，彻底改变了以往对恩格斯的看法，他们开始了密切的通讯联系，这成为他们终生友谊的起点。

马克思得知恩格斯要返回德国，在信中诚挚地邀请恩格斯到巴黎来做客，并希望能借此机会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

1844 年 8 月底，恩格斯如约来到了巴黎，巴黎是

恩格斯向往已久的城市，这里充满着生活的乐趣，使人千百次地回想起大革命和那些浪漫的女郎。但恩格斯无暇领略这个开放世界的忙乱生活，他想尽快见到马克思，尽快去会晤在柏林即已慕名，在科伦失之交臂，身处巴黎和曼彻斯特两地却日感志同道合的朋友。

恩格斯叩开了巴黎圣日耳曼郊区瓦诺街 38 号的大门，留着大胡子的马克思出现在门口，犹豫片刻，双方即认出了对方。两人趋步上前，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虽然距第一次见面仅仅两年的时间，但在这两年的生活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生活上，甚至他们的外表，都比两年前成熟了许多。

“欢迎你，恩格斯先生，自从得知你要回德国的消息后，我一直在期待着你的到来。”

“我也想尽快赶到巴黎来。你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我都看了，写得很漂亮，许多观点与我不谋而合。噢，对了，我们之间不必太客气了，叫我弗雷德或恩格斯都行。”

两人来到客厅，马克思沏好了茶，然后递给恩格斯一支大雪茄，他们相视一笑，两人在生活中又找到了一个共同点。

“我的夫人燕妮回特利尔探亲去了，这段时间，

你就住在我这儿，我们可以好好交流交流。”

恩格斯也没再客气，在巴黎的十来天中，他一直住在马克思家中，两个人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不仅白天在一起交谈，而且晚上也是每人叼着一个大雪茄，一起探讨一些重大的问题。

恩格斯向马克思介绍了自己在英国这两年的主要经历并介绍自己对英国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研究的情况。

“我刚到伦敦时，曾经惊叹这个国家所创造的巨大的财富和公民所享受的自由，在轮船上还曾为这个自由的国家干杯。但真正走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巨大的财富只属于为数不多的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却无法享用，而且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并且因此导致了犯罪、卖淫等大量使人类堕落的行为。”

“那你认为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呢？”一直聚精会神听恩格斯讲述的马克思突然问道。

“我觉得，以英国为典型的，这种表面上是由竞争引起经济危机，随即导致其它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现象，根源在于财产的私有制度，私有制才是引起利益对立和相互竞争的根源，只有消灭或废除私有制，才能消除竞争和利益对立，才能最终解决一切社会

问题。”

“你的意思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对。不过，我对共产主义这个问题的看法还不太成熟，有些问题还有待研究和探索。可以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我与你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马克思猛吸了一口雪茄，思考片刻，然后说道：

“首先，同其它一切事物一样，人类社会也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更高一级的社会所取代，这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其次，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的，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

恩格斯被马克思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概括折服

了，他承认马克思在理论方面，在对问题的演绎、推理和归纳方面高自己一筹。

马克思也对面前这位同路人感到由衷的敬佩，作为一个工厂主，资产阶级的一员，恩格斯关心的却是推翻本阶级的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且在英国做了那么多细致入微的社会调查。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对工人阶级的了解确实比自己更全面，更深刻。

在谈到实现共同的宏伟目标所依赖的阶级力量时，两人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中就已达成共识，即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贫困的劳动阶级身上。

就这样，一个哲学博士和一个工厂主在爽快的谈话中，详细地讨论了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他们通过提问和解释，命题和反题，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相同的结论，他们是何等兴奋啊！两人惊奇地发现，在一切重大问题上，他们有着惊人相同的看法。而且作为社会学家，两人更是相得益彰，彼此以各自专门研究领域的知识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这是他们结成终生友谊的重要基础。恩格斯后来写道：“当我 1844 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恩格斯在巴黎度过了令他终生难忘的十天，他回到巴门后写信给马克思说：

“我还从来没有一次像在你家里度过的十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自己真正是人。”

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马克思把他介绍给在巴黎出版的德文报纸《前进报》的编辑小组。这是一份由德国商人亨利希·伯恩施泰因于1844年1月创办的报纸，起初并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前进报》逐渐成为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报纸。马克思兢兢业业，努力使这份报纸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抨击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和札记，并把一批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家团结在《前进报》周围。

1844年8—10月，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发表了在英国时写的两篇文章《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英国宪法》。恩格斯在这两篇文章中揭示了英国十八世纪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的实质，指出：“英国工业的这一番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动力。”产业革命所引起的最重要后果是“形成了无产阶级”。恩格斯还认为，当时英国国家生活的特征是“理论和实践处于惊人的矛盾中”。即宣布的政治权利与实现之间的不一致和显著矛盾。恩格斯问道：“……实质上究竟是谁统治着英国呢？”“是财产”，“资产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是无权的，他们备受压迫和欺凌，宪法不承

认他们，法律压制他们……”。

恩格斯在巴黎逗留了十天，马克思把自己在巴黎的战友介绍给他，和他一起参加德国和法国工人的集会、聚会；在这里，恩格斯结识了一批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家，包括《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卡·路贝尔奈斯，可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法国海军军医奥·海·艾韦贝克，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赞同共产主义思想的翻译家盖里埃，他将费尔巴哈的著作翻译成法文，另外还有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尼古拉·萨宗备诺夫等人。恩格斯也向马克思介绍了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及其斗争的情况，介绍了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组织以及给他留下良好印象的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在巴黎，恩格斯获得了自己同英国工人交往时的同样感受，工人们都是国际主义者，并且“已经摆脱了民族偏见和种族优越感”。恩格斯认为，法国工人是“好样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一起走访了巴黎的一些共产主义俱乐部，但他们没有答应参加任何一个组织，他们与这些组织都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

马克思和恩格斯朝夕相处，为的是探讨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段时间，两人都对自己以往的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要素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马

克思在他所从事的哲学、法律和国家学说的领域中又新增加了政治经济关系。显然，恩格斯对这种转变起了不小的作用。另外，马克思还在自己内容丰富的经济学研究基础上着手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开始创立唯物主义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了摆在自己面前的任务。在继续研究新的革命理论的同时，为革命理论找到一条通向德国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的道路，当务之急就是推翻那些阻碍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错误观念。

在恩格斯到巴黎之前，马克思就打算写一部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性著作。因为青年黑格尔派越来越放弃先前的革命民主主义信念。他们极力鼓吹一种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的批判，否认一切实际活动；他们否认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把无产阶级形容为一种妨碍“积极精神”的“冥顽不灵”的“粗糙物质”，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布鲁诺·鲍威尔在1843年第八期《文学总汇报》上发表了题为《1842》的文章，布鲁诺·鲍威尔极力攻击了1842年德意志的“激进主义”及其代表《莱茵报》，他认为，《莱茵报》被查封，表明了革命民主思想在消极的群众面前的破产。

布鲁诺·鲍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大肆宣扬他

的观点。如 1844 年 7 月，马克思在科伦的朋友格·荣克写信给马克思说：“鲍威尔对批判简直入了迷，不久前他写信给我说，现在必须给予批判的，不光是社会，享有特权的私有者等等，还有——谁也没有想到的——无产者……”荣克认为，马克思应该反驳鲍威尔的观点。

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看法，与马克思完全一致。所以他欣然接受了与马克思共同写一本小册子，抨击鲍威尔及其同伙的建议。恩格斯后来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一文中，对这次论战的意义做了如下论述：“德国有一些哲学家不愿从他们的纯粹理想中做出实际结论，硬说人只应该去想形而上学的问题，现在我们向这些人宣战了……，鲍威尔和施蒂纳是德国抽象哲学的最终结论的代表人物，因而也是在哲学上反对社会主义或者宁可说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头等重要人物。”

开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打算写一部三、五个印张的小册子。恩格斯在巴黎期间就完成了他负责的那几个章节，共一个半印张。恩格斯回德国后，马克思才着手写他分担的那一部分，结果越写越多，远远超过原先设想的篇幅，最后达到了 22 个印张，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这本书最初定名为《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

伙伴》，后来为了讽刺鲍威尔兄弟的行径，马克思又借用了福音书上“神圣家族”这种说法，在前面加上了《神圣家族》的名称。尽管这部著作绝大部分由马克思执笔，但马克思仍然坚持它是两个人的共同作品。该书署名两人合著，于1845年2月在法兰克福出版。

该书的写作计划中称：“（针对鲍威尔兄弟的思辨唯心主义）我们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说的肯定的见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体系，指出，德国的思辨唯心主义是唯物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它描绘出的现实是歪曲的和颠倒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论证说，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精神产生自然，结果产生原因，儿子生出自己的父亲。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心目中，历史成了一种与人毫无关系的神秘力量，而人则成为彼世的一种消极工具。

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他写道：“批判所做的，仅仅是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订公式，也就是用现存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意向来制订公式。公式除公式便什么也没有。而且尽管批判在竭力抨击教条主义，但是它还是宣告自己是教条主义，

而且是妇女的教条主义。它是一个老太婆，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老太婆；它是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黑格尔哲学。这个哲学搽胭脂抹粉，把她那干瘪的令人厌恶的抽象的身体打扮起来，在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饥似渴地物色求婚者。”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时，对黑格尔辩证法中合理的成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们也没有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观点同黑格尔哲学混为一谈。他们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些观点是对黑格尔哲学的一种讽刺，他们不仅没有克服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而且比之更后退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写作《神圣家族》的，他们在书中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即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出了一条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根据这一原理，他们又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理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

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不是白白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后来，列宁在谈到《神圣家族》这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时，对上述结论予以特别的注意。他写道：“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被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态度，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他们看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一部杰出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作的结晶，这本书宣告了他们“在一切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神圣家族》又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奠定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些初步原理，正如列

宁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奠定了哲学的“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在巴黎相聚十天，彼此结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从“第二次握手”之后，两位伟大导师就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创造性合作。正如列宁后来所说的：“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第七章 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

这本书写得那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

——卡尔·马克思

1844年9月初，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到了故乡巴门市。临别时，他同马克思约定不久就返回巴黎，继续他们的合作。

故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世纪40年代是普鲁士工业革命飞速发展的时代，作为普鲁士主要工业区的莱茵省构成了工业革命的主流，巴门和爱北斐特也卷入到工业革命大潮中。

两年不见，恩格斯都快认不出自己的家乡了。这

里的“社会风气文明些了，参预政治和进行反对派活动也成了普遍现象，工业取得了巨大进步，新的街区兴建起来了，大片大片的森林被伐光……”这两年的变化比乌培河谷最近 50 年的变化都要大。

另外，这里的工人运动已经达到了旧文明的最后阶段。工人通过迅速增多的犯罪、抢劫和杀人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对此，恩格斯指出：“如果这里的无产者按照英国无产者那样的规律发展下去，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用这种方式，即作为个人和以暴力反对旧社会制度是没有用的，要作为具有普遍品质的人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它。”但是这在乌培河谷还办不到。

恩格斯很幸运，因为他的家庭一时还顾不上他这个“走失的儿子”。而正在为他妹妹玛丽亚和埃米尔·布兰克的订婚忙得不可开交。恩格斯想尽快返回巴黎，但遭到全家的反对，为此，他写信告知马克思说：“我要返回巴黎还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我大概还得在德国晃荡半年或一整年……，你想象不到，家里为了反对我离开，提出怎样琐碎的理由，怎样迷信的担心。”

既然暂时还无法离开德国，恩格斯决定先在德意志从事革命活动，主要是宣传活动。在访问了莱茵省的一些城市后，恩格斯兴高彩烈地把共产主义思

想在德国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的情况告诉了马克思。他在从德国寄给马克思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在科伦逗留了三天，在那里所开展的巨大宣传工作使我惊奇。”他同时又发现，“那里的人们非常活跃，但也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柱。只在人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去影响人民，我们很快就会取得优势。”在杜塞尔多夫，恩格斯发现了一批很能干的小伙子；在爱北斐特和巴门，也有很多热情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士，甚至“在巴门，警察局长也是个共产主义者”。

实际上，当时的德国有很多观点还糊里糊涂且摇摆不定的人，包括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及理论的著作家，甚至连费尔巴哈这样的哲学家都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情共产主义思想（当然还不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人们反政府情绪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恩格斯还高兴地告诉马克思，德国正在进行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活动。他说：“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共产主义书刊传入德国，在目前已经既是事实。一年前，这是在德国以外，在巴黎开始流行

的，实际上，那时它刚刚产生，而现在它已成为德国佬的一种负担了。报纸、周刊、月刊、季刊，以及正在向前推进的重炮预备队，统统都安排停当了。事情发展之快简直难以形容！”恩格斯亲自在社会主义者中间推广《前进报》，他同莫泽斯·赫斯共同组织出版了《社会明镜》杂志，该杂志的宗旨是系统地揭发有关现代社会状况的事实和保卫劳动阶级的权利。在恩格斯的倡导下，马克思在科伦的朋友卡·德斯特尔博士接管了《人民总汇报》，吕宁在达姆斯塔特出版了《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皮特曼出版了《莱茵年鉴》。恩格斯直接参加了上述刊物的筹备工作，并邀请马克思为这些刊物撰稿。同时，恩格斯还计划出版一套德文的《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和其它社会主义著作。

恩格斯和赫斯编辑出版的《社会明镜》因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揭露而受到反动政府的严密监视，普鲁士内务大臣下令：

“这家文学刊物企图煽动和蛊惑社会上的无产阶级，要对它严加注视，要最严厉地责成检察官最严格地行使检察法。”

1844年10月25日，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发布敕令，允许成立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国王陛下认为，这样一来，通过建立储蓄保险银行，建立学校和

普及通俗读物，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就可以在精神上和生活上得到救济了。于是，许多普鲁士城市相继组织成立了“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过些协会经常举行公开的集会，参加协会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慈善家、自由主义者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提出的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不外乎是成立储蓄银行、给优秀的工人颁发奖金和奖品之类。

尽管这样的协会在实际上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多少好处，但是，公开的集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社会问题，并有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所以恩格斯不仅参加这类集会，而且还与莫泽斯·赫斯和诗人兼画家古斯达夫·阿道夫·克特根一起组织这样的集会，以揭发资产阶级的假仁假义和宣传共产主义。

恩格斯是 1845 年 2 月 8 日、15 日和 22 日在爱北斐特召开的大会的实际组织者。集会是在寡妇奥伯迈尔夫人的“双桥饭店”即爱北斐特“一个上等饭店的最大的客厅里”举行的。第一次大会有 40 人参加，第二次大会有 130 人参加，第三次已接近 200 人。恩格斯兴奋地对马克思说：“整个爱北斐特和巴门，从金融贵族到小商人，都有人参加，所缺少的只是无产阶级。”恩格斯、赫斯、克特根是会议的主要演说人。

2 月 8 日的集会由克特根主持，首先由赫斯做了

报告，赫斯在报告中阐述了共产主义原理，接着，恩格斯发表了论述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他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工作，每一个人都在竭力使自己发财致富，而根本不理睬别人在干些什么。在这样的社会里，各个资本家同其他一切资本家进行斗争，各个工人同其他一切工人进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众也必然反对资本家集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工业自由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资本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却越来越贫困。这样，就形成了一小撮富翁和无数穷人之间的尖锐对立。

然而，自由竞争的后果还不止这些，既然每个人都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在那里生产和消费，根本不理睬别人生产什么，消费什么，那末生产和消费必然会很快完全脱节。厂主为市场生产，但他们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只是凭猜测进行生产。除了永远在波动的价格水平，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遵循的。生产的混乱导致商业的不景气，一个国家的工商业越发达，这种不景气现象也就越严重。最近 20 年来，英国每隔五、六年就发生一次商业危机；在德国，

竞争对工商业的影响表现为工业各部门的普遍长期萧条。

恩格斯分析自由竞争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目的在于从中引申出共产主义结论来。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像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要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就不难按照要求来调节生产了。”

共产主义社会将不需要常备军。全体人民都会捍卫自己真正的祖国，并且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得敌人的军队望风披靡。

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组织的优越性是“把个别的力量联合成社会的集体力量”，“这才是劳动力的最大的节省”。在谈到共产主义的历史和经济必然性时，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不是脱离现实的、只是由幻想产生的理论”。

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充满了

许多天才的和科学的预见。但是，恩格斯此时尚未完全摆脱欧文派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他在这次演讲中没有批判共产主义“移民区”之类的实验，而是肯定它，并且把欧文的平行四边形组织描绘得有声有色，认为欧文的这些主张“最实际、最完善。”

恩格斯的演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在爱北斐特工人阶级队伍中产生了回响。工人阶级虽然没有参加第一次集会，但很快便开始研究那次集会提出的问题。爱北斐特的工人选出了一个由四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后面的几次集会，并在工人的会议上向大家报告有关争论的情况。

恩格斯对爱北斐特几次集会取得的效果感到欢欣鼓舞，他也要马克思与他一起分享成功的快乐。“爱北斐特这里正在出现奇迹……，共产主义已经成为现实，也几乎成为一种力量了”。即使是“最迟钝、最无所用心、最庸俗的人士，对世界上任何事情从不感到兴趣，现在也欢迎起共产主义来了……。当然，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具体地、公开地进行宣传，比起胡乱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精神的眼睛’看着同样抽象的公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在爱北斐特举行的这几次集会引起了当局的严重不安，他们害怕“在人口密蒙的工业城市爱北斐特

——巴门”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危险。1845年2月22日，爱北斐特县长，政府枢密顾问塞塞尔·德·艾克斯伯爵在与市长冯·卡尔纳普商量后，决定禁止日后继续举行这种集会。他们通知“双桥饭店”的老板娘，今后不许再为那些共产主义者提供开会的场所，否则立即吊销其营业执照。4月28日，巴门市长签署了禁止集会的禁令并把禁令送交恩格斯等人。

禁令

致爱北斐特共产主义者集会发起人，1845年2月28日

本行政区政府奉昨日收到的指令，特通知如下：本月8、15、22日在寡妇奥伯迈尔夫人寓所举行的集会纯属非法……，本行政区政府已下令借助一切法律手段来制止再召开这类的集会，并责成警察当局禁止预定于下月1日在上述餐厅以任何方式举行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集会，禁止为同一日的或以同样方式举行的所有其它的集会，禁止未获警方许可的人公开发表演说……必要时将由警察局行使这个权力。

市长 冯·卡尔纳普
(本市) 古斯塔夫·阿道夫·克特根先生亲收

科伦的赫斯（目前在本市）先生亲收
（巴门的）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亲收

但是，恩格斯和赫斯、克特根没有理会市长大人的威胁，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照旧集会。市长和检察官都到了集会的场所，陪同他们前来的是一队从外地用火车运来的全副武装的警察。市长大人说到做到，要以武力镇压了。在这种情况下，演说已无法进行。到会的人只管喝酒、吃牛排，划拳行酒令或大谈塞纳河的风光和巴黎迷人的女郎。没有给警察任何进行干涉的借口。

恩格斯在巴门和爱北斐特的革命活动影响是巨大的，他本人也因此受到普鲁士反动当局的特别注意。警察厅长敦克尔在 1845 年 10 月 18 日向国务大臣博德尔施文克报告他巡视莱茵省的情况时曾提到恩格斯：“巴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一个完全可靠的人，但是他的儿子是一个讨厌的共产主义者，而且还以著作家的身份周游各地。”他还把恩格斯描绘成“共产主义者的首领”。

由于恩格斯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他与父亲和保守的家庭的冲突越来越尖锐。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提到：“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与他们时有交往）的‘行

为不检’又使我的老头子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出面讲话就更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地道的资产阶级狂热……。我接到的信，他们在给我之前，都从各方面嗅遍了。因为他们知道全都是共产主义者的来信，所以每一次都摆出一副宗教徒的难受面孔，叫人看了简直要发狂。我往外走，是那种面孔。我坐在自己房间里工作——当然是从事共产主义的工作，这他们知道——也是那种面孔。吃也好，喝也好，睡觉也好，放个屁也好，我都不能不在鼻子底下碰见那种令人讨厌的圣徒的面孔。不管我做什么——不管外出或在家，沉默或讲话，读书或写字，笑或不笑，我的老头总是摆出那种难看之极的哭丧相。”

有一次，恩格斯与赫斯在爱北斐特宣传共产主义，直到深夜两点才回家。第二天一大早，老弗里德里希又板起面孔，大概是暗示恩格斯去妓院了。最后，老头鼓起勇气问道：

“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

“在赫斯那里。”

“在赫斯那里！天呀！”老头停顿片刻，脸上露出了难以形容的基督教的绝望神情。“看你交了些什么朋友！”接着就是叹息，等等。如果老头子发现恩格

斯还写了《批判的批判》，肯定会把他赶出家门。

恩格斯为了不让母亲因他与父亲的冲突感到担心，不得不决定再一次去试试做生意。但是，还没有开始工作，他就感到发愁了，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做资产者，而且还要做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这种可怕的情景，我大致看到过一些，而在我老头子的工厂里呆了几天以后，它重新又展现在我的眼前……。再加上这个彻头彻尾基督教的、普鲁士的家庭里的沉闷生活，实在使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留在这里，到头来可能使自己变成一个德国庸人，并把庸人习气带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恩格斯已无法忍受，准备到马克思那里去。

然而，此时的马克思也遇到了麻烦。由于他在《前进报》发表文章抨击普鲁士的反动制度，普鲁士政府要求法国政府驱逐马克思。1845年1月16日，马克思接到法国政府驱逐他的命令，于2月3日迁往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由于他有限的资金都用于《德法年鉴》的创刊和发行上了，所以在经济上发生了困难，处于无钱安家的悲惨境地。恩格斯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在德国为马克思募捐。很快，爱北斐特、科伦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共产主义者便募集了120多

法朗。他还准备把“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的稿酬交给马克思支配，他对自己的朋友说：“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

由于已经不能再进行公开的共产主义宣传活动。恩格斯便集中精力进行理论研究，他还催促马克思要尽快把这些新原则“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观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发挥出来。“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长的著作，以便给许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当然也不会不起作用，那些事实太明显了。”

恩格斯自从回到巴门后就致力于他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述。在这本书中，恩格斯要为“英国人编制一张绝妙的罪状表。”他要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它种种罪行。“可是，我打的是麻袋，但指的是驴子，即德国的资产阶级。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坏，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勇气十足，不那么彻底，不那么巧妙罢了。”

恩格斯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写这本书的。除了个人亲身观感，恩格斯参考了大量的书籍，

以及英国议会各委员会和工厂调查委员的正式报告；他非常重视英国工人提供的直接证明材料，因此，他大量收集了宪章派的报纸《北极星报》和其它工人报刊。他还利用私人关系从医生和法医那里收集了大量工厂事故和工人伤亡情况的统计材料。正是上述大量悲惨事实激励着恩格斯在恶劣的环境中从事枯燥的写作工作。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如果我不是每天要把英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事情写进我的书里，我想我也许会有些颓唐起来，而这件事至少是把我的愤怒保持在沸腾状态。”

经过半年紧张的工作，恩格斯于 1845 年 3 月底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写作，同年 5 月，该书由莱比锡的奥托·维干德的出版社出版发行。

恩格斯的这本书取材于资本主义已经非常发达的英国，此时的英国已具备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因此，恩格斯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以及说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结论。

在“导言”中，恩格斯首先从产业革命入手，分析了产业革命的起因和后果，描述了它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指出，“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这个产业革命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并把资产阶级队伍中

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可是，这只是为了后来在某个时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们。”恩格斯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看成是英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他特别指出，如果不先研究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首先是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在这里这些条件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那么，对任何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都不能做出可靠的论证。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英国工人的贫困状态，他指出，强制性的劳动、贫困、饥饿、萎靡不振、体力和精神不断受到摧残，是工人阶级注定不变的命运。工业资产阶级向整个工人阶级，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宣布了一场真正的战争——社会战争，“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这场战争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资产阶级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追逐财富和权力，这实际上是对工人进行大量的屠杀。英国工人将其称为“社会的谋杀”。列宁在 1895 年写的纪念恩格斯的文章中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部写得很动人，充满了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的著作……它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的描述。的确，不论在 1845 年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出现过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那

么鲜明、逼真。”

与以前描写英国工人的著作不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而且历史性地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无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自由的最终解放。“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他们除了社会主义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基本思想。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与经济危机和革命的关系，马克思也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在工业发展的初期，这种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但是，由于竞争的集中作用……个别的小危机一天天地汇合起来，逐渐形成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这种危机通常是每隔五年在一个短短的繁荣和普遍兴旺的时期之后……，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

机。”危机每重复一次，其猛烈性就加强一次。恩格斯预言下一次危机将不迟于1847年到来，并且会更为猛烈和持久。结果是这一年法国和德国真的爆发了经济危机，并蔓延到大部分欧洲大陆，最终引发了1848年革命，这是后话。

经济危机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摆在工人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或者饿死，或者革命。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还第一次提出了工会和经济罢工在维护工人阶级切身利益方面，在团结工人阶级和培养他们的斗争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指出“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

恩格斯同时又指出，“罢工还只是前哨的小接触……它们还决定不了什么。”特别是不可能改变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经济规律，工人阶级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逐步认识到，要战胜资产阶级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必须有一种比工会和罢工更强大的东西。工人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迟早要演变为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运动；政治运动会教育工人，使他们明白：除了社会主义，他们别无出路。随着阶级斗

争的加剧，无产阶级必将有更高级的组织形式——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在这“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中，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英国的宪章运动，指出：“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工人阶级集合在宪章主义的大旗下，向资产阶级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保护自己的那堵法律围墙进攻。尽管宪章主义者比较落后，比较不发展，但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

恩格斯还批评了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他认为，欧文学说的特点是抽象原则和过分热衷于和平，它试图用和平的启蒙运动取代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斗争。恩格斯指出，欧文信徒的主要毛病就在于只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受苦受难的阶级，而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是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力量。

但恩格斯也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得远，并且提出了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指出，在英国只有把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运动。只有在实现了这点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

恩格斯的著作自始至终贯穿着他与马克思在巴黎会面时达成共识的一种思想：未来属于工人阶级。他指出：“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种从小就

灌输给他的原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现存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他们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工人将要起而代之。”无产阶级将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作为未来国家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具有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特性。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私利剥削所有民族，他们的民族利益就是聚敛钱财。而工人阶级“已经摆脱了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是相一致的”。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确立科学共产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为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大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向科学的发展的历史进程。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出版，在当时的德国引起了很大影响，社会主义派别的报刊对此反应尤为强烈。《文学报》赞扬该书具有“永久的价值”。俄国的《同时代人》杂志更把该书的作者称为“最优秀最高尚的德国人之一”。许多先进的工人和正直的

民主主义者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的德国工人弗·列斯纳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的，也是使我最初接受工人运动这一概念的一本书。”

马克思毕生都对恩格斯的这部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这本书出版 18 年后的 1863 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还称赞说：“你的书中的主要论点，连细节都已经被 1844 年以后的发展所证实了。……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这本书写得那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马克思在后来从事《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多次借助于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他所引证的许多材料均出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恩格斯本人对于这部青年时代的作品无疑也是非常满意并为之感到自豪的。1892 年，他在为这本书的第二版写的序言中说：“这本书无论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 24 岁。现在我的年纪比那时大了两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并没有什么使我脸红的地方。”

同时恩格斯也提醒读者注意，这本书所反映的

理论观点还不是成熟的科学共产主义，“我这本书只是他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

但是，毕竟瑕不掩瑜，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作为科学共产主义最优秀的著作之一而永远载入马克思主义文献史册。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出版后，恩格斯将第一批稿酬 100 塔勒寄给远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他是多么希望在良朋与战友处境困难的时候能与他并肩战斗。

经过不懈的斗争，恩格斯终于在 1845 年 4 月初离开巴门，迁居布鲁塞尔。

第八章 从布鲁塞尔到巴黎

他现在已经和他的家庭彻底决裂，人们都把他看作无神论者和叛教徒……但是我知道，他真正是一个才智超群的非凡人物，他日日夜夜集中精力为劳动者阶级谋福利。

——格奥尔格·维尔特。

1845年4月，在乌培河谷的小市民中一连几个星期都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最近在爱北斐特组织共产主义集会的那个英俊的小伙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在一个大雾弥漫的黑夜横跨大西洋逃到新大陆去了。

其实，恩格斯根本没有离开欧洲大陆，他也不想离开，因为他觉得欧洲大陆才是他进行政治思想活动的场地。他离开德国后，去了他的良朋与战友所在的布鲁塞尔。

1845年4月5日，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布鲁塞尔是一个宁静、美丽、富于乡土气息的城市。比利时的资产阶级依据1830年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牢牢地控制着全国的局势。由于比利时政府采取了一些相对自由主义的统治政策，许多国家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活动家都流亡到这里，使布鲁塞尔成为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

恩格斯来到圣居杜尔广场第26—27号的“野林”旅馆敲响了马克思家的门。马克思的爱妻燕妮正在做家务，她顾不上解下围裙，一路小跑去开门。燕妮并不认识门口这位高大英俊的青年，恩格斯到巴黎去她家时，燕妮正好回特利尔了。

恩格斯赶忙做自我介绍：“我是恩格斯，从德国巴门来，我可以见见卡尔·马克思先生吗？”

“这么说，您一定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了，我和卡尔等您很久了，快请进。”

听到恩格斯的说话声，正在屋里埋头写作的马克思立即跑出来与恩格斯热情地握手、拥抱，两个人是那样的高兴与激动，甚至一时地把燕妮都冷落在一边。

恩格斯和马克思夫妇落座后，从门外走进来一位金发披肩，相貌清秀，眼睛明亮的典型的日尔曼姑娘。她庄重而严肃地看一看这陌生的男子。燕妮忙开

口介绍说：“她是我们的管家，叫海伦·琳衡，是我妈妈派来帮我料理家务的，没有她，这个家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她的手很巧，什么活都会做。尽管我们经常手头拮据，但她总是有办法帮我们度过难关。”

琳衡一直在马克思家当管家，无论这个家庭曾经多么困难，她从未想过要离开，使马克思可以集中精力从事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活动，马克思去世后，她又成为恩格斯的管家，与恩格斯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她的名字，与这两个伟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刚到布鲁塞尔，恩格斯也居住在“野林”旅馆，这家旅馆是专门为外国人开办的中等旅馆，在这里投宿的主要是德国人。到了5月份，马克思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已无法支付旅馆的房租，于是举家搬到圣卢万门外同盟路5号远离市区的一家旅馆。不久，恩格斯也搬到了同盟路7号马克思隔壁，以便能很快走进最亲密朋友马克思的家。

不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具有进步民主思想人士及小移民区：其中有他们在德国的旧相识莫泽斯·赫斯夫人，与马克思一同从巴黎迁来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政论家塞巴斯蒂安·塞莱，马克思的妻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以及约瑟夫·魏德迈，威廉·沃尔弗等等。

1845年6月，恩格斯打算离开布鲁塞尔去旅行，这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同工人运动的联系；另一方面，他想回巴门参加小妹玛丽亚和英国共产主义者埃米尔·布兰克的婚礼。此举遭到了治安警察局局长奥迪男爵劝阻，理由是他的侨居证书只适用于离开普鲁士，而不适用于返回普鲁士。恩格斯只得作罢，他给玛丽亚写了一封信，表示深深的歉意和衷心的祝贺。

在这次与马克思重新会面时，马克思给恩格斯看了刚刚完稿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后来回忆说：“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面时，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然而马克思在1859年时也指出，1845年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见面时，发现恩格斯已独自远远地超过了自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着手在各个方面阐述自己的新观点，同过去的哲学信仰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

1845年7月，马克思决定到英国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以便从经济发展规律中论证共产主义学说。另外，按照与出版商签订的合同，马克思要完成《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在这部著作的

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感到有必要去英国亲眼看看那里的经济生活，看看英国的工业、工会组织、工人运动等等。

然而，马克思对英语只是略知皮毛，在图书馆里查阅并摘录资料尚感吃力，他想到了恩格斯。恩格斯在英国生活了两年，不仅英语水平高，而且对英国的社会也有一定的了解。于是，马克思向恩格斯发出了邀请。

“亲爱的弗雷德，我需要到英国考察一下那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我又担心我的英语不足以应付这样的考察，你要是能陪我一起去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噢，这几天我也在考虑是否要到英国去一趟，我想写一部英国社会史，以及关于保护关税问题的小册子，需要收集一些材料。另外……”

“还有你的玛丽……”

“对，快一年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那就快点儿准备一下吧，我们明天启程。”

1845年7月12日，恩格斯陪同马克思横渡英吉利海峡在伦敦登陆。他们无暇领略伦敦的名胜古迹，马上转乘火车奔赴曼彻斯特。他们此次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曼彻斯特度过的。

安顿好马克思后，恩格斯匆匆赶到了海德路 252

号，此时，玛丽的妹妹莉迪娅正在做饭，看到恩格斯走进来忙喊：“姐姐，快看谁来了。”

玛丽从里屋走出来，一看是自己的心上人，马上跳起来惊呼：弗雷德！”

“玛丽！”

久别的情人忘情的拥抱、接吻，过了许久他们才分开。

“弗雷德，你瘦多了。”

“你也不像以前精神了。”

“我们不要再分开了，吃苦、受累我都和你在一起。”

“我已同家里闹翻了，不用再担心了，这次你就随我回布鲁塞尔。”

“嗯。”

“马克思先生为什么不一起来？”玛丽问道。

“他不愿打扰，另外住在市中心可节省不少时间。”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中，恩格斯陪同马克思一头扎到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切特姆图书馆，阅读在欧洲大陆难以见到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切特姆图书馆是当时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有很多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古版书。两人可谓不虚此行，走时各带回了三大本笔记。

1845年8月19日，恩格斯夫妇陪同马克思踏上归途。

在返回布鲁塞尔途中，恩格斯和马克思在伦敦稍事停留。恩格斯陪同马克思拜会了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编辑部，把朱利安·哈尼介绍给马克思，并约好他今后将为《北极星报》撰稿。恩格斯还把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介绍给马克思，后来，这三人都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

恩格斯在伦敦还帮助正义者同盟跟宪章派左翼建立了联系。1845年8月中旬，恩格斯陪同马克思出席了有宪章派、正义者同盟和英国民主派领导人在韦伯大街“安琪儿”小酒家举行的会议。恩格斯在发言中倡议成立一个促进国际民主运动的协会，这一建议被会议所采纳。1845年9月22日，也就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53周年这一天，会议在伦敦召开，并决定成立“民主派兄弟协会”。英国的宪章派和德国的正义者同盟是这个协会的中坚，另外还有法国、俄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的民主人士。

为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恩格斯特意在《莱茵社会改革年鉴》上发表了题为《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文，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他写道：“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现在比过去任何

时候都具有纯粹的社会意义……各国无产者……开始不声不响地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真正地结成兄弟。也只有无产者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点……全世界无产者都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恩格斯后来一直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联系，力图将其变成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

为了履行对哈尼的承诺，恩格斯回到布鲁塞尔后，如期为《北极星报》撰稿。在1845年的最后四个月中，恩格斯先后撰写了《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维多利亚女王的访问——‘王室’之间的不和——维克同德国资产阶级的争执。——对巴黎木工的判决》、《在瑞士的‘青年德意志’》，《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和驱逐》和三篇题为《德国现状》的一组文章。

这一时期，恩格斯还写了一些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论战的文章，发表在各种年鉴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广泛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是以莫泽斯·赫斯和卡尔·格律恩为首的一批作家。这些人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批评资本主义，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心怀恐惧，害怕因之而引起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

间的阶级斗争。他们认为，通过一切阶级的充满爱的合乎理性的行为就能改变社会关系，主张用关于博爱的说教来代替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讽刺他们，将其主张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说，“真正的”社会主义用哲学上的空谈，用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片断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折衷地拼凑在一起的手法，来代替对现实和理论进行认真的研究。他谴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轻视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傅立叶、圣西门等人的社会观点，而且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这种以向一切阶级进行多愁善感的道德说教来代替阶级斗争，只能使共产主义运动庸俗化。

1845 年秋天，恩格斯和马克思决定，在详细阐述自己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前，要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在谈到写作目的时恩格斯说：“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工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

明确了这一点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

这部《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继《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完成的第二部著作。与《神圣家族》不同的是，这部著作是真正的集体创作，虽然具体写作时也有分工，但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几乎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一段都是经过共同研究推敲过的。他们经常讨论到深夜，琳衡几十年后还清楚地记得，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深夜讨论这部书时，使住在隔壁的人经常无法入睡。

《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两卷。第一卷《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共分三章，其中在理论上最重要的是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第二、三章《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是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观点的批判。该书第二卷《对各色各样先知所代表的法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分别批判了泽米希·马特伊、格律恩等人的“真正社会主义者”的观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对作为科学共产主义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了全面研究，阐述了一系列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的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指出他们据以建立新的世

界观的前提是：人、人的活动及其活动的物质条件。他们指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而“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一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物质生活的生产不仅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关系，“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人们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在它有无全不需要似乎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存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指出，生产的客观前提和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能力构成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革命的因素。一定的生产关系总

和是在一定时期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它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并构成生产力发展的条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过去曾使生产力能够获得发展的生产关系，这时就成为它的桎梏。这一矛盾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社会革命将建立起与更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说明了人类历史各个发展阶段的继承关系。他们认为，物质生产发展中的每一个新阶段都引起新的分工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每一种所有制形式又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和政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奠定了社会经济形态学的基础，从而开创了历史的科学分期，把历史从宗教神秘主义的外衣下解放出来，变为真正的科学。对此，列宁评价说：“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阐述了一个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唯物主义原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思想、观念、意识是人们物质生产关系的直接产物，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他们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了这样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责，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从这个阶级中产生了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意识……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它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共产主义由空想变为有科学根据的理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到 1846 年 5 月基本完稿，但是这部著作在两位作者生前没有发表过，只有恩格斯 1847 年为第二卷写的续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7 年发表在《威斯特伐亚汽船》杂志上。马克思在 1847 年 3 月向德国读者发表了一个声明，介绍这篇文稿未能出版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阻挠，另一方面是封建专制主义警察的干扰。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他们的劳动是浪费。马克思在 1859 年总结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出版受阻，预计从该书中获得一笔预付稿费的希望落空了，恩格斯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在布鲁塞尔期间，恩格斯家中定期给他寄一些钱，但只够他个人的生活费用，因为老弗里德里希害怕儿子把钱用于共产主义事业上，所以从不多给一文。玛丽的到来已使生活略显艰难，后来她妹妹希·白恩士也从英国来到布鲁塞尔，他们一家的生活更为困难。他甚至不得不向自己妹夫伸出求援之手。1846 年 3 月，他写信给在伦敦的埃米尔·布兰克，请求他立即寄六英镑或一百五十法郎，因为父亲没有把预定的钱寄来。另外，恩格斯还有价值一百五十法郎的物品抵押在当铺里，他希望父亲去英国探亲途经布鲁塞尔时把它们赎回来。出现这些麻烦，“是因为一个冬天我在写作方面几乎一文钱也没有挣到”。

为了替丈夫分忧解难，玛丽又干起了自己的老行当——卖水果。玛丽天性乐观，待人热情，小生意做得也还不错。她的性格使她与周围的流亡者及其

家属相处得极为融洽。受其感染，诗人维尔特还赋诗一首，颂扬这位来自爱尔兰的女郎：

玛丽，这年轻的女郎，
胸中充满沸腾的热血，
和潮水一起来自梯培雷里，
来自爱尔兰，
她轻盈地离船登岸，
水手们都同声惊叹：
“天啊！这位玛丽女郎，
真像野玫瑰含苞待放！”

她潇洒地走向市场，
一个过路人向她问安：
“天啊！这位玛丽女郎，
一对小脚多么漂亮！”
她乘车去利物浦，
黑亮的眼睛闪烁着勇敢的目光，
人们围着她的座位，
久久不愿离开她的身旁。

玛丽和潮水一起来自梯培雷里，
来自爱尔兰。

这位女郎放声高喊：

“谁买桔子，又甜又香。”

全城的人：黑人、波斯人、有色人

犹太人和受过洗礼的人，

霎时间都来购买，

桔子真是又甜又香。

海上不见船帆，

码头无船出港，

一个痴情水手，

坐在船上遐想：

真想去利物浦一趟，

那里有位玛丽，

来自梯培雷里的女郎，

正在卖桔，坐在椅上。

梅塞河畔的女郎，

人们对你情深意长。

海上有人为你倾倒，

陆地上更有人对你敬仰。

有一只小船

桅樯折断，

船员不慎落水

难忘桔子甜香。

她抗拒人们的无礼和粗暴，
被灼痛的双唇似在燃烧，
那些蓄着大胡子的顾客，
总爱聚在市场的这一角。
陌生人的亲吻使她愠怒，
她毫不宽恕，
她挣扎、叫喊、逃跑，
摆脱别人的拥抱。

收拾起挣来的钱钞，
这是金黄色水果换来的酬报，
虽然怒气未消，
还是急忙往家跑。
把钱锁牢，谨防被撬，
这时正月已来到。
赶快汇寄爱尔兰，
自己不留一分一毫。

“为了拯救我的同胞，
我向你们捐献钱钞，
起来，擦亮利剑和斧刀，

把胸中的宿怨燃烧！
但愿梯培雷里的三叶草，
长得比英国的蔷薇更繁茂，
请代替我玛丽，
向奥康奈尔先生问好！”

尽管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但丝毫没有影响恩格斯的工作热情，他一如既往地继续致力于工人运动。由于受恩格斯的感召，诗人维尔特在给母亲的信中满怀热情地说：“让那些有钱的老爷们留神吧，人民的巨臂在我们这一边……其中有我最敬爱的朋友——巴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我……把他看作是真正的奇人，一个有着非凡的智力和目光远大的人，一个日以继夜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努力奋斗的人。”

1846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同时，与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菲利浦·日果共同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创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宣传，把革命理论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相结合，清除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有农奴的儿子、与西里西亚工人保持密切联系的威廉·沃尔

弗，终生与马克思一家十分友好的前普鲁士军队退役中尉的瑟夫·沃尔弗，德国的天才新闻工作者和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沃尔夫，恩格斯的老朋友、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菲利浦·日果。德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威廉·魏德迈也曾一度加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后退出。

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负责同德国和其它国家的共产主义者联系，安排情报交流，并建议一切有社会主义者活动的地方都成立，由于各方面努力，仅1846年就成立了许多共产主义通讯委员，其中伦敦的委员会影响最大。布鲁塞尔委员会还同伦敦、巴黎、哥本哈根、哥德堡、柏林、科隆、莱比锡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恩格斯把这些规模不大的小组看成是将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工人运动中去的基地，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也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中心和政治中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刚一成立就遇到了魏特林的阻挠。

裁缝出身的魏特林是个很有才华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出色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主张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领取生活必需品，使整个社会达到“和谐与自由”。比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进步之处是，魏特林不是把希望

寄托在有产阶级身上，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工人，特别是手工业工人身上。他主张暴力革命，但又强调必须依靠少数人搞自发的暴动。

恩格斯在陪同马克思去英国旅行时在伦敦曾会晤过魏特林，1846年初又邀请他到布鲁塞尔参加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对他施加影响，希望他放弃空想社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但是，魏特林不仅未克服自己的落后观点，反而逐步趋向宗教——伦理的观点，他不把共产主义看成科学，而看成是“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良方”。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越来越少，他还以先知自命，容不得半点对自己的批评。

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在德国组织共产主义书刊宣传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同魏特林发生了公开的冲突。会上提出用威斯特伐利亚两位同情共产主义的书商提供的资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魏特林则要求首先安排他的著作出版，他的新著中充满了荒诞不经的观点。这场冲突的实质是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宣传的基础。

当时会议的参加者，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安年科夫在描述这次会议时写道：“我们坐在一张绿色小桌旁边，马克思在桌子的一端，手里拿着铅笔，低着他

那狮子一样的脑袋在看一张纸。一个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具有英国人那种傲慢而严肃的人，他的不可分离的伙伴，宣传工作的助手恩格斯宣布开会。在讲话中他谈到，献身于改造劳动的事业的人必须相互了解彼此的观点，并制定一种共同的理论，作为所有那些……后继人的旗帜。”

魏特林首先发言，他宣称，共产主义革命在德国马上就要到来，大家不应从事理论上的讨论，而应要求工人们立即采取行动；他还攻击马克思是“书房里的理论家”，“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学者”。这种无理取闹的做法，引起与会大部分成员的反感，马克思站起来反驳说：如果人们不以建立于科学基础之上的思想向工人们指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道路和目的，那一切都不过是不负责任的儿戏罢了。

这次会议表明，布鲁塞尔委员会已与魏特林公开决裂，虽然魏特林表面上还参加通讯委员会的活动。会后，布鲁塞尔委员会把会议的情况通知了所有有联系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团体。许多德国社会主义团体来信表示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沙佩尔在来信中谈到魏特林时说：“他确信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着真理并且能够拯救世界……因此，他自己不学习，也不愿他的追随者学习，认为他们应该满足于他的福音。我们……不想再跟他打任何交道。”

1846年5月底，魏特林被克利盖邀请到美国帮助他编辑《人民论坛报》，从此，魏特林在欧洲消失了。同魏特林辩论不久，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在1846年5月又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克利盖进行了思想斗争。

海尔曼·克利盖是正义者同盟的盟员，于1845年9月到达纽约，并在那里创立了同盟的支部。他创办了一个机关报刊《人民论坛报》，这个报纸经常刊载呼吁纽约富有阶级大发慈悲地给贫苦工人和一般穷人捐款的启事，这些呼吁书有时是用哭哭啼啼，苦苦哀求的语调写的。克利盖将这些呼吁书称为共产主义的活动。因此，克利盖的这些活动只能使共产主义在美国及美国以外的地区声誉扫地。1846年5月11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谴责克利盖的决议《反克利盖通告》。

通告指出，克利盖所进行的宣传“大大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他在《人民论坛报》上宣扬的观点不是共产主义的。“克利盖在纽约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那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克利盖思想的实质：“克利盖是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

教哲学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和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

这个通告以决议的方式发给各地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员，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很多共产主义者和正义者同盟的盟员表示赞许，而巴黎和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包括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都不同意对克利盖进行这样尖锐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巴黎和伦敦的来信认识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正义者同盟中还很有市场，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也远没有结束。

为彻底消除“真正的”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决定派遣恩格斯到巴黎去。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巴黎分会。

在巴黎，恩格斯要面对的对手有卡尔·格律恩，蒲鲁东和艾泽曼。格律恩是巴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又是蒲鲁东主义的信徒。

恩格斯于1846年8月15日到达巴黎，下榻在枯树街11号，后搬到百合花路23号。到巴黎后，他首先拜见了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领导人艾韦贝克，恩格斯向艾韦贝克耐心地陈述了卡尔·格律恩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危害性。显然，艾韦贝克被说服了。在8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艾韦贝克说：“我很高兴在

这里看到了弗里茨·恩格斯。他……很快就使我弄清了情况……其次，关于格律恩，我现在也了解了很多东西……我现在同意你们关于此人的评价。”

巴黎的正义者同盟按行业（裁缝、制革、木工和铁工）分为四个支部。40年代，魏特林在裁缝中起主导作用。恩格斯参加了一次他们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些裁缝真是些可笑的家伙。不久以前，他们一本正经地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用链子把刀子和叉子系在一起是否要好一些’。”⁴⁰年代中后期，木工和制革工已开始崭露头角，他们虽摆脱了魏特林的影响，但仍然受格律恩观点的影响。

恩格斯发现，侨居巴黎的德国工人的实际领袖是工人云格。云格曾到过布鲁塞尔，与马克思有过接触，并且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应该加以改变的。在云格的帮助下，恩格斯把一批先进的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时，他要向格律恩提出挑战了。

这时，格律恩和艾泽曼正起劲地向工人们宣传蒲鲁东刚出版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极为荒诞的设想：要工人积储小额的股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行业里设立几个作坊，用生产利润和利息扩大再生产，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所有无产者都有工作做，国内所有的生产力都

被收买过来，从而资产者手中的资本就丧失了支配劳动和获取利润的权力！这样一来，资本就被废除了。这样，可以暂时购买整个法国，也还可以购买其余的世界。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嘲笑说：“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真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而且，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那么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出五法郎硬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而这里的工人中的一些愚蠢的青年（我指的是德国人）却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他们口袋里连晚上在酒铺聚会时喝酒用的六个苏都没有，却想用他们的储金来购买整整一个美丽的法国！”

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一开始差不多所有人都反对恩格斯，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三个格律恩分子。在争论过程中，恩格斯直接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来集会的？”在正义者同盟盟员中，很多人自命为共产主义者，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要恩格斯给共产主义下一个尽量简单的定义，恩格斯回答如下：

（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利益。

（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

（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之外，不承认

有实现这些目的其它手段。

恩格斯的这个定义使得真共产主义者与假共产主义者分得一清二楚，一名格律恩分子转到恩格斯方面来，其余两个总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却毫无察觉。在表决时，以十三票对两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投反对票的两个人中有一个后来也宣称有改邪归正的最大愿望。于是，恩格斯满意地告诉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已经战胜了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完成了委员会交给他的任务。

恩格斯在巴黎工人中的活动引起了法国警察的注意，1846年底和1847年初，巴黎的警察加强了对恩格斯的监视，甚至派便衣盯恩格斯的梢，这样恩格斯在一段一时间内暂停参加工人集会，去充分享受一下巴黎生活的某些愉快方面。恩格斯说，他得感谢警察局长德累塞尔先生，“他使我愉快地见识了一些浪漫女郎和许多乐事，因为我想把我呆在巴黎的最后几个白天和夜晚充分加以利用。”

然而，这只是戏言。恩格斯并未把时间白白浪费掉，他利用这段时间研究了丹麦、瑞典和冰岛的历史和文化，阅读了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准备对蒲鲁东的理论进行系统的批判。

第九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和 《共产党宣言》

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团结了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为建立共产主义国际政党打下了基础。

通讯委员会对流亡在国外的德国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影响最大。1846年6月22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召开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问题，得到了正义者同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7月17日，莫尔等人回信说：“你们通讯委员会的建立和全部计划的内

容都是我们极为赞成的，但是最使我们高兴的是你们提出的召开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想法。我们认为这是使我们的宣传取得力量和一致的唯一途径。”

恩格斯在巴黎领导的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对正义者同盟其它支部和同盟的领导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从1846年11月起，同盟的领导人沙佩尔，鲍威尔，莫尔都同魏特林及其拥护者公开决裂了。1846年11月，伦敦正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发出了第一个告全体盟员书（即1846年的“十一月文告”），谴责了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体系和密谋式宗派主义组织方式，号召盟员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尽管同盟领导人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还很不彻底，但毕竟已经认识到其危害性并逐步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靠拢。恩格斯后来写道：“过去的理论观念的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愈来愈使伦敦的盟员相信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

1847年初，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认识到，必须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对同盟进行彻底的改组，才能使这个组织成为无产阶级的富于战斗性的组织。他们决定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帮助。1847年1月底，同盟中央派遣具有外交才能的莫尔为特使，先后到布鲁塞尔和巴黎拜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莫尔诚

恳地邀请他们参加同盟并参加同盟改组工作和制订新纲领工作。

莫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正义者同盟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一般是正确的，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式的传统和方式。他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以便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的形式阐述他们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然后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可以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当时条件的适合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

在此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谢绝要他们入盟的邀请，因为他们不赞成在同盟中流行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和密谋活动的组织形式。但是，这一次他们没有再拒绝，恩格斯后来回忆说：“我们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现在同盟代表们自己承认，并且已经清除；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改组工作。我们能拒绝吗？当然不能。”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向莫尔声明，如果他们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被同盟所接受的话，那么他们并不希望有什么特别的名望和地位，并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后来马克思披露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抛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

1847年2月莫尔回到伦敦后，向同盟中央汇报了大陆之行的成果。在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后，同盟中央委员会又发布了第二个文告（即1847年的“二月文告”）。文告声明坚决同魏特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决裂，并宣布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将于1847年6月举行，代表大会将讨论下列问题：

1、人民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并选举同盟新的领导机构，决定未来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

2、彻底改组同盟，修改盟章。

3、通过同盟的纲领——《简明共产主义信条》

4、创办同盟的机关报。

5、组织问题和宣传问题。

文告特别强调了制订简明的共产主义信条的重要性。文告指出：“我们要站在运动的前列，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旗帜，而且一定要团结在这旗帜的周围。”为了统一思想，同盟中央要求同盟各支部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1、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追求的是什么？

2、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追求的是什么？

3、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最快地，最正确地实行生活集体化形式？

这样，正义者同盟的改造，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的筹备工作已就绪了。

1847年6月2日，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在恩格斯当选的过程中，经历了同魏特林分子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激烈斗争。当时，正义者同盟在巴黎有五个支部；魏特林分子在其中两个支部中占居上风。进步分子占优势的三个支部决定同魏特林派分道扬镳，自行选出了包括恩格斯在内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实际上是将魏特林派开除出巴黎的正义者同盟组织。代表大会在研究了双方的文件后对多数派的做法表示赞同，并通过决议把巴黎的魏特林分子开除出同盟。

代表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者出席伦敦代表大会的是威廉·沃尔弗。马克思则由于经济困难未能前往。他在大会开幕前不久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不能去伦敦了，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去。但我想我们会派沃尔弗去。这样，有你们两个人在那里，也就够了。”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恩格斯阐述了他和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恩格斯以其饱满的精力，果断的性格，渊博的知识和明确的思想博得了代表们的尊敬，并确立了他的实际领导地位。威廉·沃尔弗是恩格斯的得力助手和坚定的支持者。

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大会在说明改变同盟名称原

因时指出，改名之所以势在必行，不仅由于柏林的正义者同盟盟员门特尔把同盟的存在告密给普鲁士政府，更主要的是，符合于同盟成立时特殊条件的旧名称，现在已经无法表达同盟的根本目的了。“许多人要正义，即要他们称为正义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们一般地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我们同盟来说，要有一个合适的名称”。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名称，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它能“表明我们实际是什么人”。

大会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根据恩格斯的提议，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取代了反映正义者同盟空想社会主义观点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恩格斯提出的这一革命口号，体现了无产阶级共同的阶级利益和共同的奋斗目标，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反对一切政治压迫和社会压迫，争取建立新社会的战斗口号。

大会通过了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章程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这个章程后来印发给各支部讨论，由共产主义

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新章程以民主制和集中制为基本原则对同盟的组织形式进行了改造。章程规定，同盟分为支部，区部，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是同盟的最高立法机关，负责解决有关全盟的各种问题。中央委员会是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全盟的最高权力执行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委员会亦由选举产生。选举者如果认为担任公职人员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可随时撤换。

这些规定使得同盟由过去的半宣传半密谋的工人团体演变为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了。

代表大会对主要由恩格斯起草的纲领草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个纲领草案就是形式上为二十二条问答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在这份文件中，恩格斯指出了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指出了由于产业革命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阐明了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把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的条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采取的措施，等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许多答案中对共产主义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可以说这个文件是《共产党宣言》诞生的第一个阶段。当然，恩格斯并不是《共产主义信条

草案》的唯一作者，纲领草案中还包含一些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不相适应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痕迹。

总的来说，《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得到大多数代表们的赞同。鉴于确立同盟的原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必须十分慎重。因此，大会决定把《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提交给各支部进行充分讨论、修改和补充，使之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大会还建议在讨论纲领草案时，“一方面要置身于那些乌七八糟的体系以及形形色色的庸俗主义之外；另一方面，又要和那些百无聊赖、无病呻吟、整日沉溺于爱的幻想之中的伤感共产主义者迥然不同……要时刻着眼赖以产生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之上”。

代表大会的结果，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第一个阶段。但是，同盟的改组工作刚刚开始，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依然存在。为了巩固大会的成果，恩格斯在代表大会结束后，一直致力于使同盟沿着无产阶级的轨道前进。

伦敦代表大会闭幕后，恩格斯回到巴黎，向盟员们汇报了代表大会的情况。7月底，他又去了布鲁塞尔，一方面与马克思研究同盟的改造问题，另一方面协助马克思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布

鲁塞尔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区部和支部。8月初，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同盟支部和区部都建立起来，马克思是区部委员之一。

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还不是公开的政治组织，其活动还受到很多限制。为便于公开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区部为依托，仿照伦敦教育协会的形式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到1847年10月底已经有会员100名左右。协会每周有两个晚上在“天鹅饭店”聚会，星期三晚上举行有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报告会，一般是由马克思或恩格斯作报告。星期日的晚上首先由威廉·沃尔弗对一周来的政治事件作概括性评论，然后举行唱歌、跳舞和演戏等娱乐活动。德意志工人协会还同比利时工人协会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此外，流亡比利时的其它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如波兰的列列韦尔和法国的思贝乐，也经常参加协会的活动。

1847年9月下旬，马克思到荷兰去探亲，恩格斯独自担负起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组织和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工作。

9月27日，恩格斯在法院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民主派宴会，出席宴会的有来自比利时、德国、法国、波兰、俄国等国的120

位民主主义者。在宴会上决定仿照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形式成立“民主协会”。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弗朗斯瓦·梅奈利将军当为名誉主席，比利时的政论家吕西安·列奥波德·若特兰当选为执行主席，恩格斯和法国社会主义者雅克·恩贝尔当选为副主席。起初恩格斯并不想担任这一职务，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领导人还显得太年轻。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当时不在场的马克思的代表，担任这一职务可以使之“不致采取任何没有我们参加的民主主义的举动”。在宴会上，恩格斯用法语提议，为纪念1792年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干杯。

恩格斯在民主派宴会上的卓越表现大大提高了德国工人协会在比利时民主主义者中的威信，“使得协会在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那里到处被谈论着”，被认为是布鲁塞尔“一支巨大的力量”。恩格斯十分满意地告诉马克思说：“我们已经使你，和继你之后的我，被公认为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

在布鲁塞尔活动期间，恩格斯还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争取到共产主义者一边。这家报纸是由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出资经营的，每周出版两期，主要面向德国流亡者发行。由于经费困难，伯恩施太德想物色一些在德国进步知识界有

声望的作家撰稿，以扩大报纸的发行量。从1847年1月起，这家报纸开始刊登维尔特的诗，从3月份起，又陆续刊登了威廉·沃尔弗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者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春天开始为这家报纸撰稿。大约在1847年8—9月间，伯恩施太德又与马克思、恩格斯达成协议，把这家报纸交给他们两人主持。这样，《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就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控制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同盟非正式的机关报，成为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喉舌。

恩格斯在该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重要的有《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尔岑》、《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1847年的运动》、《奥地利末日的开端》、《三个新宪法》等。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恩格斯批判海尔岑的文章。

卡尔·海尔岑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844年因出版了一本抨击普鲁士官僚制度的著作而受到当局的迫害。被迫从德国出走，1845年流亡布鲁塞尔，后又迁居瑞士。受到卢格的影响，海尔岑到瑞士后成为“疯狂的”激进派，他号召立即发动农民举行起义，并印刷了大量传单秘密运往德国散发。海尔岑的理论充满了冒险和空想，如果按照海尔岑的主张行事，只能给革命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甚至是彻底

的失败。海尔岑还攻击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并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混为一谈，指责他们给民主阵营带来了分裂。

反对海尔岑斗争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这是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独立发展和使其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影响的斗争，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民主革命的策略，并第一次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

恩格斯于1847年10月3日和7日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了《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尔岑》一文，回击了海尔岑关于共产主义者给民主阵营带来分裂的指责。恩格斯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不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论，而且他们本身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共同的任务没有完成和共同的敌人没有打倒之前，共产主义者同民主主义者的意见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共同对敌。

对于海尔岑一味号召立即起义，恩格斯指出，这种不考虑客观条件的蹩脚的策略是非常有害的，它只能使革命民主派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使民主主义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针对海尔岑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的观点，恩格斯强调指出，“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小

资产者，尤其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

在批判海尔岑时，恩格斯第一次表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他指出，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人民将利用这个政权来推行一些本来是准备性质的社会措施，以便最终过渡到废除私有制。这些措施主要包括限制自由竞争和大资本的积聚，由国家组织劳动等等。但是，革命不能停留在上述措施上面，如果无产阶级保存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竞争的自发势力，早晚会导致过去状态的恢复。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表述的一些思想，后来都包括到《共产党宣言》中去了。

主持《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是恩格斯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1847年10月，恩格斯回到巴黎，在法国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恩格斯特别重视同法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领导人的密切联系。他一到巴黎就会晤了路易·勃朗，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长谈。恩格斯告诉勃朗，他是正式受伦敦、布鲁塞尔和莱茵地区民主派的全权委托，同时也是以宪章派代表的身份拜访他的。恩格斯告诉勃朗，“您可以把马克思先生看作我们党的领袖，并且把最近出版的反对蒲鲁东先生的著作看作我们的纲领。”

恩格斯还同《改革报》的编辑“弗洛孔老爹”建

立了良好的关系。恩格斯写了一篇关于英国宪章派的文章，弗洛孔一字未改刊登在《改革报》上。从此，恩格斯成为《改革报》的特约撰稿人。后来，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撰文，以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名义向《改革报》致谢，感谢它随时都在维护德国共产主义者，使之不受法国反动政府的迫害。

但是，恩格斯同法国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合作并不是无原则的，正如他在《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一文中所指出的“各国民民主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除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就批评了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质，批评了勃朗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

在巴黎，恩格斯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问题。在恩格斯回巴黎前几天，同盟开除了一个因受格律恩影响而声称自己反对共产主义的支部，另外两个支部也置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于不顾，恢复了同魏特林派的联系。正如同盟中央在通告信中所指出的，蒲鲁东的空想和格律恩烦恼的胡说在许多盟员中还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再一次表现了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宣传才能。他一到巴黎就被选进区部委员会，负责通讯

和宣传工作，实际上担任了区部委员会的秘书长。他“整天奔跑，指点这指点那”，使涣散的组织又凝聚在一起。

1847 年春天，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将主要由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印发给各区部讨论。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期间，巴黎的各支部也热烈地讨论了这个文件。当时仍是盟员的莫泽斯·赫斯利用这一机会，写了“一篇绝妙的教义问答修正稿”，把恩格斯的一些思想同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混杂在一起，他把自己的修正草案提交给巴黎区部。在 1847 年 10 月 22 日的区部会议上，恩格斯阐述了他的反对意见。他逐条对赫斯的修正意见进行分析，还没有来得及谈到一半，大家就表示完全赞同恩格斯的意见。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会议委托恩格斯草拟一篇新的教义问答。恩格斯仅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新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其中包含 25 个问答题目，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告诉了他《共产主义原理》的基本内容：“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

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说明的那些内容。”

尽管《共产主义原理》在外表上仍然保留着《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式样，另外有一部分答案也利用了《信条》的答案。但是《共产主义原理》对很多重要的思想作了全新的表述，内容更加丰富，表达更加准确，这个文件实际上是《共产党宣言》的初稿。

关于共产主义的定义，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共产者的任务是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

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论述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就是：“第一，有了资本和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第二，财富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多地变成了无产者，并且资产者的财富愈是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范围，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动。因此，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关于废除私有制的方式，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

者是最不反对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社会革命任务的，“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是，恩格斯又强调指出：“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所有这些最终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

恩格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了科学的概括和描述：在新的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将被废除，取而代之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使用全部工具”。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在新社会里，阶级不复存在，城市与乡村间的对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将消失。

恩格斯还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单独在某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必须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同时发生的理论。恩格斯论证说：“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

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恩格斯的这一理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还不太尖锐的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任何单独一个国家的无阶级革命，它所面对的必然是国际上所有资产阶级的联合镇压。

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是第一部完全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理论文献，它在巴黎区部委员会上得到通过，并以区部的名义提交给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然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原理》也不是非常满意。1847年11月23—24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

1847年11月14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选举恩格斯为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几乎同时，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选举马克思为代表。为了商讨在代表大会上的共同行动计划，恩格斯和马

克思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见面，他们对党纲和其它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11月28日恩格斯与马克思横渡海峡，来到伦敦。29日，他们参加了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而举行的大会，恩格斯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论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任何民族当他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正是德国士兵直到现在还在蹂躏加里西亚和波兹南。我们德国人，我们德国共产主义者，应当首先洗刷我们民族的这个污点。”表明了无产阶级对待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恩格斯还从理论上论证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指出：“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应该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的联盟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的联盟。”

1847年11月29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如期在伦敦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等国的代表。沙佩尔当选为大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秘书，会议的所有文件均由他两人签发。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议，大会通过的章程决定把同盟的目的明确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

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章程还明确确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原则。党的中央委员会必须自下而上经过选举产生，可随时撤换；从支部，区部，总区部直到中央委员会，一切行动都要对同盟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负责。

代表大会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同盟的纲领，经过激烈的争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纲领性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命名为《共产党宣言》。

经过两次伦敦代表大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终于建立和巩固起来了，它是第一个按照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创立揭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一页。

1847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回到布鲁布尔，在那里共同起草《共产党宣言》。他们一起研究了宣言的内容、结构和表达方式，拟定了一个提纲。然后由马克思根据这个提纲并参考《共产主义原理》写出了这份文件，因为恩格斯在12月底必须回巴黎，所以并未参加《共产党宣言》的实际写作，但是，宣言体现了他们两个人的思想，是他们两个人所创

立的科学理论的总结，因此“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正当的”。

《共产党宣言》“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

《共产党宣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同以前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一样，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再能支配自己所创造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而“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共产党宣言》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特性，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大工业把无产者聚集在工厂里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这不但培养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促使他

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由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受苦最深的阶级，因而也是最富于战斗性的阶级。“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对于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途径，《共产党宣言》指出：“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而且，为达到这一目的，无产阶级还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党——共产党来领导。无产阶级只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但却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并“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以迅速发展生产力”。

《共产党宣言》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特点，基本任务和最终目标。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与无产阶级基本群众不同的是，共产党人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最坚决的，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宣言》扼

要规定了共产党的近期目标；“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差别，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建立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生产力高度发展，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宣言》最后宣告：“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宣言》再次呼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很快便被译成多种文字，传遍世界各地。正如恩格斯所说：“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战斗纲领。”

第十章 革命风暴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 1842—1849 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

——弗·伊·列宁

恩格斯于 1847 年 12 月返回巴黎。此时，法国正处于 1848 年 2 月革命的前夜，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金融贵族的“七月王朝”的矛盾日趋激化，大资产阶级的“王朝反动派”，中小资产阶级的“国民报派”和“改革报派”通过举行“宴会”活动，抨击君主专制政体，要求取消对人民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的限制，给予人民选举权。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政治运动。法国的工人阶级也在“非常沉着地等待时机”，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感到必须进行革命，而且是比 1830 年革命“更为彻底，更为激烈的革命”。

在这种形势下，“七月王朝”加强了对革命运动的镇压，警察局不分昼夜地注视着工人阶级的动向，工人领袖受到跟踪，外国流亡到法国的民主主义者受到监视。恩格斯也不例外，他一踏上法兰西的国土，便被密探盯上了。但恩格斯没理会这些，他一方面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宣传，一方面抓紧时间写了一系列政治性文章，分析了即将爆发的革命运动的性质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应采取的策略。

1848年1月23日，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了《1848年的运动》一文，详细分析了1847年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指出这些运动“首先主要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运动的结果就是要“取得资产阶级的胜利”。因而，恩格斯向各国资产阶级发出呼吁说：

“资产者大人先生们，勇敢地继续你们的战斗吧！现在我们需要你们，我们在某些地方甚至需要你们的统治。你们应该消灭宗法制，实行中央集权，把比较贫穷的阶级变成真正的无产者——我们的新战士。你们应该通过你们的工厂和商业联系为我们建立解放无产阶级需要的物质基础。为了奖励这一点，你们可以获得短期政权。”

恩格斯又指出，资产阶级充其量也只能提心吊胆地享几年福，因为资产阶级背后到处都有无产阶

级。无产阶级尽管“有时同意资产者的愿望及资产者的部分幻想……有时保持沉默，行动谨慎，“但他们却在逐步地准备推翻资产者，甚至可能公开起义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所以恩格斯又向资产阶级公开提出挑战：“你们可以支配法律，作威作福。你们可以在王宫中欢宴，娶艳丽的公主为妻，可是别忘了

‘刽子手就站在门前’”

1847年12月31日，恩格斯参加了德国流亡者举行的欢度新年的庆祝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在演说的最后，恩格斯提议为法国大革命干杯，密探把演说的内容报告了警察局，警察机关便指责恩格斯的演说含有敌视政府性质的政治隐喻，并策划将恩格斯驱逐出境。

1848年1月29日，恩格斯接到了法国政府的书面通知，要求他24小时内离开巴黎，三天之内离开法国，否则将把他引渡给普鲁士政府。在恩格斯离开巴黎前几小时，警察还闯进了恩格斯住所，企图搜出一些控告他犯罪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被迫离开巴黎前往布鲁塞尔，与马克思一起领导那里的民主革命运动。

1848年1月25日，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巴勒莫首先爆发了人民起义，革命浪潮旋即以狂飙之势席

卷整个欧洲，发展成为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革命。

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盼来了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2月25日晚上，恩格斯与布鲁塞尔各阶层人民一起，在火车站焦急地等待着从巴黎传来的最新消息。夜里12点半，到站的列车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说2月24日那天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力浦逃往国外，他的宝座被焚毁。消息一传出，“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迅速响遍了全城。

恩格斯为巴黎无产阶级的辉煌成就感到十分高兴，他奋笔疾书，欢呼胜利，“我们的时代，民主派的时代来到了。在土伊勒里宫和皇家之宫燃起的火焰，是无产阶级的朝霞。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到处都要崩溃，被推翻”。“荣誉和光荣属于巴黎的工人们！他们推动了整个世界”。他还预言：“德国一定会步法国的后尘……要是德意志人还有毅力，尊言和勇气，那么过不了四个星期，我们也会高呼：

‘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实际上，恩格斯的话音落下还不到四个星期，柏林就爆发了三月革命。

在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鼓舞下，比利时也展开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斗争。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领导民主协会来促进比利时革命运动的发展。根据

恩格斯的提议，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于2月27日作出决议：

“1、民主协会将每晚举行会议，吸收公众参加。

2、以协会的名义向法国临时政府发表宣言，表示我们同情2月24日革命。

3、向布鲁塞尔的市政委员会提议建立市的武装力量，以避免任何流血事件并维持社会安宁。”

此外，民主协会还组织捐款为工人购买武器，马克思将刚刚获得的遗产的一部分交给了协会。

2月27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通知马克思和恩格斯，鉴于欧洲大陆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认为，在这一紧要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该领导同盟。接到通知后，马克思立即组织召开了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会议，成立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共产主义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恩格斯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日果都成为中央委员。但是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并未展开实际活动，便遭到比利时反动政府的迫害。

比利时王国统治者面对人民要求共和国的呼声，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竭力煽起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说在比利时鼓动建立共和国的都是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力图把比利时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外国的阴谋，比利时警察当局开始迫害德国民

主主义者。2月28日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威廉·沃尔弗在布鲁塞尔一家咖啡馆前面遭到警察的无理殴打，第二天便被驱逐出境。3月3日下午5时，比利时政府限令马克思在24小时内离开这个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在马克思的住宅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鉴于：

在目前形势下，要在布鲁塞尔将盟员尤其是德国盟员加以联合是不可能的；

布鲁塞尔的同盟领导人员不是已被逮捕或被驱逐，就是随时都有被驱逐出比利时的可能；

目前巴黎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

目前的形势要求对同盟进行非常有力的领导，为此无疑地必须使领导人员有权自行处理一切事务。

因此决定：

1、中央委员会迁到巴黎。

2、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授权卡尔·马克思在目前独自实现对同盟一切事务的领导，这项工作他对即将成立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和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负责。

3、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委托马克思：一俟情况

许可，就亲自选择人员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应是最适当的盟员，为此甚至可以把不在巴黎的盟员召去。……

与会者尚未离开，比利时警察就闯入马克思的住宅进行搜查，逮捕了马克思并将其监禁了 18 个小时直到把他送上离开比利时的列车。3 月 5 日马克思到达巴黎。此前，马克思曾收到法兰西共和国充满敬意的邀请信，信中称：反动政府把您驱逐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邀请您回到革命的巴黎。所以这次重返巴黎一切顺利，所有证件很快便办妥了。不久，他的全家都赶到巴黎与他汇合。

恩格斯料到对他的迫害也不会远了。他在给《北极星报》的信中说：“我时刻都在等着驱逐出境的命令，如果没有更坏的遭遇的话，因为谁也不能预料这个俄国式的比利时政府还会采取什么手段。我已作好准备，驱逐令什么时候下来都行。”

恩格斯并没有等待驱逐令，他继续在布鲁塞尔与德国的各种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并组织动员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掀起了抗议驱逐马克思的运动，迫使政府将违法搜查和逮捕马克思的警察官员免职。同时，他还密切地注视着祖国的革命动向。在 3 月 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兴奋地谈到了德国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拿骚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革命；慕尼

黑的大学生、工人、艺术家正在进行真正的起义；在加塞尔，革命一触即发；柏林则处于极度恐慌和动摇中……。“就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仍然顽固下去吧！那时一切都赢得了，过几个月就会发生德国革命。看他敢牢牢抓住自己的封建形式不放！不过鬼才知道这个可笑而疯狂的家伙会干出什么来”。

当恩格斯还在布鲁塞尔逗留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大多数领导人已经从伦敦和布鲁塞尔来到巴黎。根据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的决议，3月11日在巴黎成立了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沙佩尔当选为书记，恩格斯、莫尔、鲍威尔和威廉·沃尔弗等当选为中央委员。马克思立即写信给恩格斯，新的中央委员会已成立，他缺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建议他尽快到巴黎来。

3月20日，恩格斯离开布鲁塞尔，第二天到达巴黎时，传来了柏林人民3月18日起义的消息。恩格斯决定在巴黎作短暂的停留，尽快返回德国，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

恩格斯在巴黎的十天里，密切地注视着德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这不仅因为德国是他的祖国，更重要的是他把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与马克思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注意力集

中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 17 世纪的英国和 18 世纪的法国更发达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柏林三月起义把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在普鲁士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绝对权力，人民也获得了重大的民主权力，但革命成果落到资产阶级自由派手里。经过细致的分析，恩格斯对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作了科学的总结：

“革命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力，实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漫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

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

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

德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必须表明自己在这次革命中的态度，为此，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写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由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通过，作为同盟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中的行动纲领。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首先提出，德国革命的任务是把全德国宣布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为了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措施；消灭封建压迫，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实行政教分离，普及国民教育；实行普选制；建立人民武装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无产阶级决不能把革命停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要彻底改造经济，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规定：运输工具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无偿地由无产阶级支配；成立国家银行代替私人银行；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调节信贷业；各邦君主的领地及其他地产、矿山、矿井等全部归国家所有。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这个纲领的实质是要求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必要条件。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当时过高地估计了德国革命的程度。后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了这一错误，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

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 1848 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 1848 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恩格斯这种从实际出发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体现了一代伟人的高尚情操。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由同盟中央讨论通过后，印成了传单的形式，同《共产党宣言》一起分发给准备返回德国的盟员，由他们带回德国散发和宣传。

当时，在以什么样的方式返回德国参加革命这个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伯恩施太德提出了一个组织“革命义勇军”的方案，并得到了在德国流亡者中颇负盛名的诗人海尔维格的支持。海尔维格还发表了《告流亡者兄弟》，指出：法兰西雄鸡的歌声给德国的起义发出了信号，必须组织革命义勇军，开进德国，向专制君主和暴君挑战。海尔维格的方案博得了很多人的喝彩。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恩格斯指出：“正在德国发生骚动的时候侵入德国，以便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那就等于破坏德国革命。”因此，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说工人

不要参加义勇军团，动员工人个别地或组成人数很少的小组越过边境进入德国。他们用这种方法将300—400名德国革命工人（多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送回德国，有的回到自己的故乡，有的则去了“需要他们，同时又可以得心应手进行工作”的地方。这些革命的火种分散在德意志各地，促成了1848年德国革命的燎原之势。而海尔维格的义勇军团刚刚进入德国境内，便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政府军冲散，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4月5日或6日，恩格斯也离开巴黎回德国，与他同行的有最亲密的朋友马克思和政论家恩斯特·德朗克。他们于7日到达美因兹，在那里做了短暂的停留，协助那里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建立了工人教育协会。4月11日，他们来到科伦。

科伦是莱茵省的省会，是当时普鲁士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这里无产阶级力量集中，而且共产主义同盟盟员人数较多；由于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这里有比德国其它地方更多的出版自由。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决定把科伦作为活动的基地。4月15日前，大部分共产主义同盟的中央委员都来到这座城市，科伦成为革命的中心。

尽管当时德国革命已取得了初步胜利，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还不能打出自己的旗帜，

而只能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参加现有的民主运动。因为德国的无产阶级还没得到充分的发展，没有组织起来，甚至没有能力进行独立的组织，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只能充当资产阶级最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政党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身体力行，于 1848 年 5 月底参加了科伦民主协会，并建议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不仅要参加工人联合会，也要参加民主协会的活动。他们的建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例如威廉·沃尔弗，沙佩尔，维尔特等都参加了科伦的民主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盟员也在各地参加了当地的民主协会。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绝大部分盟员都卷入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洪流中，彼此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已无法担当起领导责任。针对这一情况，恩格斯和马克思决定创办一种日报，一方面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同时对于分散在各

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来说，又可以起到指导作用。因而这份报纸实际上要承担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的各种任务。他们把这份即将创刊的报纸命名为《新莱茵报》。计划确定后，恩格斯便动身回自己的家乡筹集资金。

4月中旬，恩格斯回到了乌培河谷，巴门的资产阶级惊恐不安地注视着恩格斯的活动。甚至有人散布谣言说，恩格斯打算马上宣告成立共和国。恩格斯在4月15日给布兰克的信中说：“整个巴门都在等待着，看我怎么干……人们以为我一到来，许多事情将迅速得到解决。”但是，恩格斯决不会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小小的乌培河谷，他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去做。

老弗里德希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把儿子接回了家。儿子离开革命的巴黎回到家中，全家终于团圆在一起，这无论如何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对于恩格斯的母亲来说尤其如此，一连几天，母亲亲自下厨，为恩格斯做他最喜欢吃的饭菜，还把老头子珍藏的波尔多酒拿了出来。一有闲暇，就拉着儿子唠叨，希望儿子能留下来。但老弗里德里希并没感到由衷的高兴，一方面，他不理解儿子的被他称为“华而不实的见解”的理论，在他看来“幸福有赖于一个立宪君主政体”。另一方面，他清楚地知道，儿子回家决不止是为了探望双亲，肯定另有更重要的目的，而且肯定会

掏他的腰包。

在革命期间，爱北斐特和巴门被认为是“虔诚的，黑白两色的城市”，反动保守势力在这里占据了上风。所以恩格斯为《新莱茵报》筹集资金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很遗憾，认股的事，在这里很少希望”。这里的资产阶级“像害怕鼠疫一样害怕讨论社会问题，他们把这叫煽动人心。我费了不少唇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仍然是不肯定的答复……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连最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未来的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它调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至于他父亲，恩格斯说：“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他宁愿叫我们吃一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千塔勒。”

经过艰苦的努力，恩格斯还是在5月9日前为《新莱茵报》筹集了14股，每股50塔勒，认股的人包括爱北斐特的律师伯恩施太德，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工厂主黑克尔以及巴门的裁缝许纳拜恩。与此同时，马克思在科伦也筹集到一部分股金，并从父亲的遗产中支出很大一笔钱投入这一事业。恩格斯也把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生活费用中拿出几百塔勒来创办报纸。

为了协助马克思出版《新莱茵报》，恩格斯于1848年5月20日返回科伦。《新莱茵报》原定7月1日出版，但由于整个革命形势的逆转，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快了办报的速度。《新莱茵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声明：“鉴于反动派实施新的无耻的反动，可以预料德国的九月法令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1848年6月1日出版第一期到1849年5月被查封，《新莱茵报》共出版了301期，另外还出版了一些号外。《新莱茵报》成为“革命时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马克思无疑是《新莱茵报》的灵魂，在马克思周围，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群体。马克思的主要助手是恩格斯，他的任务是撰写政治评论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在马克思外出时，代理总编辑的职务。编辑部里还有威廉·沃尔弗，担任编辑部秘书；格奥尔格·维尔特，负责编辑小品。10月份，著名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也加入到编辑部中，并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他的革命诗篇。

恩格斯是一位出色的政论家和编辑。由于马克思除了对报纸的政治领导外，还忙于组织工作，所以写作较少，大部分社论，政治评论都是由恩格斯执笔写成的，他把写作和办报纸当成了一种乐趣，因为

“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手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马克思也非常赞赏恩格斯的智慧和才能，他曾充满自豪和很有风趣地对别人说：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楚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

恩格斯拥有广博的语言知识，能熟练地阅读编辑部收到的来自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报刊，吸取其中对自己有用的资料，并迅速地整理，然后写出一篇篇政论性文章。

在《新莱茵报》存在的短短一年中，恩格斯就写了100多篇社论和通讯。《新莱茵报》关于法兰克福议会，关于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关于波兰民族运动，关于德国对外政策及南德意志的起义等重大问题的文章，均出自恩格斯的手笔。

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为德国革命制定了行动纲领：一是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二是对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沙皇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这两点是相互关连的，即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如果不彻底击败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沙皇俄国是不能实现的。

围绕着这个纲领，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

了一系列文章，鞭笞了德国反动的封建势力，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贩卖革命的丑恶行为，也批评了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动摇和犹豫。他警告德国人民提防资产阶级把革命引向失败的危险，并敦促各地国民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果断行动。

恩格斯非常关心其他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他写了许多文章支持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等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恩格斯在为民主主义的德国制定的外交政策中坚持了这样一个原则：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它本身是不能获得自由的。他指出，必须彻底改变德国的对外政策，“现在，当德国人在抛弃自己身上的羁绊的时候，也应当改变一下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话我们年青的、几乎是刚刚预感到的自由就会束缚在我们用来束缚别国民族的锁链上。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

值得一提的是，《新莱茵报》是德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巴黎工人六月起义过程中始终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唯一报纸。在六月起义期间，《新莱茵报》发表了大量关于巴黎工人阶级英勇战斗的文章，除其中一篇是马克思写的外，其余全部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恩格斯在文章中歌颂了巴黎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巴黎的工人作战多么英勇，多

么齐心，多么有纪律，多么有军事素养……如果说 4 万巴黎工人同 4 倍于自己的敌人斗争中能够取得这样大的结果，那么全巴黎的工人群众齐心协力地一致行动起来，将会有多大的成就啊”！

六月起义——现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决斗，尽管巴黎的无产阶级被敌人优势的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历史将给他们以特殊的地位”。

随着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失败，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都发生了逆转。在 1848 年 3 月 18 日革命中被迫让步的德国封建势力，也看透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实质，重新恢复了自己的信心，集结力量，向革命阵营展开了反攻。德国革命处于危机中。

在这样的形势下，恩格斯表现出革命领袖应有的非凡毅力和组织才能。在他的领导下，《新莱茵报》编辑部加强了在科伦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活动。9 月 13 日，恩格斯召集和主持了在弗兰肯广场举行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出席大会的有 6000 多人。大会主席台用象征共和的黑红黄兰色旗装饰起来。恩格斯在演说中热烈支持威廉·沃尔弗成立安全委员会的提议，这项提议在与会者的掌声中获得通过。大会选举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沙佩尔莫尔等在内的 30 人的安全委员会，“作为在目前的合法政权机关中没有代表的那一部分居民的组织”。选

出安全委员会后，大会又一致通过了致柏林议会的呼吁书：“人民选出来协商君民之间的宪法事宜的议会，不能因单方面的行动而解散，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王权不是和议会平行，而凌驾于议会之上；

因此，解散议会就是政变；——我们要求：

在有人企图解散议会的时候，议员们能够执行自己的职务，即使在刺刀下也不要擅离职守。”

在随后的几天里，恩格斯和他的战友们又加倍努力进一步扩展革命运动，他们决定9月17日在科伦北郊的沃林根举行民众大会，以同科伦日益得到加强的反动派相抗衡。

这一天，大约有1万民众突破了警察设置的种种障碍，或步行，或坐车，或乘平底船从水旱两路来到会场。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大会通过了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决心书：“如果普鲁士和德国由于普鲁士政府反对国民议会和中央政权的决议而发生冲突，我们准备为德国而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正在这个时候，法兰克福议会批准了遭到人民强烈反对的与丹麦休战的决议。为回答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法兰克福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但遭到了普鲁士军队的血腥镇压。恩格斯在9月20号的《新莱茵报》上撰文说：“我们没有弄错；德国的荣誉操在坏人的手中’。”

法兰克福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科伦的反动势力也开始了反攻，9月25日，检查机关对《新莱茵报》编辑恩格斯，沙佩尔，沃尔弗等提出起诉，指控他们“阴谋进行颠覆活动”。同一天，沙佩尔被警察逮捕，恩格斯和沃尔弗等人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逃出了科伦。9月26日，政府在科伦宣布戒严，解除市民武装并禁止《新莱茵报》发行。《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诗人维尔特对9月26日的情况作了逼真的描述：

“全市刺刀如鬃
活像一头豪猪，
普鲁士警察到处寻衅
一切集市和广场顿时……
巡逻队头子朝门里向我们瞥了一眼厉声宣布
鼓声之下判处死刑：
查封《新莱茵报》……”

科伦戒严后，恩格斯先在巴门已故外祖父的住宅隐藏了几天，随后就踏上了去比利时的路途。10月3日，国家检查官黑克尔发布了通缉恩格斯的命令。并通过外交渠道，把通缉令发往恩格斯可能要去的几个欧洲国家。

第十一章 浴血沙场

所有在战火中见过他的人，
很久以后都还在谈论他那种非凡
的镇静和漠视一切危险的气魄。

——爱琳娜·马克思

10月初，恩格斯在逃亡途中遇到了恩斯特·德朗克，10月4日，两人一同来到布鲁塞尔，并正式办理了登记手续。他们刚在旅馆住下，一队比利时警察闯了进来，逮捕了他们并把他们关入普其·卡尔姆监狱。显然，比利时警察不仅清楚地了解恩格斯过去在比利时的活动，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事先得到普鲁士警察机关的通知。

根据比利时宪法的规定，像恩格斯这样的政治犯可以申请在比利时避难。但比利时当局以他们提出的证据不足为由，拒绝提供政治避难权，反而把他们作为“流浪汉”驱逐出境。10月4日当天，他们被运送囚犯的马车押送到车站，又用火车运往比利时

与法国的边境，一直到法国边境才将他们释放。恩格斯和德朗克只得前往巴黎。

比利时当局的行径，激起了比利时民主派的忿怒。10月8日的《民族报》撰文指出：“比利时已成为邻国的警察，“如果各国爱好自由的朋友们有意在全世界自由旅行，就不该通过我们的国家”。

10月5日，恩格斯和德朗克来到巴黎。现在的巴黎与半年前他们离开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地重游，恩格斯百感交集。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抱着极大的希望欢呼革命的到来，那时的巴黎人民还陶醉于共和国的蜜月中，他们白天吃干面包和马铃薯，晚上，在大街上种植自由树（白杨树）、放焰火、兴高彩烈地唱“马赛曲”。经过六月大起义，巴黎已景物全非。卡芬雅克的榴弹把巴黎人民不可遏止的欢乐轰得烟消云散，“马赛曲”和“进军曲”的歌声沉寂了；工人们没有面包，没有武器，他们咬紧牙关，把仇恨埋藏在心里；大街上没有了热闹的场面，只有资产阶级和警察在游荡，舞场和戏院里空无一人；街头的流浪儿穿上别动队的制服，每天为了30个苏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卖命。总之，巴黎已经没有灵魂，没有生命，没有火焰。恩格斯感慨道：“巴黎已经死了，而这个美丽的死人愈是美丽，就愈显得可怕。”恩格斯感到不能在这个已死的巴黎久留，必须尽快走开，

不管到哪里都行。

恩格斯决定先去瑞士，因为他身边的钱不多，所以只好步行。而且恩格斯也不愿意轻易离开法国，所以“一直信步往南走去”。这次，恩格斯有充足的时间仔细体会法国的风土人情，因为他必须等到科伦当局撤销对他的通缉后才能重返德国。这次政治流亡为恩格斯提供了难得的游山玩水的机会。

从1848年10月10日左右到10月24日，恩格斯共步行了1000余里。一路上，恩格斯饱览了法兰西美丽的自然景色。他不久碰见了“非常甜的葡萄和非常美丽的姑娘”，而且品尝了各式各样的法国葡萄酒，从勃艮第酒到波尔多酒，圣若尔日烈酒和南方的弗朗亭南酒，再到起泡沫的香槟酒，沙布利酒和卢西利昂酒。有多少种红的和白的葡萄酒啊！而最令恩格斯感到妙可不言的是：“喝了其中的每一种酒都会产生一种别致的醉意，喝了几瓶酒以后就能使一个人的情绪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从跳轻佻的四人舞到唱‘马赛曲’，从跳康康舞的狂热到革命热情的激发，最后，喝了一瓶香槟酒，又能鼓起人间最愉快的狂欢节的情绪！”。

经过了在科伦暴风雨般紧张的革命斗争之后，变换一下生活环境对恩格斯是很必要的，他可以放松一下过度紧张的神经，而且他也不必担心普鲁士

警察的追捕。但是即便在这种以游览为主的旅行中，恩格斯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政治意识。他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六月起义后的法兰西的社会政治情况，一方面准备总结这次波澜壮阔的革命的教训，一方面探索未来欧洲革命的前景。

在达姆比埃尔，恩格斯遇到了三、四百名曾在国家工厂里工作过的巴黎工人，他们在罗亚尔河修筑防洪堤坝，每天可赚 30—100 个苏。这些在半年前曾参加过大革命巴黎工人，由于在小村子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意志是十分消沉的。他们对本阶级的利益，对与工人息息相关的日常政治问题却漠不关心”。他们每天在玩乐中消磨休息时间，晚上则把“发展”乡下姑娘作为消遣。他们对政治的全部兴趣仅仅限于互相起各种各样的绰号。恩格斯感叹，这些工人的眼界已经“大大地缩小了，他们几乎已经农民化了”。

恩格斯十分注意农民问题，这次旅行给他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农民的机会。恩格斯发现，农民有着善良，好客的美德，但是他们被束缚在一块世代相传的土地上，劳动简单而单调，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尽管伟大的历史运动在他们身边掠过，有时甚至把他们卷进去，但他们对于运动前进的力量，运动的性质和目的则一无所知。法国的资产阶级正是利用一

点，造谣说巴黎的工人想瓜分全部财产和土地，从而引起了法国农民对巴黎和巴黎工人的切齿痛恨。但愿这个万恶的巴黎明天就全部毁灭！”竟成了法国农民最温和的愿望。恩格斯还发现，所有同他谈过话的农民，“对路易·拿破仑的热情，竟和他们对巴黎的仇恨一样强烈”。正是由于 1848 年恩格斯对法国农民的深刻认识，才使他感到“法国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要求以前，首先必须平息普遍的农民战争”。可以说，这是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提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

经过两周的漫游之后，恩格斯于 10 月 24 日到达日内瓦，并立即给马克思和自己家中写信，他已身无分文，而且在瑞士也借不到钱。马克思尽管自己手头也不宽裕，但还是尽他手头所有给处于困境中的朋友寄去，并告诉恩格斯《新莱茵报》已经复刊。马克思寄的钱不知什么原因未送到恩格斯手中。恩格斯的父母反对儿子的观点和行动，但看到儿子穷困潦倒又心生怜悯，老弗里德里希从马克思那里得到儿子的地址后也给恩格斯寄去了生活费用。他们还利用这一机会劝说儿子不要与马克思来往。

科伦当局发出对恩格斯等人的通缉令后，《新莱茵报》的股东要求马克思把包括恩格斯在内的被通缉的编辑开除，遭到马克思的拒绝。当时有谣言说恩

格斯等人已被开除出编辑部，恩格斯的母亲马上给恩格斯写信，试图借机把儿子从马克思身边拉过来。她说：她从可靠的方面获悉，“《新莱茵报》编辑部已经宣布说，即使你回去他们也不再接受你参与工作了……你现在可以看清楚，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你从他们那里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

恩格斯可能是给马克思写信询问了此事。马克思在 11 月中旬回信时予以了说明，“至于你们的编辑职务，我这样做了：（1）在第 1 号报上就立即指明，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2）向愚蠢而反动的股东们声明：他们可以随意把你们不再看做编辑部的人员，但我有权随意付出我所要给的稿费，所以，他们在金钱上将丝毫占不了便宜”。针对那些流言蜚语，马克思对恩格斯说：“我能把你丢开不管吗？哪怕是一会儿，那也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像我希望的我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马克思猜测是恩格斯的父亲从中挑拨，在给恩格斯的信的结尾又附上一句“你的老头是一个混蛋，我们将写一封最不客气的信给他。”这封信发出后的第二天，马克思又给恩格斯寄去了一笔钱。

收到马克思的信后，恩格斯了解到事情的真相，遂给家里写了一封信，驳斥了父母对马克思的怀疑。他母亲 12 月初回信说：“关于马克思，我不再说些什

么了，如果他像你在信中所写的那样做的话——对此我从未有过丝毫怀疑——那么他已做到他能做的一切，对此我对他表示感谢。”毛里齐娅·恩格斯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型妇女，不管在政治观点上她是多么反对儿子的意见，在生活上她是处处关心虽已长大成人，但在她看来还是个孩子的恩格斯。在12月初的这封信中她又写道：“你现在一定已经收到我们寄去的钱了。请你给自己买一件暖和的外衣吧，天气很快就会变得更冷，这样你就不致于没有衣服穿了。你还该置备一条衬裤和一件睡衣，以便万一受凉——很容易犯这样的病——到时也可以有几件暖和的衣服。”

还在第一次给在日内瓦的恩格斯去信时，马克思就建议恩格斯写一些通讯和较长的文章。因为此时编辑部里几乎只有马克思一人在工作，后来诗人维尔特和弗莱里格拉特又回到编辑部，其他编辑或被关入监狱，或流亡在国外。确实，马克思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他不仅要组织稿源，还要筹措出版资金，有时还得应付法庭的传讯。

在瑞士的两个多月中，恩格斯共为《新莱茵报》写了3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中心内容是论述和分析瑞士的政治制度。当时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南德的小资产阶级把瑞士看成是“模范共和国”，认

为德意志未来的理想国家就是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恩格斯写这些文章不仅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还亲自到联邦议会访问旁听。在《新莱茵报》发表的文章中，恩格斯以鲜明的讽刺笔调描写了这个“模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生活的特点。他指出，瑞士是个只有几百平方英里，250万人口的小国，但却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语四种语言，并同时存在着文明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从最先进的机器工业直到地地道道的畜牧生活。瑞士的国民议会集所有这些民族和各个文明发展阶段的精华于一身，完全不像一个国家的议院。

议会里是一种什么状态呢？那些被派来讨论国家大事的社会精英却是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自法语区和意大利语区的代表蓄有须髯，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穿巴黎时装；坐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些五光十色得出奇的人物，他们穿着带有某种文明特征的服装；再往后则是打扮得极为相像的，穿便服的军官，他们的打扮和穿着显得过时；最后是基本群众，他们的面孔和服装难以描述，彼此极不相像，各有特点，这些人议容可恭，严肃得令人感到害怕。就是这样一群议员，用四种各不相同的语言，在议会里讨论着一些最琐碎的地方性问题，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则像他们的语言和服饰一样混乱。恩格斯指出，瑞士议

会的活动表明贯穿瑞士政治生活的是“无限的分散性（这是联邦共和国的必然的历史产物），难以描述的利益的互相交错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奉为指南的各种动机的不可思议的混乱。”

德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总是幻想着把瑞士政治制度通盘搬过来，把德国变成一个幅员广大的瑞士。恩格斯强调指出，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如果采用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的方式实现德国的统一，只能继续维持德意志分散、落后的状态。德国的唯一出路在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完全统一。

在瑞士期间，恩格斯还与当地的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取得了联系。在洛桑，恩格斯参加了那里的工人联合会，11月9日恩格斯到达伯尔尼，又成为伯尔尼工人联合会的会员。12月初，洛桑工人联合会委托恩格斯为代表参加在伯尔尼召开的瑞士工人联合会和德意志民主民族联合会分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洛桑工人联合会在给恩格斯的委托书中说：“兄弟！鉴于不可能派代表出席伯尔尼工人代表大会，特委托你做我们的代表。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老战士，在这次大会上你当然也一定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

伯尔尼代表大会于1848年12月9日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各州的10个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恩格斯参

加了联合会章程的起草工作，他尽力使联合会的章程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原则保持一致。章程第一条指出：“联合总会的目的是：以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精神教育联合总会会员，并采取任何合法手段，谋求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原则及制度得到德国人方面的承认，并促其实现。”这一规定与《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在这次大会上，恩格斯还当选为瑞士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大会结束后，他受中央委员会委托，写信给各个地方联合会，通报代表大会情况，解释代表大会决议的基本要点，要求各地工人组织加强联系和团结。

尽管在瑞士期间可从事各种实际政治活动，恩格斯仍感到难以忍受，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像这样无所事事地呆在国外，什么有用的事情都不能干，完全处于运动之外，是令人十分难以忍受的。”他表示不愿在瑞士再呆下去“即使在科伦遭到审判前羁押也比呆在自由的瑞士好。”

随着科伦形势的好转，因九月集会事件被通辑的一些人陆续回到了德国。恩格斯在伯尔尼也呆不住了，于1月中旬返回科伦，从而结束了三个月的流亡生活。在1月26日的一次传讯中，初审法官宣布不再因1848年9月的政治集会而对他提出任何起

诉。恩格斯、沃尔弗和德朗克重新回到《新莱茵报》编辑部，这个强大的战斗集体又聚在了一起。

当时，德国革命正在走向低潮，反动势力已经在大部分地区取得优势，1848年10月，哈布斯堡王朝的反动军队镇压了维也纳人民起义，平息了奥地利的革命烽火。1848年12月，普鲁士政府以武力强行解散国民议会，恢复了君主专制统治。但在个别地区，特别是在匈牙利，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还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匈牙利由农民、手工业者、工人和大学生组成的匈牙利人民革命军，正在英勇抗击奥地利反动军队的进攻。

恩格斯在分析匈牙利革命战争的特点时，首先着重指出这次革命战争具有人民性质，正规军的军事行动与游击战的方式相结合，军队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恩格斯写通讯和评论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奥地利官方的战情通报和各大报纸相互矛盾的消息，但恩格斯总是能根据所掌握的材料，通过分析对比，剔除一切捏造和虚构，成功地写出内容丰富，分析深刻，能客观反映战场真实情况的评论。甚至他对战场形势的预测，也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证实，以至于人们都猜测《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这些军事评论是出自匈牙利某高级指挥官之手。

后来，恩格斯在说明《新莱茵报》对匈牙利事件

的态度时写道：“在斗争中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完全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报》对于在德国宣传匈亚利人们的工作，比任何其它报纸做的都要多。”

恩格斯回到科伦刚刚三个星期，便受到了科伦陪审法庭新的传讯，与恩格斯一起被起诉的还有马克思和报纸的发行人海尔曼·科尔夫。他们被指控的罪名是《新莱茵报》在 1848 年 7 月的一篇文章《逮捕》侮辱了科伦检查长魏茨费尔和宪兵。实际上这是科伦反动势力对《新莱茵报》进行的一系列迫害的继续。

恩格斯在法庭的辩护发言中，把捍卫自己的报纸同捍卫出版自由联系在一起。指出，检察机关提出指控的依据是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时颁布的《刑法典》第 367 条的规定。如果这一条依然有效的话，三月革命后确立的出版自由就得不到保障。恩格斯在总结发言中对法庭说：“诸位陪审员先生，此刻你们必须在这里解决莱茵省的出版自由问题。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裁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其一

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避而不谈——那末，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如果你们想这样做，那你们就宣判我们有罪吧！”

恩格斯的发言，引起了旁听者的喝彩。他的发言令人信服，法庭不得不宣判被告无罪释放。这一判决有助于莱茵资产阶级出版自由一直保持到德国革命终结。

在科伦，恩格斯一边参加《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一边致力于科伦民主联合会的工作。为纪念柏林三月革命一周年，恩格斯与编辑部其他成员一起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宴会。五、六千人把该城最大的会议厅挤得满满的。主席台上的两面旗子格外引人注目，一面是象征共和的黑红黄三色旗，一面是象征革命的红旗。服务人员一律头戴雅各宾派便帽，胸佩红色授带。这次宴会的祝酒词成了一篇将革命进行下去的号召书。海·贝克尔提议为3月18日和19日的牺牲者干杯；恩·德朗克举杯祝贺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提议为巴黎的六月起义者干杯；《工人报》编辑克利·埃塞尔提议为红色共和国干杯。在这天晚上的宴会中，诗人弗·莱里格拉特的革命诗歌《起床号》第一次响彻了科伦的夜空。这首诗是特意为这次宴会而写的，用《马赛曲》的曲调唱出来，更显得慷慨激昂：

“新的起义！
全面的起义！
前进，前进！
前进，前进！
前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们高举红色的旗帜！”

这次宴会是在有条不紊，非常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晚上 11 点，宴会在全体与会者为红色共和国干杯声中结束。3 月 22 号的《新科伦报》报道了这次宴会活动，它写道：“整个集会是红色的，它向我们的对手提供一个机会来看看红色这样一种颜色在科伦这个地方是多么强大。”

1849 年 3 月以后，德意志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新莱茵报》对反动势力的抨击也更加激烈。4 月 27 日，普鲁士政府解散了第二议院，第二天，《新莱茵报》便撰文指出，“加倍的军刀统治降临在我们头上……迫害，抓人即将开始，到处都将实行戒严。”四、五月份的《新莱茵报》“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要知道，《新莱茵报》所在的科伦是普鲁士的头

号堡垒，它所面对的是八千驻军和岗哨，但是“编辑室内的八枝步枪和 250 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红色雅各宾帽，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不能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

1849 年 3 月 28 日，法兰克福议会通过了德意志帝国宪法，尽管这部宪法具有强烈的保守性，但宪法规定德意志是统一的国家，因此人民群众将帝国宪法看成是革命的象征，在他们看来“每向统一德国迈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都是朝着消灭小邦割据局面和免除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迈进一步”。但普鲁士各邦的封建统治者却拒不接受这部帝国宪法，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拒绝接受帝国皇位。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评论说：“国王狠狠地打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一记耳光，并把奉献给他的那顶幻想帝国的虚假皇冠轻蔑地当面掷还给它。”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各地人民纷纷起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护宪运动。

5 月 3 日，保卫帝国宪法的起义首先在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爆发，随后，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佐林根，杜塞尔多夫，巴登和普法尔茨，爱北斐特也爆发了起义，资产阶级民主派甚至在一些城市夺取了政权。

为支持莱茵河右岸的护宪运动，恩格斯认为莱

茵河左岸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在要塞和有驻军的城市中，应避免举行徒劳无益的行动；第二，在莱茵河左岸的小城市，工业区和农村中进行佯攻，以牵制莱茵的驻军，使其无法调动；第三，把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到莱茵河右岸的起义地区，使起义更加扩大并设法在这些地方建立革命军的核心。

5月10日，恩格斯离开科伦前往爱北斐特，途经佐林根时，佐林根的工人送给他两箱子弹。到达爱北斐特后，恩格斯向那里的安全委员会汇报了科伦的情况，并表示接受安全委员会的调遣。鉴于他在爱北斐特是公认的共产主义者，所以恩格斯第一次与安全委员会接触就声明自己“只希望进行军事方面的活动，而根本不想涉及运动的政治方面，因为非常明显：目前在这里，运动只能在黑红黄三色旗下进行。”

5月11日，安全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授权恩格斯检查城内全部街垒，并指导建筑防御工事。5月12号，军事委员会又授权恩格斯自行斟酌安装大炮。恩格斯到爱北斐特第一天就组织了工兵连，并在该城几个出口处构筑了街垒。在爱北斐特逗留期间，他出席了军事委员会的各次会议，并建议该委员会聘请退设的前普鲁士炮兵军官米尔巴赫担任卫戍司令，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军事委员会还委派恩格斯担任米尔巴赫的副官。

5月13日，恩格斯身披红色军官肩带，出现在连接爱北斐特和下巴门的哈斯佩列尔桥上，检查桥上的防御工事，这时出现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站在工事上的恩格斯遇到了正要去教堂的父亲。“一个在全城享有极高声誉的积极市民，目睹儿子如此不轨行为，真是恼怒万分。”后来，一位名叫阿道夫·舒尔特斯的诗人写了几句俏皮诗来描写这一戏剧性场面：

这是弗里德里希·——先生：
儿子完全不像父亲！
教区里最虔诚的父亲，
却教育出一个“上帝所诅咒的人。”
起初他像非洲霍屯督族人那样，
恶意地亵渎我主上帝，
后来是一个十足的过激共和党人，
在城市把街垒筑起。
他出现在爱北斐特，
完全像丹东——罗伯斯庇尔。
如果事情不是那样反常，
他也许会博得英雄的称誉。
早在学校的时候，
他就在顽童中最富有才气，

让上帝降福给老——先生吧，
为他有这样一个浪子。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活动，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惧，他们散布了谣言说，恩格斯一夜之间就会用红旗取代街垒上的三色旗，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等等。5月14日，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安全委员会的赫希斯特博士找到恩格斯，对他这样说道：虽然恩格斯的一举一动丝毫没有可以非议的地方，但爱北斐特的资产者对他的到来仍感到万分惊恐并时刻担心他会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所以一致希望他离开。恩格斯表示，他决不想勉强别人接受他的效劳，但也不愿意被人误解为胆怯地离开自己的岗位，他要求安全委员会作出一书面决议。结果，安全委员会当天就作出了决议：“我们对过去居住在科伦的巴门公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迄今在本城所进行的活动予以充分公正的评价，但是还是请求他今天就离开本城区，因为他的逗留可能引起对运动性质的误解。”

委员会的做法激怒了武装工人和志愿部队，他们请求恩格斯留下来并表示要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为避免革命阵营的分裂，恩格斯向工人、战士们做了说服工作，然后离开了爱北斐特。

5月16日，恩格斯回到科伦，在5月17日的

《新莱茵报》上发表了关于爱北斐特事件的详细报道，他对工人们说“现在这个运动只是另一个更重要千百倍的运动的序幕，在那个运动中涉及到的将是他们工人切身的利益。这一新的革命运动将是现在这个运动的结果，而只要这个新的运动一开始，恩格斯便会——这一点工人们可以相信！——像《新莱茵报》的所有其他编辑一样，立刻出现在战斗岗位上，那时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离开这个岗位了。”

此时科伦的局势也急转直下，5月16日，科伦当局发布了在24小时内将马克思驱逐出境的通告，5月17日又发布了逮捕恩格斯的命令。反革命得势了，《新莱茵报》已无法继续办下去了，恩格斯后来回顾说：“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枝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

5月19日，《新莱茵报》出版了最后一期，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都是用红色油墨刊印的，刊头是致科伦工人书，它庄严宣告：“《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在《新莱茵报》的最后一期上，编辑和诗人弗莱

里格拉特代表编辑部满怀豪情的向科伦的无产阶级告别：

再会吧，再会吧，你这战斗的世界。
再会吧，你们鏖战中的大军！
再会吧，你这被火药熏黑的战场，
再会吧，刀剑和戟枪！
再会吧——但不是永别！
兄弟们，他们不能把精神杀死！
很快我就要身披甲冑，发出铿锵之声，
很快我就要纵马飞奔，回到你们的身旁！

当红色的《新莱茵报》在科伦发行时，恩格斯正陪同马克思走在法兰克福的路上，5月20日和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同德国国民议会的民主派议员洽谈，敦促他们领导德国西南部的护宪运动。恩格斯向这些议员们建议，把巴登和普法尔茨的革命军召集到法兰克福，一方面抑制动摇不定的各邦联合军，另一方面把起义的烈火燃烧到黑森和拿骚两公国，并迫使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退却。恩格斯论证说，一旦革命军占领法兰克福，将使革命迅速扩展到美因盆地。然而，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们“既没有勇气和毅力，也没有才智和主动精

神。”他们对恩格斯的建议充耳不闻。5月23日，恩格斯又与马克思来到巴登首府卡尔斯卢瓦，向这里护宪运动的领导者建议派军队到法兰克福，以便控制国民议会，把护宪运动推向全国。但巴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则把主要任务放在重建“安宁与秩序”上，断然拒绝了恩格斯的建议。24日，他们又来到普法尔茨的首府凯则斯劳腾，遇到了与卡尔斯卢厄类似的局面。

5月底，恩格斯陪同马克思来到宾根，与先期到达的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和孩子们汇合。6月初，马克思全家动身前往巴黎，恩格斯则返回凯则斯劳腾，准备一旦斗争重新爆发，就“在这个运动中占居《新莱茵报》唯一能占居的地位——士兵的地位”。

不久，普法尔茨的军队与普鲁士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开始了。恩格斯作为一个步枪手参加了一个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军团，担任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奥古斯特·维利希的副官。在这个军团中，有很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其中包括同盟中央的领导人约瑟夫·莫尔。在同反动军队的战斗中“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战士”。

由于巴登和普法尔茨护宪政府屡失良机，护宪军在战场上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恩格斯参加的几次战斗，都是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

行的，均以护宪军失利告终。在向瑞士边境撤退的过程中，恩格斯自告奋勇担任后卫，负责掩护大部队转移。

经与维利希商议，他们决定以进为退。1849年6月29日，恩格斯与维利希率领一连步枪手沿牟尔克河右岸，向比施韦尔进发，在距离罗腾费尔斯半小时路程的地方，与普鲁士军队遭遇了。恩格斯命令步枪手成散兵线散开。维利希则纵马折回，督促落在后面不远的一支部队赶上前线。

“要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恩格斯向战士们喊道。

这里是一大片果木园，战士们听到恩格斯的声音，马上就近以果木树或葡萄架为掩护，向敌人进行猛烈的射击。战斗持续了两小时四十五分。这时一支强大的敌军纵队赶上来支援，护宪军左翼的步枪手开始后退，恩格斯喊破了嗓子也无法阻止他们后退。无奈之中，他随右翼向山上撤去，在撤退途中，他收编了散落的其它部队的一些战士。到达山顶后，马上指挥战士们构筑工事，因为这里是掩护大部队的唯一屏障。普鲁士军队由于不知山上护宪军的虚实，未敢昌然进攻，双方对持了一天多。

在战斗中，恩格斯表现勇猛，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他看来，“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

小事情”。他的积极奋战和勇猛大胆，受到战友们的特别赞扬。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后来在回忆恩格斯时说：“所有在战火中见过他的人，很久以后都还在谈论他那种非凡的镇静和漠视一切危险的气魄。”

维利希和恩格斯指挥的部队在完成了阻击任务后，作为巴登——普法尔茨的最后一支队伍，于7月21日越过国境进入瑞士境内，至此，德国乃至欧洲的1848—1849年革命结束了。

第十二章 总结经验

目前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9 年 7 月 12 日，恩格斯随维利希军团越过瑞士边境，经过手续繁琐的登记签证和将近 200 公里的步行，12 天后到达瑞士西南部。根据瑞士政府的安排，驻扎在位于日内瓦湖北岸的莫尔日，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月的宿营生活。

在瑞士刚一安定下来，恩格斯赶紧写信与在巴黎的燕妮·马克思联系。恩格斯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听到战友的消息了，他对马克思的情况感到忧虑，因为巴黎早已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像马克思这样公认的共产主义者是不会受到当局欢迎的。而且，在巴登

时，恩格斯还听到关于马克思已被捕的谣传，由于他看不到任何报纸，所以也无法判断这一消息的真伪。他对燕妮说：“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为此焦虑不安，我万分迫切地恳求您安定我的心，把有关马克思的命运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但愿我能确实知道马克思是自由的！”

马克思本人也很为恩格斯担心，一接到恩格斯的信，他马上提笔写了回信：“亲爱的恩格斯：我一直为你感到十分的不安，昨天接到你的亲笔信，异常高兴。”马克思还建议恩格斯就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写一部历史或一部抨击性文章，“如果没有你参加这次战争，我们是不能就这种滑稽戏提出我们的看法的，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很好地表达《新莱茵报》对民主派的总的态度。我确信这种著作会有价值并且会给你弄来些钱。”但是，营地的环境不适合恩格斯从事写作工作，恩格斯对此万分苦恼。8月中旬，恩格斯收到了家里和妹夫布兰克寄来的钱，在洛桑租了一间陋室，开始写《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8月24日，恩格斯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正在写关于普法尔茨——巴登革命闹剧的回忆录……我参加了各次战斗……有机会看到了许多事情。你知道，我有足够的批判能力，不会赞成平庸的极端共和主义者的幻想，能够看透领袖们用大话

掩盖起来的怯懦。

我的这一著作按照《新莱茵报》精神，对这一段历史提出了与其他预期将会出现的说法不同的解释。它将揭露某些肮脏的勾当，特别是将包含关于迄今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普法尔茨事件的许多新材料。”

然而，这部书在瑞士并没有写完，恩格斯就接到了马克思邀他去英国的信。

1849年8月20日左右，法国政府通知马克思，他要么永远居住在远离巴黎的摩尔比安省布列塔尼沼泽地，要么离开法国。布列塔尼沼泽地环境恶劣，让马克思去那里无异于变相谋杀。马克思决定离开法国，去英国定居，并在伦敦创办一份德文杂志。同时，他写信给恩格斯，劝他尽快移居英国。“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而且你的安全也要求这样做。普鲁士人会枪毙你两次。(1) 由于巴登；(2) 由于爱北斐特。你在瑞士什么也不能干，何必在那里呢？……在伦敦我们将有事情干……再说一遍，我估计你是一定不会辜负我的。”

恩格斯决定接受马克思的建议。1849年9月初，他提出了从瑞士去英国的申请，瑞士政府很干脆地满足了他的要求。由于恩格斯不能经德国或法国前往英国，所以只能绕道意大利和地中海。10月初，恩格斯离开瑞士，10月5日到达撒丁王国的热那亚，在

那里搭上了史蒂文斯船长的英国纵帆船“康沃耳钻石号”，经过近五周的航行，于11月10日到达伦敦，在分别半年之后，两位战友又重新聚首，他们共同在新的形势下迎接新的挑战。他们一方面组织已经涣散的革命队伍，另一方面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为未来的革命做理论上的准备。

在恩格斯到达伦敦之前，马克思已经对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了改组，恩格斯缺席当选为同盟中央委员。其他领导成员还有亨利希·鲍威尔，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卡尔·普芬德等人，威廉·沃尔弗滞留在伯尔尼，卡尔·沙佩尔在晚些时候出狱后也到了伦敦。当时摆在同盟面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救济政治流亡者。这不仅是一项社会工作，更重要的是积聚革命力量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1849年9月18日，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成立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委员会主要成员只有马克思、鲍威尔和普芬德等人。9月20日，这个委员会发表了《救济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呼吁书》，阐明了救济委员会的宗旨是救济在德国革命中同反动势力进行战斗的流亡者，而“不论他们是自由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是共和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头头司徒卢威和海因岑通过协会中的拥护者，企图另立一个救济组织同原救济委员

会对抗。11月18日，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成立“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来代替原来的救济委员会，新的救济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救济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也不拒绝救济其它党派的流亡者”。恩格斯也被选入委员会，他主要负责在英国以外募集救济资金。

由于恩格斯所能活动的范围并不很大，这也影响了资金的来源，为此，他请在法兰克福的魏德迈为流亡者多多募捐。恩格斯在1850年4月22日给魏德迈的信中说：“如果我们现在收不到钱，那么过一个星期，我们的五六十名流亡者就会身无分文而流浪街头。”他请魏德迈在法兰克尼亚，纽伦堡，拜罗伊特等《新莱茵报》畅销的地方设法募捐。

救济委员会一方面募集救济金，同时尽力为流亡者寻找工作。但是到1850年夏天，还是有一部分流亡者找不到工作，于是救济委员会为他们兴建了简陋的流亡者公寓和食堂，还建立了一个小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恩格斯和马克思所做的这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保存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干部，使他们不致在流亡中穷困潦倒，流落街头。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救济革命流亡者的同时，还着手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创办杂

志的想法在决定移民英国时即已产生，恩格斯到达伦敦后，便开始协助马克思筹办。他们创办这份杂志的目的，正如《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示所指出的，是“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创刊，得到德国革命者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支持。同盟中央要求各地盟员尽最大努力支持无产阶级自己的杂志。同盟的地方组织也都期待着这一继承《新莱茵报》精神的杂志的创刊，并发动盟员为自己的杂志尽一份力量，魏德迈编辑的《西德意志报》，1849年10月17日头版头条报道了该杂志即将出版的消息：“根据伦敦的消息，卡尔·马克思博士在近期内将出版一种政治经济评论，我们满怀信心地期望，所有主张社会民主派的全体成员都来支持自己的开天辟地天才领袖所创办的这个事业。”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于1850年3月问世，至同年11月共出版6期，其中第5期和第6期是合订本，该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由舒贝特印刷公司印刷。同盟中央委员，热情奔放的康拉德·施拉姆负责发行。杂志刊载的文章大部分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作品。

根据分工，恩格斯负责撰写总结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经验教训，马克思负责撰写总结法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教训。除了单独撰写的著作外，两人还合写了三篇国际述评和一些短论，出报评论等。

恩格斯总结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第一部著作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这部著作在瑞士已动笔写，完稿于伦敦，刊登在杂志的第 1、2、3 期上。

作为亲身参加过护宪运动的一名战士，恩格斯有机会了解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掌握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肮脏的勾当”。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目击证人的回忆录。

恩格斯指出，整个护宪运动的灵魂是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却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推动下被迫走上起义道路的。如果事情完全由小资产阶级决定的话，“那它未必会抛弃处处以法律为依据来进行合法，平和而又软心肠的斗争的这种立场，未必会借助于火枪和石块来代替所谓的精神武器”。

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这个阶级实质：“这个阶级在它还没有觉察出任何危险的时候，总是吹牛，爱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在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躲

躲闪闪；一旦其他阶级郑重其事地响应和参加由它所发起的运动，它就显得惊恐万状，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最后，由于它的不坚决，一旦反动派取得胜利，它总是特别受欺骗和受凌辱。”

在运动初期，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比较坚定的派别也曾依附过小资产阶级。但是，与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相比，德国的资产阶级要怯懦得多。“只要有一点点再发生混乱即进行真正决战的可能，它便会张惶失措地退出斗争的舞台”。

恩格斯猛烈抨击了巴登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首领布伦坦诺之流的背叛行为。布伦坦诺在起义开始被抬上巴登委员会领袖的地位，但他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把运动拖住，试图用自己的权力反对给予他权力的运动。他所要做的一切努力就是“尽可能使一切都转回到旧轨道上来，尽可能减少混乱和骚乱，并且使国家尽快地失去自己的革命面貌”。为此，他甚至不惜出卖起义。

恩格斯指出，德意志小资产阶级的梦想是建立这样一种世外桃源：以范围略加扩大了市镇，即州，组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没有君主，没有常备军，没有多少赋税，没有大工业，没有铁路，没有世界贸

易，没有百万富翁与无产者的冲突，但却有着一种充满虔诚笃信和君子之风的幽静而舒适的生活，适应于知足常乐的人们要求不高的生活。但是，如果德国真有一天变成了这样的世外桃源，“那就会使它降低到甚至在它最可耻的时代都想象不出的低级阶级”。

恩格斯又指出，以较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为首的，包括相当大一部分农民，是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主力军，他们情愿为了帝国宪法牺牲一切，正是他们“促使这个运动更加明确，更加坚强有力，而且尽力一有可能就去掌握运动”。在维护帝国宪法的军事行动中，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表现更是出色，他敢于对其他一切党派说：“无论哪个党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兵士。”

最后，恩格斯热情歌颂了英勇献身的革命志士，无情鞭笞了反革命势力的罪行和导致革命运动失败的叛徒。他慷慨激昂地写道：“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施坦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求饶，也没有一个人发抖。德国人民不会忘记拉施坦特的执行枪决的刑场和监禁囚徒的牢房，他们不会忘记下达这些令人发指的命令的统治者，同时也不会忘记那些因

自己的怯懦而导致这样恶果的叛徒——卡卡斯卢厄的和法兰克福的所有布伦坦诺之流的人物”。

恩格斯写的另一部著作是《德国农民战争》，刊载于《新莱茵报》第5、6期合刊上。后来恩格斯在第二版序言中谈道：“德国1525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不谈到它”。这种类似之处，有助于恩格斯说明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原因。

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恩格斯把16世纪的市民阶级看作是早期的资产阶级，是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前身。而把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看作是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把16世纪前半期事件与19世纪中期的德国革命作一比较。

恩格斯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阶级反对派，在1517—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他们的后代资产阶级自由派在1848—1849年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是何等的相似，路德在从事宗教革命活动初期，曾经多次发表言辞激烈的革命言论，号召人们“运用百般武器来对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然而，当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

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到运动中的时候，这位一鸣惊人，声势烜赫的伟大人物却毫不踌躇地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这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的变化是何等惊人的相似。

因此，恩格斯得出结论说：“路德在 1517—1525 年这几年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现代德国君主立宪派从 1846 到 1849 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经历的转变。资产阶级党派总是在领导运动时，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经过这一对比，恩格斯为人们清楚地揭示了如下历史性结论：“1848 年和 1849 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 1525 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在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

恩格斯写这部著作的最主要意图是证明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指出，农民战争在客观上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不是取决于农民阶级在战争中所取的立场，而是取决于起义农民提出的反封建要求的内容。由于农民自身的特点，使他们不能独立地将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农民具有莫大的革命潜力，农民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对革命的胜利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恩格斯关于建立工农联盟的理论，对于后来的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深远的影响。

恩格斯选择德国农民战争作为研究课题，同时也是为了重新恢复无产阶级队伍的革命热情。德国在经过两年大搏斗到后期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历史时期，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在革命队伍中出现了消沉的失望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把德意志农民战争中坚韧不拔的革命家如托马斯·闵采尔、米哈埃尔·盖斯达尔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以重新唤起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革命情绪。在谈到南德的农民斗争情况时，恩格斯心怀崇敬地写道：“南德的农民，坚韧不拔，从 1493 年起，密谋造反，历时 30 年之久，把他们因住地分散而造成的种种困难都一一克服了，并在无数次溃败，失散，首领被杀后，总是再接再厉重整旗鼓，直到最后大规模起义的机会来到——这样的顽强坚忍，实在令人敬佩。”

在与马克思合写的《国际述评》中，他们系统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产物，它又是引发革命的最直接的原因。1848—1849 年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过调整，促成了各国经济的普遍繁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只有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因此，革命者应正视现实，避

免在革命时机不成熟时盲目行动，从而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无法克服的，新的危机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新的革命高潮也一定会到来。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刊半年后，由于资金困难，被迫停刊。该杂志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特别是该杂志发表的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都是不朽名著。

在伦敦期间，恩格斯一边进行总结革命经验的理论工作，一边与马克思一起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

欧洲大陆的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9年9月在伦敦重新建立起来。以前的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先后来到伦敦，参加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沙佩尔于1850年出狱后也来到伦敦，成为新的中央委员；老盟员莫尔在护宪运动中英勇献身；新的中央委员会增加了一些新成员，其中包括在护宪运动中表现神勇的维利希。

为了使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组织严密、行动一致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从理论上认真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教训，统一盟员的思想。为此，他们共同起草了《中央

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这个文件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 1848—1849 年革命的经验教训。

告同盟书首先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的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 1848—1849 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方面经受了考验：首先，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纸上，街垒中以及战场上，都是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其次，共产主义者同盟受到的考验是 1847 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

鉴于 1848—1849 年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象 1848 年那样受资产阶级利用和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在未来的革命中，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同盟，“不应再度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

资产阶级革命中，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保证工人阶级独立性的重要性。

告同盟书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1850年3月底，同盟中央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并派遣亨利希·鲍威尔为特使赴德国各地，向德国本土的盟员宣传告同盟书中的政治纲领，协助重组同盟的地方组织。鲍威尔此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科伦外，他在法兰克福、柏林、汉堡、莱比锡、慕尼黑、斯图加特、巴登等地改组了一些同盟支部，并建立了一些新支部。使“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都已掌握在同盟手里”。

在重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时，恩格斯和马克

思积极地同各国革命运动的左派人士建立了联系。受同盟中央的委托，恩格斯，马克思和维利希负责与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宪章派左翼和匈牙利流亡者保持经常接触。由于马克思和维利希的英语说得还不流利，所以宪章派和欧洲流亡者组织的大会和宴会主要由恩格斯出席。

1850年4月中旬，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同英国宪章主义革命派、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签署了世界共产主义者协会协议。协议第一条规定：“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这一条规定，不仅符合《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而且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政治名词

然而，德国共产主义者与法国布朗基主义者的联合并不巩固，恩格斯也不认为布朗基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分析说：他们自以为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半年后，共

产主义者同盟断绝了同布朗基主义者的联系。

恩格斯与哈尼和琼斯为首的英国宪章派左翼有着较密切的联系。1850年11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英译本发表在宪章派的杂志《红色共和党人》上,哈尼附了一个简短的编者按,第一次公开《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称“根据它可以判断德国革命家先进政党的计划和原则”。

应哈尼之邀,恩格斯一直为宪章派的机关报、特别是哈尼主编的《民主评论》撰稿。1850年2月,恩格斯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了《10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呼吁英国的工人阶级不要满足于资本家的小恩小惠,“而应当勇敢地立即斗争,争取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从1850年1月到8月,《民主评论》杂志还发表了恩格斯的两组连载文章《德国来信》和《法国来信》。这两组文章,实际上是恩格斯对1848—1849年革命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其主要原则和理论都包含在马克思的《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名著里。

1850年夏天,正当共产主义者同盟经过改组,在德国本土和一些欧洲国家逐渐恢复活动的时候,同盟内部出现了以维利希和沙佩尔为首的“左派”集团,他们以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

为首的正确路线相对立，并最终导致了同盟的分裂。

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对党的任务、策略的看法。

1848—1849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言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很快会发生经济危机，下一革命高潮很快便会到来。但通过对近 10 年来各国经济史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纠正了自己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欧洲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到来，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而维利希和沙佩尔等人根本不承认革命形势与经济危机的关系，他们不顾革命暂时处于低潮这个现实，硬要人为的掀起革命高潮，制造革命形势。这实际上与小资产阶级的急进主义和冒险主义是一致的。

在革命的任务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形势的分析，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注意力，应当是利用暂时的休战时间钻研革命理论，“学习！学习！再学习！”通过学习总结革命经验，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使无产阶级为未来的革命高潮做好准备。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施拉姆、埃卡留斯、李卜克内西等都把学习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恩格斯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谈到这一情况时说：“自然，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干嘛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

要懂’。不过，一般说来，马克思派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当你看到流亡者中间还有些蠢驴，到处猎取一些新词句，因而最后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我们党的优越性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就显而易见了。”

维利希和沙佩尔就属于恩格斯所称的“蠢驴”，他们不理解新形势下党的任务转变的重大意义，而是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把革命当作儿戏，主张采取冒险行动，不顾一切地发动起义。如沙佩尔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是我们自己动手砍掉别人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们的脑袋”的时候。

在革命策略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 1848 年革命得出的结论，并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反复强调，并要在伦敦的盟员与各国流亡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界限。而维利希和沙佩尔不仅同他们来往密切，而且坚持同这些所谓的“当代民主主义英雄结成联盟”。

1850 年 8 月，在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维利希发生了直接冲突，后来，维利希在谈到这次冲突时说：“当居于伦敦的、当年曾起过相当显著作用的革命家送来请帖邀请我们参加会议时，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第一个矛盾便暴露出来了。我想赴会……我居于少数派，邀请被拒绝了。”斗

争虽然围绕是否接受邀请进行，但实质却是同盟坚持什么样的策略的问题。

1850年9月1日前后，在同盟中央委员会上，双方再次发生更为激烈的争论，拥护马克思、恩格斯的施拉姆激忿之下甚至向维利希提出决斗。恩格斯出面试图制止决斗，但未成功。两个人于9月11日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举行了决斗，结果施拉姆头部受伤。

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召开非常会议，中央委员中的多数派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鲍威尔、埃卡留斯普芬德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少数派代表是维利希、沙佩尔和列曼，恩格斯担任书记。

在会议上，中央委员会主席马克思作了重要发言，他批评了维利希和沙佩尔错误观点，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点意见：（1）中央委员会由伦敦迁到科伦，委托科伦区部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2）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宣告无效，委托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章程。（3）撤销以前的伦敦区部，设立两个各自独立的区部，两者都只跟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马克思认为这样做即可以同维利希和沙佩尔“分道扬镳而又不致引起党的分裂”。

但是，沙佩尔等人却在大搞分裂活动，他经常挂在嘴头上的一句话就是“要分裂——就分裂吧。”在

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再次提出“组织两个同盟，完全决裂”。这次会议后的第二天，沙佩尔操纵同盟伦敦区部，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支持者从同盟中开除出去，另组由少数派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它实际上是一个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即宗得崩德联盟。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支持者声明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因为这两个协会的成员大部分都站在维利希和沙佩尔一边。

鉴于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宗得崩德联盟不服从在科伦成立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议，新的中央委员会将沙佩尔、维利希、列曼等七人开除出共产主义同盟。

由于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叫嚣、挑衅和德国国内一些盟员的疏忽，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落入普鲁士警察当局手中，普鲁士政府随即制造了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1851年5月10日，普鲁士警察当局先后逮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特使诺特荣克、中央委员勒泽尔、毕尔格尔斯、丹尼尔斯等人，并在德国全境进行了大逮捕，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工人活动积极分子共有几百人。

对共产主义者进行迫害，是普鲁士政府蓄谋已久的阴谋，为此甚至不惜采用卑劣的手段。1850年

11月11日，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写信给首相曼托伊费尔说：“我产生了一个不便大声明言的念头。这就是：能够创造一个解放阴谋，并使普鲁士公众看一出理当渴望已久的戏，即一个阴谋被破获并且（首先）受到惩办。”正是在威廉四世的授意下，警察头子施梯伯一手导演了这出闹剧。

需要指出的是，维利希和沙佩尔集团言过其实的叫嚣，客观上帮了普鲁士警察机关的忙，正如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言，警察机关在普鲁士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完全是由于伦敦的蠢驴们的哀叫造成的，这些风箱们知道，他们既没有阴谋造反，也没有追求任何现实的目标，在德国也没有一个组织支持自己，他们只愿作出危险的样子，给报纸的磨车供料。因此，这些无赖是在阻碍和危害现实的运动，并使警察找到踪迹。”

对被捕者审讯期间，普鲁士政府用造谣中伤，栽赃陷害，伪造和盗窃文件，利用奸细混入同盟组织等卑劣手段，以“图谋叛国罪”对11位科伦共产党人进行审判。牢前扣押长达一年半，开庭时间历时一个月。

科伦共产党人案发生后，恩格斯积极协助马克思，收集、揭露普鲁士政府阴谋，为在押共产党人辩护的材料。此时恩格斯已移居曼彻斯特经商，他利用

商业往来的便利与德国的辩护律师建立了联系，使得他与马克思收集的证据源源不断地送到辩护律师贝姆巴赫手中。

尽管普鲁士政府未能拿出它所大肆渲染的所谓“叛国阴谋”的证据，但是，如果宣告被告无罪就等于宣告政府当局有罪。会使政府颜面尽失。所以，法庭也顾不上他们所吹捧的“法律准则”了，强行判决毕尔格尔斯、列斯纳勒泽尔、贝克尔等七人六年以下徒刑，丹尼尔斯等四人无罪释放。

法庭判决后，马克思发表了重要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恩格斯与马克思联合发表了《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恩格斯还单独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最近的科伦案件》。这些著作深刻揭露了普鲁士政府迫害革命者的阴谋，把真相揭示给世人。同时，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科伦案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逮捕，使德国各地同盟组织被破坏，同盟实际上已不能继续存在了。1852年11月，根据马克思提议，同盟宣布解散。

第十三章 欧门—恩格斯公司

“一个人自己可以当一个不错的交易所经纪人，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并因此仇恨和蔑视交易所经纪人阶级……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它一百万，从而使欧洲和美洲的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会到交易所去”。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50 年深秋，浓雾弥漫着伦敦。这时的气候就像 1848 年革命后的政治形势一样，使人感到压抑和情绪低沉。在这样一个季节里，恩格斯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伦敦，前往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经营商业，从而开始了长达 20 年的“埃及的幽囚”的生活。

恩格斯做出这一选择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于资本主义生意场，恩格斯并不陌生，高中没毕业

他就到不来梅的商行当过两年见习生，后来又在曼彻斯特的营业所里当过办事员，过着整天同资产阶级讨价还价的无聊生活，可以说，对于经商，恩格斯没有丝毫的兴趣。

1848年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又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新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面前的任务是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研究革命理论，特别是从经济学上对共产主义进行彻底的科学论证，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要从事和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绝非易事。在反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找不到发表文章和出版著述的机会，他们唯一发表意见的地方是不给分文稿酬的美国宪章派的机关报刊。经济上的困难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困扰着马克思，如果在经济上得不到必要的支持，马克思将不得不为了面包而停止正在进行的理论研究。为了使马克思“不致于被迫过行乞的民主派生活”，能专心致志地从事《资本论》的研究，恩格斯不得不接受家里的建议再度到曼彻斯特从事那“该死的商业”。

按照恩格斯的初衷，他只是打算用几个月、最多几年来从事商业活动，他坚信数年后资本主义社会肯定会爆发新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也必然会带

来新的革命高潮。那时，他将摆脱商业的羁绊，重新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原来准备暂时寄居曼彻斯特的计划竟一直延续了 20 年。

老弗里德里希让长子回曼彻斯特并不是想在经济上帮他一把，他有自己的目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是老弗里德里希与欧门合伙的企业，他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代表他，监督公司的经营财务情况，保护自己的利益。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可以想象，你在那里，对你来说，未必愉快，但是凭你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系，对我们和我们的公司来说，也许倒是很有利……你在那里非常合适，在那里除了你没有人更能代表我了。”

另外，老弗里德里希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他要把恩格斯束缚在公司业务上，使恩格斯成为像自己一样有地位的资产者，这样，恩格斯就会慢慢疏远自己的战友和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从而把自己的儿子拉回到资产阶级阵营中。

但是，老弗里德里希很快发现，儿子只是打算把商业作为暂时的栖身之所，根本没有长期经商的打算。他委托玛丽亚·布兰克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信中道破了恩格斯的意图：“在我们看来，目前你极欲成为一名商人只是为了使你的生活有个着落，但是，

一旦你认为形势对你的党有利，你就又会放弃经商，又为你的党去工作了；总之，你没有兴趣，也不愿意成为商人，更不打算终身经商。”对此，恩格斯毫不讳言。

严厉的父亲决不允许恩格斯把“终身职业”当儿戏。因此，他考虑了多种方案以期把恩格斯终身束缚在商业上。第一个方案是把恩格斯送到印度加尔各答去，这个方案遭到了恩格斯的强烈反对，而且同老弗里德里希一起磋商的那个代理人也不赞成，只得作罢。第二个方案是把恩格斯派往纽约，负责为公司购买棉花。这个方案大家一致赞成。恩格斯为此还专门同马克思商量，马克思甚至打算陪他到新大陆定居。1851年初，这个计划也破灭了，因为当时正是经济繁荣时期，棉花货源充足，价格便宜，公司没有必要再增一名采购员。最后一个方案，也是最便于实行的一个方案，就是让恩格斯作为恩格斯家族驻英国公司的全权代表，一同前去的还有彼得·欧门和哥特弗利德·欧门兄弟俩人。1851年1月底，父子俩一致同意按这个方案办。

对于英国，恩格斯最熟悉的地方莫过于曼彻斯特了。1842——1844年他曾在曼彻斯特经商两年，1845年7月，恩格斯又陪同马克思在该城图书馆从事研究两个月。这里不仅有一些参加过宪章运动的

老相识，老战友，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恩格斯的挚爱——玛丽·白恩士。1846年8月，恩格斯受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托去巴黎后，玛丽·白恩士也回到了曼彻斯特，两人分手已有五年多。

然而，这次迁居曼彻斯特，恩格斯总有一种身在他乡为异客的感觉。在曼彻斯特，没有马克思这样的朋友在一起谈笑风生，一起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恩格斯在这里看到的只是肮脏的贫民窟和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尔虞我诈，他觉得这里甚至比雾都伦敦还难以忍受。在给朱利安·哈尼的信中说：“看到你讨厌曼彻斯特，我并不感到奇怪，这是掠夺钱财者的一个该诅咒的肮脏巢穴。我宁愿被绞死在伦敦，也不愿平平静静地死在曼彻斯特。”

最让恩格斯心烦的是他在营业所的职务。恩格斯刚到营业所上班时，他只是父亲在公司里的代表，或者说是一个一般的办事员，并非公司的重要人物。专横吝啬的欧门兄弟分配给他的工作，是负责与各国商人通讯，摘抄商业情报，检查样品，接送货物，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除了晚上少得可怜的一点儿时间可以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写一些政论文章外，他几乎没有多少自由时间可供支配。恩格斯把他所从事的工作称为“该死的生意”，是“巴比伦监狱”，是“鬼商业”，有时则尖刻地讽刺为“可爱的商

业”。

对恩格斯来讲，经商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是一种牺牲。尽管他有时也抱怨，但是他甘愿承担这一切牺牲。在伦敦一年的生活使他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一家免除饿死的危险，使马克思的天才完全发挥出来，就只有再过他所讨厌的商人生活。

同时，恩格斯也确信，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用不了几年，欧洲大陆的革命高潮将会再次涌起，届时，他就可以重新置身于波澜壮阔的斗争激流中。因此，恩格斯竭力避免因为签订契约而被长期束缚在欧门—恩格斯公司。他最初只是作为父亲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正式代表，而没有担任负有工作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他的收入是每年由父亲向他支付 200 英镑的交际费和生活费。老弗里德里希很精明，这笔钱用于恩格斯的生活绰绰有余，但也剩不下多少来干别的，恩格斯不仅要用这笔钱维持他和玛丽·白恩士的基本生活，每月还要节省一些给远在伦敦的马克思寄去。

然而，老弗里德里希决不会允许长子半心半意地经商，他想把整个公司的权力逐渐转交给恩格斯。1851 年 6 月底，老弗里德里希亲赴曼彻斯特指导公司的运营。这是自 1849 年 5 月爱北斐特起义后父子首次见面。恩格斯的母亲对这次见面忧心忡忡。她采

取了种种防范措施，避免父子之间的冲突。她尽力说服主管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彼得·欧门把老弗里德里希接到他家去住；同时给儿子写信，“你们观点各异，最好不要谈论政治。”

老弗里德里希正春风得意，他在各处的生意经营得很出色，自1837年以来财产已翻了一番。在曼彻斯特，他提出一项计划，让彼得·欧门到利物浦管理工厂，把欧门——恩格斯公司交给自己的长子管理，由哥特弗利德·欧门协助。老弗里德里希的计划是一箭双雕，这样既可把公司控制在自己手里，又可把恩格斯永远束缚在商业上。恩格斯并没有正面反对，他只是装出非常谦虚的样子，说自己尚无力胜任，把老头顶了回去。

一年后，情况发生变化，1851——1852年度公司结算出现赤字。这意味着公司亏损，使得老弗里德里希非常伤心。亏损的原因除了一些不可克服原因外，欧门兄弟两人争权夺利，经常闹矛盾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老弗里德里希打算终止同欧门家族的合同，恩格斯也希望从公司中退出去。因为父亲来信通知他，一旦公司关闭，将安排他到利物浦去独立开设一个办事处，在那里负责收购棉花，并且有更为充裕的津贴。在利物浦，恩格斯的收入可供马克思一家生活半年。

1852年6月，老弗里德里希再次来到曼彻斯特，和欧门兄弟进行了长期的谈判，最后签订了新的协议书。根据协议，彼得·欧门退出企业，到别处去经商；公司的业务由哥特弗利德·欧门主持；恩格斯作为恩格斯家族驻公司的代表并兼任总助理。

老弗里德里希坚持让长子留在曼彻斯特，因为在他身为合伙人的公司必须有一个他家庭的常驻代表，而其他几个儿子都在其它几家企业和商行中任职，无法分身。而长子不仅熟悉曼彻斯特，熟悉合伙人的习惯，而且了解英国商人的秉性。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精通多种语言，这在经商方面无疑是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而且，令老弗里德里希感到欣慰的是，他觉得儿子对商业的兴趣比以前大了，如此发展下去，恩格斯迟早会抛弃他的革命理想和“引诱”他“堕落”的马克思。

此时，恩格斯也对在公司中占据一个有权力的地位感兴趣，因为这同时也意味着他收入的增加，和可以拿出更多的钱支援处于贫困中的马克思。根据新的合同，从1852年7月1日起，恩格斯的薪水不仅增加了，而且完全归他支配，再也没有人查问他钱是怎么用了。更为重要的是，1852年后，恩格斯能够得到公司一份固定的利润；前4年为5%，后4年为7·5%，从1860年起提高到10%。此外，恩格斯每

年还可得到 100 英镑的交际费用。

据推算，从 1852—1859 年间，恩格斯年收入从 265 英镑增加到 1000 英镑。这时，恩格斯才能够经常支援马克思；再过几年之后，恩格斯的支援才能真正帮助马克思从经济困境中解放出来。在 60 年代初期，马克思还时常遭遇这种困境。

收入增加的同时，恩格斯的商务工作也更加繁忙。他指挥着六个办事员编辑书信、文件、电报，他本人还需要审核公司的往来帐目，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并向远在德国的父亲报告。而发往法国、意大利、瑞士、俄国的书信都要恩格斯亲自来写，因为别人不熟悉这些国家的文字。

1854 年，恩格斯成为曼彻斯特交易所的一名成员。马克思特意写信祝贺他：“你现在是交易所的一员，而且是完全受尊敬的。特向你祝贺。很想听一听你在这狼群中的咆哮。”1856 年，恩格斯又接受了培养学徒的工作，他首先告诉了马克思：“可诅咒的商业天天妨碍我动笔。现在我要管三个家伙，因此检查、纠正、申斥和指挥没个完。况且还要为纱质差或交货慢等跟工厂主斗争，还有我自己的工作……。”1858 年以后，哥特利德经常把繁重的公司事务推给恩格斯，他自己则经常外出，有时甚至一连儿星期都不在公司露面。

对于商务工作的困扰和烦恼，恩格斯尽力独自克服，有时也向心爱的战友倾诉一下。1857年3月1日，他写信对马克思说：“我目前还必须在办事处里忙到八点钟，在晚餐等等结束之后，不到10点钟无法开始工作；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现在早晨最迟十点钟必须到办事处，因此，最迟夜里一点钟必须上床睡觉；真伤脑筋！正当有兴致工作的时候，不得不去睡觉；这样根本不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下决心反抗哥特弗利德的刁难。他在同一封信中说：“等着瞧吧。今年夏天我们将另作安排，或者就会垮台，我打算这样安排：十点到五点或六点上班，然后就离开，让一切都见鬼吧。”但是，只要马克思还需要他经济上的支援，恩格斯就会义无反顾作出牺牲，忍受商业的桎梏，并为此改变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过的是一种“双重生活”。这种双重生活首先表现在工作和交往上：一方面，在公司办事处和交易所中，他是作为一个资本家和大商人出现的，他要与资本主义社会上流人物交际应酬。在这种场合下，恩格斯不得不注意社交礼仪，并且在各个方面适应英国商界人士的习惯。他要同那些他所讨厌的唯利是图的人推杯换盏，灯红酒绿，还要同他们讨价还价，争吵不休。另一方面，回到自己的住处后，恩格斯又恢复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者的本来面

目，或致力于革命理论研究，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谈笑风生。他时刻在提醒自己，不能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要永远牢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一员。

这种双重生活还表现在恩格斯的住处上。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经常有两个住处。一个是他真正的家，即他与玛丽·白恩士和莉迪娅·白恩士姐妹俩的住宅。他在那里有许多闲暇时间可以休息，并在那里撰写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另一处是他自己单独的住宅，比较漂亮和讲究，里面有上等雪茄和高级香槟。在这里，恩格斯接待家里人和来宾，设宴请客，或进行礼节性拜访。这所住宅承担业务上的交际和往来，同时也是给别人看的。在这两所住宅中，恩格斯更喜欢前者，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是自由的，他才能做他想做的事。

恩格斯的作法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非议，因为在曼彻斯特，很多工厂主除了自己的家以外还有一个第二寓所，在这个秘密寓所中养着他们的情人。恩格斯与他们是迥然不同的，这些工厂主不仅有情人，家里还有一位正式的夫人。而恩格斯把他的爱情只献给了玛丽·白恩士，后来又给了莉迪娅·白恩士。

恩格斯不仅在业务上同资产阶级经常打交道，而且也经常参加他们的各种娱乐活动。他既是曼彻斯特工业家组织艾伯特俱乐部的成员，也是曼彻斯

特文学艺术协会的常客，他经常光顾这个协会的图书馆和报刊阅览室，为他的写作搜集材料。由于恩格斯通晓多国语言，他还成为曼彻斯特外文图书馆的会员；他还参加了慈善机构“外国穷人救济协会”和资产阶级组成的狩猎协会。恩格斯是一位出色的骑手，在不来梅当见习生时练就了一身好骑术。当附近的绅士贵族邀请他参加狩猎活动时，他总是毫不客气地答应下来。当猛烈地追逐野兽时，恩格斯总是一马当先，冲过壕沟、篱笆等障碍物。马克思经常因此为恩格斯担心，他曾对女婿拉法格讲：“我老是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会发生意外。”

但是无论是那些资产阶级商务谈判的对手，还是狩猎活动中的同伴，显然并不了解恩格斯的政治观点和卓越才能，因为恩格斯从不轻易在他们面前表露自己的学识，这个被马克思称为欧洲最有教养的人，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善识醇酒美味和谈锋甚健的人物而已。他们谁也看不出，这个在算帐经商上如此精明的德国商人，意然在热切盼望着爆发一次新的经济危机。1857年11月15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为已经到来的经济危机而欢呼，他说：“在这普遍崩溃的情况下，我感到非常愉快。最近七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冲洗掉了，我又变成另一个人

了。危机将像海水浴一样对我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

经商活动虽然浪费了恩格斯极其宝贵的精力和时间，但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摆脱商业事务，充分利用一切时间从事学习、研究和写作。在曼彻斯特经商期间，他认真研究了语言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在军事科学方面造诣更深，实现了 1848 年革命后他与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的要求。

恩格斯对语言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非常希望能“埋头搞我的老爱好——比较语言学”。恩格斯学习语言，不仅是商业工作的需要，也是研究各国政治，历史和科学文化的需要，重要的是它还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在开始学习斯拉夫语时，恩格斯曾对马克思说：“除了这种学习引起我对语言学的兴趣之外，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在下一次大演出中，我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人对那些恰好不久就会与之发生冲突的民族语言、历史文学以及社会制度的特点有所了解。”

恩格斯学习语言有独特的方法，1883 年在给友人的信中作了如下总结：“我在学习一种语言时总是采取这样的方法。不研究语法（变格、变位和代词除外），而是靠着查词典阅读所能找到的古典作家的最

困难的作品，例如，我从但丁，佩脱拉克和阿里欧斯托的作品开始学意大利文，从塞万提斯和卡德龙的作品开始学西班牙文，从普希金的作品开始学俄文。以后我读报纸等。”

在到曼彻斯特前，恩格斯已精通英语和法语，运用这两种语言就像母语一样熟练。50年代初期，又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和俄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以及捷克斯洛伐克语。50年代中期，他研究了波斯语，不过他对波斯语印象不好，认为与阿拉伯语相比“波斯语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真正的儿戏。”60年代中期，他又深入地研究了斯堪地那维亚语。70—80年代，他又涉猎了克尔特——爱尔兰语，荷兰语，苏格兰语和罗马尼亚语。

有一位巴黎公社的流亡者拿恩格斯一激动就有点口吃的习惯开玩笑说，“恩格斯能结结巴巴地说20种语言。”实际上，恩格斯能用20种语言与人交谈和写文章，能熟练阅读二十种文字。

拉法格在回忆恩格斯时曾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在兰兹格特海滨，一个杂耍场的主人扮成了一个穿巴西将军礼服的满脸胡子的矮子，他的四周围着一群伦敦平民。恩格斯先后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跟他谈话，可是得不到任何回答。最后，这位“将军”无意中流露了一句话，恩格斯马上喊道：

“这个巴西人原来是爱尔兰人!”接着就用他的家乡话和他谈了起来。当这个流浪汉听到家乡话的时候,高兴得流下了眼泪。而当他得知用家乡话与他交谈的竟是一位德国人时,更是惊诧不已。

精通多种语言,为恩格斯以后从事革命活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第一国际时期,他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中先后担任了几个国家的通讯书记,与这些国家的革命家进行通信联系时,他都是使用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字,而且语言修养达到惊人的程度。

从 50 年代后期,恩格斯开始深入研究自然科学,他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哲学。1858 年 7 月 14 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叙述了他对生理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研究工作,恩格斯说,最近 30 年来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充分证实了辩证法的世界观,如果黑格尔现在写一本《自然科学》,那么论据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

恩格斯非常重视施莱登和施纳的细胞学说,认为“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一切东西都是细胞,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最后直到‘观念’这个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细

胞学说充分论证了量变质变这个辩证法的规律。

使恩格斯感到兴奋的还有英国科学家焦耳的能量守恒与转化理论，他认为这个理论是“关于反思的规定如何互相转化的一个绝妙的物质例证”。

1859年12月，恩格斯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达尔文出版仅仅几天的《物种起源》一书，在12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兴奋地说：“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

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为他日后写自然辩证法打下了基础。

50年代，由于东方问题引起了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恩格斯也把一部分精力用来研究土耳其帝国的历史，特别是土耳其的亚洲属地——小亚细亚的历史。他把对小亚细亚历史的研究同宗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他对旧约圣经起源的看法。恩格斯认为：“犹太人的所谓圣书不过是古代阿拉伯的宗教传说和部落传说的记载，只是这些传说由于犹太人和与他们同一个族系但从事游牧的邻族早已分离而有了改变。”后来的历史研究表明，恩格斯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恩格斯还打算写一本有关爱尔兰历史的鸿篇巨

著，但各项工作交织在一起，使他无法集中精力完成这项研究。这部著作虽未完成，恩格斯还是学有所获，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后来写进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

整个 50 年代，是欧洲革命的低潮期，深入地总结上一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对于迎接未来的革命的新高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恩格斯于 1851 年 8 月至 1852 年 9 月写了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也是系统总结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最后一部著作。

恩格斯写这部著作，多少有些偶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了使马克思有一份比较固定的收入，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谋生的迫切需要”。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851 年夏天，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德纳邀请马克思担任该报的特约撰稿人，在经济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一要求正合马克思的心意。另外，在整个欧洲大陆处于反动黑暗统治的年代时，能够利用《纽约每日论坛报》这份在新大陆广泛发行的报刊来宣扬革命观点，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马克思当时正从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工作，根本抽不出时间为报刊撰稿，而且，马克思的英语水平还不能满足写政论文章的需要。因此，他只好

向恩格斯求援，8月8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早晨（8月15日）以前寄给我，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文章的要求也很简单，“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为了使自己的战友获得这一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恩格斯给予了帮助。

这样，从1851年8月到1852年9月，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一组文章，共19篇，以马克思的名义发表。

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分析了1848年革命爆发的背景，指出，革命前的德国社会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各个阶级关系错综复杂，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的四分五裂状态，对封建专制统治强烈不满。由于这些因素哪怕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時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已处于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恩格斯论证了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动力，是“历史的火车头”。“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

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的发动机；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产生和迅速的成长，它们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地震动时期 5 年就走完要普通环境下 100 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在谈到革命胜利的条件时，恩格斯指出：“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恩格斯认为，顽强奋战后的失败和轻易的胜利同样具有革命意义。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同马克思的《1848 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样，是总结 1848 年革命的经典著作。它不仅总结了 1848 年革命的经验教训，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学说。

1896 年，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将这组论文收集成册，以马克思的各义出版了单行本。直到 1913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公开后，人们才发现完全出自恩格斯的手笔。

50 年代末期，恩格斯的政论文章着重揭露和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同时也歌颂了亚

非各国人民反抗侵略和殖民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

这一时期，恩格斯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中国。他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波斯和中国》、《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等文章中，抨击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对中国自卫战争的恶毒攻击。指出，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的一切带有绝灭战的性质。虽然这个战争带有这个东方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为，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但是，这场战争是‘保卫社稷的家园’的战争，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当 19 世纪中后期，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在西方殖民侵略下和新文明冲击下垂死挣扎的时候，恩格斯对中国的前途却充满信心，他指出，我会看到中国是“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恩格斯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 1857—1859 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他从 1857 年 11 月到 1858 年 9 月写了不少分析印度反英起义进程的文章，在谈到印度民族起义失败后的形势时，恩格斯指出：“这再次的征服并没有加强英国对印度民心的控制。”而只能增加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者的仇恨心理。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你的文章很出色，在风格和文体上都使人

回想起《新莱茵报》的全盛时代。”

恩格斯对亚洲解放运动的关注和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十四章 “总参谋部”

恩格斯似乎生来就应该是一个军人，他能料事如神，随机应变，明察秋毫，当机立断，沉着冷静……如果当他在世时再一次爆发革命，那恩格斯一定就是我们的卡诺，是我们军队和胜利的组织者，军事思想家。

——威廉·李卜克内西

恩格斯对军事科学情有独钟，他认为，一旦发生暴力革命，无产阶级需要有自己的军事家。早在1851年给魏德迈的信中，恩格斯就强调“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重大意义”，谈到他已经在“啃军事”。

恩格斯青年时代曾在普鲁士军队里当过一年炮兵，学到了一些军事知识。1849年德国武装护宪运动期间，他先是在爱北斐特指挥炮兵，组织工兵连，领导了构筑街垒的工作；后来又到处巴登——普法尔茨

的护宪军中，提任维利希的副官，负责部队的装备和后勤工作，还亲自参加了四次战役。这些亲身经历，不仅使恩格斯对军事活动有了一定程度的体验，而且使他对军事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迁居曼彻斯特后，恩格斯开始研究军事科学和军事艺术。为此，他从书商和各国朋友那里搞来了几乎是欧洲所有的军事科学书籍和资料，系统地研究了战争史和军事史，基本战术，筑城原理，野战工事，军事工程，军队组织，给养，医院，不同兵种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各种武器的结构和使用方法，等等。另外，他还设法搜集了各国的军事地图，这是研究欧洲战争史必不可少的工具，据不完全统计，恩格斯为了研究军事科学，先后阅读过 100 位作者的 250 部著作。

作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奠基人，恩格斯一生撰写了大量军事著作。据统计，他发表的有关军事问题的作品多达 240 篇。如果将他写的军事文章和散见于一般政论性著作和书信中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加在一起，总共有 150 余万字，占他全部著作的 1/5 以上。此外，恩格斯还与马克思合写了几十篇军事文章。这些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学说、军事学说，军事思想和军事艺术的整个军事科学体系的基础。

恩格斯把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应用到军事科学上，他认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军事体系和战争方式。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封建社会的军事体系和战争方式，同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军事体系和战争方式。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时代的军事体系和战争方式，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它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和小农摆脱封建枷锁，获得社会和政治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换句话说，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摆脱了封建束缚，他们既可以到招工站报名，把自己投入市场，又可以到招兵站报名，把自己投入战场。这是形成资本主义时代庞大军队的必备条件。

与这一阶段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军备生产能力的增强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这就保证了近代军队能获得足够数量的武器、弹药、食品等军事装备，以及相当数量的相当文化水平的军官和士兵。这样，资产阶级利用它的巨大财富，像雇佣大量工人一样，雇佣了大量的士兵，交战各方也得以使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武装部队投入厮杀。当然，兵员的征集，也并非没有限度，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各国国民经济和人力状况分

析、估算，认为投入战争的兵力最高可达人口的7%。这个数字，在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兵员的众多性是近代军事体系和战争方式的一大特点。

近代军事体系和战争方式的另一特点是战争的运动性。由于士兵众多，武器精良，后勤补给迅速，交通工具更新，战争不像过去那样局限于某一区域内，而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具有过去无法比拟的运动性。战争的运动性与兵员的众多性是相互联系的“运动性是庞大人数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得出结论说：由此构成的“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

这种资产阶级近代军事体系和战争方式，是拿破仑的贡献。恩格斯强调指出：“拿破仑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上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战略和战术发展到那样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不仅不能胜过他，而且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和成功的作战中抄袭他罢了。”近代欧洲各国，包括普鲁士，奥地利，英国实际上都是模仿拿破仑的军事体系和战略战术。

但是，恩格斯又指出，“现代的军事体系不可能

在贫困的，半野蛮的和人口很稀少的国家长期采用”。例如俄国和西班牙都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国家，它们既不适宜普及近代军事体系，近代军事体系也不适宜在那里作战。因为在这样的国家，近代军事体系难以发挥它的全部潜能，这也是拿破仑兵败俄罗斯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也指明了落后国家对付先进国家军事体系的方法：避免正面作战，诱敌深入，坚壁清野，用小股部队袭扰敌人的供应线，使其庞大的战争机器无法发挥威力，甚至受困于异国而无法动弹，不得不撤退。

恩格斯还预言，资产阶级近代军事体系这两大特点，到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时，还会进一步发展。他明确指出：“也正如像无产阶级革命在工业上不是消灭蒸汽机，而是增加它的数量一样，在军事上，它的任务也不在于减少军队的众多性及其运动性，而恰恰相反，在于把两者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执行暴力的工具是军队，但是军队这个工具是受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力量的制约的。恩格斯指出：“目前，暴力是陆军和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是需要巨额的金钱的。”即金钱铸造暴力。这就是恩格斯经济力量决定暴力强弱的理论。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战争无

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恩格斯完全赞同一命题，他在观察军事问题时，往往同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加以考虑，从而，揭示了隐藏在战争舞台后面更为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斗争。

恩格斯在论述普法战争时，从政治角度分析了法国失败原因，普法战争前夕，法国政治腐败、混乱，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的统治陷入危机，为转移人民的视线，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拿破仑三世挑起了对普鲁士的战争。此时普鲁士国内政治稳定，各派政治势力为全国统一团结一致，再加上军事制度先进，毛奇指挥得当，使普鲁士军队一开始即获得胜利。

初战失利后，拿破仑三世本应重新集结力量，准备新的大会战，但他为了顾全面子，表示他还有力量与普军周旋，仅仅从政治斗争需要而不是从军事战略需要来决定行动，结果遭到了更大的失败。恩格斯指出：“全部计划看来是这样轻率，以致只能解释为出自政治上的需要。”“这不是战略家的计划……这就是第二帝国的全部丑态。装作平安无事，掩饰失败，这是最主要的，拿破仑孤注一掷，终于失败了。”结果，麦克马洪元帅在色当战败，拿破仑三世被俘，逃往瑞士边境的巴森兵团也最终投降。这是近代史上典型的因为政治原因挑起战争，又因为政治上的

需要而不顾战场形势进行军事赌博的典型战例。

在分析近代英国政府机构对军队的制约和影响时，恩格斯指出，这是因为分权而不分工所造成的危害。英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出现独裁统治，反对一个人或少数人掌握军权，对军队的征召、训练、调遣、供应、运输进行分权管理。如要对军队进行调动，需要有军队总司令，炮兵总监，军事大臣，财政大臣和陆军大臣共同参预和合作，否则便不能行动。这种体制，在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往往不能作出及时的反应。恩格斯指出：“显然这种制度产生于防范常备军的立宪措施。它以缩小军队的机动能力到最低限度的分权来代替可使军队具有最大灵活性的分工。”要调遣，就“必须取得五个人的全体同意”。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与英国的政治结构关系重大。

恩格斯经常指出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腐败给军事行动带来严重恶果。在分析意奥战争时，恩格斯指出：“奥地利的军需机构也和奥地利的行政机构一样，是行贿受贿和营私舞弊的巢穴……对于四边形的要塞区的要塞来说，奥地利行政机构可能是比意大利炮兵更为危险的敌人。”在分析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原因时，恩格斯又指出：“革命前的军队的不灵活，正是封建制度的反映，仅仅运载军官财物的

行李车辆本身就阻碍了一切运动……到处被掠夺和被撞骗的俄国军队却真正的挨饿，兵士在行军中像苍蝇似的一群群死去。”

恩格斯将政治的各个方面与军事联系起来考察，使他更能客观地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准确地指出战争形势的变化甚至最后的胜负。

军队是战争的最主要角色，恩格斯对影响军队战斗力的诸因素如军队的征召、编制、训练、纪律、作风、士气、武器、装备，后勤给养等方面都极为重视，并将其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恩格斯通过对各国兵役制的比较研究，认为征兵制比募兵制要好，可使兵源更有保证。在役与训练时间短，而预备役时间长的制度，将使兵源在总数上相应增加。这样“战时军队的数量将有更大规模的增加，而平时军队的数量将减少；每一个国民都将亲自而不是通过代役兵来参加解决政府之间争端的武装斗争；防御将更加坚强，而进攻将更为困难，因此军队的扩大本身，归根到底将节省开支，并将成为和平的保证”。

恩格斯对新兵训练极为重视，这是他考虑到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成千上万的新战士涌上战场，如何训练他们打仗将成为一个大问题。恩格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采取拿破仑一世组建新军的办法，

即每一个新兵营，都要有一定数量的老练的军官和士兵，每个连队都要有一些老兵，使新老战士相结合，这样组成的新军，一个月就可以投入战斗。也只有以这样的速度组织军队，才能适应战争的迫切需要。

恩格斯很重视军队的气质和作风，认为这是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详细分析了各国军队的特点。英国军队经验丰富，作战勇敢，沉着冷静，它常常靠发挥这些优势取胜，在危急时刻也能减少损失。普鲁士军队坚韧不拔，作战英勇，“常常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作战，并且几乎每次都是进攻者”。法军曾是欧洲军队的典范，但法兰西“虽然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不是一个善战的民族”。这个浪漫的民族在普法战争中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和荣耀。美利坚民族太看重生命，在南北战争中双方军队“彼此都害怕对方，并且像害怕失败那样害怕胜利”。至于俄国军队，恩格斯认为那是一支庞大、笨拙、野蛮、缺少近代训练和很不机动灵活的部队。他嘲笑俄军“前进，前进，再前进——这应就是所能做的一切。这一个稠密的人群，由于非常密集，当然就成了炮兵求之不得的最理想的射击目标”。恩格斯同时也指出，俄军中老兵很多，因此有一种传统的凝聚力，在战败时也不会溃散。

恩格斯十分重视纪律对军队的重要性，他指出：“虽然民族热忱对战斗有巨大意义，但是如果缺乏纪律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抢劫、掠夺、烧杀、奸淫是破坏军队纪律的主要行为。恩格斯强调说：“军队一旦任其抢劫，就永远变样，将军的任何命令和威信都无法使它恢复原状。”

在人与武器的关系方面，恩格斯更加重视人的因素。他在《步枪史》一文中明确指出，“军界的舆论改变了，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到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因为“这些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利的手来使用它们”。

但恩格斯并没有忽视军事装备和军事手段的重要性。在研究克里米亚战争时，恩格斯就指出，英法联军使用的米涅式步枪比俄军的步枪杀伤力大得多，这是导致俄军在战场上败北的一个重要原因。米涅式步枪是一种有来复线的后膛枪，一发子弹可射穿四五个人，而俄军使用的步枪只能勉强射穿一个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恩格斯对部队的后勤供应问题，也予以高度重视。特别是近代战争，参战人数多，消耗大，后勤供应更为重要。他认为1870年法军被普军所击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后勤供应出现严重问题。“部队已经出击，但连必要的行军地

图也没有，弹药和粮食供应也跟不上军队的进军步伐。部队缺少行军水壶，行军锅和其他行军装备；肉是腐烂的，而面包又常常是发霉的”，所以恩格斯说“第二帝国的军队在此以前已经由于第二帝国本身而遭受了失败”。

恩格斯不仅注意研究军事理论，而且也十分重视研究作战方法和军事艺术。当时，在资产阶级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中有一种普遍性倾向，就是把武器的优劣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而不注意研究作战理论和战争艺术，对此，恩格斯指出：“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他强调在武器不断改良的情况下，更要注意对军事理论和作战方法的研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先进武器的威力。“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每个在战争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

战略决策，是军事上的头等大事。正确的战略，是军事行动胜利的保障，即使暂时处于劣势，也有胜利的希望；如果战略决策和判断失误，即使处于优势地位，最后也可能失败。所以，恩格斯强调军事家要

有战略眼光，如果“在战略上犯了错误，那就是很难避免错误的成果”。

确定战略方针，既要从敌我双方军事对比来考虑，又要从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及地理环境来考虑。在分析美国南北战争时，恩格斯指出，在战略上，南军利于速决战，而北方利于持久战，这是因为南军训练有素，兵力雄厚，且蓄谋已久，而且南方人口少，工业基础薄弱，南方没落的奴隶制度又遭到人民反对，所以只有速战速决；北方军队势单力薄，仓促应战，但北方人口比南方多一倍多，集中了全国大部分工业，为反对奴隶制和维护联邦而战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可以持久。后来，南方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后，只能等待失败的到来。战争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恩格斯的论断。

在分析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指出，拿破仑的失败，主要在于他做战略决策时忽视了俄国的社会条件和地理环境，把近代化的战争机器陷入到经济落后而又土地辽阔的泥潭中。先进的战争机器威力无法发挥，而漫长的战线又使后勤补给发生困难，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战略计划和战略方针一旦确定下来，就要坚决执行，首先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即抓住“交战之利”。恩格斯以欧洲战争的一些实例，深刻地论述了

首战的重要性：如果战略得当，首战告捷，可鼓舞士气，为最后胜利奠定基础；如果战略错误，而首战告捷，可趁机调整战略部署，挽回颓势。

1859 年的法、撒对奥战争，奥地利军队率先向撒丁王国宣战，但奥地利军队没有利用在意大利北部战场上自己的兵力优势和地形优势，没有及时给予尚未得到法军支援的撒丁王国军队以决定性打击，反而在开战初期的两周内按兵不动，坐等撒丁王国的军队和法军集结完毕后再与之决战，结果大败而归。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奥军这种先机之失的错误。1870 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军重犯了奥军 1859 年的错误，坐失了取胜的良机，当时恩格斯就指出：“在本周末法皇将面对数量占优势的敌军，如果说上周他想前进而不能够，那么现在他既不能前进也不想前进了。”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结果已经一目了然。

对于当时爆发的各种类型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恩格斯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双方是否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是否充分利用了一切可资利用的有利条件，是否力求回避和弥补自己的劣势和不利因素。恩格斯认为这也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之所在。

恩格斯指出，无论是占据地形险要的优势，还是据有士气旺盛的优势，或是拥有精良武器和后勤供应的优势，都应当善于运用和发挥这些优势，并将优

势转化为胜势。对自己的短处和不足，则要力求回避，避免以己之短攻人之长。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军队新兵较多，针对这一情况，恩格斯指出，北军不宜过早与南军决战，应该让这些新兵多打些小仗，具有一定战争经验之后再投入会战。

战争中，总要有进有退。恩格斯告诫说，退却一定要朝着于自己有利的方向，而不能盲目逃窜。在普法战争中，战败的麦克马洪兵团沿着法比边境盲目退却，而保尔巴克兵团则沿着法瑞边界退却，最后都因走投无路被迫投降。当时，如果这两个兵团向法国腹地退却，既可以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又可得到法国人民的支持，完全可以长期抵抗下去，避免法国历史上耻辱的一幕。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仗，这种战略历来为聪明的战略家所运用。恩格斯也指出，无论在战争、战役还是战斗中，都要尽量避免兵力分散，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

恩格斯称赞拿破仑一世善于集中兵力，批评拿破仑三世总是分散兵力。他在一篇评论克里米亚战争的文章中，谈到英法联军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围攻时，嘲讽说：“假若拿破仑看见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架起 8 英寸和 10 英寸口径火炮队，他定要哈哈大笑。”拿破仑不会笑别的，一定会笑他侄儿指挥的

联军不把炮火集中起来进行攻击，却将火力分散，向长达 3 英里以上俄军设防的正面垒墙上炮击，不仅白白浪费了许多炮弹，保垒也未能攻下来。

恩格斯指出，奥地利军队在同法撒联军作战时，因兵力分散而失败；美国南北战争中，南部军队因兵力分散防线屡屡被联邦军队所突破；英军在镇压印度民族起义时，也因分散兵力而多次受挫。所以，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有希望取得胜利”。

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唯一手段。因此，恩格斯十分重视对进攻战所涉及的问题的研究。

恩格斯指出，当一方分散兵力防守时，另一方应毫不犹豫地集中兵力进攻；当一方兵力尚未集中或正在集中时，另一方应不待对方集结完毕而迅速“直接插到正在集中的敌军之间”，这是拿破仑最出色的有效战法之一。“在敌人兵力还没有完全集中以前直接扑向敌人，攻击并粉碎敌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计划”。

即使是被围困期间，也不应消极防御，也要适时地选择突破口，主动出击，扰乱敌方的进攻计划和步骤，等待战场形势的变化或援军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对于如何击退围困之敌，恩格斯还提出了一种

进攻方法，这就是攻击和截断对方的后方交通线和补给线。恩格斯确信：“交通中断几天，就会使围攻军在几个星期内受影响。”普鲁士军队围困巴黎期间，几十万人屯于巴黎郊外。恩格斯断言，“交通线情况的好坏”，是普军“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法国军队来说，截断普军交通线，是解救巴黎的“最容易的一种方法”，这就会使普军不得不比他们“坚决地”前进时，还要更加“坚决地”退却了。然而，巴黎的“国防政府”并没有恩格斯那样的战略眼光，他们整天所想做的是如何与普鲁士妥协。

与进攻相对应的是防守，这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有进攻就会有防守。在防守中，山川河流、湖泽、关隘、要塞是重要的防御工具和手段，恩格斯在一系列论文中，都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

比较大的河流和山脉的分水岭往往是国家间的边界，这与大规模的近代战争有关。恩格斯在《波河与莱茵河》、《萨瓦亚·尼斯与莱茵》等文章中指出，奥地利坚持以意大利北部的波河作为与意大利边界，法国坚持要求以德国西部的莱茵河和意大利西北部的萨瓦亚尼斯山区为国界都是从防御上考虑的。

对于要塞的重要性，恩格斯也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他多次举例说，拿破仑横扫欧洲，所向无敌，

只有两座要塞阻止了他的前进步伐，一座是意大利北部的有“意大利锁钥”之称的曼都亚要塞，另一个是波兰的但泽要塞。而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塞瓦斯托波尔营垒的命运”，这座要塞失陷后，沙俄才被迫屈服。

一个国家的首都是否设防，这在当时军界和军事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只用一个月时间就横扫法国东北部，直逼巴黎城下。但几十万普军围攻巴黎数月，却无所作为。据此，恩格斯指出“巴黎的筑垒工事……已为法国作出了这样巨大的贡献”，国家首都是否设防“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肯定的解决了”。巴黎“无疑比以往任何一个要塞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大”，“对巴黎这样一个要塞的真正围攻在全世界所引起的激动，比对一百个较小的要塞的围攻所引起的激动要大得多”。这里，恩格斯强调了首都设防的政治意义，即有利于动员本国人民的家园情绪和抵抗情绪，同时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战争的政治解决。

19世纪，除了国家之间的常规战争外，还出现了人民起义和民族起义，恩格斯在肯定这些特殊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的同时，也对起义军的作战方法和战略战术进行了研究。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恩格斯提出：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就是，“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进攻……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

恩格斯在研究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起义之后认为，“民族起义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会战，而在于进行游击战争，防守城市和切断敌人交通线”。“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企图以大量人员在平地上作战，他们就容易被击败；然而在村庄和城市内在街垒和没有枪眼的房屋掩护下作战时，他们却能进行顽强抵抗。

在论述 1847—1859 年印度民族起义时，恩格斯说：“起义者到处游荡。”他们的优点就在于这种不规则的作战方法。他们在行军方面优于英军，而英军在

战斗方面优于印度民族军。在谈到英国驻印度派遣军总司令坎贝尔的狼狈情景时，恩格斯兴奋地说：“对他来说，起义者是太神速了。起义者到处都是，只是他要去搜寻的地方就没有了；当他以为在前面碰上他们时，他们却又绕到了他的背后……士兵使他不平地奔波……这样的队伍能够经得起多次失败而不致于丧失士气和兵力。”

当交战双方势均力敌时，双方主帅的素质将决定战争的胜负。恩格斯对近几个世纪驰骋在欧洲战场的将帅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对拿破仑，克劳塞维茨，毛奇和加里波第给予了较多的肯定。他通过对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的有趣的对比，充分说明了军队统帅的素质与战争胜负的关系：

“这种情况，真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拿破仑打击的是同他作战的那些国家的心脏；今天的法国攻击的却是德国的偏僻的地方。希望不寄托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寄托在成功的突击、奇袭和冒险上面。第一和第二法兰西帝国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整个差别就在于这种策略的不同。拿破仑惯于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现代欧洲各国的首都。而他的继承者则以各种借口——保护教皇，保护苏丹，保护希腊国王——把法国的守备部队分驻在古代欧洲各国的首都：罗马、君士坦丁堡和雅典……拿破仑的秘诀在于

集中，而他的继承者的秘诀在于分散……。”拿破仑获得的是一个一个的胜利，而他的继承者得到的是一系列的惨败。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奠基人，他所创立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方法至今仍有很大价值。

威廉·李卜克内西后来在回忆恩格斯时说：“恩格斯似乎生来就应该是一个军人，他能料事如神，随机应变，明察秋毫，当机立断，沉着冷静。”他的军事著作，“得到第一流职业军事家的好评，这些人根本料想不到小册子的匿名作者竟是一个十分可疑的叛乱者……如果他在世时再一次发生革命，那恩格斯一定就是我们的卡诺，是我们军队和胜利的组织者，军事思想家”。

恩格斯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公认，很多军事杂志和报刊约他撰稿。马克思对自己战友的军事才能十分叹服，称他为“曼彻斯特的陆军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中的战友们称他为“将军”，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称他为我们的“总参谋部”。

第十五章 朋友和家庭

贫困简直要置马克思和他的
一家于死地，如果不是恩格斯经
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
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
死于贫困。

——弗·伊·列宁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基本上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这首先是由当时的客观形势造成的，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欧洲大陆，大批革命家被当局通缉，流亡异国他乡，他们散居各地，很难聚会。

另外，还有一批流亡者不知自重，把流亡当作一种营生，庸俗无聊，争吵不休。他们有的把革命当作游戏自娱，有的带着募捐的钱袋到处乞讨。恩格斯和马克思坚决与这样的人断绝了关系。恩格斯在1851年2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从现在起，我们只

对我们自己负责，而当这些先生们用得着我们的时刻来临时，我们就可以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在这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安宁。当然将不免有些孤独，但是，我的天，我在曼彻斯特三个月来已经尝过了这个滋味，而且已经习惯了。”

当然，说恩格斯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并不是说他与世隔绝，更不是从政治上隐退。尽管商行里的琐碎事务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他还是尽力与自己“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朋友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和联系。

与恩格斯联系最密切的无疑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与战友马克思。由于谋生的需要和从事革命理论研究的需要，这对亲密的战友被迫分居两地长达 20 年之久，使得他们无法“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他们只能通过信来加强彼此间的联系，来往于曼彻斯特和伦敦之间的书信，有时是一天一封甚至一天数封。目前保留下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这段时间的通信有 1300 多封，这些书信是关于两人友谊的非常动人的见证，使很多人感到吃惊的是两位伟大人物的感情竟是如此的细腻。

有一次，恩格斯被商业事务所缠身，一连三星期未顾上给马克思回信，马克思心急火燎，忧心忡忡地写信询问说：“亲爱的恩格斯：你是在哭还是在笑？是

在睡觉还是醒着？最近三个星期，我往曼彻斯特寄了各种各样的信，却没有收到一封回信。”另一次，马克思因病卧床休息，一个多月没给恩格斯回信，恩格斯也同样为马克思担心。他在信中说：“老摩尔（“摩尔”是马克思的家人和朋友对他的爱称——引者注）老摩尔，大胡子的老摩尔！你出了什么事，怎么听不到你一点儿消息？你有什么不幸，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病了？还是陷入了你的政治经济学的深渊？还是你已任命了小杜西（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马克思——引者注）做你的通信秘书？还是别的什么？”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革命事业上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的朋友。1857年5月，恩格斯因过度劳累而病倒，几个月不能工作，马克思十分担心恩格斯的健康。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你可以相信，不管我们如何不幸，我和我妻子对你最近健康情况的消息比我们自己的事更为关切。我对你的病有好转感到非常高兴，可是想到你又要去办事处，而且就在这个星期，真是使人担忧。要知道，从你病的整个过程来看，你应该已经看出，你的身体需要巩固，休息和暂时摆脱办事处的一切杂务，你必须尽快地去海滨。如果在这紧要关头你这样孩子气……那是不可原谅的。”

恩格斯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到海滨疗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先到利物浦附近的滑铁卢镇，后又去了威特岛和泽稷岛。即便如此，马克思仍不放心，他甚至专门花费一段时间研究医学，以帮助恩格斯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1857年10月，家里境况稍为好转后，马克思到威特岛去探望了患病的朋友。

19世纪50年代，是马克思一家生活最为艰难的时期，困苦的生活先后夺去了他4个儿女的生命，有的是刚生下来就死了。对马克思打击最大的是8岁的儿子埃德加尔的病逝。1855年4月6日，埃德加尔在病情几经反复之后，终于未能抵抗住病魔的侵袭，在马克思的怀中离开了人世。这个孩子是全家的骄傲和灵魂，曾使家中充满生气，他死之后，家里完全空虚了，冷清了。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为了减轻马克思夫妇的丧子之痛，恩格斯盛情邀请他们到曼彻斯特，换一换环境。马克思夫妇在恩格斯家中住了三个星期，在恩格斯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了最痛苦的日子。

然而，更经常折磨马克思的是贫困问题。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经常坦率地承认自己面临的困境。这时，恩格斯总能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从经济上帮助马克思，维持其家庭的正常生活，这也是恩格斯赴曼彻斯特经营“该死的生意”的初衷。恩格斯刚到曼彻斯特时，父亲每年只给他 200 英镑的生活费和交际费，恩格斯一般要从中挤出几十英镑给马克思。几年后，恩格斯的收入增加了，他寄给马克思的钱也随之增加。几乎每个月，甚至每星期，都有一张一英镑，二英镑，五英镑或十英镑的汇票从曼彻斯特寄到伦敦。到 60 年代中期，恩格斯基本上可以保障供给马克思一家人的生活补助费，到 60 年代末期以后，恩格斯每年固定资助马克思 350 英镑，使马克思从贫困中摆脱出来。正如后来列宁所说的“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己相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

恩格斯的舍己相助，也使马克思深为感动，同时也深感不安，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他多次向恩格斯表示对“经常榨取你的钱包”感到过意不去。对此，恩格斯则表示这是互相帮助，

“完全不在于谁在某个时候是‘榨取者’或‘被榨取者’，这种角色是会再调换的。”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无私援助，已远远超过个人友谊的范畴。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当时几乎是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并肩屹立，坚持不懈地献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对恩格斯来说，帮助马克思免于饥饿和贫困，就是保护了无产阶级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使他能够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研究；对马克思来讲，接受恩格斯的援助，也是为了两人共同为之献身的事业的需要。正如梅林所指出的：“只是根据这一点，恩格斯才作出自己的牺牲，而马克思才接受他的牺牲。作出这样的牺牲和接受这样的牺牲，都同样需要崇高的精神。”

恩格斯和马克思深感分居两地的不便，所以，他们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相聚。恩格斯往常到伦敦马克思家过圣诞节和新年，在去欧洲大陆旅行或经商时，也尽量路过伦敦，在马克思那里多逗留几日。马克思到曼彻斯特去的机会不多，但每去一次都要呆较长时间。1855年秋天，为躲避债务，马克思在恩格斯家住了三个月。

每当恩格斯来信说要到伦敦时，马克思全家都兴高采烈总是谈论这件事。当恩格斯要来的那一天，马克思更是烦躁不安，甚至把工作都撇在一边，不停

地到门口张望。恩格斯一到，两个朋友就抽着烟，喝着酒，通宵地谈心，谈他们上次分手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

恩格斯还把他的友情扩大到马克思全家，马克思的孩子都把恩格斯视为第二个父亲。她们常常在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写上几句俏皮话，或画上一张画寄给恩格斯。

对恩格斯和马克思来说，友谊绝不等于没有矛盾和分歧，不过大多数分歧都能很快消除。例如，马克思曾埋怨恩格斯，说他为了个人的爱好去研究许多科目，分散了精力，“不是考虑到为人类工作”。恩格斯则针锋相对：“我倒很乐意烧掉好几年来使你不能写完《资本论》的那些关于农业的俄文书刊。”这些俄文书刊是彼得堡的一个俄国友人寄给马克思的，书中的内容是农业统计资料，揭露了俄国农村中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资料有助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但由于他不懂俄文而长期无法利用。两人通过辩论和交锋，最终马克思妥协。类似情况还很多。在这种绝无仅有的人类友谊中，他们各自保持着独立的自我和自己的观点。但是，这并非他们纯真友谊中的瑕疵，只有了解了这些分歧的前因后果，才能认识到这对良朋与战友内心的伟大。

由于疏忽大意，两人的友谊甚至还出现过一次

大的危机。1863年1月6日，恩格斯的夫人玛丽·白恩士突然病逝，第二天，恩格斯便通知了马克思。但是，此时的马克思正处困境；债主不停地逼债，孩子们没有鞋和衣服穿，甚至没有钱购买食品，所以马克思在回信中只表示了意外和震惊，而没有说安慰的话，接着又诉说了自己的不幸。

马克思的回信使恩格斯感到生气和伤心，他对马克思“冷冰冰的态度”感到失望。他说：“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

实际上，马克思及其全家对玛丽·白恩士去世同样感到悲痛，只是在信中没有表达出来。考虑到恩格斯的情绪，马克思在过了10天后才又去信解释，“从我这方面来说，给你写那封信是个大错，信一发出我就后悔了。然而这决不是出于冷酷无情。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可以作证：我收到你的那封信时极其震惊，就象我最亲近的一个人去世一样。而到晚上给你写信的时候，则是完全处于绝望的状态之中。”这封信消除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误会，使他不致于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

这两位伟大人物的交往并不总是严肃地谈论政治问题，严肃之余，也不乏诙谐。一次，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谋事在男人，成事在女人。昨天晚上我给你整理出一包《未来报》，还有伯恩哈特·贝克尔关于拉萨尔的一篇文章，可是今天早晨她们把房间收拾了一番，我就把这件事忘了。”爱琳娜·马克思后来曾回忆说：“特别使我忘不了的是：有时摩尔读着恩格斯的来信，笑得流出眼泪来。”

确实，恩格斯与马克思的通信充满了无限幽默。几十年后，当马克思已经去世，恩格斯整理他们的通信时，他对老战友贝克尔说：“过去的日子和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许多愉快的时刻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想起这些往日的经历，我常常笑得流下泪来。我们的幽默是我们的敌人永远不能夺走的。”当一个德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在‘忧伤的马克思’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时，恩格斯斥责说：“这些蠢货要是有机会读一读摩尔和我的通信，简直会惊讶得目瞪口呆。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泼辣而欢乐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儿戏而已。摩尔有时会狂怒，但从来不消沉！我重读旧稿，总是笑得前仰后合。”

这就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另一面，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恩格斯和马克思。

除了马克思外，与恩格斯保持较密切往来的还

有几位“政治和学术上”的朋友。在曼彻斯特，恩格斯最亲密的朋友是威廉·沃尔弗。他比恩格斯大11岁，出身于农奴家庭，20岁考入布勒斯劳大学，毕业后当家庭教师和新闻记者。他经常发表文章揭露农奴主，资本家和封建官僚体制的罪行，因而受到当局的迫害被迫流亡国外。

1846年4月底，沃尔弗流亡到布鲁塞尔，他几乎是一到那里就参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各项政治活动。第一次见面后，恩格斯很快便与沃尔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终生的朋友。后来他在回忆与沃尔弗第一次会晤的情况时说：“第一眼看到他，我们并没有料想到，这个外表并不出众的人，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物，没过几天，我们就同这位新的流亡伙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结交的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在古典学校里受到良好培养的才智，他那丰富的幽默，他对艰深理论问题的清楚理解，他对人民群众的一切压迫者的憎恨，他那刚毅而又沉着的气质，很快就展现了出来。但是，只有在斗争中，在胜利和失败的时候，在顺利和不利的时候，经过多年的共同活动和友好交往，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他那坚韧不拔的性格，他那无可怀疑的绝对忠诚，他那对敌，对友，对己都同样严格的，始终如一的责任感。”

在布鲁塞尔，沃尔弗与恩格斯一起参加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参予了正义者同盟的改组，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他又与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战斗在《新莱茵报》编辑部。1848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到瑞士，50年代初又来到英国。在伦敦谋生失败后于1853年9月来到曼彻斯特，并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

恩格斯为在自己身边多了一个战友而欣喜异常，他积极帮助沃尔弗联系工作，并最终给他找到当家庭教师的固定职业。沃尔弗的教学才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使他的生计完全得到了保证。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只能与沃尔弗在一起时才能谈论党的事务，并能得到他的忠告和建议。正如后来恩格斯所说：“在许多年内，沃尔弗是我在曼彻斯特的唯一同志；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在那里又经常有机会赞赏他对当前事件的几乎本能地准确的判断。”

1864年4月，沃尔弗得了重病，恩格斯每天都去看望他，守护在床边。4月底，医生认为病情已经无望。恩格斯紧急致信马克思。5月3日，马克思也来到曼彻斯特。但沃尔弗已无法抢救，于5月9日逝世。沃尔弗的病逝，对恩格斯是一个沉重打击。他说：“马克思和我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德国革命失去了一位价值无比的人。”

马克思被沃尔弗指定为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继承人。由于马克思正忙于《资本论》的写作，所以由恩格斯负责安葬仪式和清理遗产。最后，恩格斯将沃尔弗的遗产共 800 英镑给了马克思。

在曼彻斯特的头几年，有时到恩格斯家做客的还有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恩格斯和维尔特相识于 1843 年，他们一起接受了 1848—1849 年革命的洗礼。革命失败后，为了谋生，维尔特先是在汉堡后又在布莱德弗德经营商业。刚到曼彻斯特时，恩格斯曾给维尔特写信诉说他那单调乏味的工作，维尔特回信安慰他说：“时间固然宝贵，前途更为重要。你讨厌曼彻斯特，这很好，因为讨厌的事情能使人生财，而愉快的东西却从来没能使人发财。钱是唯一能使我今后感兴趣的东西。”

从 1850 年起，维尔特一直在一家贸易公司担任推销员，他经常为商务而外出旅行，与恩格斯经常是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不能见面，一旦畅聚倍觉亲切，维尔特到过的地方很多，他走遍了南美、北美和中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他骑马越过了帕姆帕斯草原，登上了秦布拉索峰，在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海岸度过了不少时光。他见得多，经历多，观察也多，听他谈话是一种享受。他虽然已不再写小品文，但却在口述它们；这样，听的人可以看见他生动的模仿和面部的表

情，听到他充满热情的笑声。

1855 年秋天，马克思为躲避债务在恩格斯家住三个月，恰好维尔特来拜访恩格斯，三位老战友一起度过了非常幸福的几天，但是，这是他们与这位诗人最后一次见面。因为维尔特总是幻想着西印度群岛的热带风情，第二个月就乘船去了那里，从此永远没能回来。黄热病夺去了诗人的生命，1856 年 7 月 30 日，维尔特在海地与世长辞。

噩耗传来后，恩格斯和马克思都非常悲痛。马克思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称“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恩格斯打算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悼念文章，向这位“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致敬，但当时他无法使任何一家德文报刊登载这篇悼文。21 年后，恩格斯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格奥尔格·维尔特》一文，介绍了维尔特的生平，缅怀了昔日的友情。

恩格斯无论是在政治活动还是私人友谊上一直同厄内斯特·琼斯保持着密切联系。琼斯是英国宪章运动左翼的领导人，在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和宣传家。恩格斯帮助琼斯创办了杂志《寄语人民》，并定期为该杂志撰稿。琼斯只要到曼彻斯特作短暂停留，总要与恩格斯会晤，征求他对宪章运动的意见。

恩格斯对琼斯的政治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的巨大功绩是宣传《共产党宣言》的思想。1869年，琼斯英年早逝，年仅50岁，恩格斯将这一消息通知了马克思，说琼斯是“政治家们实际上完全站在我们方面的唯一有教养的英国人”，“在曼彻斯特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工人当中代替他”。他的逝世，使我们“又失去了一位老朋友”。

50年代末，恩格斯的交际圈子里又增加了几位新朋友，主要有德国医生龚佩尔特，化学家肖莱马和经济学家穆尔。

1848年革命前，爱德华·龚佩尔特是布雷斯劳一位很有名望的医生，作为正直的民主主义者，他在革命失败后也流亡到曼彻斯特，并在那里开办了一家诊所。恩格斯有时找他看病，由于政治观点相近，所以很快就成为要好的朋友。恩格斯经常到龚佩尔特家做客，他那爽朗、幽默的性格博得了龚佩尔特家庭每一个成员，特别是孩子们的好感。每逢圣诞节前夕，恩格斯总要带着孩子们到戏院观看专门为儿童演出的传统节目——哑剧。

在龚佩尔特看来，恩格斯不仅是一个可靠的朋友，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他经常阅读恩格斯送给他的作品，并与恩格斯一起探讨社会问题。经恩格斯介绍，龚佩尔特又认识了马克思，他

给马克思作过诊断，还根据恩格斯提供的病情，给远在伦敦的马克思寄去治疗的药方。马克思和家人去曼彻斯特，好几次都是住在龚佩尔特家中。

1870年，恩格斯迁居伦敦后，他与龚佩尔特保持着书信往来。1892年底，他得知龚佩尔特由于患严重心脏病，已无法行医时，立刻向他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而且，恩格斯提供经济支援的方式非常得体，好象在报答龚佩尔特过去对自己的关照。龚佩尔特将其称为“你用天才方式送给我的礼物”。

恩格斯同卡尔·肖莱马相识是在60年代初期。肖莱马是著名的化学家，同时又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肖莱马出生于1834年，比恩格斯小14岁，在有机化学和理论化学领域颇有造诣，尽管他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但对人一直非常谦虚，恩格斯称他是“世界上最谦虚的人，因为他的谦虚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的意义的正确认识上的”。

难能可贵的是，肖莱马不仅热衷于科技发明，而且也十分关心各国的工人运动，他是第一国际最早的成员之一，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成员。

恩格斯与肖莱马的交往，两人都从对方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恩格斯从肖莱马那里充实了自己在化学领域的知识；肖莱马在恩格斯那里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恩格斯迁居伦敦后，同肖莱马继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不间断的通信外，肖莱马经常到伦敦恩格斯的家中做客。1888年，两人携手游历了北美，1890年又一起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旅行。1892年6月，肖莱马不幸在曼彻斯特病逝，恩格斯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位忠实的朋友和同志墓前敬献了花圈。7月3日，他在《前进报》上撰文，给肖莱马很高的评价，他写道：肖莱马“早在拉萨尔在德国崭露头角之前，就已经是个共产主义者了，”作为化学家，“他在他的专业——单烃化学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威，”在政治方面，“肖莱马无疑是整个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仅居马克思之下的最著名人物”。

赛米尔·穆尔也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为数不多的政治上的朋友，而且，他们的交往可称得上是忘年交，因为1863年两人相识时，穆尔还只是一个刚从剑桥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学生，年仅25岁。穆尔对经济学十分感兴趣，这也是他与恩格斯结识的桥梁。

穆尔十分钦佩恩格斯待人真诚，而且知识渊博；恩格斯则十分欣赏穆尔的聪明才智，他称穆尔是一个“具有本民族的一切优点而没有任何一点缺点的典型的英国人”。

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后，穆尔承担了把这部巨著翻译成英文的艰巨工作，马克思去世后，穆尔完

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大部分翻译工作，他工作严谨，翻译准确，得到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恩格斯对穆尔十分信任，指定他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之一。在恩格斯的葬礼上，致悼词的就穆尔。

在曼彻斯特时期，恩格斯与父亲和兄弟们之间的关系已有所改善。老弗里德里希曾多次到曼彻斯特检查公司的事务，有时也与儿子住在一起，为避免冲突，两人绝口不谈政治。此时他们的父子关系，除了血缘上的感情外，更多的是礼节上的往来。

恩格斯与母亲的关系一直十分亲切，他与父亲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母亲从中调解。1856年，恩格斯曾陪同母亲游览伦敦城，给母亲充当向导和解说，母子一起享受了难得的天伦之乐。老太太甚至半开玩笑的忠告儿子：“不要喝太多啤酒和红葡萄酒了，以免我将来看到你有一个英国人的红鼻子。”

1860年3月中旬，恩格斯得到父亲病重的消息，他决定立即回国。然而，因为1848年革命期间的活动，当局对恩格斯的指控尚未撤销，他不能进入德国。恩格斯的母亲和兄弟们，甚至在王宫中担任宫廷牧师的舅父接连向当局提出申请，要求给他两个星期回家的权力。当普鲁士内务大臣批准这一请求时，恩格斯的父亲已经离开人间了。恩格斯在父亲逝世两天后，于3月22日才能动身前往巴门，处理父亲

的后事。

父亲的去世使恩格斯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按英国的法律规定，一个股东去世后，他的继承人不能立即在公司得到继承权。因此，大事小情都要同主要合股人——哥特弗利德·欧门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一处理完父亲后事，就匆匆赶回曼彻斯特，准备与哥特弗利德谈判。5月，恩格斯弟弟埃米尔受家庭委托，也来到曼彻斯特帮助恩格斯进行谈判。恩格斯的母亲打算继续经营这家公司，并让恩格斯在她的保护下成为英国公司的继承人。

经过谈判，最后签订了新合同，恩格斯从父亲在德国的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企业中拨出1万英镑的资本给欧门—恩格斯公司，恩格斯继续留下来担任公司的职员，分取一定红利，4年之后成为公司的股东。

另外，恩格斯还有权得到父亲在巴门和恩格耳斯基尔亨公司的利润。1860年底至1861年初，恩格斯的几个弟妹为遗产发生了争执，他们终于联合起来共同对恩格斯。他们借口恩格斯对商业不重视，坚持要恩格斯放弃恩格耳斯基尔亨公司的遗产，并说恩格斯以后会成为哥特弗利德的合股人，从恩格耳斯基尔亨拨去的1万英镑也是属于他的。他们起草了契约，复制了八份，寄给恩格斯，要他签字。这样处理遗产对恩格斯是不公平的，也是十分不利的。为

了不让年迈多病的母亲因家庭遗产纠纷而黯然神伤，恩格斯强忍着忿怒和悲伤签署了这份契约。他写信给母亲说：

“亲爱的妈妈，为了你，我克制住了这一切以及许多其它事情。世上的任何东西都丝毫不能使我让你在晚年因家庭遗产纠纷而黯伤……我愿意作出牺牲顺着你的愿望来解决一切。因此我也不多说什么，就签署了这个文件。决不让这样的问题再烦扰你，惊动你。我不会为此生弟弟们的气……甚至不愿意再对他们提起这件事。我认为这件事算结束了，我也不打算夸耀我认为我所作的牺牲……我知道在每次谈判的时候，你也总是想到了我，并且为我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

他在另一封信中还安慰母亲说：“我还会有成百个别的企业，但是我永远不会有另一个母亲。”正是出于对母亲的挚爱。恩格斯在 1860 年 5 月又返回巴门，从 12 日至 25 日，一直护理患病的母亲，直到她能起床后，恩格斯才返回英国。

在曼彻斯特，与恩格斯共同生活的是他的亲密伴侣玛丽·白恩士。只有回到他与玛丽共同生活的家，恩格斯才能享受生活的宁静和摆脱世俗的纷扰。他们在海德路 252 号的家，也是恩格斯与“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朋友”相聚的地方。

玛丽·白恩士机智善良，十分和蔼可亲，她以自己整个质朴无华的心灵爱着恩格斯，她为自己这样一个女工拥有一个非凡的和体贴入微的丈夫而感到十分幸福。在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之前，他们很少有时间在一起生活，玛丽还要为恩格斯个人安危担心。1851年后，尽管他们能长期生活在一起了，但仍不得不过着“双重生活”。对此，玛丽毫无怨言，在她眼里，她与恩格斯的爱才是永恒。

在曼彻斯特的几年，恩格斯没有到过比伦敦更远的地方。1856年5月，他才与玛丽到爱尔兰作过一次旅行。这次旅行既是恩格斯对爱尔兰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对妻子作的某种补偿。他们周游了爱尔兰将近三分之二的地方，恩格斯以敏锐的眼光看到英国第一个殖民地的社会状况。

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整个整个的村庄荒无人烟，其间有一些较小的地主的漂亮花园，几乎只有他们还住在那里。”这种现象是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造成爱尔兰人大批逃离自己的家园，“爱尔兰人再也感受不到自己是自己国家的主人了”。恩格斯指出，英国人一向吹嘘本国的民主和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

恩格斯对玛丽的爱还表现在对她的亲属关心上，玛丽的妹妹莉迪娅（莉希）长期与恩格斯夫妇生

活在一起，恩格斯还把玛丽的一个侄女艾伦接到自己家中并供她上学，尽管她很多地方令恩格斯失望，特别是滥交一些异性朋友，但恩格斯仍将她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

1863年1月6日晚上，玛丽因心脏病或脑溢血猝然逝世，而此时恩格斯恰好不在海德路，当他在办事处听到这噩耗时，如五雷轰顶，“同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她的死不能不使我深为悲恸”。甚至三个星期后，恩格斯仍然表示，“我感到，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

从此以后，他一到海德路便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心情更是沉重，于是在别处另租了一套房子。

玛丽去世后，恩格斯和莉迪娅相互关心和日益亲近，直到相互倾慕而产生了永恒的爱情。莉迪娅成了恩格斯的第二位夫人。

莉迪娅和姐姐玛丽一样，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青少年时就成为一名女工了。她善良，聪慧，富于幽默感。她还是一位“革命的爱尔兰人”，是芬尼亚运动的参加者。她多次参加曼彻斯特芬尼亚社的秘密活动。拉法格后来回忆说，“有不少芬尼亚社社员把恩格斯家当作避难所，其中有一个企图解救被押赴刑场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领导人，就是由于恩格斯夫人的帮助，才得以从警察手中溜走。”

恩格斯对同莉迪娅在一起的美满生活也十分满意。他曾对德国工人领袖倍倍尔的夫人尤莉娅说：“她对本阶级的天赋的热爱，对我是无比珍贵的，在关键时刻，这种感情给我的支持，比起‘有教养的’、‘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可能给予的总要多些。”

马克思一家人经常到曼彻斯特做客，莉迪娅在招待马克思一家时也总是十分快乐和满怀热情，马克思夫妇也感到与“莉希夫人”在一起非常愉快。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杜西）更是“狂热地赞美曼彻斯特的家，并且坦率地表示希望尽快地回到那里去”。1869年9月，恩格斯夫妇去爱尔兰旅行，还带着马克思的这个小女孩，而从爱尔兰回来后，爱琳娜“成了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激烈的爱尔兰人”。

第十六章 国际的诞生

“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经过 1848 年革命，各国封建势力对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让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调整。因而，整个 19 世纪 50 年代，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依然以稳健的步伐向前发展着，而德意志和美国则以更快的步伐赶超着。

但是“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

劳动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社会对抗。”随着 1857 年的大危机，工人运动在沉寂了十来年后开始复兴。

在法国，许多城市成立了工人互助会，并举行了罢工斗争，迫使波拿巴政府废除了禁止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的反动的《霞不列法》。在英国，按行业组成的工人团体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罢工斗争中结成了工会联合会组织。1860 年 5 月，成立了“工联伦敦理事会”，这实际上是英国工联运动的领导中心。德国的工人阶级也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等组织，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

1864 年 9 月初——10 月初，恩格斯到普鲁士新占领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回来后因忙于处理公司事务，未能立即告诉马克思，而马克思正焦急地等待他，要告诉他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原来，恩格斯在欧洲大陆旅行时，伦敦发生了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了。

创建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开始于 1863 年。1863 年，波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沙俄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得到了各国革命力量的支持，当时欧洲各大

城市都举行了群众大会，抗议沙俄军队对波兰人民的血腥镇压，支持波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7月22日，在伦敦圣詹姆斯大厅召开了声援波兰的大会，法国工人代表托伦、帕拉尚等应邀出席了大会，大会之后，英国工联理事会安排英、法两国工人代表会面，就建立工人阶级国际组织达成了协议，并选出了由工联领袖奥哲尔和克里默等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受筹委会委托。奥哲尔起草了《英国工人告法国工人书》，在1863年11月10日召开的英国工人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后寄往巴黎。

《英国工人告法国工人书》是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写成的，反映了英国工联的主要观点，但是，对波兰人民的斗争，它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波兰的事业由于一个民族的献身，真诚和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而成为神圣的事业”，它还呼吁各国人民的兄弟团结。“让我们与一切向往和平，工业发展，自由和全世界人类幸福的人们，有充分的了解”“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对于劳工的事业是极为必要的”。

1864年9月，法国工人代表团到达伦敦，为了欢迎这个代表团，英国工人邀请各国工人于圣马丁堂举行大会。

马克思是以德国流亡者的代表被邀请参加大会的。筹委会曾专门派遣勒·吕贝与马克思联系，邀请

马克思以德国工人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成立各种组织，其中绝大多数都充斥着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气息。马克思虽常常接到邀请，但一般都拒绝参加，这一次，马克思认为这会是真正的工人运动，是英、法两国工人渴望已久的活动，因此决定“打破向来谢绝这类邀请的惯例”。同时，他还推荐埃卡留斯作为德国工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大会于1864年9月28日晚上在圣马丁堂召开，与会者除了英国和法国的工人代表外，还有来自意大利、波兰、德国、爱尔兰的工人代表。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会场上挤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因为工人阶级现在显然重新觉醒了）。”据说参加大会的有两千多人，会议由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伦敦大学的教授比斯利主持。奥哲尔首先用英文宣读了1863年起草的《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呼吁书，接着，法国代表托伦宣读了《致英国兄弟》的答辞，宣布：“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筑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堤坝，来抗拒把人类分成两个阶级——愚昧饥饿的平民和脑满肠肥的官吏——的害人制度。我们要团结起来拯救自己！”

马克思出席了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坐，埃卡留斯代表德国工人发表了演说，演说词是他与马克思共同拟定的。马克思没有在大会上发言，只是“在讲台

上扮演哑角加以协助”。

11月4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通报了会议的情况，“会议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它的总委员会设在伦敦，‘联系’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工人团体……这次群众大会选举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其中奥哲尔、克里默和其他许多人（一部分是老宪章主义者、老欧文主义者，等等）代表英国；沃尔弗少校，方塔纳和其他一些意大利人代表意大利，勒·吕贝等人代表法国；埃卡留斯和我代表德国。委员会有权任意吸收新的成员。

目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参加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了一个小委员会（也有我在内）起草原则宣言和临时章程。”

马克思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显然是感到很满意的，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低潮后，他和恩格斯都在等待和盼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这个新成立的国际工人组织成员思想复杂，其中有宪章主义者，资产阶级激进派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工联主义者，欧文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同一封信中指出了这一情况，并告诉恩格斯，在他的坚持下，否决了充满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乌托邦思想的《成立宣言》，由他起草《告工人阶级书》（即《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章程。

马克思还告诉恩格斯，在这两个文件中，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

恩格斯得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消息，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我们又同那些至少是代表自己阶级的人发生了联系，这毕竟是好的；归根到底，这是一件主要的事情。”另外，根据马克思提供的情况，恩格斯又指出：“我认为，一旦问题提得稍微明确一点，这个新协会就会立即分裂成为理论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理论方面的无产阶级分子。”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迫切地等待着《告工人书》……这一定是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

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确实是一部艺术作品。因为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各国工人组织在思想意识上是不统一的，除少数人持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外，大多数人持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国际工人协会的发起者——英国的工会联合会，他们试图建立一个首先为经济目的——缩短工作日，协调罢工斗争，调整工资等而斗争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受蒲鲁东思想影响下的法国工人阶级，则幻想建立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搞无息信贷和发展合作

社事业的国际组织，并认为这是摆脱剥削的唯一道路。而马克思认为，新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应该是团结和指导各国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所以恩格斯后来说：“在所有参加者当中只有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 1848 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马克思在起草《成立宣言》时，成功地把革命的原则性与现实性结合在一起，既照顾到各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又没有放弃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成立宣言》以英国为例说明，工业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不仅没有改善劳动群众的境况，消灭他们的贫困，反而加深了贫富差距和阶级对抗。《宣言》评述了 1848 年以来欧洲工人阶级取得的两大成就：10 小时工作制和合作社运动的普遍开展。指出“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伟大使命”。

《成立宣言》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性，“过去的经验表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的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因而《成立宣言》使用了《共产党宣言》的战斗口号：“全世

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临时章程》中，恩格斯也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马克思在章程中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力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这样，马克思拟定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使当时一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分子，比埃尔·勒鲁分子、甚至英国工联中比较先进的部分，都可以参加国际。”

第一国际成立初期，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根据国际工人协会 1864 年 11 月 8 日决议，总委员会只接受那些能够经常出席会议的人为委员，以保证总委员会是一个真正从事工作的团体而不单纯是一个代表机构，这样，恩格斯不能参加总委员会的工作。因此，恩格斯主要是作为马克思的助手，协助马克思领导总委员会的工作。

马克思把总委员会的一切重大事情，以通信的方式告诉恩格斯，让恩格斯发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恩格斯经常以这种方式为国际工人协会出谋划策；他还向协会提供赞助性经费，帮助总委员会出版自

己的报纸；有时，恩格斯也应马克思之邀，撰写一些政论性文章，并承担了与德国工人组织的通信工作。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在西欧大多数国家影响迅速扩大，但在德国却受到拉萨尔派的抵制。尽管此时拉萨尔已经去世，但以施韦泽为首的拉萨尔的信徒们把持着全德工人联合会，他们竭力阻挠德国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并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国际进行诽谤，力图削弱国际在德国的影响。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只要这种拉萨尔主义的脏东西在德国还占上风，国际协会在那里就没有地位。”为使德国工人阶级参加到国际中来，使全德工人联合会早日摆脱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并成为一个人富于战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恩格斯做了大量的工作。

1864年12月，施韦泽主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柏林创刊，为扩大影响，施韦泽邀请在德国工人中享有极高威望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由于办报纲领中没有拉萨尔派特有的要求，而且李卜克内西也参加了编辑，所以，恩格斯和马克思答应下来，他们认为可以利用这份报纸在德国工人中宣传国际的思想，批判拉萨尔派的错误理论。

在该报第2、3号上刊载了恩格斯翻译的《成立宣言》。这样，德国的工人阶级不仅知道了国际的存

在，而且也了解了国际的宗旨和纲领。针对拉萨尔派只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进步党，而不反对容克贵族，并且轻视农民的错误立场，恩格斯在1865年2月第3号上发表了他在翻译的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歌辞简朴寓意深刻。

清晨——天色刚刚发亮，——
提德曼老爷就在卧室里穿衣裳，
他穿了一件漂亮的衬衣。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他穿了一件漂亮的衬衣，
又披上绿色的丝绸衬衣，
再系好山羊皮靴的带子，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再系好山羊皮靴的带子，
又扣紧镀金的马刺
他高傲地到南哈尔德去出席司法会议，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他高傲地到南哈尔德去出席司法会议
一进会场就向自由农讨税

每张犁要缴黑麦七斗，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每张犁要缴黑麦七斗，
每四猪要缴一头还得是肥的，
这就激怒了一位老人，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这就激怒了一位老人，
“我们谁也缴不出这样多捐税，
要缴，咱们先得算算帐，”——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要缴，咱们先得算算帐，
任何人都不准离开会场！
南哈尔德人，紧紧地围起来！”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南哈尔德人，紧紧地围起来！
不要让提德曼活着跑掉，
老人第一个上去给了他一拳，——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老人第一个上去给了他一拳，
提德曼老爷猛地栽了一个根头，
提德曼老爷躺在那里血流满地。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提德曼老爷血流满地，
而犁把自由地在黑土上走来走去，
猪也自由地在森林里吃东西。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恩格斯为这首诗歌写了一个简短的译后记，明确指出了诗歌的现实意义；这首富有朝气的古代农民歌曲对于德国这样的国家非常合适，因为在德国，有产阶级中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多，无产阶级中农业无产者和工业工人也一样多，或者甚至还要多些。”

《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后，施韦泽除了在报纸上继续宣传对拉萨尔的迷信外，还向俾斯麦政府献媚讨好，1865年1月，他一连发表了五篇题为《俾斯麦内阁》的社论，肉麻地吹捧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说这个政策“把普鲁士历史光荣传统从长期睡眠中唤醒”了，并要求俾斯麦把这个政策“贯彻到底”。恩格斯对施韦泽的态度感到气忿，指出这种立场将葬

送工人阶级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写了《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提出了与拉萨尔派相对抗的策略。

这篇文章起初是应李卜克内西之邀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的，由于文章的篇幅超过了报纸容量，再加上文章的政治倾向，因而不可能在拉萨尔派的报纸上刊登。2月底，这篇文章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汉堡由迈斯纳出版社出版发行。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军队改组的政治方面，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应采取的策略。

恩格斯首先指出，德国工人阶级所在的这个国家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有一批非常令人吃惊的活生生的古生物，封建老爷，领主裁判所，土容克地主，体罚，参政官，地方官，行会制度”，等等。封建贵族势力同资产阶级势力还在进行夺权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双方都力图把工人阶级拉到自己一边。“衰亡的社会的封建和官僚代表号召工人同他们一起向工人的唯一敌人资本家吸血鬼进攻；而资产者向工人指出，他们共同代表着新的社会时代，因此在对待衰亡的旧社会形式的关系上，他们的利益无论如何是一致的”。

针对这一情况，恩格斯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及其

政党应当意识到本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利益，在斗争中决不能做任何一个阶级的附庸。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在“资产阶级还忠于自己时”，无产阶级可以与资产阶级结成暂时的联盟。因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具有进步意义，而且“资产阶级对反动派的每个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也是工人的胜利，有助于彻底推翻资本家的统治，能使工人战胜资产阶级的日子更快地到来”。

如果资产阶级由于害怕无产阶级而同它的敌对分子联合，工人阶级政党也应该“继续进行资产阶级背弃了的，违反资产阶级心愿的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的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

恩格斯强烈抨击了拉萨尔派鼓吹的工人阶级与封建贵族结成联盟，换取封建国家对工人阶级的让步这种无稽之谈，恩格斯指出，如果封建反动派用某些虚假的让步引诱无产阶级上钩，那么无产阶级就应该“用古老的‘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豪迈辞句来回答它：‘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恩格斯正告德国工人阶级，不要指望

从政府那里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因为这个政府正是为了制止工人反对资产阶级而存在的”。

1865年2月底，《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这本小册子一出版，在德国就引起了广泛的反应。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对你又走上了轨道感到十分高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克莱因来信告诉恩格斯，这本小册子在科伦很畅销。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坚持其错误立场，继李卜克内西退出编辑部后，恩格斯和马克思也发表联合声明，同施韦泽及其“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断绝了关系。

在恩格斯迁居伦敦之前，他一直不能在国际工人协会中担任正式职务，但他却一直是马克思领导协会的最重要的助手。恩格斯在谈到他的这一角色时总是自豪地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确实，在协助马克思工作方面，恩格斯做得很出色，特别是当马克思致力于《资本论》的写作时，工作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恩格斯肩上。1865年3月11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感慨地说：“运动的新高涨确实使我非常辛苦。真是要命。”然而，当看到欧洲各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恩格斯又是何等的

兴奋啊！

60年代中后期，欧洲各国工人组织和国际都对民族问题特别关心。当时引起欧洲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主人士同情的波兰民族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正方兴未艾，各国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民主团体出于各自的目的提出了各种民族问题理论，而少数工人团体，特别是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他们认为国际工人协会只应关心经济问题，民族问题属于政治问题，是资产阶级的事情，与无产阶级无关，他们特别反对把波兰问题列入1866年国际日内瓦大会的议程。

1866年1月，马克思请恩格斯赶紧撰写一组文章，阐述无产阶级在波兰问题上应持的立场。恩格斯很快便写出一组三篇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论文，刊登在3月底和4月初的一家英国周报《共和国》报上。

恩格斯以波兰为例指出，认为民族解放问题与无产阶级无关，客观上是支持了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对波兰的民族压迫政策。工人阶级的重要使命就是消灭一些民族对另一些民族的奴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自治要求，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斗争不可缺少的口号，因而“凡是工人阶级独立参加政

治运动的地方，他们的对外政策一开始就用不多的几个字——恢复波兰表达出来”。恩格斯的著作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60年代末，在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工人组织中，巴枯宁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巴枯宁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一切国家和政权，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依靠农民、小生产者和流氓无产者进行破坏一切的暴动。1868年11月贝克尔把巴枯宁派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寄给总委员会，要求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加入国际，马克思将同盟的申请书和同盟的纲领，章程寄给恩格斯，征求他的意见。

恩格斯看完这些文件后回信说：“我从来没有读过比这个理论纲领更为可鄙的东西了。西伯利亚、肚皮和年轻的波兰女人已使巴枯宁变成一头真正的公牛。对于巴枯宁派加入国际的要求，恩格斯指出，对这些妄图钻进国际的家伙，最好是冷静而坚决地加以拒绝。”“否则，就会有两个委员会，甚至两个代表大会，这是国中之国。”马克思接受了恩格斯的意见，在代表总委员会给这个同盟的答复书中，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引用了恩格斯所作的评价。

恩格斯一直关注着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特别

是德国的工人运动。这不仅因为德国是他的祖国，而且德国工业的飞速发展使得工人阶级的队伍空前壮大，已成为欧洲大陆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然而，德国的工人运动领导权一直操纵在拉萨尔主义者手中，使得德国的工人运动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为了在德国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宣传国际的精神，使德国工人摆脱拉萨尔主义的影响，恩格斯对德国的工人运动施加了直接影响。恩格斯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并与德国进步工人的领袖李卜克内西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就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问题予以正确指导。

李卜克内西和比他年轻 14 岁的战友倍倍尔一直在努力使德国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1868 年 9 月，他们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作出了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从而扩大了国际在德国的影响，国际的思想，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越来越深入人心。对奉行萨姆主义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由于警察当局查封全德联合会，恩格斯于 1868 年 9 月在《民主周报》上发表了《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竭力劝说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不要只考虑在原有的基础上恢复联合会，而应促进统一的德国工人阶级政党

的建立。他希望不久前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是“同目光短浅的拉萨尔主义决裂”的表示。他写道：“自从被解散了的联合会的成员开始用思考来代替信从，在通向全体德国社会民主派工人汇合成一个大党的道路上的最后障碍就消失了。”

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加速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分裂，联合会中以威·白拉克，泰·约克和尤·布雷梅尔为代表的革命派脱离施韦泽，接受了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建议，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了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白拉克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革命派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把德国的全体社会主义工人团结在一起的党”，并“引导它走上正确的，唯一能导致胜利的道路，即建立在国际基础之上的伟大工人运动的道路”。

为支持德国无产阶级的建党工作，恩格斯在大会召开前夕发表了介绍马克思生平和事业的《卡尔·马克思》一文，发表在柏林《未来报》和莱比锡《民主周报》上。

恩格斯着重论述了马克思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驳斥了拉萨尔是德国工人运动创始者的谬论。他说，拉萨尔有一个先驱者，一个在智力上远

远超过他的人，他一面把这个人的著作庸俗化，同时却对这个人的存在只字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德国的工人运动起源于马克思和他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而拉萨尔只是利用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打好的基础”。

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前夕，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称为“组织得很好的社会主义政党”，其寓意是相当深刻的，恩格斯既打碎了套在拉萨尔头上的神圣光环，又为即将诞生的无产阶级政党树立了一个榜样，希望新成立的工人政党能够继承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光荣革命传统。

1869年8月7——9日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在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白拉克的领导下，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这个党从建立之日起就公开声明，它将同封建的、军国主义的普鲁士国家和资产阶级进行不调合的斗争。并宣称该党是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一个分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内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建立，使国际有了一个在中欧扩大它的影响的根据地，也为国际工人协会中马克思主义派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支柱，恩格斯本人一再把爱森纳赫派称作“我们的党”。

为了给予这个新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实际帮

助，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恩格斯于 1870 年 1 月在《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再版了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并为该书写了一篇序言，集中阐述了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这一中心问题。

恩格斯在分析了 1866 年以来德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重大变化后指出，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在德国统一中得到了好处，更由于他们害怕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所以，他们已完全拜倒在俾斯麦脚下，与容克贵族和霍亨索伦君主政体结成了同盟。所以“在德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革命的严重敌手——普鲁士政府了”。无产阶级政党应当仁不让地取代资产阶级，站在民主斗争的最前列，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国家。

在斗争中，无产阶级应与德国的农业工人结成联盟。恩格斯强调说，唤起农业工人，“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工人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恩格斯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作用，主要是针对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对农民问题缺乏明确认识而言的。

恩格斯的著作，对爱森纳赫党的领导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提出同农业工人和小农建立密切联

系的号召，也得到李卜克内西的响应，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把农民，即小土地所有者和雇农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单靠产业工人不能实现德国的革命，由于你阐明了这个思想，我首先向你表示谢意。”

在第一国际前期，恩格斯一直是作为马克思的助手和国际的顾问默默的工作，他的工作不仅为使国际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国际影响的扩大，国际精神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而且，也使得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完成他的宏篇巨著——《资本论》。

第十七章 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早在第一次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时，恩格斯就已经认识到，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关系的基础。1844年2月，恩格斯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文章对马克思影响很大，是促使马克思重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因素。这年春天，马克思将其称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流亡伦敦后，马克思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为了使马克思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和写作，恩格斯不得不到曼彻斯特从事“该死的商业”，以维持马克思及其一家的基本生活。特别是美国内战爆发后，马克思停止了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从而失去了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时，恩格斯的帮助就显得更为重要。每个月，有时甚至是每周都有数量不等的汇票由曼彻斯特寄往伦敦。

恩格斯对马克思从事《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的帮助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恩格斯实际上参与了其中一些重要理论的创作。而且，很多重要问题，都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经过反复探讨后才解决的。马克思也十分重视恩格斯来伦敦商议。如 1862 年 8 月 20 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你能不能来这里逗留几天？我在我的批判中要推翻许多旧东西，因此我想有几点要预先同你商量一下。”

1851 年初，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探讨了地租问题。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批判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他说，李嘉图把地租理论建立在土地肥力递减的规律上，这是与历史的发展相矛盾的，因为科学和工业的进步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

能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论”。恩格斯完全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而且，早在 1844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恩格斯就已经用科学耕作法的成就批判过土地肥力递减的理论，只是未作系统论述而已。恩格斯为马克思彻底弄清地租理论感到高兴，他诙谐地对马克思说：“毫无疑问，你对问题的解决是正确的，这使你有进一步的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如果世间还有公理和正义的话，那么至少一年的全部地租现在应该归于你，这是你有权要求的最低数目。”

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马克思研究了大量有关经济史和资本主义经济现状的资料，但他仍觉得不够充分，他还非常渴望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实际经营活动，特别是资本主义企业和部门间的经济关系。这在当时公开出版的理论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因此，他经常请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管理工作的恩格斯帮助。例如，1851 年 3 月 31 日，马克思写信询问恩格斯：商人，工厂主等等怎样计算他们自己消耗的那一部分利润？这些钱是否是从银行家那里取？恩格斯回信说：“商人作为一个公司，作为一个利润获得者，和同一个商人作为消费者——这在商业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互相敌对的人。商人

作为公司，可以叫做资本帐目或相应地叫作盈亏帐目。商人作为吃、喝、住和生产子女的人，可以叫做家庭费用帐目。资本帐目把从商业领域转移到私人腰包的每一分钱记入家庭费用帐目的借方，因为家庭费用帐目只有‘借方’，没有‘贷方’，从而是公司的最坏的负债者，所以到年终时，家庭费用帐目的借方总额就将构成纯亏损，并从利润中扣除。”

恩格斯生活在曼彻斯特这个工业城市，本人又是一名企业家，因此熟知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情况，为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不可缺少的资料。1862年3月，他应马克思的要求，向马克思提供了自己工厂里的工种情况以及每个工种工人的比例，不久，又为马克思提供了关于意大利簿记的细节。

为了帮助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进行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经常向马克思推荐和介绍欧美一些国家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新著作，并指出这些著作的特点，合理之处和谬误所在。1858年3月，恩格斯向马克思介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一书，批判了拜比吉关于机器折旧的理论。指出，拜比吉关于机器每5年更新一次的说法是荒谬的，在英国没有一家企业会每隔5年就更新一次机器设备。一般来说，机器设备更新的周期大体上是30年。如果机器的主要原理没有被新

的发明所取代，那么只需更换磨损部分就行了，而不必更新整个设备。

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着恩格斯的巨大贡献。恩格斯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是无法避免的，基本上每隔 10 年左右就爆发一次，可以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就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后来，他又将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经济危机是引起革命的原因，而经济繁荣则为反革命的胜利准备条件。

1856 年 4 月，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和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敏锐地预见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即将来临，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说：“当我们听到其支线通往北京等地的伊尔库茨克大铁路的消息时，我们就该收拾行李了。这一次的崩溃是前所未闻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备；激烈紧张，广泛普遍，一切有产的和统治的社会阶层都牵涉进去。”果不其然，1857 年秋天，席卷欧洲各国的经济危机终于爆发了。1857 年 11 月，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详细论述了这次危机的新特点。恩格斯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为马克思创立经济危机的理论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恩格斯与马克思的通信十分频繁，通

过这些书信，恩格斯为马克思提供了大量的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被马克思以直接引用或间接叙述的方式运用于《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还多次引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材料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一些观点。尽管恩格斯的名字多次出现在《资本论》中，但马克思仍然真诚地向恩格斯表示：“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到目前为止，我只写了些小东西）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分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尽管恩格斯并没有以合著者的身份出现，但他为《资本论》一书所做的巨大工作，包括许多理论观点的形成，提供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以及在经济上对马克思的支援，使得恩格斯的名字无法与《资本论》分开。

1867年4月2日，《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终于整理完毕。恩格斯得知这一消息后禁不住欢呼“乌拉”。他深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立即产生很大的效果，而且，自己的战友也会在摆脱重负后，为未来展现令人鼓舞的前景，他对马克思说：“我一直认为，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不把这个担子抛掉，你就永远不会而且也不能脱出困境。这个一辈子也搞不完的东西，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非常清楚地了解，现在，你摆脱这个梦魇后，会感到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特别是这世界，只要你一重新投身进去，也就会感到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黑暗。”

4月10日，马克思冒着风暴乘船离开伦敦，尽管天气恶劣，风浪很大，但马克思在幽禁了很久之后，却觉得“痛快得无以复加。两天后到达汉堡，立即与书商迈斯纳商谈出版事宜。谈判很顺利，迈斯纳准备几天后便付印，因而他要求马克思不要离开德国，以便及时进行校对。5月5日，马克思校改了每印张，这一天正好是他49岁生日。

从5月底到6月初，马克思又来到曼彻斯特，住在恩格斯那里休养并同恩格斯交换意见。回伦敦后，马克思又把迈斯纳从汉堡寄来的清样寄给恩格斯审校。恩格斯在分批阅读清样的过程中，多次称赞这部著作，他在信中对马克思说：“我祝贺你，只是由于你把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放在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因此完满地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和相当清楚。我还祝贺你，实际上出色地叙述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这里第一次得到充分而又互相联系的叙述。”对于马克思来说，恩格斯所表示的满意比世界上其他人可能做出的评价都重要。不过，马克思请恩格斯阅读校样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完善这部

著作，因此，他请恩格斯把他的“要求、批评、问题等等都写到清样上”，恩格斯也的确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在《资本论》出版第一版时，这部长达 50 个印张的鸿篇巨著只分为六章，不便于读者了解和掌握。恩格斯不满意这个叙述方式，他在信中直接了当地向马克思提出意见“你怎么会把书的外部结构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第四章大约占了 200 页，才只分四个部分，这四部分的标题是用普通字体加空排印的，很难找到。此外，思想进程经常被说明打断，而且所说明之点从未在说明的结尾加以总括，以致经常从一点的说明直接进入另一点的叙述。这使人非常疲倦，在没有密切注意的情况下，甚至会使人感到混乱。在这里题目分得更细一些，主要部分更强调一些是绝对合适的。”马克思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在 1872 年再版时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和调整，全书不再是分为六章，而是七篇二十五章。原来的第四章成为第四篇，包括第十至第十四章。以后各版和各种文本基本上都保持了这种结构。

对于某些具体问题，恩格斯也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例如关于价值的论述，恩格斯认为这一部分过于抽象，又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对于不懂辩证法的读者来说难以理解，恩格斯建议：

“把这里用辩证法获得的东西，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从而用历史的方法……证明货币形成的必然性并表明货币形成的过程。”马克思在复信中说：“我是既接受了你的建议，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马克思没有对正文进行修改，而是专门写了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放在全书的末尾。后来在第二版时则完全采纳了恩格斯的意见。

1867年8月16日深夜两点，马克思校完了最后一个印张，马上提笔给良朋与战友写信，他要让自己的朋友与他分享快乐，并向这位忠实的朋友再次表示感谢。“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资本论》“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这部书即将出版时，恩格斯曾担心它“在普鲁士有可能被禁止”，但由于书中所涉及的几乎全是英国的事情，所以普鲁士政府没能找到禁止出版的借口。但是，资产阶级御用学者们在对付社会主义书刊的传播上是“相当聪明的，它们采用了八年前对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使用的策略——尽力保持沉默。

显然，在《资本论》付印前，恩格斯就已预见到

资产阶级学者可能采取的策略，并着手制订对付“沉默的阴谋”的办法。他在1867年4月27日给正在汉堡的马克思的信中说：“我深信，书出版后立刻会产生很大的效果，但是，极其有必要稍微推动一下有学问的市民和官吏们的热忱，并且也不要看不起小小的手腕……为了对付那帮无赖文人集团有必要这样做……此外，大部分学术著作如果没有这种辅助手段，要发生作用是很迟缓的，而一旦有了这种手段——想一想《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等等——就像‘着火’一样”。在《资本论》正式出版前半个月，恩格斯向马克思建议，“为了推动事情，我是否需要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书进行抨击”，马克思对这一策略非常赞赏，认为这是“最好的作战方法”。

恩格斯不仅自己准备从各个角度和立场写书评，还动员自己的朋友和战友们多写书评，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强调说：“主要的不在于写什么和如何写，而在于使人们来谈论这本书，使孚赫，米哈埃利斯，罗雪尔和劳这班家伙也不得不来表示自己对它的看法。应当尽量设法在一切报纸上发表文章，不管这些报纸是政治性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只要它们肯发表就行，既要有长篇书评，也要有短小简评，主要的是要多要经常。必须使这班先生们无疑试图奉行的完全沉默的政策不通，而且要尽快使它行不通。”

1867年11月8日，恩格斯再次写信给库格曼说：“德国报刊对于《资本论》仍然保持沉默，而十分重要的是使人们说话……主要的是要经常不断的发表对该书的评论。由于在这种场合下，马克思的手脚受到束缚，而且他像少女一样，所以正是我们这些第三者，必须来做这件事。”总而言之，“整个事情就在于‘制造轰动’”。

然而，恩格斯本人决不会满足于仅仅制造轰动效应。他为《资本论》的传播一共写了9篇书评，其中7篇通过李卜克内西，库格曼和济贝尔等人在报刊上发表。为《资本论》这样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写书评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由一个人写出几篇书评，且不能让人看出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则更难。写书评时还要考虑迎合准备投稿的报纸的政治倾向，同时要把《资本论》的主要思想介绍给读者，这的确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但恩格斯凭借其极高的理论修养和写作艺术，巧妙地运用各种写作手法，既适应了各种报刊的不同要求，又达到了宣传《资本论》的效果。

恩格斯给柏林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未来报》写的书评，可以说是上述做法的典范。《未来报》倡导民族主义，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反对国家和民族的分裂。针对《未来报》的这一政治倾向，恩格斯

在为该报写的书评中以一个普通德国人的身份指出，“我们这个出思想家的民族，直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贡献如此少，这对于每一个德国人都是一个可悲的事实。”当然，恩格斯不会放过任何挖苦资产阶级御用学者的机会“这方面我们大名鼎鼎的人物，充其量不过是像劳和罗雪尔那样的编纂者……政治经济学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在科学上谁也不感兴趣的领域……这是我们国家分散状态的过错，是我们可惜的还这样不发达的工业的过错，还是在这个科学部门内我们传统的对外国的依赖的过错？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论》的出版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因为这本书中所进行的研究有大极的科学确切性”。

然后，恩格斯为说明《资本论》的科学确切性而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我们首先举出全书整个巧妙的辩证的结构，举出在商品的概念中货币如何已经作为自在的存在东西被表述出来，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我们承认：我们认为新介绍的剩余价值的范畴是前进的一步；我们没有看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反驳这个论断：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出现……贯穿于全书的历史的见解，使作者不把经济规律看作永恒的真理，而仅仅看作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我们应当承认，这种历

史的见解我们是很满意的。”

在书评的最后，恩格斯仍然忘不了要刺激和羞辱一下那些御用学者们。“遗憾的是，作者谈到德国御用经济学家时所用的那种声色俱厉的语调，不可否认是有其理由的。这些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属于‘庸俗经济学’的；

他们为了眼前的声誉，拿自己的科学作卖淫勾当，背弃了科学的古典大师……让这本书给他们的严厉教训，促使他们从昏睡中醒来，提醒他们，政治经济学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认真、热心为它工作的科学。”

《爱北斐特日报》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办的报纸，恩格斯为该报写书评是站在一个资本家的立场上。书评开头便指出，这部 50 印张的学术著作，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我们的银行家，工厂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资本，不外是工人阶级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这篇书评一方面承认马克思的《资本论》“包含着充分的，并且非常充分的勇敢而大胆的新东西”，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完全科学的形式呈献出来”；另一方面，书评又呼吁：“科学界人士应该保卫他们那些在这里被从根本上驳斥的经济理论的规律，他们应该证明，资本固然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但不是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书评特别期望像罗雪

尔、劳、麦克斯·维尔特等人“不要放过机会保卫到现在为止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来反对这个无疑地不能轻视的新的进攻”。

在为斯图加特民主派报刊《观察家报》撰写的书评中，恩格斯利用该报主张德意志统一和联邦制，憎恨普鲁士容克贵族政治倾向，以一个南德意志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指出：“对本书的倾向无论抱什么态度，我们还是认为有权说：它是属于那种使德国精神获得荣誉的著作之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作者也是普鲁士人，可是是莱茵省的普鲁士人，而莱茵省的普鲁士，不久之前还爱把自己叫做‘不得已的普鲁士人’而且作者在最近几十年内是远离普鲁士的放逐中度过的。普鲁士本身早已不再是任何科学首倡的国土，特别是在历史、政治或社会领域中，这种首倡在那里是不可能的。关于普鲁士，不如说它俄国精神而不是德国精神的代表。”在对普鲁士进行了一番攻击后。恩格斯笔锋一转，着重介绍了《资本论》的主要观点。这样做，既可博得《观察家报》主编的好感，又巧妙地宣传了《资本论》的主要思想。

在《维尔腾堡邦报》这家德国中部工厂主办的报纸上，恩格斯的书评是以一个工业化的保卫者的口吻写的。在书评的开头，恩格斯首先声明：“我们注意这本书，完全不是为了作者在序言中就已公开表

示出来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倾向。

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本书不管它的倾向如何，包含着值得所有的人注意的科学研究和实际材料。我们也不在这里研究科学部分……我们仅仅限于事实方面。”

恩格斯接着重点介绍了《资本论》的主要内容，说这本书“如此明白而完全地分析了从中世纪起到现在为止的近代工业史的基本特征”。既然在英国发生的事情迟早要在德国发生，“那么大体上熟悉一下现代工业史，以便预先知道在这样的变动中如何行动，对于我们所有一切工厂主就成为必要的了”。而且，“那些不仅从日常赢利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工业，而且把它看做各国全部巨大的现代工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因此也关心同自己的部门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的德国实业界人士，在这里会找到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泉源”。

最后，恩格斯号召德国的工厂主不要害怕本书的倾向，因为“你们迟早一定会面临这同一问题的”。

恩格斯的上述文章表明他是一位多么出色的进行“合法”斗争的能手。他通过巧妙的手法，使资产阶级的各种报刊发表了推荐《资本论》这部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巨著的书评。

1868年1月，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莱比锡出版

了一份《民主周报》。在这家工厂报纸上，恩格斯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像在资产阶级报纸上那样隐晦了。在1868年3月刊登在《民主周报》上的书评中，恩格斯开始便明确指出：“自地球上有了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强调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这个德国人就是马克思。

恩格斯特别强调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一伟大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力是一种商品，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能生产比它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资本家的剩余价值都是由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创造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也是建立在这种无偿劳动之上。

恩格斯还着重介绍和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不但继续不断地再生产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工人的穷困”。“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也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以不断增加的人数再生产无产的工人阶级……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

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

在为报纸写书评的同时，恩格斯还着手为工人们写一本通俗的小册子，以使工人阶级更好地了解《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到1868年4月，恩格斯已完成包括《资本论》四章内容的提纲。后来，由于《资本论》迅速得到传播，影响不断扩大，恩格斯才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恩格斯在书评中，还批判了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有很大影响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指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马克思先生明白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必然性，也同样明白地指出了那些仅仅消费的占有土地的容克阶级的多余性，拉萨尔脑中充满了幻想，以为俾斯麦能承担实现社会主义千年王国的任务，马克思先生则极其明白地否认自己的不肖学生。在《爱北斐特日报》发表的书评中，恩格斯强调指出：“马克思打算以批判迄今存在过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总结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社会主义的意图，奠定直到现在为止无论傅立叶和蒲鲁东，亦无论拉萨尔，都不能为它奠定的科学基础。”在《杜塞尔多夫日报》上发表的书评，恩格斯更明确地指出：“谁有眼睛，谁就会看到：这里社

会革命的要求是足够清楚地提出来了。这里所指的不是像已故的拉萨尔所说的拥有国家资本的工人协会，这里所指的是根本消灭资本。”

在恩格斯、库格曼和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努力下，资产阶级御用学者“沉默的阴谋”终于被粉碎了。到1868年7月，至少已有15家德文报纸和杂志发表了关于《资本论》的书评和简介；《未来报》、《观察家报》、《先驱报》先后发表了《资本论》的序言，还有一些报纸刊登了《资本论》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御用经济学家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

第一个发表书评的资产阶级学者是柏林大学的讲师欧根·杜林，他在《现代知识补充材料》1867年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评。杜林几乎完全接受了马克思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但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其它原理，杜林根本不理解，所以他的评论漏洞百出，可笑至极。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这个家伙文章写完时兴高采烈，付邮时无疑胆战心惊”。但是，杜林毕竟是谈论《资本论》的“第一个行家”。

此后，资产阶级的御用经济学家孚赫、卡尔·施特拉斯堡、克尼斯等人也一改往日的沉默态度，对《资本论》进行大肆攻击，发泄自己的怒气。拉萨尔的信徒霍夫施太滕也利用《社会民主党人报》对马克

恩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攻击。上述对《资本论》的攻击大多属破绽百出的诽谤。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目的达到了，《资本论》的影响日益扩大，传播也更加广泛。

《资本论》在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在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会议上，代表们通过决议称赞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工人阶级立下了不朽功勋”。在同年的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德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资本论》的决议草案，建议所有国家的工人都来学习《资本论》。随后几年，《资本论》的俄文本和法文本相继问世，从而使《资本论》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传播。

看到自己的战友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如此大的贡献，恩格斯既欣喜又焦虑。他为战友的成就而感到高兴，同时又为自己羁绊于该死的商业而百感焦急。60年代后期，他终于看到了摆脱商业困扰的曙光。

第十八章 伟人重聚

不用说，我不需要告诉你，我摆脱了这个该死的商业而能重新随意工作，是多么高兴，尤其因为这恰好发生在现在，即欧洲的事态愈来愈尖锐化，有朝一日暴风雨会完全出乎意外地来到的时候。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从 60 年代初，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根据 1862 年 9 月 25 日恩格斯同哥特弗利德·欧门签署的协议，恩格斯除了每年 100 英镑的工资外，还可获得 10% 的利润分成。但是，协议又要求恩格斯要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献给本公司并准确地执行哥特弗利德·欧门的一切正当合理的指示”，具体负责“把所有收入和支出、销售成交，订货和商务谈判都准确地按照规定作好记录”；此外还

要求恩格斯不得泄露雇主的业务秘密和来往关系。根据协议，恩格斯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办事处里。

1864 年，恩格斯由于他的家族投入的资本股额达到 1 万英镑而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这一年，恩格斯与哥特弗利德签署了最后一个合伙经营公司商业的合同，根据这个合同，恩格斯分红比例提高到年利润的 20%，另外还可以从流动资本中得到年利率为 5% 的利息收入；5 年后，亦即合同期满后，恩格斯还可以得到公司给他的某些收入。

成为股东后，恩格斯的业务负担更重了。除了商业通信外，他还负责主管办事处的全部业务工作。为此，他需要整天呆在营业所里，跟办事员在一起，如果不是为了增加收入，以维持他和马克思一家的生活，恩格斯宁愿继续做代理人和业务助手，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和理论研究。

1867 年，马克思的《资本论》付印在即，促使恩格斯下决心摆脱该死的商业。这一年的 4 月 27 日，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再过两年我和猪猡哥特弗利德的合同就要满期，根据目前这里的情况来看，我们两人都不见得希望延长它；甚至分裂更早发生也不是不可能的。果然这样，我就要彻底抛弃商业；因为如果现在还独自创业，那就是说，要极其辛勤地操劳

五六年而得不到什么显著的结果，然后要再干五六年才能收获前五年的果实，这会把我彻底毁掉的，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尤其是我当上老板后，负的责任更大，情况也就更糟了。如果不是为了增加收入，我真想再当办事员。”

但是，恩格斯并没有中止合同，而是继续又忍受了两年商业的煎熬。在同一封信中恩格斯道出了其中原因，“无论何时，再过几年我的商人生活就要结束，那时生活费就会减少很多很多。我脑子里老是在转，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但是如果事情照目前这样发展下去，即使到那时不发生革命，一切财政计划也没有终止，那么事情也总是会安排妥当的。”显然，恩格斯首先考虑的是退出这家公司后，如何保障马克思一家的生活。

恩格斯与哥特弗利德的合同将于 1869 年 6 月 30 日期满。哥特弗利德知道恩格斯对经商并没有什么兴趣，因此提前 7 个月就与恩格斯进行谈判，试图：“赎买”恩格斯。哥特弗利德表示愿意为恩格斯提供一笔数目可观的补偿费，条件是恩格斯不再对这家公司提出任何权利要求，并且 5 年内不得经营任何与欧门兄弟竞争的业务；同时允许欧门兄弟继

续使用“欧门——恩格斯公司”这一老字号。

恩格斯对经商根本就没有兴趣，他考虑的是如何得到尽量多的补偿金，以在今后五六年内保障他与马克思一家的生活。所以，谈判开始后，恩格斯紧急致书马克思，要马克思立即十分准确地答复下面两个问题。

“（1）你需要多少钱才能还清你的全部债务，把你完全解脱出来？

（2）你平时的正常开支，每年 350 英镑是否够用（治病和意外的紧急开支除外），就是说，这样你是否无需借债了。如果不够，请把你需要的数额告诉我。”

恩格斯早就打算把哥特弗利德给他的补偿金专门用于支援马克思，他计算这笔补偿的基础是为马克思还清债务后，今后五六年每年给马克思 350 英镑，在紧急情况下甚至还可更多一些，之后每年至少可支援 150 英镑。

收到恩格斯的信后，马克思非常感动，马上回信说：“亲爱的弗雷德：你对我太好了，我十分感动。”并表示，每年 350 英镑完全够用，“只要彻底摆脱债务，就能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

1868 年 12 月 2 日，恩格斯与哥特弗利德签署了结束在欧门—恩格斯工作的协议。协议规定：欧门一次性付给恩格斯 1750 英镑的补偿金，恩格斯则同意

5年内不创办与欧门竞争的新企业，并让欧门兄弟继续使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老招牌。按照协议，恩格斯将在曼彻斯特营业所继续负责行政管理，直到1869年6月30日。另外，恩格斯还必须比规定的时间在曼彻斯特多居住一年（直到1870年6月30日），以便他的接班人能向他咨询。

1869年6月30日，恩格斯最后一次去营业所上班。商业的桎梏即将卸去，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恩格斯是多么兴奋啊！当时在恩格斯家居住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杜西）后来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晨当他穿上皮靴最后一次到营业所去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地喊着：‘最后一次了！’”

几小时后，我们站在大门口等他回来，只见他从门前的一小片田野里走过来，挥舞着手杖，容光焕发地唱着歌。然后就像过节一样大吃一顿，喝香槟酒，陶醉在幸福中。”

7月1日，恩格斯第一次不用去营业所上班了，他在家异常兴奋，提笔给亲朋好友写信，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快乐。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亲爱的妈妈，今天是我自由的第一天，我觉得要更好地度过这一天，莫过于立即给您写信。”

“我刚刚获得的自由使我高兴极了，从昨天起，我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十岁。今天早

晨，我没有到那阴郁的城市里去，而是趁天气晴朗在田野里漫步了几个小时。我的房间布置得很舒适，可以打开窗户，不必担心到处都是煤烟灰尘了，窗台上摆着花卉，屋前长着一些树木；坐在这样的房间里的写字台前，同坐在货栈里我那间只能看到天井的阴暗房间里，工作起来完全不同了。”

当然，恩格斯不会忘记让自己的战友分享此时的欢乐，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亲爱的摩尔：好啊！从今天起再不搞可爱的商业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杜西和我今天早晨在田野里作了长时间散步，以庆祝我这第一个自由的日子。”马克思在回信中则“最热烈地祝贺”恩格斯“逃出了埃及的幽囚”。为了祝贺这件事，马克思还喝了“不该喝的一小杯”。

1869年8月10日，哥特弗利德与恩格斯签署了一项解约协定，了结了双方的业务。恩格斯终于可以把精力和时间，全部献给他所钟爱的社会主义事业。他在7月10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说：“不用说，我不需要告诉你，我摆脱了这个该死的商业而能重新随意工作，是多么高兴。尤其因为这恰好发生在现在，即欧洲的事态愈来愈尖锐化，有朝一日暴风雨会完全出乎意外地来到的时候。”

恩格斯就像刚刚飞出牢笼的雄鹰，迫不及待地要飞向辽阔的天空，去呼吸那自由的空气，恩格斯一

向喜欢长途旅游，在解除了与哥特弗利德的商约后，恩格斯决定偕同夫人莉希和马克思的小女儿杜西到爱尔兰旅行。自上次爱尔兰之行以来，时间已过了13年。这一次恩格斯不仅想欣赏爱尔兰美丽的岛国风光，他还要为写爱尔兰史收集材料。

从9月6日到23日，恩格斯夫妇和杜西游览了都柏林，威克洛山区、基拉尼和科克等地。都柏林给恩格斯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港口城市变化极大，以至恩格斯都快认不出来了，但是“这个国家本身看上去实在荒凉，使人立刻想到，这里的人口太少了”。在爱尔兰，英国殖民者为防止爱尔兰人民的反抗，到处都处于战备状态。皇家爱尔兰团的士兵挂着猎刀，有时腰插手枪，手持警棍，分成一支支的小部队在各处走来走去。在都柏林，恩格斯甚至看到一个骑炮连直穿市中心而过，这种现象在英格兰从来不会出现。

回到曼彻斯特后，恩格斯开始整理所搜集的材料，准备写一部爱尔兰史。他为这一写作开列的参考书目达150多种，涉及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文学和法律等各个方面。他摘录的读书笔记满满的15本。为了阅读研究爱尔兰的资料，恩格斯还学习了古爱尔兰语。

1870年5月，恩格斯正式动笔撰写《爱尔兰史》，这部著作计划分为四章：（一）自然条件；（二）古代

的爱尔兰；（三）英国的征服；（四）英国的统治。可惜，这部著作未能完成，恩格斯只写完了第一章，第二章只写了一部分，作为本书重点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只字未写。主要原因是普法战争的爆发、巴黎公社以及国际的活动使恩格斯忙碌起来，无暇再从事这部书的写作。

然而，这部著作已经完成的部分，尽管是论述爱尔兰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爱尔兰的历史，恩格斯也赋予其丰富的政治内涵。英国资产阶级学者为了替英国的殖民统治辩护，胡说爱尔兰的地质条件不适合经济独立发展，说爱尔兰土著居民：“愚昧和懒惰”。对此，恩格斯予以了无情的揭露，他指出：“据说，爱尔兰的气候已注定了它只能为英国人提供肉类和油脂，而不能为爱尔兰人生产粮食。”这种说法，是那些无耻的学者为讨好统治者故意捏造的。恩格斯特别批判了英国历史学家列德维奇，称“列德维奇是一个卑劣的撒谎家，他竭力把爱尔兰人描绘成好像是不堪造就的野蛮人，而全部文明来自国外”。

针对英国统治者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攻击和诬蔑，恩格斯讥讽说：“爱尔兰人应该永远保持举止温顺，——直到他们被剥光了皮为止！”

恩格斯在研究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就民族问题再次得出结论：“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它民族，那

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不幸。”

恩格斯直到 1870 年 6 月 30 日才彻底摆脱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事务，在这之前，他要随时接受继承他职务的查理·勒兹根的咨询，然而，早在 1870 年 2 月，恩格斯的夫人莉希就急不可待想迁居伦敦了。2 月 22 日，恩格斯致书马克思说：“我今年夏末迁居伦敦现在已经决定了。莉希说，她想离开曼彻斯特，越早越好”。5 月 11 日，恩格斯委托马克思在附近找一所房子，为了照顾莉希，恩格斯希望房子不要太高，因为莉希是气喘病患者，怕上楼梯。恩格斯要迁居伦敦的消息令马克思一家感到兴奋，马克思及夫人燕妮和视恩格斯为第二父亲的女孩子们积极张罗，为恩格斯物色住所。

到 7 月初，伦敦的房子还没有着落，恩格斯有些着急了，便写信询问：我们现在在窗户上已贴出‘出租’广告。你们还没找到一点线索吗？”接到信后，燕妮马上带着大女儿燕妮·马克思和小女儿杜西出去寻找。7 月 12 日，终于找到了一处她们比较满意的住所。燕妮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介绍说：“我找到一所房子，它座落在非常美丽和方便的地方，因此得到我们大家一致的好评……它就在樱草丘旁边，因此从窗户朝街的所有房间都能看到优美开阔的景色，而且空气充足。此外，周围的街道上有各种各样的店铺，

您的夫人可以自己去购买所有的东西……它实在是太敞亮，太令人喜欢了。几乎用不着走出屋子就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和看到成千上万的人。”

恩格斯显然对这所房子感到满意，他相信燕妮及其女儿们的眼力，所以并未去亲自看就定了下来。这就是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的住宅，坐落在美丽优雅的瑞琴特公园对面。而且，这所住宅离马克思家也不很远，步行只有十五分钟的路。1875 年 3 月，马克思搬到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后，两家相隔就更近了。

1870 年 9 月 20 日，恩格斯和夫人莉希以及莉希的侄女玛丽·艾伦迁居伦敦。恩格斯和莉希对由燕妮亲自挑选的新居深感满意。这是伦敦典型的单元式住宅。按当时英国的居住条件，这套住宅是足够宽的了。伯恩施坦称这种住宅是“资产阶级家庭居住的地方”。使恩格斯特别感到满意的是，这房子地处绿树丛中，紧靠着浦利母洛斯山，山不太高，但绿树成荫，小径弯弯，是个非常适合散步的地方。恩格斯高兴地称这是伦敦“最有益于健康的地区。”

1870 年——1883 年这段时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在以往的 20 年中，他们主要是通过书信商量和研究问题，沟通思想，现在，他们可以当面交谈和交流了。

这两个朋友几乎天天见面。通常是下午 1 时左

右，恩格斯到马克思家去，如果天气晴朗，马克思的兴致又好的话，他们就一起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外出，他们便留在马克思的书房里。马克思的小女儿杜西描述他们两人当时的情形时说：如果不出门，他们便在我父亲的屋里走来走去——两人各沿屋子的一边，走到屋角就转过身来，他们鞋跟在地板上磨出了一些坑洼。他们在这里讨论了许多大多数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时常两人一前一后地走来走去，半晌不发一言。有的时候又各自说自己所想的一套，直到半小时后大家都停了下来，相互承认双方所想的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于是两人就放声大笑起来”。

由于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探讨和商议，两个伟人重聚后整天“足不出户”，马克思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未顾上给在德国的老朋友库格曼写信，使得库格曼焦虑地写信询问马克思是否真的生病了。马克思的大女儿兼秘书燕妮·马克思代写了一封信，告诉库格曼：马克思的健康比往年这个时候好，“这一点无疑要感谢我们的好心恩格斯‘大夫’采取的强硬措施。恩格斯或总参谋长——这是我们刚给他起的一个绰号——现在就住在我们附近，他常常同摩尔一块散步，这对摩尔的身体很有好处，比吃药管用多了。我们每天都见到“将军”，同他度过许多愉快的

晚上。前几天晚上，在我们家举行了一次大型的爱国主义晚会。在唱完《烧酒歌》以后，摩尔和‘总参谋部’又朗诵《守卫在莱茵河上》”。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家庭关系也更加密切。恩格斯的夫人谦虚、温和、乐于助人，很久以前就博得了燕妮及其长女、次女的好感，小杜西由于经常到曼彻斯特居住，早已把莉希看成了第二个母亲。莉希和燕妮曾多次结伴到海边疗养地休养。

恩格斯很喜欢马克思的长外孙让·龙格，并亲切的称他为琼尼。这个孩子由于父亲流亡英国而经常住在外祖父家里。恩格斯和马克思经常与琼尼做游戏，通常是马克思扮作马车，琼尼骑在外祖父肩上是驾车的御手，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被指派为拉车的马，当“车马”装配好后，便在马克思小屋后面的小花园里撒欢地奔驰。据李卜克内西回忆：“摩尔跑得满脸流汗，如果恩格斯或我想把脚步稍微放慢一点，那无情的御者嗖嗖发响的鞭子立刻落到我们脊背上。”在这种游戏中，恩格斯和马克思感觉自己返老还童了。

1870年7月，正当马克思一家在伦敦找房子，恩格斯准备举家南迁的时候，震撼欧洲的普法战争爆发了，双方近百万军队投入了这场血腥的大屠杀。

无论是普鲁士还是法国，双方的统治集团可以

说各怀野心。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来说，他试图通过战争占领德国莱茵河左岸地区，阻止南德四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使德国永远处于分裂状态。另外，他还试图通过战争扼杀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如他的皇后所讲：如果没有战争，吾儿就当不上皇帝了。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则力图通过战争打败法国，扫除德意志统一的最后一块绊脚石，并趁机把法国的重要矿区阿尔萨斯和洛林拿过来，正如恩格斯所预料的，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战争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马克思就写信给恩格斯，交流对战争的看法。马克思认为，如果普鲁士在战争中获胜的话，“国家权力集中将有利于德国工人阶级集中”。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超过法国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壮大，有助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加强。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于7月23日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深刻分析了战争的原因。指出，这场战争是德法两国反动王朝制度的产物；战争是波拿巴发动的，目的是为了保住和扩大他的权力，从这个角度讲法国是侵略者。因此德国必须从本民族利益出发，进行一场防御战争。但是，德国无产阶级应该把战争严格限制在民族防御的范围内，防止德国

统治者把战争演变为侵略性战争。

鉴于沙文主义猖獗，马克思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特别是法德两国工人团结的重要性，认为“全世界工人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

恩格斯完全赞同马克思起草的宣言，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宣言将教育各国工人阶级懂得，现在只有工人才有真正的对外政策。”

此时，恩格斯也放弃了《爱尔兰史》的写作，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普法战争上，他运用自己丰富而渊博的军事知识，分析正在进行的战争。在战争刚刚开始时，他便敏锐地判断普鲁士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在7月3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好在是法国人首先进攻德国领土的。当德国人击退侵略，跟踪追击的时候，这同他们没有遭侵略就开进法国比较，无疑会在法国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因此从法国方面来说，战争更具有波拿巴主义的性质。

最终的结局——德国人终将取得胜利——我已毫不怀疑。”

如何看待普法战争的性质，这涉及到确定工人政党对待战争的态度和策略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尽管没有受笼罩全国的沙文主义的影响，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在战争初期，德国进

行的是防御战争，而党的领导机构（不伦瑞克委员会）则应根据战争初期德方在客观上是防御性的，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抨击法国的波拿巴主义上，而没有必要揭露普鲁士容克军阀的侵略阴谋。由于双方意见存在严重分歧，所以都致信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在答复德国社会党人之前，先征求了恩格斯的意见。

经过慎重考虑后，恩格斯于8月15日回信，详细阐述了对普法战争和社会主义党应该采取的策略的看法。恩格斯指出：如果德国战败了，“波拿巴主义就会有若干年的巩固，而德国会有若干年，也许是若干世代的破产。到那时，就再也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德国工人运动，到那时，恢复民族生存斗争就将占去一切。”相反，“如果德国胜利了，那么，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就无论如何都要遭到破产……德国工人就能按照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国规模组织起来，同时，不管法国出现什么样政府，法国工人无疑将获得比在波拿巴主义统治下要自由一些的活动场所。”

根据这一分析，恩格斯把社会主义民主工党应采取的策略归纳如下：

（1）参加民族运动，……只要这一运动是保卫德国的；

（2）同时强调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

(3) 反对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切企图——俾斯麦现在暗示，他打算把这两个地方并入巴伐利亚和巴登；

(4) 一等到巴黎由一个共和主义的、非沙文主义的政府掌握政权，就力争同他光荣媾和；

(5) 不断强调德国工人利益和法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他们过去不赞成战争，现在也不互相交战。

1870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即恩格斯迁居伦敦以前不久，马克思专程去了一趟曼彻斯特，以最后确定这个纲领。他们联名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阐述了普法战争行将结束的第一阶段，指出了德国在战争中所面临的选择，“这场战争是有利还是有害，完全取决于德国胜利者当前的行动。

如果他们夺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那么法国就会联合俄国共同对德国作战。这种战争的致命后果是没有必要加以说明的。

如果他们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那么这场战争就会把欧洲从俄国人的独裁下解放出来，就会使普鲁士溶于德国之中，就会使欧洲大陆的西部获得和平的发展，最后，它还会促进俄国社会革命的爆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

须协调一致的行动，争取最好的结果。“如果德国工人阶级不众口一辞地说出他们的主张，那些恶棍和傻瓜就会肆无忌惮地继续他们的疯狂的赌博……所以德国工人阶级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和帮助下，不伦瑞克委员会很快便纠正了错误，这个委员会在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代表德国工人阶级，抗议德国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并公开声明“忠实地拥护无产阶级共同的国际事业”。身为国会议员的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国会的讲坛上，对普鲁士政府的对外战争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们呼吁欧洲各国人民“争取自决权利，并且把国家和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即现今的军阀阶级统治推翻”。恩格斯对他们两人的行为十分满意，他在给李卜克内西的夫人的信中说：“公开而坚定地捍卫我们的观点并非一件小事，他们两人在国会的英勇行为使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高兴。”

普法战争爆发不久，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9月1日，法军主力在色当投降，法军统帅麦克马洪元帅和皇帝拿破仑三世都成为俘虏。9月4日，巴黎爆发起义，推翻了第二帝国，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此后，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形势的变化，第一国际必须重新制定自己的

策略和路线，为此，马克思再次请恩格斯帮助。因为德国统治者以德国安全为由，对阿尔萨斯和洛林提出领土要求。为揭露德国反动当局的战争意图，马克思请恩格斯“尽快把有关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的必要的英文军事述评寄来，也许宣言中能用得上。”恩格斯立即照办，马克思把恩格斯寄去的材料，用在9月9日发表的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

宣言揭露了普鲁士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侵略、掠夺政策，并根据恩格斯从军事角度的分析，指出：德国根本不需要占领斯特拉斯堡和麦茨这两个军事要塞作为德国安全的屏障，因为这次战争已证明，一个统一的德国，随时都有能力击退从这两个基地进攻的法军。德国对法国的领土要求，是“在19世纪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

宣言指出，交战双方性质已发生变化，德国已由过去的防御战争演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相反，法国正在进行的战争则具有防御性质。据此，宣言指明了两国工人阶级应采取的策略和路线：德国工人阶级应坚决反对本国政府侵占法国领土的任何企图，并要求德国“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法国的工阶级则既要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即反对德国的侵略，又要镇静而坚决地利用共和

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自己阶级的组织”。

普法战争爆发不久，伦敦的《派尔——麦尔新闻》找到马克思，请他以军事记者的身份到普鲁士，为这家报纸撰写军事通讯。马克思认为对军事问题有深刻研究的恩格斯更适合担任这一角色，于是向编辑部推荐了恩格斯。他在邀请恩格斯撰稿时指出，尽管《派尔——麦尔》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它也有几个优点：第一，在有威望的报纸中，它是唯一对俄国采取某种反对立场的报纸。这在战争进程中会有重要的意义；第二，作为一家贵族的报纸，在所有俱乐部，特别是在军事俱乐部起着主导作用；第三，它是伦敦唯一没有被收买的报纸。

《派尔——麦尔新闻》在六、七十年代是颇为保守的报纸，它的负责人是欧文主义者约翰·瓦茨，40年代与恩格斯有一定交往，在保守的总编辑格林伍德面前，他虽然不允许恩格斯公开支持无产阶级，但还是允许恩格斯结合历史、政治来阐述军事问题。

这样，恩格斯以《战争短评》为标题，陆续写了59篇军事报道。由于多种原因，恩格斯并没有去普鲁士。但是，他的战争短评有根有据，分析合理而准确，他的预言往往在一两天内便得到印证。因此，他的文章很快便在伦敦引起轰动，许多报刊，包括像《泰晤士报》这样最权威的报纸争相转载和引用恩格斯对

战争的分析。马克思在 8 月 3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如果战争再延续一些时候，那你很快会被公认为伦敦的头号军事权威。”

战争爆发初期，英国整个新闻界，甚至政府人士都预测法国将取得胜利，恩格斯在详细分析了两国军队的编制、装备和战略战术后，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他指出，波拿巴的对手仅是国王威廉，“亚涅山大”（这是一个带讽刺意味的词——引者注）还有德意志民族。法国军队不能痛快地渡过莱茵河，只采取会丧失战机的措施——长途行军。所以，法国几乎毫无获胜的机会。而“德军在数量上将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只要他们不犯大错误，就足以取得胜利。”1870 年 8 月 26 日，恩格斯甚至预言，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军主力可能将被迫在梅济埃尔和沙尔蒙——纪韦之间法国那片向比利时领土突出的狭窄地带投降。一个星期后，战争的结果正应了他的预言。他预言之准确，令当时英国的军事家也深为折服。

与一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不同的是恩格斯并不仅仅从狭隘的军事角度分析军事行动，他能从政治、经济等多方位来考察战场上的得失。他在 1870 年 8 月 31 日《战争短评（十四）》中分析法军失败的原因时说：“一个高尚而勇敢的民族眼看着自己为了自卫而作的一切努力白费，这是 20 年来它听凭一群

冒险家主宰它的命运，而这些冒险家已经把行政机关、政府、陆军、海军，实际上把整个法国都变成了他们牟取暴利的源泉。”

色当战役后，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恩格斯在《战争短评》中无情揭露了普鲁士统治者的野心，严厉谴责了普军在法国的种种暴行。他指出：“一切都是系统地按照命令进行的：把遭难的村庄包围起来，把居民驱逐出去，把粮食夺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法国中部，凡是德军游动队经过的地方，沿途常常是烟火弥漫，血迹斑斑。”这是一种“强盗行为和可耻的凶杀行为”。

德军围困巴黎后，恩格斯认为扭转战局的唯一途径是开展人民战争，把坚守要塞的正规战同游击战结合起来。

“当入侵敌军……全部兵力都被牵制在占领区内时，法国在其余 $5/6$ 的地区内可以建立足够的武装部队，用来到处袭扰敌军，切断他们的交通线，破坏桥梁和铁路，毁掉他们后方的粮食和弹药……如果每个城市和几乎每个村镇都变成要塞，每个农民和市民都变成战士”那么，任何强大的力量“都不足以征服这样的民族”。

恩格斯的《战争短评》在英国引起很大轰动，多家报纸争相转载，有的还将其作为社论发表。《旁观

者》报称恩格斯的文章是“英国报刊上唯一出色的文章”。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兴奋地告诉他：“您可能想象不到，您的文章在这里多么轰动一时啊！这些文章写得如此惊人地清晰明了，使我不能不把你称作小毛奇。”

恩格斯的军事才能赢得了朋友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将他称为“我们的总参谋部”。从此，恩格斯便有了“将军”这个绰号。恩格斯在世时，这是朋友们和战友们对他用得最多的称呼。

第十九章 巴黎公社和总委员会

让资产者去庆祝他们的 7 月
14 日或 9 月 22 日吧。无产阶级的
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 3 月 18 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0 年 9 月 20 日，即恩格斯迁居伦敦的当天晚上，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吸收恩格斯为委员，10 月 4 日，恩格斯经全体一致同意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这样，恩格斯又可以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新莱茵报》编辑部一样，同马克思并肩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工作了。

恩格斯被选入总委员会不久，就担负起了总委员会的部分重要工作。从 1870 年冬天到 1871 年夏，恩格斯担任了总委员会比利时通讯书记，1871 年 9 月又兼任意大利通讯书记，以后又兼任过丹麦、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讯书记。恩格斯卓越的理论水平和超凡的语言才能，使他迅速成为总委员中地位仅次于

马克思的重要领导人。

当时，总委员会面临的一大任务，是支持英国工人阶级开展的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群众运动。英国工人非常同情 1870 年 9 月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到处举行声援法国的集会和游行，但是，总委员会内部对英国工人阶级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未能取得一致意见。1871 年 1 月 31 日，恩格斯建议总委员会讨论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现阶段应采取的策略。在会议上，恩格斯论证了英国工人阶级应迫使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场，他认为，像大不列颠这样一个大国承认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将提高法国与俾斯麦和谈时的地位，甚至在不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情况下也可能结束普法战争。会议经过激烈地辩论，通过了恩格斯的提议，最后决议指出“工人阶级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首先应当集中全力迫使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1871 年 3 月 19 日，巴黎发生革命，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的消息传到伦敦，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们曾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多次讲座法国的形势，他们对从巴黎传来的消息感到不安，认为法国政府的一系列挑衅行为有可能导致工人过早起义。恩格斯早在 1870 年 9 月就曾对马克思说：“假如人们在巴黎能做点什么的话，那就应当阻止工人在

缔结和约之前采取行动。”因为这样他们将面临德国军队的镇压，会使法国工人运动倒退 20 年。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的判断，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也指出：“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阶级应利用共和国所提供的自由，加强自己阶级的组织。但是，当巴黎的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并夺取政权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站在他们一边，成为巴黎公社最坚定的支持者。

巴黎公社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于这一时期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第一国际影响下法国工人阶级觉悟不断提高的结果，所以恩格斯说公社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同时，巴黎公社又是法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标榜“抗战到底，绝不投降”，并扩大组织了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短短几天内，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防御目的编入国民自卫军和武装起来，使得过去主要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成为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力量。正是这支武装力量使巴黎免遭沦陷。1871 年 1 月 28 日，梯也尔政府同普鲁士政府签订停战协定，公开投降了。法军交出了炮

台，卸下了城墙上的大炮，基干团和流动自卫军交出了武器，被宣布为俘虏。但是，国民自卫军仍保持着自己的全部武装，使得胜利者不敢凯旋进入巴黎。20年后，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十分自豪地写道：“巴黎的工人们竟快使一支使帝国一切军团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竟不得不正式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在共和国政府已经同德国缔结了和约的情况下，巴黎的工人阶级仍坚决要求继续进行斗争，国民自卫军联合会提出了“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口号”。梯也尔对巴黎的工人武装深为恐惧，他意识到，只要巴黎工人还握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境地”。因而，梯也尔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武装，在得到俾斯麦的默认后，梯也尔加紧调动他最可靠的部队。与此同时，广大工人群众也在加紧武装自己。3月3日，《人民呼声报》号召“每个公民都应当拿起武器。”3月18日，梯也尔下令解除工人武装，夺取工人大炮，挑起了内战。巴黎的工人阶级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迎接了反动政府的挑战，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便肃清了城内

的反动军队，夺取了政权。梯也尔带领政府官员和为数不多的亲兵卫队逃往凡尔塞。巴黎沸腾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诞生了。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3月19日得到了关于巴黎的最新消息，他们立即收集和分析关于巴黎形势的所有报道，并积极同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进行联系。国际的巴黎支部很快便送来了可靠的情报，这使得恩格斯能够在3月21日，也就是巴黎起义的第三天，在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巴黎起义的报导。恩格斯根据翔实的材料，驳诉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和报刊对巴黎工人的诽谤，巴黎工人突然夺取了很多大炮并且不肯交出来，法国政府的行动只是为了惩治这些人。对此，恩格斯指出，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士兵筹款置备的，并且希望把它们保存在自己那里。但是，2月份选举后，巴黎人民认识到在所选出的那种议会下面共和国决不是处于完全状态的。国民自卫军保留这些大炮完全是为了不受普鲁士侵犯，只是当政府试图清洗巴黎的革命者和夺走大炮时，人民才奋起反抗。

现在，“士兵们也倒向人民方面了……城市掌握在人民手里；没有转到人民方面的军队被调到凡尔赛去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一个是名人……但是他们在工人阶级中间却是很出名的。委员会里

有四个国际会员”。恩格斯指出，如果巴黎人民能使普鲁士站在斗争之外，“成功的机会就增多了”。

恩格斯和马克思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同巴黎的革命者建立联系。3月底，他们派遣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法国的赛拉叶去巴黎，负责公社与国际之间的联系；另外，他们还通过当时住在波尔多，有时去巴黎的拉法格和俄国革命家拉甫洛夫转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有关公社的军事方面问题的意见，大多是恩格斯提出来的。公社领导人基本上都没有军事经验，所以在同凡尔赛军队的作战中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机会。4月8日，正在巴黎的拉法格致信马克思，希望恩格斯能到巴黎来发挥他的军事才能。但是，由于马克思收到信时巴黎已被封锁，而且，这一时期马克思疾病缠身，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任务几乎全部落在恩格斯身上，使他无法脱身。

但是，恩格斯一直密切注视着巴黎的军事形势，4月11日，在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他心情沉重地分析了公社在军事方面的失误和公社所面临的严峻的形势，他指出：“向凡尔赛进军，应当是在凡尔赛还软弱的时候，可是这个有利的时机被错过了，看来现在凡尔赛占了优势并在逼迫巴黎……巴黎人正在失去土地，几乎无益地消耗弹药，吃光自己的储备粮……情况是困难的，时机已经不像两星期以前那样

好了。”5月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巴黎城被攻破的可能性，但他又确信，即使城破，但“还有街垒，在这些街垒将第一次用枪炮和组织正规的军队而防卫”。

5月中旬，马克思通过可靠的情报来源得悉，凡尔赛政府与俾斯麦达成协议，德军将允许凡尔赛军队通过德军防线进攻巴黎，恩格斯根据双方军队的部署断定，凡尔赛军队将从巴黎北部绕过德军防线，突然兵临巴黎城下。所以，他认为公社应加强北部的防御。这一意见通过一个德国商人转达给公社，遗憾的是恩格斯的意见未能引起公社领导人的重视。

为了动员各国工人阶级支援巴黎公社，恩格斯领导国际总委员会向欧美各国的工人组织发出了几百封信。无疑恩格斯超凡的语言才能又一次得到充分的发挥，他用十几种文字，向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介绍了巴黎人民的光辉业绩，驳斥了资产阶级报刊对公社的攻击和诬蔑。

恩格斯高度赞扬了公社取得的光辉成就，指出，尽管公社处于被围困的状态，所采取的政策仅仅是一个开端，但是“有些决议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恩格斯特别强调公社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尝试。恩格斯后来总结说：“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

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恩格斯还十分赞扬了巴黎公社所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公社战士中，除了法国人外，还有许多其它国家的革命家，其中流亡法国的几百名波兰人成为保卫公社的坚强的战士，东布罗夫斯基和符卢勃列夫斯基还成为公社的军事统帅，前者为保卫公社而英勇献身。另外，还有许多匈牙利和俄国的革命家参加了公社，其中匈牙利的弗兰克尔还当选为公社委员。公社从诞生之日起，就公开宣布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它拆毁了象征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旺多姆凯旋柱，恩格斯认为这是它“向一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表现的勇敢挑战”。

在总委员会的领导下，欧美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组织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声援巴黎的工人阶级。在德意志、奥地利、瑞士、英国和美国，到处都有声援巴黎公社的活动。

德国声援巴黎公社的斗争规模最大，柏林、汉堡、不来梅、科伦、来比锡、德累斯顿等城市都举行了声援巴黎公社的群众性集会和示威。李卜克内西

在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文章，热情的捍卫公社，抨击资产阶级报刊对公社的污蔑。倍倍尔则在德国国会中，在资产阶级讲坛上宣传公社的原则并向本国的资产阶级提出警告。他向资产阶级议员们说：“先生们……在你们看来，公社的意图无论如何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你们可以相信，全欧洲的无产阶级和一切衷心追求自由与独立的人，目前都注视着巴黎……即使巴黎现在被摧毁，可是我提醒你们，巴黎的斗争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前哨战，我们在欧洲还面临主力战，不消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消灭贫困和寄生现象！’将成为全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

对德国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巴黎公社期间的立场和表现，恩格斯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称赞说：“德国工人在最近这次大危机的时期表现得很出色，比其他地方的工人都强。倍倍尔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的关于公社的演说所有英国报刊都登了，给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月初，凡尔赛军队开始进攻巴黎，5月21日，反动军队攻入城内，从而开始了“五月流血周”。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凡尔赛军队对巴黎革命人民进行了血腥屠杀，“他们用后膛枪杀人还嫌不够快，于是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

屠杀是在贝尔·拉雪兹神甫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进行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在保卫公社和公社失败后，有3万名公社战士被杀，6万名被捕入狱或被流放。

在巴黎无产阶级英勇战斗的时候，马克思向总委员会建议，给国际全体会员写信，说明巴黎战斗的意义，以便在工人阶级中间推广巴黎公社的经验。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这封信。5月30日，当巴黎的硝烟尚未散尽时，马克思在国际总委员会上宣读了这篇题为《法兰西内战》的著作。《法兰西内战》深刻地揭示了革命的原因，阐述了公社历程，说明了公社的原则和它的历史意义。恩格斯指出这部著作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

总委员会通过《法兰西内战》这一文件后，恩格斯负责出版英文第一版和随后第二版、第三版的一切事务。为了使国际的各个支部都能尽快看到这一文件，恩格斯废寝忘食，很快将其译成德文、西班牙文、丹麦文、荷兰文等。20年后，恩格斯为《法兰西

内战》一书写了导言，再次论述了巴黎公社的性质和意义。在1892年3月17日《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中，恩格斯满怀深情地说：“让资产者去庆祝他们的7月14日或9月22日吧。无产阶级的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3月18日。”

公社失败了，一些侥幸逃脱凡尔赛军队魔掌的公社战士逃到了瑞士或英国，他们出逃时，除了随身的衣物外一无所有。在异国他乡，由于语言不通，生活更加困难。从第一批流亡者到达伦敦之日起，恩格斯就积极参加为他们募集资金，安排职业的活动。在国际总委员会上，恩格斯呼吁成立“流亡者基金会”，他说：“现在显然再也不能为流亡者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援助了；因而有必要要检验一下工人阶级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了。”基金会成立了，由恩格斯负责具体工作，募捐和筹集资金的工作是繁忙的，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这里从早到晚都有来访者，连读报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又有人坐在楼上。”总委员会的“流亡者基金会”救济了90多名法国流亡者。

然而，资金方面的救济毕竟是暂时的，因而，恩格斯十分注意帮助公社流亡者寻找工作。恩格斯为此费尽了心思。他常常把需要找工作的流亡者的姓名、特长记在笔记本上，以便找工作时参考。下面是

恩格斯为公社流亡者谋职的札记，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是如何认真为公社流亡者谋取工作的。

“罗伯特·哈普尔，尤尼奥尔寓克勒肯威尔街红狮子 76 (?) 号。能立即安置一位雕版师——他稍通法语。需询问尤尼奥尔。

科列——排字工，已三次记下名字，好象是稍通英语，不过看来这方面并非必需，因为需用法文排字。

茹·柯普芝（法国人），在德勒纳德 (?) 那里工作，托登楠大院路 11 号，两个青铜匠——一人是作字模的金属雕刻师，另一人是画师，绘图员，铸模工，两人均技艺精良。”

恩格斯的家也成为公社流亡者的避难所，恩格斯热情的接待和周到的关怀，令公社流亡者终生难忘。公社的军事统帅，波兰革命家符卢勃列夫斯基在 7 年后仍满怀感激的给恩格斯写信说：“在我流亡伦敦期间，你的家和马克思的家成了我唯一的，真正充满友情的避难所，在这里你们对我多么友爱和仁慈。”在恩格斯有生之年，他一直关心着公社流亡者的生活。1895 年，他得知符卢勃列夫斯基在一次事故中手臂骨折，需住院治疗，而他本人经济上又有困难。恩格斯非常着急，他马上给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拉法格写信，筹划按月给符卢勃列夫斯基寄钱作医疗

费和养老金。他强调说：“这事有关法国社会主义的荣誉。如果让公社的最后一位将军饿死，法国社会主义今后再不能把 1871 年的公社算在自己的名下了。”

公社的失败，成为各国统治阶级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信号，法国政府把巴黎公社说成是国际的阴谋，号召欧洲列强消灭国际。资产阶级报刊也加入了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大合唱，它们在欧美各地掀起了造谣诽谤运动。恩格斯在谈到公社失败后的形势时说：“到处都在攻击国际，旧世界的一切势力，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警察和报刊，反动地主和资产者，都在争相迫害国际，在整个大陆上，恐怕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千方百计地使这个他们望而生畏的伟大的工人兄弟同盟处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

作为国际主要领导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在公社期间和公社失败后，在各种报刊上英勇捍卫革命，替“冲天的巴黎人”辩护，因而激怒了各国的资产阶级，各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在攻击巴黎公社的同时，也起劲对这两位革命导师进行造谣中伤甚至人身攻击。恩格斯年迈的母亲从德国报刊上看到这些流言蜚语后，信以为真，写信责备恩格斯的立场，并把这一切归咎于马克思的影响。

恩格斯要让所有的人包括自己的家庭了解事情

的真相，他不允许对公社的事业有任何的误解，在回复母亲的信中，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报刊的无耻谎言，他说：“那些在战时把所有法国报刊上的东西都看作是谎言的人，现在却把警察局的每一个捏造和卖身投靠的巴黎下流报纸对于公社的每一个诽谤，都当作福音书一样在德国各地传布……，由于照普鲁士的样板枪毙了几个人质，由于照普鲁士的先例烧毁了几座宫殿——而其余一切全是谎言——就大叫大嚷起来，而对于凡尔赛分子枪杀已经解除武装的 4 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事，却无人谈论！”恩格斯提醒母亲回忆老拿破仑统治时期的道德协会的会员，1871 和 1831 年的蛊惑者，1848 年的人们，都曾经被诽谤为真正的食人生番，而后来总是证实，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坏，只是那些自私自利的迫害狂，给他们编造了各种骇人听闻的故事，他说：“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这些捏造的恶行时，会记起这些，这样你对 1871 年的人们也就会怀有好感。”

在谈到他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和母亲对马克思的误解时，恩格斯断然指出：“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 30 年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假如事变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不仅会保卫它，而且在其它方面也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你也不应该觉得突然。我要是不这样

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惭愧。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并且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似乎是我把他带坏了。”

恩格斯在回答和反驳任何对巴黎公社的责难的同时，又积极投入了国际总委员会的工作。此时，国际工人协会面临着成立以来最大的困难，外面是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协会各国支部的迫害和攻击，内部又面临着巴枯宁主义的挑战。

巴枯宁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其创始人是俄国的巴枯宁。巴枯宁是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他反对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认为国家是一切祸害的根源，无产阶级专政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巴枯宁根本否认工人的政治斗争，认为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争取政治权利是承认资产阶级国家，将延缓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巴枯宁主张，依靠流氓无产者，毫不犹豫地毁灭这个世界的地位关系和任何人“消灭任何国家和权威，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权威，实现阶级和个人平等的无政府社会。

公社失败后，巴枯宁认为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国际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大言不惭地自称是公社精

神的真正继承者，公开向国际提出了挑战。

1871年7月28日，恩格斯在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在伦敦召开秘密代表会议。因为巴黎公社后，欧洲大陆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在欧洲某个国家举行公开的代表大会了，在伦敦，也要提防资产阶级政府可能的迫害。

秘密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由恩格斯负责。为了使代表会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恩格斯尽了很大努力，他一方面给各国的支部写信，希望他们尽可能派代表参加，另一方面，他适当依靠公社的一些流亡者，请他们参加代表会议，以加强其中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

代表会议于1871年9月17日在伦敦开幕，有很多协会支部未能派代表参加，有些支部则委托总委员会委员为其代表。参加会议的代表中，有很多人从国际成立之日起就矢志不渝地为国际工作者，如法国的欧仁·杜邦和德国的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公社的著名领导人赛拉叶、瓦扬和符卢勃列夫斯基也参加了会议。

伦敦代表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问题。恩格斯在会议的进程中，作了30多次发言，在9月21日的会议上，恩格斯强烈抨击了巴枯宁的观点。指出：“生活的实践，现存政府——

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都迫使工人不得不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后，恩格斯又十分中肯地对与会代表说：“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最明显不过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

出席会议的巴枯宁分子对恩格斯的发言提出了异议，而马克思和几位巴黎公社成员瓦扬·弗兰克尔则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驳斥了巴枯宁分子的论点。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指出：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

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实现这一革命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伦敦代表会议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通过了禁止以秘密团体形式建立国际支部的决议，并规定，总委员会有权将违背国际原则的国际所属团体、小组或个人暂时开除，以听候应届大会的裁决。这项决议显然是针对巴枯宁派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分立派别的活动，目的是杜绝在国际队伍中的任何宗派主义组织。

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引起巴枯宁派的强烈不满，他们借机发起了一场反对总委员会的猖狂运动。1871年11月12日，巴枯宁派的八个支部的代表在瑞士的桑维耳耶镇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一封致国际各支部的通告信，公开指责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违背国际章程，诬蔑国际总委员会是“阴谋的策源地”，“俾斯麦所操纵的德国人民委员会”，要求召开国际非常代表大会来撤销代表会议的决议。恩格斯在看到这个通告后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1872年1月3日，恩格斯给李卜克内西主编的

《人民国家报》寄去了一篇批判巴枯宁主义的论文，题目为《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在文章中，恩格斯气愤地说：“正当旧社会的一切势力联合起来用暴力手段破坏国际，而团结一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必需的时候，瑞士某个角落里的一群人数不多的……国际会员，竟然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公开的通告，来在国际会员中间制造纠纷。”

为了向国际无产阶级揭露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真面目，1872年春天，恩格斯与马克思合写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内部通告，经总委员表决通过，分发给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联合会。

与此同时，恩格斯还给与他有联系的各国联合会的领导人写信，批判巴枯宁主义的理论，揭露巴枯宁分子阴谋。他在给那不勒斯支部成员帕迪诺的信中强调说：“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代表大会的决议等，都属于同一范畴……任何一个团体，即使是最革命的团体，都非有它不可”。在给都灵支部的特尔察吉的信中，恩格斯着重论述了巴枯宁派所极力攻击的权威的重要性，他写道：“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打败自己的敌人，那时，我认为这就是权威行动。如果巴黎公社的权威和集中稍微多一些，那末，它就会战胜资产者……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

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两种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尽管巴枯宁的理论是那样不堪一击，但在搞阴谋诡计方面却十分内行。巴枯宁分子通过秘密活动，搞垮了国际在西班牙、瑞士和意大利的许多支部。1872年7月5日，恩格斯针对巴枯宁派的宗派活动，建议总委员会将巴枯宁秘密组织开除国际。经过激烈争论，国际总委员会决定在即将召开的海牙代表大会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巴枯宁的宗派主义问题。

为了保证革命力量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优势，恩格斯作了大量的工作，他特别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派出一个强有力的代表团，来参加海牙代表大会，因为这次大会将关系到国际的生死存亡。

1872年9月2日，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在出席会议的65名代表中，有许多久经考验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如库格曼、拉法格、瓦杨、列斯纳、赛拉叶库诺、左尔格等，而无政府主义者和英国工联主义者只有十几人。

大会围绕组织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巴枯宁分子吉约姆提出了否定一切权威的原则，反对总委

员会拥有集中的权力，认为总委员会不应成为“伟大身躯的大脑”，甚至要求取消总委员会，吉约姆等人的观点，遭到了与会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驳，来自美国的工人活动家左尔格形象地说：“如果吉约姆希望国际工人协会是无头的，那末他就把国际工人协会降低到了低等动物肌体的水平，我们则希望它不光有一个头，而且有一个大脑发达的头，如果敌人开炮的话，我们决不会只有霰弹回击的。”

受总委员会委托，恩格斯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恩格斯利用充分的证据，揭露了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破坏国际的阴谋活动。指出：“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秘密阴谋，其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代表大会通过了把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议。

由于欧洲各国统治者对国际进行变本加利地迫害，国际内部又有巴枯宁分子的破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议将总委员会驻地迁到纽约。对此，恩格斯解释说：自国际建立以来伦敦一直是总委员会的驻地，那是因为伦敦能够保障它的国际性，总委员会委员和文件在那里也十分安全，但是，现在“在伦敦，

党内分歧已经非常尖锐，所以必须改变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而且，“也终究需要换一换地方，以免出现我们不希望出现的僵化现象”。在当时看来，纽约无疑是比较合适的地点，“在纽约我们的文件是会安全的，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新的组织，在那里我们的党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具有真正的国际性质”。大会经过激烈辩论后通过了恩格斯的提案。

海牙代表大会后，国际工人协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美国度过了有名无实的4年后，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在纽约宣布解散。实际上，早在1874年，恩格斯就已经为它划上了句号。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说：“十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可是，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任何想使它重新获得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会是愚蠢而徒劳的。”

恩格斯满怀信心地迎接下一个国际的诞生“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第二十章 收拾无聊的杜林

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落到我的手里，我已经拟定好了计划。开始时我将纯客观的似乎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和庸俗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巴黎公社被镇压下去，随后国际工人协会宣告解散，国际工人运动处于一个低潮，欧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获得了相对较充裕的时间从事科学理论研究。为了继续指导各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具体的分工。马克思把主要精力用于《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恩格斯则“要在定期报刊上，特别是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

1875 年，德国两大工人组织——信仰拉萨尔主义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哥达合并了，这次合并是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对于促进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起着积极作用，但是，合并后的社会民主党通过了一个充斥拉萨尔主义的纲领，“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该加以批判的”。恩格斯在给尚在狱中的倍倍尔的信中对这个纲领进行了猛烈抨击，过了七八个星期，马克思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一文，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纲领的批评要点，写得更加详细，并且用许多新的结论作为补充，这就是到 90 年代初期才公开发表的《哥达纲领批判》。

庆幸的是资产阶级新闻界并没有发现纲领中的错误观点，相反，他们以非常严肃的态度看待，分析这个纲领，并按照共产主义的观点，对纲领作了解释，德国工人阶级在实际斗争中也没有受纲领的约束。鉴于此，恩格斯和马克思只是在与倍倍尔和白拉克的通信中批判了这个错误的纲领，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

合并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巨大发展，党员人数增加了，工会运动的力量壮大了，影响范围也广了。在 1877 年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一举取得了 12 个席位。没隔多久，恩格斯高兴地断言，对妥

协性纲领的担心，并不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哥达纲领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思想上带来的混乱也是显而易见的。合并不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德国党内泛滥起来，杜林主义就是这些思潮的典型。

杜林于 1833 年出身于普鲁士官僚家庭，12 岁时父母双亡，被送进国立孤儿院。1853——1856 年在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28 岁时成为获得博士学位的法学家，后来任柏林议会法庭高级见习法官，30 岁时双目几乎完全失明，被迫退出司法界，然而几乎是同时，他又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63 年，他受聘担任柏林大学哲学系讲师，颇受大学生青睐。据曾听过他讲课的白拉克讲，杜林“头脑敏锐，知识丰富”。

杜林是个狂妄之徒，他自称精通数学、逻辑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物理学等六门科学。而事实上，由于青年时代即双目失明，这种生理的缺陷使他对任何一门科学都不精通，可是，就这样一个瞎子，特别喜欢舞文弄墨，从 60 年代中期，杜林开始著书立说。1867 年 9 月，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后，杜林发表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评，胡说马克思的学说在去掉一些奇形怪状的外衣之后，充其量不过是英国的或李嘉图的政济经济学

的老生常谈，从而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他还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施泰因死板的三段论相提并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恩格斯在读了杜林的评论后当即写信给马克思，认为杜林的评论“可笑极了”“整篇文章显得狼狈不堪，惶恐不安”。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也斥责杜林“是一个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而实际上却是“在进行欺骗”。

杜林在发表评论《资本论》的文章时还是个小人物，社会上知道杜林其人的还不多，他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也不大，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拿他当回事，在报刊上同他公开论争。

到了 70 年代，杜林更加猖狂。他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和“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自居，变本加厉“向当代挑战”。他连续抛出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 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3 年），《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875 年）等著作。扬言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实行全面的变革，杜林继承了德国思想界“创造体系”的恶习，臆造了一个庞杂的

折衷主义体系，宣称他的体系是“最后的和终极的真理”。

由于杜林没有资产，在讲演时或著作中有时颂扬巴黎公社或公社的活动家，有时用相当激烈的言辞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杜林虽然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但在与别人谈话时却常常以“党员同志”相称，似乎他也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员。他的种种伎俩，在当时迷惑了不少人，使得他的机会主义观点在德国党内流行起来。而《哥达纲领》给德国党内造成的思想混乱和使党的理论水平下降，也助长了杜林主义在德国党内泛滥。

杜林的假社会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甚至像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这样党的领袖人物也一度受到杜林的影响。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出版后，倍倍尔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题为《一个新的‘共产党’人》的评价文章，其中写道：“这位作者（杜林）在自己过去的经济学著作中是凯利观点的坚决拥护者，而在自己的最新著作中已经转变，站在社会主义者左翼一边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在标题中加给他的党的称号，没有人会比他更加感到惊讶。但是他的观点同科学社会主义理解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选择了

这一称号。”“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继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杜林的最新著作属于经济学领域最近出现的优秀著作之列。所以我们赶紧推荐研究他的这本书。”

作为德国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倍倍尔，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和工人群众轻率地推荐这本连他自己都没有看懂的著作，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恩格斯在得知这篇文章是出自倍倍尔的手笔之后，非常气愤，对德国党的领导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德国党的另一重要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由于对杜林认识不清，对恩格斯的批评也不以为然，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你们认为此人是个无赖或暗藏的敌人是否有根据呢？我了解到的关于他的情况使我深信，他虽然有些糊涂，但十分诚实，并且坚决站在我们一边。那篇受到你们指责的文章并不是完全正确和令人高兴的，不过意思无疑是好的，也没有产生什么坏影响。”然而，这不过是李卜克内西一厢情愿罢了。

尽管杜林的全部作品和思想在科学上的价值“并不比一只空蛋壳大”，但由于德国党的领导人对他的吹捧和迁就，使得杜林的思想在德国党内迅速扩大，一大批党的骨干分子都成了杜林的狂热追随者，据当时还很年轻的伯恩施坦后来回忆：“我受到杜林著作的鼓舞，把它介绍给其它社会主义者，他们

的反应都和我一样。”“在我看来，他用任何人所不及的科学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也可以说是继续了马克思。”总之，“杜林做到了使柏林运动领导人几乎全体都赞成他的学说”。

更为恶劣的是杜林还采取拉拢手段，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以约·莫斯特为首，包括伯恩施坦、弗里彻、恩斯、舒尔茨、格罗特考等人在内的宗派小集团，他们把杜林吹捧为“精神领袖”。对此，恩格斯指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地成为一种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支力量，第一个条件是不让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受到危害。而杜林博士却公开地着手在自己的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政党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1875年，杜林出版了《哲学教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本人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说马克思“观点的狭隘性……他的著作和成就，从本身看来，即从纯理论的观点看来，对于我们的领域（社会主义批判史）没有长远意义，而对精神潮流的一般历史来说最多只是近代经院哲学中一个支脉的影响和征兆……进行集中和条理化的能力的薄弱……思想和文体的不成样子，语言上的下流习气……英国化的虚荣心……欺骗……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

幻想的杂种的荒谬概念……虚伪的辞令……个人的虚荣心……恶劣的作用……无耻的……装作机智的笨蛋和蠢货……中国式的博学……哲学的和科学的落后。”甚至咒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粗野、迟钝的犹太人理论家”。

杜林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攻击，暴露出他的真实面目，他使越来越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清了杜林的丑恶嘴脸，并意识到杜林主义对德国党的恶劣影响。德国党的理论家白拉克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柏林到处都有杜林的信徒，在有才干的同志中间，也不时听到赞扬杜林的话，因而，批判杜林的工作必须马上动手，不然就太迟了。李卜克内西也逐渐意识到了杜林主义的危险性，认为有必要予以批判。他在1875年2月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询问：“你是否愿意写篇文章（严厉地）清算杜林？他在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第二版中重复了他对马克思充满忌妒的全部愚蠢谰言。我在圣诞节的前夜听了这个人的演讲，他除了夸大狂和极端忌妒马克思外，什么也没有，他的思想已经深入我们许多人的脑海里，必须彻底收拾他。”之后，李卜克内西又多次写信给恩格斯：“你必须下决心收拾杜林”，“请尽快和尽量彻底地批判杜林的著作。”

李卜克内西的反复催促，使恩格斯和马克思意

识到杜林思想的传播已成为德国党的心腹之患，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将会给德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危害。于是，恩格斯决定暂时放下《自然辩证法》的写作，集中精力“收拾无聊的杜林”。1876年5月2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在德国，一批受雇佣的煽动家和浅薄之徒大肆咒骂我们党。这些人以为，杜林对你进行了卑鄙的攻击，就使我们对他无可奈何，因为倘若我们讥笑他在理论上的无稽之谈，就会显得是对他的人身攻击进行报复！结果是，杜林愈蛮横无礼，我们就应该愈温顺谦让……总之，这件事把我气坏了，试问，难道不是认真考虑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的时候了吗？”

马克思第二天便回信表示：“‘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由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已进行了明确的分工，马克思集中精力从事《资本论》的第二、三卷的写作以及其它理论方面的研究，恩格斯承担党务方面的工作，所以，批判杜林的任务自然要由恩格斯来做。他在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半开玩笑地说：“你说得倒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体的俄国土地关系和一般的地租，没有什么事情打搅你。我却不得不坐硬板凳，喝冷酒，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但是，既然我已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论战，那

也只好这样了，反正我是得不到安宁的。”

接着，恩格斯向马克思谈了他批判杜林的计划：“开始时我将纯客观地，似乎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和庸俗的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

当然，批判杜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杜林创造出来的思想体系可谓包罗万象，涉及当时的各种科学领域，要批判杜林的“创造体系”，既要对他的体系有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又要广泛地研究各种科学，这样才能对杜林进行彻底的清算。对此，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第三版序言中指出：“杜林先生的‘体系’，涉至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看眼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

从1876年6月到1878年7月，在马克思的配合和支持下，恩格斯用了两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反杜林论》。从1877年1月3日，陆续发表在德国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人民国家报》自1876年起改名为《前进报》）上。到1878年7月初，全书以三组论文的形式出版。

正如恩格斯在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反杜林论》所阐述的世界观,是他与马克思共同创造的,现在又由他们一起来捍卫。在具体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也给了恩格斯许多帮助,马克思不仅阅读了全部书稿,而且还亲自撰写了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也可以说,《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总结。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把科学共产主义看作是一个体系,然而,只是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才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整个体系,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和主要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这部著作又被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用恩格斯自己的话就是“我们百科全书式地概述了我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

1877 上 1 月,恩格斯的文章在《前进报》一发表,便在德国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李卜克内西称恩格斯的文章写得“真出色”;白拉克也说,文章写得好极了,“我从中得到很大满足”。另一国际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列斯纳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在新的一年之初,不会有比这更好,更有价值的作品了”,并建议将其译为英文和法文。

然而,恩格斯的文章刺中了杜林分子的要害,使

杜林及其支持者暴跳如雷。杜林心怀不满地注视着恩格斯的文章，他在课堂上极力诋毁所谓的“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他对马克思更是恨之入骨，在杜林看来，“马克思先生是通过他的‘管家弗里德’，即以前曾经统治工人的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工厂主，来对我进行诽谤和辱骂的，骂我粗野，甚至欺骗”。杜林分子的重要人物恩斯在杜林的指使下，发表了题为《恩格斯对人的健全理智的谋杀，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科学上的破产》的小册子对恩格斯进行了卑鄙的人身攻击。

在1877年5月27日——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杜林分子公开向党挑战，莫斯特在向大会提交的议案中说：恩格斯在最近几个月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太冗长了”，丝毫不能引起《前进报》大多数读者的兴趣，甚至还引起了极大忿慨，这类文章今后不应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另一杜林分子瓦尔泰希则声称恩格斯的文章是失策，给党和报纸带来了巨大损失。对杜林分子的挑战，李卜克内西予以了坚决的回击，他指出：“不能苛求《前进报》编辑部限制像恩格斯这样一个在科学上只有马克思才能与之相比的人应该写多长或应该写多短。这种文章肯定是长的，而且必须是长的，因为这是在全面反击杜林……并对他的整个体系从哲学、

自然科学和经济方面加以批驳。在这方面，恩格斯做得很出色……自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以来，这些收拾杜林的文章是党内涌现出来的最重要的著作……。而且，对付一个论敌本来就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彬彬有礼地轻描淡写是无济于事的……杜林先生的追随者无权指责语言粗卤和‘骂人’，因为在这方面，谁也比不上杜林。”

由于双方斗争激烈，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倍倍尔的妥协性提案，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章继续在党的机关报《前进报》的附刊上发表。

《反杜林论》最初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在《前进报》上发表，1877年7月，李卜克内西将本书第一编《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收集成册，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第二年七月，本书的第二、三编也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几乎在同时，恩格斯将全部三编汇集成书《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这部光辉的论著成为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同等重要的经典之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在《反杜林论》的第一编中，恩格斯着重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系统论证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

恩格斯之所以从哲学入手批判杜林，是因为杜林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势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从而研究这一体系本身”。

杜林吹嘘自己创造了新的哲学体系。实际上，杜林的哲学不过是康德的先验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统一体。杜林把自己的体系分为三个部分：“这就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最后关于人的学说。”恩格斯对这一体系进行了解剖：“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全书》以及它的全部热昏的胡话同杜林先生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对照一下，在杜林先生那里首先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这在黑格尔那里称为逻辑。其次，他们两人各自把这些模式或逻辑范畴应用于自然界，就是自然哲学；而最后，把他们应用于人类，就是黑格尔叫做精神哲学的东西。”杜林所谓的创造就是“忠实地抄袭《全书》”。恩格斯正是按照杜林的哲学体系，对它逐部分地进行解剖、批判，并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杜林把原则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就存在着“存在形式的基本原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就是这些原则的应用并要

适应这些原则。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原则在先”的谬论，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而杜林先生则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这完全像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

随即，恩格斯又批判了杜林的“世界模式论”。根据杜林的解释，世界不是统一于物质，而是统一于存在，然而这个存在并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离开客观世界的抽象思维。在杜林看来，先有思维的统一，然后才能引导出世界的统一。这样，杜林就颠倒了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本来的关系，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观点时，发展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他指出：“世界的真正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

恩格斯在批评杜林关于时空有限的谬论时，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时间、空间和运动的理论。恩格斯指出：“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

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在批判杜林没有矛盾的无限性谬论时，恩格斯论述了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事情就是这样。”“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灭了，那就是无限性的终结。”

杜林认为，世界最初处在“宇宙介质的状态”，即物质和机械力统一的状态。这种状态是静止的，只有当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停止时，运动才开始，世界进入可以计数的发展阶段。这也是十足的谬论。特别是杜林不能解释世界是如何由静止转变为运动的，他只能求助于“上帝之手”推动。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这一观点时，进一步论证了物质和运动的关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名论断“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为了说明物质运动的多样性及其相互转化，恩格斯还考察了物质在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领域的运动形式。

杜林将自己的哲学吹嘘为“终极真理”，并且宣称：“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是不受时间和现实变化的影响的，对他的“终极真理”的怀疑“完全是

愚蠢的”。恩格斯驳斥了杜林的狂妄叫嚣，阐述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已经数出来的无限数这一著名的奇迹。”然而，这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恩格斯还批驳了杜林对辩证法的攻击。杜林在《哲学教程》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换句话说就是“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他攻击辩证法是“背理的顶点”。恩格斯针锋相对，提出了相反的命题和论据，他指出：“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但是，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

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然而，恩格斯提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从而揭示了物质运动的根源。

恩格斯还根据自然科学的新发展，论述了量变和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最后，恩格斯给唯物辩证法下了一个经典式定义：“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以及与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区别。

在结束对杜林哲学的批判时，恩格斯写道：“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呢？一切。他履行了哪些诺言呢？一个也没有。”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杜林主义赖以生存的哲学体系。最后，恩格斯对杜林哲学和作为哲学家的杜林做了概括总结：

我们“不得不承认，‘新的思维方式’、‘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的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的无稽之谈，可是没有一行字能够使我们学到一些东西。这个人用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乏于最鄙俗的市场叫卖者，而在他的那些大字眼后面却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这个人竟敢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叫做江湖骗子，他们当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恩格斯反问说：“确实有江湖骗子，但

是谁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杜林恶毒地攻击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剩余价值学说，宣扬一套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经济思想体系的过程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杜林声称，他的经济学涉及他的哲学中“已经确立的东西”，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是依据高级的，在更高的研究领域中被完成的真理”。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经济的最一般的自然规律。”

恩格斯在具体地研究了各种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变化后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恩格斯给政治经济学下了一个经典式定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这样恩格斯不仅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区分了“广义的”和“狭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区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所宣扬的“分配决定论”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辩证关系的思想。恩格斯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便不能

发生。”另一方面，两者互相影响和制约，交换范围的扩大或缩小会直接促进或阻碍生产的发展。而“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恩格斯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制度，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并且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蛰居某一个书斋的学者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暴力论是杜林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杜林认为：“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作用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第二等的事实……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寻找。”对此，恩格斯予以了有力驳斥，他指出：“暴力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经济进程的结果，而决不是它的原因”。在分析私有制产生的过程时，恩格斯得出下述结论：“在私有财产形成的任何地方，这都是由于改变了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为了提高

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是由经济的原因产生的。在这里，暴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

在论述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时，恩格斯批判了杜林“暴力是绝对的坏事”的观点。他说：“暴力在历史上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同时，系统论述了马克思关于价值，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的分析是如此简单明了，除了杜林之外，肯定不会有人感到“完全不清楚”。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攻击，“不过是一种军事计谋，狡猾手腕，借以掩盖他在《教程》中对马克思所作的粗暴的剽窃”。“这位忠实的埃卡尔特警告德国青年提防维纳斯，但是他为了自己的需要却悄悄地把他从马克思的领域引到自己家里来了。”

恩格斯在分析了杜林政治经济学的“自造的体系”后，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在一切豪言壮语和更加伟大的诺言之后，我们也象在‘哲学’上一样受了骗。”杜林“在开始的时候，由于自我吹嘘，大吹大擂，许下一个胜似一个的诺言而付出巨大的‘耗费’，而‘成果’却——等于零”。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三编中，批判了杜林的假社会主义，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三大空想家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已经暴露，阶级斗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不充分的结果，三大思想家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罪恶，对未来社会提出了天才的设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

恩格斯也指出了三大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时代局限性和理论上的错误，并说明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恩格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正是在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

然而，杜林对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阶段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立场，尽管他对三大思想家的著作“真正可惊的无知”，但却谩骂三大思想家是“社会炼金术士”。杜林称，“想象和博爱的热情……幻想的夸张，支配着圣西门的全部思想。”而傅

立叶则是“神经错乱的白痴”；欧文的学说充满了“荒唐”和“粗糙”，从而全盘否定了三大社会主义思想家。杜林本人则用他“至高无上的脑袋”制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共同社会结构”模式。恩格斯对杜林的美妙幻想进行了逐条的批判，指出杜林的社会主义没有超过普鲁士资本主义的范围，是“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科学地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轮廓。他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生产将有计划地进行，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另外，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国家也将自行消亡，这时，人类将实现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完成《反杜林论》后，恩格斯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身体上都感到格外轻松，他说：“让我们同我们这个肯定常常是枯燥无味的和令人气闷的题目和和气地，高高兴兴地告别吧。”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从理论上摧毁了杜林主义思想体系，肃清了杜林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影响，使党内许多不甚了解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的人提高了认识，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后起之秀考茨基后来回忆：“当时我们都很尊敬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推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但是，在恩格斯的《反杜林

论》出版以后，我们才开始比较深入地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开始系统地按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和工作了。”

尽管恩格斯的对手“不过是作为一只被缚的干瘪的昆虫而留名于后世的”。但恩格斯在同对手的论战过程中，却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及其相互联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和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必谈的书籍。

正当恩格斯紧张地写作《反杜林论》时，恩格斯的夫人莉希病重，为了帮助莉希治病，恩格斯多次放下手头的工作，陪她在海宾疗养，但莉希的病始终未见好转。

1878年夏天，莉希的病情急剧恶化，恩格斯停止了一切工作陪伴着自己的妻子。这一时期身体状况也不太好的马克思夫妇一有空就过来，他们既担心莉希的病情，又担心恩格斯的健康情况，深恐老战友会过度疲劳。爱琳娜更是每天必到，她以少女的细心照顾着自己的第二位母亲。

然而，亲人们的呵护并未能阻止莉希病情的恶化，莉希和周围的人都明白：她在走向生命的终点。与姐姐玛丽不同，莉希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不愿意以不明确的身份去见上帝。当身边只剩下自己钟爱的丈夫时，她吃力地提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

“亲爱的弗雷德，你能与我举行一个简单的婚礼吗？我应该以恩格斯夫人的身份去见上帝。”

尽管恩格斯不信上帝，更讨厌牧师们的故作姿态，但这一次，为了不让心爱的人失望，他痛快地答应了。

“莉希，我马上派人去请牧师，咱们在家里举行婚礼。”

莉希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恩格斯马上差人去请牧师，并第一次向教堂捐了钱物，当然，他主要是担心教堂的牧师不愿来他这个无神论者的家，恩格斯还请马克思全家来参加婚礼。

婚礼是极其严肃的，参加婚礼的人心情都极其沉重，只有莉希心中充满着无比的幸福。

“你愿意娶莉迪娅·白恩士为妻，并用自己的一生去爱她吗？”牧师手捧圣经，向恩格斯问道。

“愿意”

“你愿意嫁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并用自己的一生去爱他吗？”

“愿意”

莉希的声音是微弱的，但却是坚定的，在场很多人都流下热泪。

“愿上帝保佑你们，阿门”

牧师以尽量快的速度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婚礼结束后，众人将莉希搀扶回自己的卧室，然后各自散去，他们想让这对“新人”单独多呆一会。

“今天我好开心，好高兴”。莉希喘息着对恩格斯说。

“只要你开心，我就高兴。亲爱的，折腾这么半天，好好休息一会吧。”

莉希依偎在丈夫的怀里，宛如新婚的少女。

这对“新婚”的老人，就这样依着，偎着，回味着在一起的幸福生活，几个小时后，恩格斯发现妻子在自己的怀中睡着了，并且永远也不会再醒过来了。她睡的是那样安详，那样开心，好像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是她。

莉希的病逝，对恩格斯是个沉重的打击，尽管没有文化，但她天资聪颖，并深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在他们共同生活的15年中，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丈夫所从事的事业。

恩格斯深深地沉浸在丧妻之痛中，一连几日茶饭不思。为了减轻老朋友的痛苦，马克思把恩格斯请到自己家住了几日，以避免他睹物思人。后来，马克思又邀恩格斯一起到海边疗养一段时间，回到伦敦

后，恩格斯整理了自己的书房，开始继续自己的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他要用加倍的工作来转移自己的痛苦。

第二十一章 研究自然科学

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脱毛”。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丰富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而对于自然科学恩格斯和马克思以前只是进行了零星的，时断时续的，片断的研究。

实际上，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恩格斯便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曼彻斯特经商期间，他开始利用空余时间学习和钻研自然科学著作，并对当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细胞

学说以及生物进化论有了较为透彻的理解。在他的朋友、化学家肖莱马的帮助下，恩格斯在化学方面，特别是有机化学方面掌握了丰富的知识。但是，这一时期恩格斯毕竟没有太多的精力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

1870年，恩格斯退出商界并迁居伦敦，这为他系统研究自然科学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如他在《反杜林论》第三版序言中所说的：“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

“脱毛”一词是德国著名化学家尤·李比希强调化学家应适应化学的飞速发展时用的一个生动而形象的比喻。李比希说：“化学正在取得异常迅速的成就，而希望赶上它的化学家们则处在不断脱毛的状态。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量更轻快。”恩格斯在阅读李比希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一书时看到了这个比喻，并对其非常欣赏，他把自己系统研究和学习数学、自然科学的过程也比喻为“彻底的脱毛”。

从1873年至马克思逝世的1883年，除了中间

1876年至1878年三年间，为回击杜林的挑战而不得不中断自然科学的研究外，恩格斯把八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期间，恩格斯涉猎了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在1876年至1878年收拾无聊的杜林时，恩格斯大量运用了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反杜林论》反映了恩格斯早期研究自然科学的成果。

恩格斯研究物理学首先从经典力学开始，接着又研究了电学、热学、磁学和电磁学，等等。

在研究经典力学时，恩格斯认真阅读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赫尔姆霍茨的《论力的守恒》、《通俗讲演录》等。通过学习和研究，恩格斯对力的本质，对物质与运动，对运动和静止等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例如，对于运动，恩格斯下了如下定义：“运动，就最一般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物质没有运动是不可想象的，运动和物质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在研究经典力学时，恩格斯对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并不盲从和轻信，在肯定他们的研究成果时，也能指出他们理论的错误之处和对科学研究可能造成的危害。

恩格斯在研究和分析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关于“力”的定义和计算时，发现赫尔姆霍茨的计算和用这些计算作证明的定义正相矛盾，他指出：“既然力这个概念甚至在赫尔姆霍茨这样的物理学家的头脑中都引起了这样的思想混乱，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它在从事计算的力学范围以外的任何研究领域中，在科学上都是不适用的……因此，如果有人把运动的原因叫做力，这一点也不会损害力学本身；但是人们习惯于把这个名称也搬到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里面去，这样一来混乱就不可避免了。”

恩格斯对热学、电学和电磁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恩格斯肯定了热力学创始人之一萨迪·卡诺的突出贡献，说他为“正确的见解开辟了道路，”尽管这种正确的见解“不过是把它的前驱所发现的定律倒过来，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而已”。卡诺的研究很巧妙，他的计算方法至今还被广泛运用。而且，卡诺已经差不多探究到问题的底蕴，但他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恩格斯指出，妨碍卡诺完全解决这一问题的，并不是事实材料的不足，而只是一个错误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物理学家用他们的似乎比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强得多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穿凿附会出来的”。即研究问题的方法论阻碍了卡诺取得根本性突破。

在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电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尽管当时电已开始被应用到工业领域为人类服务，但是电这种运动形式的性质却仍然是一个最大的迷。恩格斯在肯定电学取得的突破的同时，又指出了电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当时电学中，“只有一堆陈旧的、不可靠的、既没有最后证实也没有最后推翻的实验所凑成的杂乱的东西，只有许多孤立的学者在黑暗中胡乱摸索，从事毫无联系的研究和实验。他们像一群游牧的骑者一样，分散地向未知的领域进攻。”电学研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个象道尔顿的发现那样能给整个科学创造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巩固基础的发现，还有待于人们去探索。”

恩格斯关注着在电学方面的每一次重大突破，1882年，法国工程师赛尔·德普勒在慕尼黑博览会上成功地进行了远程高压输电。恩格斯很快便认识到这项发明的重大意义，他在1883年2月底写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说：“生产力将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的确，这项发明称得上是电学上的革命性突破，为电的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也使人类由蒸气时代进入了电力时代。

恩格斯对数学的研究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

中，他们在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有力的论证材料。恩格斯十分强调笛卡尔的变数在数学研究中的作用，“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的了”。

恩格斯对化学不仅颇有兴趣，而且有一定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好朋友肖莱马是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另一方面，在化学领域，物质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质变是一种较常见的现象，而这正是证明唯物辩证法量变质变规律的有力证据。

在无机化学方面，恩格斯研究过波义耳，拉瓦锡，道尔顿等人的著作，他认为道尔顿的原子论开辟了化学领域的新时代。道尔顿的原子论同以往原子论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主张物质只是非连续的，而主张各个不同阶段的各个非连续的部分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质的存在形式。道尔顿的原子论给化学领域带来的革命性突破使他称得上是“近代化学之父”。恩格斯还对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的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予以了高度评价，称赞门捷列夫“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个勋业可以和勒维烈计算尚未知道的行星海王星的轨道的勋业居于同等地位”。

由于同肖莱马的密切交往，恩格斯在有机化学领域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肖莱马不仅把自己的学术著作《简明化学教程》，《化学教程大全》。《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等送给恩格斯参考，而且还是恩格斯学习有机化学的老师，每当恩格斯在有机化学方面有疑难问题时，他总是要“进一步问一问氯化马”。

恩格斯在学习和研究化学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丰富的化学基础知识，而且在某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提出了颇具创造性的见解。例如，恩格斯在研究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生理化学之后，提出了“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一著名论断，并进而提出，只要把蛋白质的化学成分弄清楚，那么总有一天，可以通过人工方法制造蛋白质，而且这样的蛋白质也一定会显示出生命现象。现代生物化学已经成功地进行了牛胰岛素的合成，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言。

生物学研究在 19 世纪中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有两个是在生物学领域，即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理论。恩格斯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这些科学新发现，达尔文的著作刚出版，恩格斯就买来研读。迁居伦敦后，恩格斯对生物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如动物学，植物学，细胞学，人类学等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研究。对在这些领域中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几乎都进行了研究，如海克

尔的《自然创造史》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名著。

在系统地研究了从细胞学到人类学等生物学的各分支学科的知识的基础上，恩格斯对生物进化和人类起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也许经过了多少万年，才造成了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种没有定型的蛋白质能够由于核和膜的形成而产生第一个细胞。但是，随着这第一个细胞的产生，整个有机界的形态形成的基础也产生了；正如我们可以根据对古生物学的记录所作的全部类推来假定，最初发展出来的是无数种无细胞的和有细胞的原生生物，在这些原生生物中只有加拿大假原生生物传到了现在；在这些原生生物中，有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渐次分化为最初的动物。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

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如此——从一个单独的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

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

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蕴酿时期，就已经意识到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他警告世人：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恩格斯举例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小亚细亚以及其它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做梦都没想到，他们留给子孙的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保护的松林，这样一来，他们把自己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摧毁了，更有甚者，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枯竭了，而到了雨季，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因此，恩格斯提醒人们要时刻牢记，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即已形成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保护生态平衡的思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恩格斯将这一时期自己的研究成果写进《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这是一部未能最终完成的著作，尽管如此，它还是集中地反映了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许多精湛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目的是为了回击资产阶级在思想意识领域里的进攻，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进入了一个反动时期，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在对工人运动进行镇压的同时，在思想战线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疯狂攻击，宣称马克思主义破产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谬论”，已经被“驳倒”了。

当时流行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影响较大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思潮在科技界以德国

的生物学家毕希纳为代表，在哲学界以英国的哲学家斯宾塞为代表。1872年，毕希纳出版了《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书，把达尔文关于生物界生存竞争的规律机械地应用于人类社会，认为生存竞争是人类社会和生物界共同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人剥削人现象，都是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规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是由人的生物本性所决定的。斯宾塞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符合自然界的规律，是永恒不灭的。毕希纳和斯宾塞之流的意图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他们妄图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并改良社会主义”，因而，“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注意他们了”。

另外，在自然科学领域，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如以赫尔姆霍兹和莫列尔为代表的生理学的唯心主义，他们妄图利用感观生理学来宣传康德的不可知论，宣扬人的知识的有限性，如鹰的眼睛比人看得远，蚂蚁能看见紫外线而人却看不见等等；他们还宣扬感觉不是客观实在的反应，而是一种符号；感觉的源泉在于感觉器官而非外部世界。

另外，19世纪七八十年代，降神术遍及欧美各国，甚至一些自然科学家也成为降神术的狂热崇拜者，如生物学家拉塞尔·华莱士1875年还专门出版了《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公然宣称自己是“科学

的请神者”，搞“桌子跳舞的降神术试验”。针对这一现象，恩格斯专门写了一篇题为《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抨击这种与科学格格不入的宗教蒙昧主义。

可见，恩格斯前后花费了八年的时间，钻研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决不是进行单纯的科学研究，他是要根据充分的自然科学知识证明，在自然界中，也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中一样，辩证法规律是普遍存在的，由此出发，把唯物的和辩证的自然观系统阐述出来，完成自然观方面的根本性变革，从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世界观。

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高兴地写信告诉远在曼彻斯特的马克思：“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接着向马克思详细介绍了这些思想的内容，实际上，恩格斯是描绘了《自然辩证法》的大致轮廓，随后，恩格斯便开始研读各种科技著作，收集有关材料，至1876年，他基本上完成了这部著作的整体构思。他在这年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在自然科学方面，我感到我对于这个领域非常熟悉，我能在这方面进行活动，虽然要十分小心，但毕竟有相当的自由和把握……这部著作的清晰的轮廓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

遗憾的是为了回击杜林的进攻，恩格斯不得不

中止《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转而去收拾无聊的杜林。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运用他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阐述了自然辩证法的一些思想。

从 1873 年到 1883 年这段时间，恩格斯拟定了具体的研究计划，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片段和札记，主要有：《辩证法》、《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的量度——功》、《热》、《电》、《潮汐摩擦》、《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的主要精力用于整理出版《资本论》的第二、三卷，间或也写了一些札记和片断。1886 年，恩格斯在完成《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后，完全终止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他曾把有关本书的全部论文和读书札记分为四束，分别冠以如下标题：（1）《辩证法和自然科学》；（2）《自然研究和辩证法》；（3）《自然辩证法》；（4）《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东西》。

《自然辩证法》在恩格斯逝世后才发表了一部分，在恩格斯逝世 30 周年时，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才以《自然辩证法》为标题，第一次出版了这本书。这本未完成的经典巨著总结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就，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发展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观念。尽管《自然辩证法》全书的内容较

为分散，涉及了多个不同的学科，但是，该书的基本线索却是非常清晰的，它主要集中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述了唯物辩证法自然观代替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必然性。

在本书《导言》部分，恩格斯论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指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把自然科学从神学解放出来，从此科学开始大踏步向前发展，这一时期发展最迅速的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物体和天体的力学，和它同时并且为它服务的，是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主要成就有：确定了最重要的数学方法，主要由笛卡尔制订了解析几何，由耐普尔制订了对数，由莱布尼茨和牛顿制订了微积分；在天文学方面，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牛顿则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确定了力学的三个基本定律，并通过对刻卜勒行星运动规律的分析，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除上述成就外，自然科学的其它部门发展缓慢，物理学在当时尚未超出最初的阶段；化学则刚刚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地质学还没有超出矿物学的胚胎阶段；生物学还处于收集和整理材料的阶段。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

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即形成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这种观点否定了自然界的任何变化和发展。例如在世界的形成这一问题上，即使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也是求助于万物创造者——上帝。

在这个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的是哲学家康德，他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中提出了“星云假说”，康德的这个假说把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说成是“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而非神意的结果。康德还认为，牛顿用“上帝的直接意志”来解释行星的最初运动“是一个苦恼的决断”。在这里，康德显然是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解释自然界的。

打开形而上学自然观第二个缺口的是地质学家赖尔。他认为，“地球表面和一切生活条件的渐次改变，直接导致有机体的渐次改变和它们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导致物种的变异性”。赖尔不自觉地吧辩证法的思想引进地质学中，恩格斯称他“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

物理学中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是打开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第三个缺口。恩格斯将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1842年称为“划时代的一年”。恩格斯介绍说，反映物理学巨大进步的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是由三个不同的人，几乎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总结出

来的。“迈尔在海尔布朗，焦耳在曼彻斯特，都证明了热到机械力和从机械力到热的转化……同时，格罗夫——不是职业的自然科学家，而是英国的一个律师——仅仅由于整理了物理学上已经达到的各种结果，就证明了这样一事实，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

化学的发展，特别是自道尔顿的原子论确立以后化学领域的惊人迅速发展，从另一方面向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进行了攻击”。由于用无机的方法制造出过去一直只能在活的机体中产生的化合物，它就证明了化学定律对有机物和无机物是同样适用的。

最终给予形而上学自然观以沉重打击的是生物学领域的两大发现——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是由德国动物学家施旺和植物学家施莱登建立的。这一学说认为细胞是动物和植物有机体构造和发育的基础；一切有机体都是由细胞按照一定的规律发育生长的结果。恩格斯对细胞学说的建立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有了这个发现，有机的有生命的自然产物的研究——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才获得了巩固的基础，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这个过程是依据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所共同的规律进行的。”

1759年，卡·弗·沃尔弗第一次对物种不变说提出异议，经过了整整一百年后，英国的生物学家经过多年的科学考察和实验，第一次全面系统的论述了生物进化理论。达尔文认为，生物界的一切物种，无论是动植物还是人类，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长期演进的结果。都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恩格斯评价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使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自然观的基本观点。

上述自然科学的一系列重大成就，特别是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和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一切事物和过程的辩证性质，从而给予形而上学自然观以决定性打击，并为唯物辩证法自然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集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他指出：辩证法是“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规律的科学……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这些规律可以归纳为：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

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因此，在实际科学研究中，“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还论述了物质运动的形式和规律。他根据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将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概括为以下四种：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每一种运动都有其特殊的本质和物质承担者，如生命运动的物质承担者是蛋白质，其运动方式表现为同化与异化，遗传与变异。

恩格斯指出，各种运动形式不仅相互区别，而且也相互联系和转化，这种相互转化过程正好体现了自然界的辩证本质。“不管一切渐进性，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天体的力学转变到个别天体上较小

的物体的力学是如此，从物体的力学转变到分子的力学……也是如此……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反应历程，更是如此。”

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恩格斯把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的经典之作。关于人类的起源，这是一个长期引起争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观，在这个问题得到科学的解释之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是各种各样的“神创说”。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起源也成为科学探索的重大课题。18世纪，瑞典科学家林耐第一次提出人与类人猿可能同种，他说“野兽中丑恶的猿和我们多么相象。”达尔文的进化论为这种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达尔文虽然没有专门谈到人类起源问题，但他的进化论也包含着人类是逐渐进化而来的结论。后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猿同祖的思想。但是，无论是达尔文还是赫胥黎，他们都没有解决人类如何由猿演变而来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恩格斯解决的。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一文中明确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样，在由猿转变为人的过程中，恩格斯为这种转变搭起了一座桥梁——劳动。

按照恩格斯的解释，由猿转变为人类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根据考古的发现，人类的远祖，是生活在热带某个地方的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这些发达的猿类，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逐渐学会了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因为“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手的解放使劳动成为可能，但是，“手不仅是劳动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

由于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劳动的发展又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加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正是这种生活的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即可以逐渐发出清晰的音节的器官，“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为两个

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逐渐地变成了人的脑髓。与此同时，同大脑相联系的各种感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

随着人类的出现，人类社会也随之形成了，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创造了人类社会。

这样，恩格斯就彻底解决了猿向人类的转变问题，这一解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恩格斯后来在谈到他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时说：“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加以阐发。

不过，要系统地并且在每领域中都来完成这一点，却是一件巨大的工作，不仅所要掌握的领域是漫无边际的，而且就是在这整个的领域中，自然科学本身也正处在如此巨大的变革过程中，以致那些即使有全部空余时间来从事于此的人，也很难跟踪不失。”

当然，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还很难做到穷其究竟，而且也受到当时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但是，恩格斯根据当时科学研究的成果所阐述的唯物和辩证的自然观，无疑是指导科学研究的科学的方法论。

第二十二章 与“摩尔”共处的最后几年

我们党的最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想，我生平所知道的一颗最有力的心停止了跳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70年代末期，恩格斯觉察到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正在日益恶化，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长期过度劳累和生活贫困所致。神经痛、胸膜炎、喉头炎、支气管炎害得马克思长期无法工作。所以，从70年代后期开始，恩格斯主动承担了马克思的大量事务性工作，包括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通信联系，指导各国工人党的活动，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来访者，等等。

第一国际解散后，欧洲各国的工人组织并未停止活动，只是活动的中心由国际转移到了国内。继德

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后，荷兰、丹麦、美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相继成立了工人政党。这些工人政党尽管并不都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但是，它们都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并在工人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这些党的领导人在理论上和行动策略上也都向公认的国际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求教或请求帮助。

由于马克思的慢性病日益恶化，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所以恩格斯总尽力说服马克思外出疗养，而把指导各国工人运动的重担担在自己身上。这一时期恩格斯的主要工作是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反对非常法的斗争和帮助法国工人建立自己的政党以及关注其它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878年5月11日和6月2日，在德国发生了两起谋刺威廉一世皇帝的事。尽管这两起个人恐怖行动与社会民主党人毫无关系，但一心找机会打击社会民主党的俾斯麦却以此为借口，迫使帝国议会颁布了《反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法》（亦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个法令规定，任何组织，团体、集会、报刊和其它印刷品，凡是“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都一律禁止；当局有权在个别城市和地方宣布“小规模的特殊戒严”，非经许

可不得集会，不得在公共场所散发印刷品，等等。

这个法令将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的境地，一时间，德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法令公布后，先后有 330 个工人组织被解散，300 多种社会主义出版物被禁止出版和发行，大批社会民主党骨干被逮捕或流放。由于长期在和平和合法的环境中从事斗争，缺乏秘密斗争的心里准备和组织准备，在统治阶级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时竟束手无策，党的领导层也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采取正确的立场，并给基层党员以明确的指导。

早在帝国议会讨论这项法律草案时，主持党务的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就不顾倍倍尔的反反对，宣布解散社会民主党，并要求地方党组织自行散伙。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的议员团也发表了一个《帝国议会议员的报告》，公开声称：“我们根本不想革命……我们没有必要推翻俾斯麦制度，我们让它自己垮台”，我们认为“国家和社会正在自然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李卡克内西在统治阶级的进攻面前也做了丧失原则的让步，1879 年 3 月 17 日，李卜克内西在帝国议会中声称：社会主义工人党将遵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因为它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改良政党，而暴力革命行为根本是一种荒谬的事情”。

李卜克内西的发言激起了恩格斯的极大忿慨，他在给德国党的另一领导人贝克尔的信中说：“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中所表现的不适时的温顺，在欧洲罗曼语区显然产生了很不好影响，而且在各个地方的德国人中间也造成了很不愉快的印象”。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恩格斯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应同俾斯麦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要像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恩格斯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把公开的、合法的斗争同秘密的、非法的斗争结合起来。

面对容克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了“左”、“右”两股机会主义思潮。

“左”倾机会主义以杜林的狂热追随者莫斯特为首。1878年底，莫斯特被驱逐出德国，与哈赛尔曼等人一起来到伦敦。莫斯特等人在报刊上公开攻击德国党的领导人，反对用任何合法的形式如议会讲坛，参加选举进行斗争，主张用公开的暴力和个人恐怖等手段对付俾斯麦的非常法。莫斯特还声称，恩格斯是同意他的意见的。鉴于此，恩格斯认为必须予以有

力回击，他指出，莫斯特等人想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革命者，但是，“光在每一行字里重复‘革命’这个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莫斯特等人只不过是企图通过内讧和阴谋来搞垮我们的党。“莫斯特散布谣言说我们支持他，那他是在撒谎”。到1880年，莫斯特因公开走上了反党道路而被开除出党。

右倾机会主义以“苏黎士三人团”赫希伯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为首。1879年初，赫希伯格三人在苏黎士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创刊号上，抛出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回顾》一文，这篇文章公然要求改变社会民主党的性质，由“片面的工人党”转变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文章还要社会民主党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承担责任，说什么拥护巴黎公社“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文章要求今后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要“平静、客观和慎重”。文章甚至宣布，现在“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看到这篇文章后，恩格斯义忿填膺，说这篇文章“实在太过分了”。赫希伯格于9月中旬到达伦敦时，恩格斯向他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给贝克尔的信中，恩格斯说：“我向他说明，我们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抛弃我们高举了将近40年的无产阶级

旗帜，更不用说去赞成我们与之斗争了也将近 40 年的小资产阶级关于博爱的骗人鬼话……一句话，他终于明白了，我们对他是什麼态度。为什么我们不跟他们这伙人一道走。”

1879 年 9 月 17—18 日，恩格斯写了一封致莱比锡《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委员会全体委员——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弗里茨舍以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白拉克等人的正式信件，马克思从兰兹格特疗养地回伦敦后，恩格斯又与马克思讨论了公开信的内容，然由他们两人签名寄往莱比锡。这就是著名的《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简称《通告信》）

《通告信》指出：“苏黎士在三个检查官……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这些大谈和解、妥协和博爱的社会民主党人，实质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和对资产阶级投降”。

《通告信》明确宣布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应坚持的立场和路线，恩格斯写道：“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

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 40 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一道走。”

《通告信》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879 年 10 月 23 日，倍倍尔在给恩格斯在信中说，《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回顾》这篇文章除了原则上的错误外，也是一篇我未见过的迂腐作品，因而我“理解了你的忿慨”。德国党的理论家白拉克也认为这篇文章是企图“破坏党的基础，威胁党的存在”。

1879 年 9 月 28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苏黎士创办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由福尔马尔任主编，虽然福尔马尔在致恩格斯的信中答应按《通告信》的精神办报，但在办报过程中，对当时党内的右倾情绪并未给予应有的回击，恩格斯对这种状况深为担心。

1880 年 12 月 9 日，倍倍尔带领伯恩施坦来到伦敦，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商讨撤换《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福尔马尔的问题，此时，在恩格斯的帮助下，伯恩施坦已经放弃了改良主义观点，并得到恩格斯的信任。

到达伦敦后，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先去找恩格斯，恩格斯在家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并邀两人共进午餐，

午饭后又带他们两个人拜访了马克思，在伦敦期间，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就住在恩格斯家里，他们三个人就目前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交换意见，恩格斯还亲自担任向导，引导倍倍尔和伯恩施坦游览了伦敦的名胜古迹。倍倍尔本来是带伯恩施坦来承认错误的，但恩格斯除了正面引导外并未过多的责怪。特别是恩格斯看到伯恩施坦年轻，而且富有才华，还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因此对他偏爱有加。

征得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同意后，伯恩施坦从1881年起担任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办报的方向和宗旨也有了一定的改变，对此，恩格斯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1881年2月2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说：“新年以后出版的五号《社会民主党人报》说明它有很大的进步……调子变得流利而且坚定了，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报纸就会不是麻痹德国的群众，而是激励他们勇气……总之，继续这样干下去吧！”由于恩格斯的大力帮助和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整个“非常法”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在恩格斯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很快便摆脱了“非常法”初期的混乱状态。1880年党的维登代表大会认真分析了德国的形势，对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纲进行了修改，把原党纲中“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

自己的目的中的“合法”二字删去了。去掉这两个字使党纲的实质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表明德国党已放弃了只进行合法斗争的路线，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把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德国党逐渐扭转了不利局面，党的力量也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对俾斯麦的反动政策进行有力反击。

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大批工人领袖或是牺牲或是被捕或是流亡国外，工人组织被破坏殆尽。但是：“法国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本能的政治觉悟，”所以恩格斯一直关注着法国工人阶级，期待着法国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877年，恩格斯终于又看到法国工人阶级再一次向法国和欧洲显示了自己的力量。1877年5月，当法国的三个保皇派集团联合起来向共和国宣战的时候，工人们万众一心，立即宣布支持共和国是他们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在粉碎保皇派企图恢复帝制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工人阶级是跟在资产阶级共和派走的，但毕竟使沉寂数年的法国工人运动再次活跃起来。而且，共和制的确立，对于法国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它“使法国工人有了一个基础，可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将来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利益进行战斗”。不久，恩格斯的愿望就变成了现实。

1877年11月，以茹尔·盖德为首的一批社会主义者在巴黎创办了《平等报》，该报很快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879年夏天，通过拉法格，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平等报》建立了联系。恩格斯通过拉法格，不时地向盖德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建议。

1879年10月，在马赛举行了法国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多数代表赞成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决议，并委托盖德起草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同时也将成为工人党参加下届议会选举的竞选纲领。

1880年5月初，盖德专程来到伦敦，经拉法格引荐，拜访了仰慕已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晤是在恩格斯家进行的，盖德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党的纲领草案，马克思和恩格斯答应了盖德的要求。

纲领草案分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其中理论性的导言部分是由马克思向盖德口授的，这一部分重申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工人政党的历史任务。恩格斯称这一部分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是我少见的，说得这样简明扼要，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奇。”

纲领的实践部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盖德、拉法格共同讨论的，包括了工人阶级许多现实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反映了工人阶级目前的利益和要求。这

个纲领草案在 1880 年 10 月哈佛尔的党代表大人上表决通过。这样，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法国工人党诞生了。

但是，这个年轻的工人政党的大多数党员理论水平还不很高，受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还深，而在工人中间占主导地位的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不确定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从蒲鲁东，路易·勃朗，比埃尔·勒鲁等人的思想中逐渐蒸馏出来的”。恩格斯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法国缺少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文献。尽管《资本论》法文版已经面世，但对大多数工人来讲，这是“一部不可理解的书”。因而，在法国迫切需要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介绍给法国的社会主义者。

应拉法格的要求，恩格斯将《反杜林论》中的三章抽出来，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这部著作与《反杜林论》原文基本上一样，但“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的辩证运动更容易为法国读者所理解”，恩格斯对第三部分做了必要的补充。同年，这部著作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出版了单行本。这本小册子在法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在许多优秀的法国人的头脑中

引起了真正的革命”。

法国工人党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同任何工人政党一样，“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哈佛尔代表大会不久，以党的领导人贝·马隆和保·布鲁斯为首的改良派便对党纲进行大肆攻击，并于1881年提出了一个新党纲，这个党纲要求党在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因此，这一派又被称为可能派；主张工人阶级应把注意力放在争取城市议会之类的地方自治机关方面；在组织原则方面，他们反对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每个地方党组织均可自行修改党纲。

1882年9月，在法国工人党圣亚田代表大会上，正式发生了分裂，以盖德和拉法格为首的革命派坚持哈佛尔党代会通过的纲领，并保留了党的原来的名称，以马隆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可能派），另组“社会主义工人同盟”。

恩格斯对盖德和拉法格同可能派的斗争予以了坚决的支持。他认为，两个互不相容的派别完全分开“是一件好事”。他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说：“起初，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如果接受纲领的时候暗地里还有保留，这在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在这里我们从来没有为马隆和布鲁斯所迷惑。他们两人都是在巴枯宁

阴谋学校里培养出的，马隆甚至是建立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共谋者（他是17个创始人之一）。如果事情照马隆这一帮人所希望的那样发展，那末福尔马尔所抱怨的‘革命稀粥’就会成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正式说法。”

恩格斯指出，马隆之流是一群嫉贤妒能的浅薄之徒，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一想到以法兰西思想造福世界的，拥有思想垄断权的民族，文明中心的巴黎，现在忽然要接受德国人马克思的现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就觉得非常可怕。因此，马隆极力贬低马克思，他或是为马克思的发现另找一些始祖（如拉萨尔，谢夫莱，甚至巴普），或是把马克思的发现硬归之于这些人。这只能是妒忌天才，而“只有十分渺小的人才妒忌天才”。恩格斯指出，而布鲁斯在“著述方面和理论方面是一个绝顶的庸材（恩格斯又称布鲁斯是他所见过的最平庸的糊涂虫），却非常善于搞鬼”，对他应予以提防。

恩格斯十分关心正在崛起的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他对盖德印象较好，认为他有“极其清晰的头脑，在理论方面远远超过其他巴黎人，……是少数完全不认为现代社会主义起源于德国损他们体面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而且，盖德也是巴黎最好的演说家之一，“是一个爽直而可靠的人”。同时恩格斯又毫

不隐瞒地指出了盖德的缺点：第一，他有巴黎人的偏见，似乎必须经常反复地说“革命”这个词；第二，他非常急躁。他的神经有毛病，总认为自己活不了多久，因而无论如何要亲身经历某些重大事件，由于这种病态的激昂情绪，就产生了他过分的，往往是有害的活动欲望。恩格斯希望盖德能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克服这些缺点。

除了德、法两国外，恩格斯还关注着英国、俄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工人运动，并同这些国家的工人活动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给予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必要的指导。

为了向各国工人阶级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时期恩格斯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有：《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另外，他还为马克思和已故去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威廉·沃尔弗写了传记。由于马克思经常为疾病所困扰，所以从70年代后期，指导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作大部分是由恩格斯承担的。

1876年，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也患了慢性病，到1880年夏天，病情开始加重，到秋天查明，她患的是

肝癌，大家都知道这是不治之症。1881年6月，马克思准备陪同燕妮去法国看望大女儿燕妮·尤格一家，恩格斯忧心忡忡地给小燕妮写信，告诉她母亲的健康情况：“她的确日见消瘦，并且今天她向我诉说自己日益消瘦并且软弱无力，显然是一种严重的症状，特别是这种症状，看来，并未停止发展。”

到1881年秋天，燕妮已卧床不起，不幸的是马克思又患了沉重的肋膜炎，医生一度认为马克思几乎无望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前面的大房子里躺着燕妮，后面小房子里睡摩尔。一对相亲相爱大半生的人，竟再也不能同住在一间屋子里。

临终前一个月，肝癌造成的疼痛折磨着善良的燕妮，可是她兴致一直很高，幽默从来没有离开过她，她甚至还像小孩一样焦急地询问1881年德国选举的情况，当得知社会民主党获胜后，她是多么快乐啊！她直到气绝时神智还完全清醒。

摩尔再一次战胜了病魔，当他一能够下床，就来到了燕妮的房间里，他们在一起时彼此又都年轻起来，像一对共同进入生活的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而不是彼此正向生命告别的一个被疾病摧毁了的老人和一个将死的老妇人。

1881年12月2日，经过长期病痛折磨的燕妮不幸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她用英语告诉她的“卡

尔”：“我不行了。”卡尔站在床边为挚爱的妻子送行，他觉得妻子不是在死亡，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然而，马克思再也看不到这样一双亲切而又熟悉的眼睛了。

燕妮的不幸逝世，使马克思悲痛万分，他的病情再次加重，恩格斯比任何人都清楚燕妮的去世给摩尔带来的打击，他对正在灵床旁哭泣的爱琳娜说了一句几乎令她发火的话“摩尔也死了”。为了尽量减少马克思的痛苦，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恩格斯总是与马克思在一起，并负责料理燕妮的丧事。

恩格斯主持了燕妮的葬礼并致悼词，他对这位一生追随马克思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先进妇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她的一生表现出了极其明确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在报纸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

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末这位女性就是她。”

确实如恩格斯所言，燕妮的去世意味着“摩尔也死了。”马克思长时间无法从丧妻之痛中摆脱出来，他在12月15日给左尔格的信中称自己是双重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

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竭力帮助马克思从可怕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与医生一起，为马克思安排治疗和休养。在恩格斯和医生的共同安排上，马克思差不多整个1882年都是在疗养地度过的。他先到了法国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同大女儿燕妮和外孙们度过了几天真正幸福的日子，随后去了法国南部，瑞士和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到10月初才回到伦敦，但只过了几星期便又去了威特岛的文特诺尔。有一个时期，马克思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他在9月30日从巴黎寄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的总的健康状况，据医生说，已大大改善，说我甚至‘发胖’了。”恩格斯马上把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告诉了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马克思的健康正在完全恢复，如果胸膜炎不再犯，明年秋天他的身体将会比近几年以来都好。”然而，这只是一个假象，马克思的健康状况继续好转的希望越来越小了。

1883年1月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在巴黎附

近的阿尔让台突然逝世，留下了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个噩耗给了马克思致命的一击，他从威特岛一回到伦敦便躺倒了，对马克思的照料和他的全部家务几乎全部落在恩格斯身上，恩格斯每天都来陪伴这位病重的战友，并尽力设法使马克思的病情好转。但是，由于马克思年事已高，此外又产生了许多并发症，所以马克思的生命一直处于危险之中。恩格斯在给老朋友左尔格的信中回顾了自己那一阶段的担心：“六个星期以来，每天早晨当我走到拐角的地方时，我总是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看看窗帘是不是放下来了。”

1883年3月14日清晨，马克思的病情突然恶化，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急剧衰竭。下午两点半钟，恩格斯来到了马克思家，看到全家都在掉眼泪，似乎马克思快到临终时刻了。恩格斯询问了情况，想弄清到底出了什么事，以便进行安慰。这时，一直像母亲一样照料马克思的老管家琳蕻走上楼去，立刻又下来了，她说马克思处于半睡状态，要恩格斯跟他一起上去。当恩格斯和琳蕻走进马克思房间时，马克思躺在那里睡觉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祥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我们党的最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想，我生平所知道的一颗最强有力的心停止了跳动。”恩格斯也失去了

“相交 40 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

恩格斯忍着悲痛，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通知了各国工人运动和工人党的领导人；社会主义报刊和马克思的生前好友。恩格斯比任何人都清楚，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多大的损失，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说：“人类……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作出的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

确实，恩格斯一时还接受不了失去马克思的事实，“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孔也永远不动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

但是，恩格斯这位不屈不挠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为丧友而极度伤心，但决不会为面前的困难所吓倒，他在给贝克尔的信中表示：“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子弹呼啸着，朋友们倒下去，但这些对我们俩人来说是屡见不鲜的，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被子弹打中，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总之，我们要克服一切障碍和困难，“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

全世界一切有觉悟的工人都在分担着恩格斯的痛苦，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恩格斯收到了几十封唁电和唁函，对马克思逝世表示哀悼和同情。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老朋友，英国宪章运动领导人哈尼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你的损失不是一般的损失，也不是一种家庭的损失。你对他的友谊和忠诚，他对你的友爱和信赖，使得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超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人的任何一种关系……我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表达我在获悉你失去挚友时的悲痛情感，以及我对你的悲哀的深切同情。”

1883年3月17日下午，马克思的遗体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即一年多前安葬他夫人的同一个墓穴。葬礼比较简朴，参加葬礼的德国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法国党的领导人拉法格和龙格，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的老朋友列斯纲，化学家肖莱马，生物学家朗凯斯特以及马克思的家属。恩格斯主持葬礼并致了悼词，他说：

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历史功绩，即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

其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人”。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的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继恩格斯之后，马克思的大女婿龙格宣读了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唁电和唁函。随后，从德国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李卜克内西发表了演说，他说，我是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委托来向自己的“导师和缔造者”表达感情的，马克思的不朽功绩就在于，“他把无产阶级，

劳动人民的党从空话下面解放出来，并给了党一个坚实的牢固的科学基础……马克思属于无产阶级的，他的一生都献给全世界无产者了……

我们不会耽于悲痛，而会照着已故的伟大战士那样去行动；我们要尽全力来早日实现他的教导和他的志向，这就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敬爱的永生的朋友！我们一定沿着你所指出的道路前进，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我们在你的灵前的誓言！”

送别了自己的战友，恩格斯又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一方面，他要继续马克思未竟的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整理出版《资本论》的续卷，以使“摩尔”永世长存；另一方面，以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承担的、指导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重担，现在已全部落在恩格斯一人肩上。这位坚强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昂首挺胸，直面新的挑战。

第二十三章 国际伟人

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弗·伊·列宁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承担起了指导国际工人的重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尽力保持“从各国自愿在马克思书房里聚集起来的那许多联系。”作为国际工人运动公认的领袖，恩格斯以通信和在社会主义报刊上的宣传指导着各国的工人运动，而欧美各国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在重大问题上，都要征求恩格斯的意见，并把伦敦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当做自己的麦加城。尽管恩格斯是欧美各国社会主义者公认的导师和领袖，但他总能平等地对待任何人，从不对哪个国家的党颐指气使，更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早在 1881 年 10 月，由于可能派攻击拉

法格和盖得是马克思的传声筒，恩格斯特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伯恩施坦写了一封信，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与各国工人运动的关系。他指出：

“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成就，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走的特殊的和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恩格斯的这段话，同样也适合于马克思逝世后，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发挥独特作用的恩格斯自己。

恩格斯格外重视德国的工人运动，这不仅因为德国是他的祖国，而他本人也曾亲自参加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更主要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各国最早的和最大的工人政党，是“在欧洲居于领先地位的党”，尽管党的纲领中充斥着拉萨尔主义的思想内容，但在实际斗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上能采取马克思主义立场，特别是在反对“非常法”的斗争中，它诚恳地接受了恩格斯的批评和建议，利用一切手段同俾斯麦的专横统治进行斗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可以说，德国党的活动在当时欧美的影响是其它国家的工人党所无法比拟的。恩格斯在 1884 年

10月11日致倍倍尔的信中说：“一句话，你们的胜利会在各地（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从西西里到瑞典）产生影响。”

到1883年，社会民主党人反对非常法的斗争已取得了初步成就，他们不仅恢复了遭到破坏的组织，而且通过创办各种群众性组织如互助基金会，文艺协会，遛鸟协会等，秘密扩大了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另外，德国党还在国外创办了各种报纸、杂志，通过秘密渠道，运入国内，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夺回了失去的阵地，而且又占领了更多的敌人的阵地，影响也日益扩大。

恩格斯对德国党人利用各种手段同俾斯麦进行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致倍倍尔的信中说：“我们的人表现得非常好，在同德国现实中那些大大小小丑恶现象进行的斗争中，这种坚韧、沉着、灵活和战斗决心，这种充满胜利的信心和幽默，是德国近代史前所未有的。……德国无产阶级光辉地显示出自己有取得统治的才能和推翻这整个旧的齷齪世界的能力。”

恩格斯把社会民主党参加三年一度的国会竞选活动称作是“对我们力量……的大检验，是一个具有全欧意义的事件。”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曾一度对

在“非常法”时期参加议会活动的成效表示怀疑，他本人也不愿意参加议员的竞选，为此，恩格斯对他进行了耐心地说服工作。恩格斯指出，长期从事鼓动工作和议会活动可能会使人很厌烦，因为这和登广告，搞招贴画以及四处招揽生意一样，不会立刻收到成效，而且有些人往往会一无所获。不过，没有别的办法，倍倍尔作为唯一“掌握得住真正议会活动的分寸”的党的活动家，应当把议会斗争进行到底，不然会前功尽弃，特别是“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应放弃这个唯一剩下的公开途径”。

1884年5月，德国党的领导人之一辛格尔到伦敦拜访了恩格斯，恩格斯同他探讨了社会民主党在秋季帝国国会选举中的策略，恩格斯认为，为了使更多的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进入国会，社会民主党应该采取灵活的竞选策略，甚至可以同反对俾斯麦的资产阶级政党作某种幕后交易，如彼此让给对方一些选区等。这可能会干一些蠢事，“但蠢事在任何时候都有，这不是干更大蠢事的理由”。

在1884年秋季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大获全胜，获得55万张选民票，比实行“非常法”前还多24万张，有24名社会民主党代表进入新的帝国议会。恩格斯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兴奋，当晚便给倍倍尔写信说：“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最终能获得多少席位，现

在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而主要的是选举表明，运动正以迅速而坚定的步伐向前发展，席卷一个又一个选区，削弱着其它政党在这些选区的阵地。我们的工人真是好样的！他们不顾政府和资产阶级的一切诡计、威胁和暴力，夺回一个又一个阵地，表现得那么顽强，那么坚决，主要的是，又那么达观！……这对欧洲和美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由于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恩格斯开始认真考虑党的议会斗争策略问题。他指出，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在议会讲坛上不仅要抨击政府的反人民政策，而且还“应该提出积极的法案”，如标准工作日（其中国内的比国际的可以更进一步），关于责任制，伤亡事故和疾病，残废工人立法的彻底修改，等等。

恩格斯密切关注着社会民主党成员议会中的表现，对于党的领导人在议会中的出色表现常常给予表扬和鼓励。如 1886 年 4 月，倍倍尔在帝国议会关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辩论中发表了一个演说，恩格斯在看到这个材料后“感到十分高兴”，他对倍倍尔说：他仿佛看到一群匪徒，更恰当地说，一群恶狗，狂吠着从四面八方向你扑去，而你扬起皮鞭把他们纷纷打退，这个情景太壮观了。

恩格斯特别重视党的宣传机器，他把苏黎世的

印刷所和出版社,《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称作是三个阵地,是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中无论如何要掌握住的三个阵地。《新时代》杂志的主编是考茨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是伯恩施坦,这两个人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恩格斯认为这两个人都经得住坦率的批评,能正确领会最主要的东西,值得信赖,特别是和那些“粘在党身上的糟糕透顶的青年之人相比,这两个人倒是真珠子”。为了使党的喉舌能坚持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恩格斯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伯恩施坦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十年(1881年——1890年9月)间,恩格斯从办报的方针,策略以及编辑艺术和文风等各方面给伯恩施坦以指导,他还亲自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为编辑部选送一些稿件和材料。伯恩施坦也很尊重恩格斯的意见,他将恩格斯的指示称作是“办好报纸的唯一准绳”。1888年5月,瑞士政府在德国压力下,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驱逐出境,编辑部迁到了伦敦,恩格斯积极帮助在伦敦重建编辑部。从10月1日该报复刊到1890年9月底停刊,编辑部实际上是在恩格斯直接指导下工作的。恩格斯称该报是党历来最好的报纸。恩格斯还经常为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撰稿并指导该刊编辑部的工作,他多次批评编辑部的错误倾向

并帮助改正。他还给《新时代》杂志物色合格的外国通讯员如法国的拉法格,美国的左尔格等。80年代中期,考茨基迁居伦敦,在那里主持《新时代》的编辑工作,从而聆听了恩格斯更多的指导。使《新时代》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80年代中期,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影响日益扩大,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也钻入到党内来,他们同党内拉萨尔主义分子联合起来,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1884年国会选举后,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中,这些“有教养”的庸人甚至占了多数。这必然要给社会民主党带来混乱。1884年底,围绕政府提出的给予私人轮船公司以国家津贴的议案,作为社会民主党实际领导机构的议会党团发生了矛盾。

以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为首的少数派认为这项法案同俾斯麦的殖民冒险勾当有直接联系,要求党团投反对票。而党团中的改良主义多数派却认为这项议案有助于发展国际贸易和为造船工人谋福利,党团应投赞成票,双方争执不休。

为此,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征求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在年底给倍倍尔的信中说:“完全可能,投票的结果将取决于社会民主党人。如果由于你们的投票而使资产阶级得到津贴,而且是没有报偿地得到津贴,那就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

脸！我简直不知道，那时候我该对法国人和这里的公众说些什么才好。而这会使无政府主义者多么兴高采烈啊！他们会欢呼说：“你们看，这是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呀！”恩格斯建议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向党内有觉悟的群众发出呼吁。

在这次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人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发表了许多专栏文章，尖锐批评改良主义分子的立场，而且还刊登了大量的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来信，反对政府的议案。在广大基层党员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议员团被迫集体投了反对票。

但是，议会党团内的机会主义多数派并未就此罢休，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整个事件中的立场大肆攻击，他们于1885年4月2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什么“报纸根本不应当决定党团的路线，而是党团应监督报纸的路线”。恩格斯马上意识到，这是机会主义分子“为使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党内掌权和具有正式地位而把无产阶级分子排挤到仅仅是一种忍气吞声的地位的第一步”。

在恩格斯的支持下，倍倍尔向议会党团声明，如果它要压制党内的意见自由，他将向党提出申诉。最后，机会主义分子被迫让步，议会党团与编辑部签署了共同声明，声明强调不容许限制党内批评，必须维

护党的统一。

经过这一事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心情沮丧，情绪低落。恩格斯了解这两个人的性格，马上去信予以鼓励，他说：“看来，我还得再给你写几句，不然的话，我想你会过于忧郁。你和考茨基两人大概都在互相助长沮丧的情绪，真可以凑成一部完整的声调忧郁的协奏曲……每当听到坏消息的时候，你们总是忘记那句旧谚语：鬼并不像描绘的那样可怕。

‘党团和编辑部’之间的全部冲突，到处都必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党团出了丑……如果你按照它的最初要求把它的第一个圣旨登出来，那么，它就会真正大出其丑，‘愤怒的风暴’就会从四面八方掀起。”最后，恩格斯告诫伯恩施坦：“要记住一条老规矩：不要只看到运动和斗争的现状，而忘记运动的未来。而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1890年，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取得了更大的胜利，35个党员当选为议员。同年3月，反动政客俾斯麦下台，10月，国会废除了反对社会党人非常法，德国工人阶级经过12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在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并不断发展壮大。这里面，也凝聚着恩格斯无数心血。

同以前一样，这一时期恩格斯与法国社会主义

者的联系依然是通过拉法格夫妇。劳拉和拉法格经常向恩格斯通报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恩格斯则通过他们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法国工人党领导人，有时，恩格斯也直接与盖德、杰维尔等党的领导人直接通信表达自己的意见。

整个 80 年代，法国政局一直动荡不安，资产阶级中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利害冲突形成了多种政治势力和多个党派，从其基本政治倾向看可分为保皇派和共和派，保皇派又分为拥护波旁王朝的正统派，拥护奥尔良家族的奥尔良派和拥戴拿破仑家族的波拿巴派，共和派则由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温和派和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派两股势力组成。上述各种政治势力既斗争又勾结。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往往提出各种蛊惑人心的口号，拉拢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这就为工人政党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法国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中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指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坚决保卫共和制度，反对保皇派恢复帝制的阴谋。因为“任何君主制的复辟必然会带来暴力的统治，对各种社会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压制……保存现有的共和政府，至少使工人阶级仍然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以便创

办工人报刊，在集会上进行鼓动和组织独立的政党；此外，保存了共和国，工人阶级就不必在将来专门为了赢得共和国而再进行斗争了。”

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应采取的策略，恩格斯指出：“应该考虑到：在那里，甘必大分子比保皇派进步，激进派又比甘必大分子进步……因此，巴黎工人在一定意义上遵循了他们的正确本能，不断支持尽可能最激进的政党。只要激进派上台执政，这种本能就促使工人投入共产主义者怀抱。”从而为法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指明了正确的斗争道路。

为了贯彻法国工人党党纲中关于利用普选权，把资产阶级的欺骗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要求，恩格斯非常重视和支持法国工人党参加议会斗争，在1891年议会选举时，恩格斯积极鼓励拉法格参加竞选，并指示在竞选时“保持饱满的情绪，竭力时刻嘲笑自己的敌人，相信我们党一定会赢得历史的胜利”。拉法格当选为议员后，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利用议会讲坛，“把每件新揭发出来的丑事当做子弹”，猛烈抨击资产阶级政府。

恩格斯对法国工人党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说：“你们现在可以看到40年来，只要善于使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

要可靠十倍，而且更好的是，能最确切地指明哪一天应号召武装革命。甚至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就是说，使我们处于进行革命的最有利的地位。”

议会斗争的成就也冲昏了法国党的领导人的头脑，像盖德这样党的领袖也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议会斗争方面，他甚至声称“社会解放将通过合法道路完成”，并把自己当选为议员称作是“一次真正的革命”，通过这次革命，社会主义就会进入波旁王宫并“为世界开创一个新纪元”。对于党的领导人头脑发热，恩格斯及时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他指出，盖德的这种说法只能给人当做笑料，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最好场所，工人政党可以通过议会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并为工人争取某些具体的利益，但工人要获得解放，“除了暴力革命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

80年代末期，法国出现了以布朗热将军命名的运动。布朗热是一名沙文主义分子，他利用广大群众对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不满情绪，拼凑了一个所谓的“爱国者同盟”，他对外宣称要以武力收复被德国兼并的亚尔萨斯和洛林，对内则表示反对激进派政府的贪污腐败和营私舞弊，要整顿共和国。布朗热还和保皇派暗中勾结。布朗热的蛊惑性宣传，曾一度迷惑

了不少人，在 1889 年巴黎补选时获得了 25 万张选票，轰动一时。

当时，大多数法国社会主义者不了解布朗热运动的实质，更没有估计到它的危险性，甚至社会主义者的一翼布朗基主义者成为它的狂热支持着，而可能派则站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立场反对布朗热运动。而拉法格则因为布朗热抨击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府，认为这是一场人民运动，工人党可以给其一定的支持。

恩格斯对工人党的态度感到很很焦虑，为此，他连续给拉法格去信，强调指出，布朗热的声望主要是由于对目前政府的抨击而获得的，单凭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布朗热运动是一场人民运动。而且，布朗热煽动军国主义，实际上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从这个角度看，布朗热就是战争。恩格斯主张，法国工人党在布朗热同激进派的斗争中要坚持独立的政治路线，要向广大群众表明，问题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不是个人专权，就是议会政权”，还有“现实的第三条出路”，即争取真正的人民政权。

1889 年，布朗热因策动政变阴谋败露而仓皇出逃，布朗热运动也随即消声匿迹了。至此，保皇派对共和国的威胁彻底解除了。恩格斯认为，今后法国的阶级力量将进一步两极分化，最后，将“逐渐引起激

进派的崩溃和社会主义者的真正集中”。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将迎来它新的高潮。

英国是恩格斯的第二故乡，而且，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英国度过的，在这里，他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还根据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状况，写下了宣告这一制度死亡的判决书。然而，自宪章运动衰落后，英国的工人运动长期受奉行改良主义的工联的控制，停滞不前。1883年4月，恩格斯曾对倍倍尔说：“自从国际停止存在以来，在这里，除了充当资产阶级即激进派的尾巴和在资本主义关系范围内提出一些微小目的的运动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工人运动。”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英国利用其工业垄断地位，建立了庞大的世界贸易体系和殖民体系。与在殖民地实行的残酷统治和剥削相对照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内实行许多改良主义措施，如政治上给予工人以普选权等大陆其它国家工人所没有的“自由”和“民主”，在经济上制订了工厂法，从一定程度上保障工人的权益，使英国工人有着比大陆工人高一些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从而淡化了他们的斗争意识。对此，恩格斯曾分析说：“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他们既然充当了资产阶级在经济

上利用这种垄断地位的尾巴，并且毕竟总是分享资产阶级的利润，那他们自然就会在政治方面充当‘大自由党’的尾巴，而这个党又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如承认他们有建立工联和罢工的权利，不再坚持无限制的工作日，并给予那些报酬较高的工人以投票权。”这种社会环境使得英国未能出现真正的工人运动。

80年代初期，英国的工人运动有所发展。一些新的由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组成的职工联合会成立了，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提出了比老工联更高的要求，恩格斯希望新工联能把这种良好的势头保持下去。于是他从1881年5月到8月，在工联的《劳动旗帜报》上陆续发表了《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雇佣劳动制度》、《工人党》、《必要的和多余社会阶级》等文章，努力向英国工人阶级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批判工联的改良主义思想。他指出，工联的口号“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是完全错误的，在这种“公平”的幌子下，劳动者的一部分产品不可避免地积累在不劳动者手里，并变成他们奴役生产这些产品的人的工具。因此，工人的目标绝不限于“公平的工资”，而必须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然而，恩格斯这些文章并未引起英国工人的重视，英国工人运动依然在消沉状

态中徘徊。

从 80 年代中期起，恩格斯在为英国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884 年 8 月，海德门将民主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但该联盟除了爱琳娜夫妇等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外，基本上是一个由“文人、旧宗派残余和多愁善感的公众三者”组成的组织，特别是联盟领导人海德门一开始就采取宗派主义立场，反对在工联中进行工作，反对经济罢工；他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口号很革命，但在当时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因而到年底，在恩格斯支持下，爱琳娜、莫利斯和巴克斯等人脱离社会民主联盟，另行组织了社会主义同盟。

爱琳娜和艾威林参加领导的社会主义同盟，从一开始就得到恩格斯的热情支持，恩格斯还在同盟的机关刊物《公益》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恩格斯希望该组织能推动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但事与愿违，该组织最后未能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同盟的领导权被无政府主义者所控制，他们醉心于革命空谈，反对参加议会斗争。1886 年秋，爱琳娜夫妇退出了社会主义同盟，不久，该组织消声匿迹。

1884 年初，英国还出现了另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组织——费边社，领导人是韦伯夫妇和肖伯纳。这个组织挂的是社会主义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

改良主义团体。它宣扬马克思主义不适合英国国情。否认阶级斗争，鼓吹劳资合作。主张通过改良、渗透和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在揭露这个团体的阶级实质时说，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钻营之徒到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拼凑的集团，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要取得统治而联合起来，他们尽一切力量通过保障自己的、即‘有教养的人’的领导权的办法来防止这种危险。”总之，“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

到 80 年代末，英国真正的工人运动崭露头角。1889 年秋天，伦敦码头工人刚刚开始罢工，恩格斯便指出：“这次罢工对这里的运动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并指示伯恩斯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报导罢工情况。最令恩格斯感到兴奋的是罢工工人摆脱了工联领导人的控制，而马克思主义者爱琳娜·汤·曼和白恩士成为运动的真正领导人，恩格斯在写给劳拉的信中对爱琳娜的卓越表现感到欣慰，对英国工人运动水平的提高感到高兴，他说：

“自从码头工人罢工以来，杜西完全成了东头的人，她组织工会，支持罢工……早上和晚上都要演讲。这些由非熟练的男女工人组成的新工会，和那些旧的工人阶级贵族组织完全不同，不会陷入同样的

保守习气……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所有的男女领导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鼓动者，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里运动的真正开端。”

伦敦码头工人罢工在各行业工人的支持下最后取得了胜利，恩格斯为此专门写了《关于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一文，热情赞扬了码头工人的斗争精神和罢工的重大意义：“这是我们近年来最有希望的一次运动，我还能看到这次运动，感到很自豪，很高兴。如果马克思还活着并亲眼看到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在关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同时，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刚刚起步的俄国的工人运动也寄予厚望。早在1878年初，他在《1877年的欧洲工人》一文中，对于1861年俄国农奴制的废除，作了如下判断：“欧洲自由派的报刊所极力赞扬和歌颂的伟大解放法令，只不过是将来为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这个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罢了。”

在七八十年代，俄国还没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最强大的反对沙皇政府的势力民族派已经发生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革命的民粹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以刺杀彼得市长而闻名的女革命家维拉·查苏利奇，民粹派老革命家拉甫洛夫，洛帕廷和丹尼尔

逊等。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将这种联系继续下来。

1883年9月底，普列汉诺夫在俄国成立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劳动解放社，该组织一成立，就宣布要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普列汉诺夫通过查苏利奇向恩格斯寻求帮助。当时恩格斯并未表态，因为他搞不清这是暂时的爱好，还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已被革命组织所接受。查苏利奇的下一封信令恩格斯感到非常高兴，她在信中说：“在俄国对我们的创举——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所持的态度，预示我们将获得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成功。”随后，恩格斯向她（他）们推荐了他和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供劳动解放社选择出版。

劳动解放社一成立，便同民粹派进行了论战。1885年初，普列汉诺夫将他同民粹派论战的小册子《我们的意见分歧》通过查苏利奇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对其非常感兴趣，他从中不仅了解到了劳动解放社与民粹派原则性分歧的实质，更为俄国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而感到高兴，他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说：“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身也同样会以此为自豪的。这是一

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恩格斯一方面支持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同拉甫洛夫，洛帕廷和丹尼尔逊等民粹派革命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并对他们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1884年初，恩格斯把马克思所收藏的近百种俄文书刊赠给拉甫洛夫，供他们建立一个俄国革命流亡者图书馆。

1883年3月，洛帕廷从流放地逃了出来，并在马克思逝世几天后到达巴黎，他从巴黎给恩格斯和杜西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表示对“爱之如友，敬之如师，尊之如父”的马克思的深切怀念，恩格斯对洛帕廷顺利出逃感到十分高兴，并邀请他到伦敦逗留几天，同年9月，洛帕廷来到伦敦，两次拜访了恩格斯，恩格斯同洛帕廷就俄国革命的形势交换了意见。恩格斯说：“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最近的将来在彼得堡所做出的事情，整个欧洲一切有思想，有远见和有观察力的人们的眼光现在都集中到了彼得堡。俄国是本世纪的法国，新的社会改造的革命首创权理应属于俄国。”

80年代末90年代初，恩格斯一直对俄国革命寄予厚望，1890年初，恩格斯指出，革命正在敲打着俄国的大门，在俄国国内，它也已经有足够的同盟者，只待时机成熟就会为革命打开大门。1894年12月，

74 岁高龄的恩格斯再次预言，在危机到处趋于成熟的今天，俄国“那里不会再这样持续很久了”。

恩格斯虽然身在旧大陆，但他也一直关注着新大陆特别是正跃居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的美国的工人运动，在恩格斯看来，美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与英国相类似，尽管形成的原因各异，但总的来说，这两个国家的工人运动水平都不高，社会主义运动也未真正起步。恩格斯在 1886 年 8 月致友人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人中说：“现在你可以相信，还要过一些时候美国工人群众才会开始阅读社会主义书刊。”

1886 年，美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以争取 8 小时工作制为主要内容的工人运动，几乎席卷了全国所有工业城市，其规模和影响之大，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恩格斯为这场“说英语的人们中间第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欢呼，他在致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说：“我们的（以及你们的）资产者曾经以为，美国是凌驾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这种幻想现在破灭了，地球上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天堂正在迅速地变为涤罪所。”

恩格斯对当时美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四个派别逐一作了科学的分析，并指出了美国工人运动科学发展的道路。恩格斯指出，由亨利·乔治领导的统一

工人党主要是地方性的，这个派别的纲领认为土地垄断是出现社会贫困和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只要把土地交给社会，然后由社会出租给个人，并把地租用于公众需要，便可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这完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目的是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认为，“乔治作为整个工人运动的旗手，是自欺欺人的，乔治作为乔治派的领袖，很快就会成为历史遗物。”

劳动骑士团是美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其宗旨是“为全世界工人在财政上和工业上从大公司的压迫下和雇用劳动的奴隶制度中解放”而斗争。恩格斯认为，不管这个组织起源和历史如何，也“不管它有什么样的缺点和细小的怪诞行为，不管它的纲领和章程怎么样，这里存在的是美国实际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的产儿，是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唯一的全国性的纽带”。因而，劳动骑士团是美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嘲讽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

另一大工人组织是龚伯斯领导的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这是一个按照狭隘的行会形式和工联主义思想组织起来的工人组织，曾在争取 8 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它鼓吹劳资协调，反对工人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因而逐渐成为

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民主党的尾巴。但是这个组织人数众多，所以恩格斯主张与该组织加强联系，特别是争取其基层工人群众。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美国在理论上最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工人组织，它的领导人是恩格斯的老战友，德国移民魏德迈和左尔格。恩格斯对这个党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是，这个党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妨碍了它自身的发展。这个党主要由德国移民组成，而且主要是在德裔移民中进行活动，没有与美国工人结合在一起，恩格斯要求他们努力学习英语，主动向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靠拢，使党成为真正美国工人的政党。他希望社会主义工人党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而要从美国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来具体运用这些理论，“最重要的是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

恩格斯认识到，美国独特的发展历程和美国的国情，决定了美国工人运动必然要“经历十分独特、缓慢和曲折的道路”。因而他鼓励美国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不要被眼前的挫折和困难所吓倒，要善于“逆风而进”，要坚定必胜的信念。

恩格斯不仅关注着上述欧美大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而且，他还关注着比利时、荷兰、丹

麦、意大利、西班牙等这些小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成长。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收到了恩格斯热情洋溢的贺信，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也把恩格斯看作是自己的导师，该党领导人阿德勒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称，如果他有钱，他将创办一所旅行学校，“每年把每一个党员送到瑞琴特公园路同你在一起生活一周”。对于意大利的工人运动，恩格斯不仅给予直接的指导，而且还期盼着意大利会出现“一个新的但西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恩格斯还注意到，巴尔干半岛上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把马克思树立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旗帜一直插到黑海和爱琴海岸”。

1887年1月，恩格斯在谈到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时自豪地说：“目前欧洲所有的广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和法国，在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在丹麦和瑞典，以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像一支在同一旗帜下统一的军队一样在战斗着。”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与恩格斯的热情指导和亲切关怀是分不开的，他是这一时期“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从年老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

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将恩格

斯称为“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所信任的国际伟人”，列宁则称恩格斯是马克思逝世之后：“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第二十四章 完成《资本论》

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将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

——维克多·阿德勒

马克思在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后，就开始修订第二卷的草稿。根据马克思的写作计划，第二卷将包括两个分册，即《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虽然草稿在1867年就已全部完成，但马克思仍在根据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情况，对原稿进行不断的修改。

1863年，马克思在致俄国友人丹尼尔逊的信中说：“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

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11年后，他仍然说：“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仍在搜集最新的材料和进行更细致的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他几易其稿我们可看出他对科学的严谨态度，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所说：“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

马克思自知不能亲手完成《资本论》了，在他逝世前不久，曾对小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恩格斯能根据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做出点什么”来，实际上是把完成《资本论》的历史任务托付给了恩格斯。

马克思逝世后，欧美许多社会主义活动家都关心着马克思遗留下的、未完成的《资本论》的续卷顺利出版。1883年3月17日，即马克思逝世的第四天，倍倍尔便写信给恩格斯说：“现在大家都关心的首先是这个问题，即：将怎样对待马克思未完成的著作《资本论》。法国的报纸已经报导，本地的报纸也在转载，说你将担负起完成这部著作的工作，大家都希望这样，并且也只有你一个人能够胜任。”

与此同时，一些资产阶级政客和文人散布流言蜚语，说马克思写不出比《资本论》更多的东西，甚至说马克思根本没有想过要写第二卷，关于即将出版第二卷的消息是马克思“威胁自己的反对者”和“借以回避科学论据的狡猾诡计”。而那些所谓的学者则认为，《资本论》第一卷所阐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是极端抽象的，未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关系。

各国社会主义者的热切期待和资产阶级的恶意攻击，促使恩格斯把“出版马克思的手稿”当作“压倒其他一切的义务”。为了使自己能全力从事马克思遗稿的整理工作，同时也为了使作为马克思家庭一员的琳蕙·德穆特老有所依，恩格斯请求琳蕙搬到自己家里来，帮助他料理家务。琳蕙同意了，从此，两人共同幸福地生活了七年，直到琳蕙去世。琳蕙善于管理家务，并且待人热诚，在琳蕙的帮助下，恩格斯可以安心从事整理马克思遗著的工作了。

马克思的空房子里堆满了报纸，纸包，书籍和包裹，恩格斯和琳蕙发现了一包《资本论》第二、三册的手稿，约有对开纸 500 页。4 月 2 日，恩格斯又告诉拉甫罗夫，说找到了《资本的流通》和第三册中《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手稿，约对开纸 1000 页。4 月 11 日，恩格斯在给纽文胡斯的信中表示：“我必须

先看一遍（它是用什么字迹写的啊！），然后才能说，它在多大在程度上已经搞好可以付印，需要从比较后期的笔记本中选取多少东西作为补充。无论如何，主要的东西已经有了。”

然而，在当时，谁也不了解这些手稿的情况，不了解付印的准备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恩格斯本人也不清楚。他在1883年8月30日回答倍倍尔的询问时说：“你问，怎么连我也不知道该书完成的程度？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是他也知道，万不得已时（现在正是这样），手稿会由我根据他的精神出版的，这一点也跟杜西谈过。”

在开始的几个星期，恩格斯把原稿通读了几遍，这时，他才发现，他承担下来的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他在给老朋友贝克尔的信中说：“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劳动，因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

恩格斯首要的任务就是辨别马克思的笔迹。马克思的字迹很潦草，写作时又经常使用许多缩写字，

英文句子以及用不同语言的字母拼写词，有些字和句子马克思本人事后都认不出来，他写的稿子也只有燕妮，恩格斯和他本人能看懂，所以，恩格斯是当时活着的人中唯一能辨认马克思字迹的人。

开始时，恩格斯一边辨认一边誊写，到1883年9月，恩格斯已把第二册的大部分内容整理出来，在9月18日写给考茨基的信中，他已能够将本册的主要内容概述出来，恩格斯说：“第二册会使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大失所望。这一册的内容，几乎只是对资本家阶级内部发生的过程作了极其科学，非常精确的研究，没有任何东西可供编造空泛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字。”

1883年10月，由于过度疲劳，恩格斯病倒了。这使他万分焦急，他在给老朋友拉甫罗夫的信中说：“咳，这个第二卷！我的老朋友，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希望尽快地把它整理出来啊！可是我那该死的病却使我不得不失去半年的时间。”

为了使誊写工作继续进行，恩格斯以每周两英镑的酬金请来了装订工艾森加尔藤做自己的秘书，向他口授手稿，由艾森加尔藤抄写。从1884年6月起，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恩格斯躺在沙发上念手稿，由秘书笔录，晚上恩格斯再逐字逐句地订正。秘书艾森加尔藤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他把

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为党工作，因而格外勤奋，使手稿的整理工作进展顺利。

在誊清手稿的基础上，恩格斯接下来的工作是从各种类型的原稿中，选择最成熟的样本。《资本论》第二卷共有八份手稿，除了第一稿和第二稿比较完整外，其余各稿都是在不同时期写成的，带有片断性质的修订稿。特别是较后的手稿“已经够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第五稿”。最后写的关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的第四稿，逻辑的联系常常中断，有些地方的论述不完整，特别是结尾部分的论述完全是片断的”。

恩格斯仔细研究和推敲了各份手稿的内容，认为晚年的手稿在理论上最为成熟，因此决定以最后的手稿为基础，并参照前面的各份手稿，搞出一份定稿来。当然，恩格斯绝不是对这些手稿进行简单的排列，组合，而是经过精心的选择，安排和加工，使之有机地连接起来，形成一部完整的著作。

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还对第二卷全书的结构做了必要的调整，同第一卷一样，马克思在写第二卷时分章也很少，这部巨著只分了三章 11 节 17 小节。为使第二卷与第一卷第二版和以后各版结构一致，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分章的原则，把每一章改为相应的篇，把 11 节扩编为 21 章，把 17 小节扩编为 45 小

节。并根据各部分的内容，给各章和节加了相应的标题。

由于马克思的手稿并不是为了供付印时使用，所以文字未经反复推敲，只是把自己的思路直接表述出来，而这些表述有的也不太清晰；另外，在手稿中还很多空白有待填补。所以，恩格斯不仅需要在文字上进行润色，在内容上进行修改，而且要把手稿中的空白填补起来，要填补得象马克思本人写的一样。上述工作，也只有恩格斯才能胜任和完成。

经过近两年的辛勤工作，1885年3月8日，《资本论》第二卷终于整理完毕，7月正式与读者见面，恩格斯以其卓越的才华，向读者奉献了一本内容博大，逻辑严密，文字流畅的科学著作，“是作者而不是编者的著作”。

恩格斯于1885年5月5日，即马克思生日那天，为《资本论》第二卷写了一篇颇具论战色彩的序言。在序言中恩格斯首先介绍了自己整理出版第二卷时的原则，即“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而不是编者的著作。”在这里，恩格斯显然缩小了自己的贡献。

序言的第二部分驳斥了资产阶级学者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对《资本论》的攻击。

洛贝尔图斯是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国家社会主

义的鼓吹者。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洛贝尔图斯在私人通信中多次诽谤马克思剽窃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1874年，迈耶尔在《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一书中首次将这种诽谤公诸于世。1881年洛贝尔图斯在《书信和政治》论文集中，更是直接了当地说：“我现在发现，谢夫莱和马克思剽窃了我，而没有提到我的名字，”“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了，说明本质上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明了。”

由于这种诽谤影响不大，所以马克思在世时未加理会，马克思逝世后，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把这种谬论当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大加宣扬，使这种谎言在德国，英国甚至美国流传起来，一伙资产阶级理论家聚集在洛贝尔图斯的旗帜下，对马克思发动了猖狂的进攻。甚至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也不明真相，未加说明就刊登了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席佩尔在国会演说中提到的“洛贝尔图斯——马克思的理论”，奥地利社会党领导人阿德勒还写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洛贝尔图斯》，这种崇拜洛贝尔图斯，诋毁马克思的运动实质上是“一些非共产主义者想把一个也是非共产主义者的人抬出来同马克思分庭抗礼”。为了维护亡友的声誉，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站出

来，揭穿资产阶级学者的阴谋，为马克思辩护。

恩格斯先是在《新时代》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文章，指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前，任何一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无一例外地都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相衔接，洛贝尔图斯根本分不清价值和交换价值，更不懂得价值规律。可笑的是他自己没有任何可供别人剽窃的地方，竟还能发现自己被别人“剽窃”了。

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恩格斯再一次对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的诽谤进行了回击，他指出，马克思根据自己的独立研究，在40年代末就已经知道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和是怎样产生的，1847年马克思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和同年12月在布鲁塞尔作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就是有力的证据，而直到1859年前后，马克思对洛贝尔图斯这位“天才”经济学家还是一无所知，更没有见过他的书。

所谓“剽窃”只能是洛贝尔图斯本人“因热狂而进行诽谤”。

洛贝尔图斯被马克思“剽窃”的更简单，明了的理论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在他的《第三书简》中，洛贝尔图斯把地租和利润之和称为“租”，这个“租”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工资所受到的价值扣除，换句话说，由于工资仅仅构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

可见，所谓洛贝尔图斯的首创，只不过是认识到“租”是工人无偿劳动创造的。然而，这哪里又是什么新发现呢？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早已熟知并系统表述过那些东西。洛贝尔图斯只是重复了斯密的发现，但还没有超越李嘉图。如果按照洛贝尔图斯的推理，他的“发现”本身就是“剽窃”，而且是低级“剽窃”。对此，恩格斯嘲讽道：“不仅那位在绝望中揪住洛贝尔图斯的衣角而‘确实不学无术’的庸俗作家（指迈耶尔——引者注），而且那位身居要职，‘自弦博学’的教授，（指阿·瓦格纳），也把自己的古典经济学忘记到这程度，竟把在亚·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就可以读到的东西，煞有介事地硬说是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窃取来的，——这个事实就证明，官方的经济学今天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是他发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他将这一历史功绩归结到古典经济学家身上。马克思本人的贡献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的存在。”在前人止步的地方，他却继续探索。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和劳动力问题，解决了资本和劳动依据价值规律进行交换这个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发现了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这

是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它不仅是洛贝尔图斯所望尘莫及的，也是他所不能理解的。

最后，恩格斯以讥讽的口吻向洛贝尔图斯的信徒提出挑战，那些想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马克思的秘密源泉和把洛贝尔图斯看作马克思的一个卓越先驱者的经济学家们，在这里有机会可以表明，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到底能够提供什么。如果他们能够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那末，我们就愿意同他们继续谈下去。”然而，这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们是无法证明的。自此以后，洛贝尔图斯和他的谎言被人们永远抛弃了。

恩格斯在序言中对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的反击，受到各国社会主义者的赞赏和支持，德国工人运动的老战士贝克尔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它本身就是一篇伟大著作和论战杰作。看到你如何有根有据地把有虚名的洛贝尔图斯的孔雀羽毛拔得精光，我感到非常高兴。”

《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粉碎了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的攻击，受到了各国社会主义者的热烈欢迎，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收到恩格斯寄来的《资本论》第二卷后，欣喜若狂。拉法格对当时的情景做了绘声

绘色的描述：“盖德、杰维尔和其他来看我的朋友，大家都怀着崇敬和喜悦的心情，手捧着这个继续推进《资本论》所开创的事业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巨著，就像猴子把核桃在手里掂来掂去，不知怎样打开一样。”

还在《资本论》第二卷的整理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恩格斯便开始计划第三卷整理工作，到1885年3月，恩格斯对第三卷的内容已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并对马克思在第三卷中所阐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感到惊叹，他在3月8日给劳拉的信中说：“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资本论》第三册伟大……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在自己身边搁置20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4月11日，他又十分乐观地对倍倍尔说：“我正在搞第三册。它是卓越的，出色的。这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只是由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才具有不可摧毁的基础，我们才能在各条战线上胜利地发动起来。只要书一出来，党内的庸人习气也会再次受到久久不会忘记的打击。”4月23日，恩格斯又对一直关心《资本论》续卷出版的丹尼尔逊说：“第三卷圆满完成全著的结束部分，甚至使第一卷相形见绌……是我所读过的著作中最惊人的著作……，最困难的问题这样容易地

得到阐明和解决，简直像是做儿童游戏似的，并且整个体系有一种新的简明的形式。”

恩格斯一开始认为，第三卷的困难大概只是技术性的，整理第三卷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几个月或一年足够了。但事实上，整理第三卷不是用了1年，而是10年。这一方面是由于80年代中后期国际工人运动日益高涨，恩格斯不得不挤出更多的时间来指导各国的工人运动；另外，恩格斯年事日高，疾病不时地侵袭这位老人，特别是他的视力衰退得很厉害，晚上根本无法写作，然而，最主要的困难还是来自马克思的手稿。

第三卷与第二卷不同，整理第三卷时，可利用的只有一个初稿，并且这个初稿也是极不完整的。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带有草稿的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去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是按当时产生的思想写下来的，就越长、越复杂。

整理工作从1885年2月下旬开始，辨认笔迹，口授誊写工作于7月底完成，手稿誊抄完毕后，恩格斯如释重负，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现在我已经放心了，因为手稿已经誊写清楚，假如在这段时间我的

歌子唱完了的话，那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可以照现在这个样子刊印。在这项工作没有完成的时候，我没有片刻安宁过。誊清手稿，只是完成了整个工作的一小部分，要将其编辑成书，还要付出十分艰巨的劳动。

首先，恩格斯对第三卷的结构重新进行了编排。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把长达千余页的巨著分作七章，而且各章均未分节。这既不利于阅读，又不便于研究。因此，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提示，重新安排了这一卷的结构，将其分为七篇五十二章。内容较多的章再分节，各章节均根据内容加上章节标题，经过这样编排。使得全书结构严谨而完整，层次错落有致，增强了可读性。

随后，恩格斯对部分篇章的内容重新进行了组织。如第一篇，要大规模压缩才能使用。这个手稿一开始，全是有数学公式说明剩余价值率与年利润率的关系。恩格斯深恐自己的数学水平不足以对其进行修改，于是聘请他和马克思的老朋友，也是忘年之交的英国数学家穆尔对笔记本上的方程式材料进行整理。又如第三十章，手稿的思路不时地被插入的句子和离题的论述所打断，因此，这一章是挪动和删节最大的。

然而，真正的困难是填补前面提到过的“空白”。在第三卷手稿中，有好几章只有一个标题而未写实

际内容，如第四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即是如此。在这一章的标题下面马克思注明“这个因素，我们暂且放在一旁，因为它对利润率的影响，在后面的某一章中将专门予以研究。”马克思过早的逝世使这一研究的重担落在恩格斯身上。恩格斯根据《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周转对于剩余价值的影响的原理得出如下结论：“在资本百分比构成相等，剩余价值相等，工作日相等的时候，两个资本的利润率和它们的周转时间成正比。”可以说，恩格斯对手稿的一系列补充，大大丰富了本卷的内容。

在恩格斯看来，整理第三卷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对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各章的编辑工作。“这一篇不但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可以提供轮廓、以便加以充实的纲要，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评述和摘录的资料。”起初恩格斯试图把空白补足，但试验了三次，均未成功。后来，恩格斯说：“我看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要这样做我就得涉猎这方面的全部浩瀚的文献，而最后搞成的东西，就不会是马克思的著作了。”没有别的办法，恩格斯最好当机立断，“尽可能限于整理现有的材料，只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尽管如此，整理起来还是很费力气。

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所作的各种增补和注

释共 60 多处。其中很多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新现象的理论分析和总结。例如，恩格斯认识到，自 1867 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周期缩短了，“周期过程的急性形成和向来十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稍微的营业好转和比较持久的不振这样一种在不同的工业国在不同的时间发生的比较慢性的延缓的交替。但这里也许只是周期持续时间的延长。”

恩格斯还指出：“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范围。”使得竞争被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这一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正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说明这种变化为新的社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整个整理过程中，恩格斯始终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即“要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版本，即尽可能有马克思自己的话表述马克思得出的各种新成果”。

经过恩格斯长达近 10 年的辛勤工作，《资本论》第三卷终于在 1894 年 12 月，即恩格斯逝世前半年正式出版。

在整理《资本论》手稿时，恩格斯曾对劳拉说：“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而把自己所做的工作简单归纳为“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

然而，当人们看到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时，恩格斯所付出的心血和劳作也不禁跃然纸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阿德勒在评价恩格斯所做的贡献时说：“恩格斯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将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列宁在阿德勒的后面又加上了两句，“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

由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恩格斯没能亲自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但是，他对第四卷非常关心，为它出版做了重要安排。

《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于1861——1865年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这部手稿的主体部分，即第220——972页，以论战的形式详细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史。这部手稿并不是准备付印的，而是作为进一步加工的草稿。恩格斯

在整理完第二卷后，就对这一部分手稿作了安排，他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说：《剩余价值理论》是“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同时以同前人进行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大多数后来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中专门地、在逻辑的联系上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

由于年老的恩格斯视力急剧下降，他感到自己已无法亲自完成第四卷的整理工作，为使这项工作不致中断，同时也为了整理马克思的其它手稿。恩格斯认为必须教会一些青年人辨认马克思的“天书”。

1889年初，恩格斯征得马克思幼女爱琳娜同意，决定让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学习辨认马克思的笔迹，1889年1月28日，他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正式提出这个建议：“我应当考虑到，不仅使马克思的这一部手稿，而且使其他手稿离了我也能为人们所利用。要做到这一点，我得教会一些人辨认这些潦草的笔迹，以便必要时能代替我……为此我能够用的人只有你和爱德，所以我首先建议，我们三个人来做这件事。

而第四册是应当着手搞的第一件工作，可是爱德完全陷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工作……但我认为，你会有充分的空闲时间，经过某些训练和实

习并在你妻子的帮助下，譬如在两年内把大约七百五十页原稿转写成容易读的稿子。只要你略微学会辨认笔迹，你就可以口授给你的妻子，那么事情就会进展很快。

.....

一旦我教会你们两人能容易地辨认马克思的笔迹，我就如释重负了……因为那时，这些手稿至少对于两个人不再是看不懂的天书了。

恩格斯还表示，他将提供 100 英镑，以支付考茨基夫妇从维也纳搬到伦敦居住的费用，考茨基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从维也纳来到伦敦，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学习辨认马克思的笔迹，并整理手稿，到 1890 年 4 月，考茨基已经誊清了手稿的六分之一。但是，考茨基不久就带着手稿离开伦敦回到德国，有好几年没有继续这项工作。恩格斯对此很不满意，要求考茨基将手稿寄还。1893 年 3 月，他写信对考茨基说：“如果我知道你打算继续整理《剩余价值论》手稿，我会把它留给你，可是我已经好几年根本没有听到此事了。而在整理第三卷的过程中经常需要核对手稿，所以我才要你把它寄来”。

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作为马克思遗著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把马克思的全部手稿交给考茨基，让他整理出版，由于手稿太多，考茨基把

关于党务的部分交给了梅林，自己留下了《资本论》第四卷手稿。

考茨基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终于把这部巨著整理完毕，并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名出版。这部手稿的出版，完成了恩格斯的夙愿，考茨基终于没有辜负恩格斯的期望。我们撇开考茨基后来的思想变化，单就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来说，考茨基为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资本论》第四卷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锐利武器，正如考茨基在第四卷《序言》中所指出的，手稿的发表，粉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第三卷只是一种“困惑的产物”等等对《资本论》第三卷的攻击，它清楚地说明：“在第一卷出版的前五年，第三卷就不仅在结论上，而且在思想的逻辑次序上，像现在的样子一样，为马克思所思考过了。”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后，资产阶级学者已无法用“沉默的阴谋”来对付它，于是，他们变换手法，从各种角度极力贬低《资本论》的科学性，对《资本论》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和诽谤运动。

1890年，柏林的书店里冒出了一本题为《我和马克思的论战》的小册子，作者是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布

伦坦诺。他在小册子里为他早在 20 年前就被马克思驳倒的对《资本论》第一卷中一段引文的攻击进行新的反扑。

原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引用了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议会演说中的一段话。格莱斯顿在议会财政预算演说中有这样一句话，从 1848 年以来，英国“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格莱斯顿的这句话正好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必然引起贫富差距加深这一论断。

1872 年 3 月，德意志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协和》杂志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在思是怎样引证的》匿名文章。文章宣称，格莱斯顿根本没有讲过这句话，因而断言：“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之后，这位匿名作者还接二连三地的发表文章，诋毁马克思是“无耻地撒谎”，“近乎犯罪的轻率”，等等。

马克思看到匿名文章后，立即把用过的材料又核对了一遍，然后撰文反击，马克思用不可辩驳的证据说明，《资本论》引用的格莱斯顿这句话在英国尽人皆知，曾被英国各大报刊所刊载，被著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广泛引用，而正是这位德国工厂主的辩护士，“在形式和实质上撒了谎”。至于《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中没有记载，那是由于格莱斯顿这句话不打

自招地供认了英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事实，因害怕得罪英国的资产阶级才在事后出版的半官方的议会记录中删掉了这句话，这种做法在标榜议会民主的英国是司空见惯的。

在揭穿了事实的真相后，马克思嘲讽说：“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窍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马克思不愿意与这种下流的文丐纠缠。在“告别”时，马克思赠给这位“博学之士”一句话，“你永远是一头驴子。”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马克思逝世后，布伦坦诺跳到了前台，于1890年11月发表了《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一书，重弹所谓“捏造”的老调。这时已81岁的格莱斯顿也粉墨登场，他于11月22日写信给布伦坦诺写信打气：“您完全正确，马克思绝对错误。”11月28日他又写信说：“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于是，资产阶级报刊借机再次掀起攻击马克思的浊流。

恩格斯为捍卫亡友的声誉，结束这场闹剧，立即着手反击，1890年12月13日，他写成了论战文章《关于布伦坦诺（ON TRA 马克思）》发表在《新时代》上。接着，又于1891年初，编辑出版了《布伦坦诺（ON TRA 马克思问题）。——关于所谓捏造

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一书，这本书详尽地叙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公布了三次论战的全部文件。恩格斯列举了当时包括格莱斯顿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在内的八家报纸报道，证明了马克思的引证是正确的，击败了布伦坦诺，泰勒和格莱斯顿对《资本论》的又一次挑战。

恩格斯在结束这场论战时，怀着获胜的喜悦写道：“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 20 年之久，而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可以想象得到，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像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莱，泰勒先生今后也将不会再相信由布伦坦诺先生笔战获胜的战报了。”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发表后，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论》所阐述的理论提出了挑战，特别是企图推翻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理论，如康拉德·施米特博士，彼·法尔曼和尤利乌斯·沃尔弗教授以及意大利庸俗经济学家阿基尔·洛里亚。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是预料中的事，而回击这些挑战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恩格斯挑出阿基尔·洛里亚作为打击的靶子，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对洛里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恩格斯单挑洛里亚，并非洛里亚攻击《资本论》的理论有比其他资产阶级学者更值得重视的地方，而是因为此人已经无耻到没有限度的地步，打击他的时候可以畅所欲言。

正是这个洛里亚，在马克思刚去逝就在《新文选》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文章内容错误百出，1886年，他抛出了《关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说》一书，把经他歪曲了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宣布为他自己的发现。他攻击马克思的《资本论》，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是建立在自觉诡辩基础之上，也正是洛里亚，预言马克思根本不打算写第二卷，这第二卷很可能是马克思在拿不出科学论据时使用的一种诡计。

更为可耻的是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后，他造谣说这两卷《资本论》是恩格斯编的。他以近乎无赖的口气说：“现在恩格斯得意洋洋地把第二卷和第三卷扔在我面前作为答复……妙极了！这两卷书使我感到这么大的愉快，我由此得到了这么多精神上的享受，以致从来没有一个胜利像今天的失败——如果这真是失败的话——这样使我觉得如此可喜。但是，这真是失败吗？马克思真的为了发表而写上这么一大堆不连贯的笔记，好让恩格斯怀着虔诚的友谊把它们编在一起吗？真的可以设想，马克思

……本来希望这些手稿成为他的著作和他的体系的王冠吗？真的可以相信，马克思会发表关于利润率的那一章吗？在这一章里，好多年前就答应要解决的问题。被归结为最无聊的故弄玄虚和最庸俗的文字游戏？这至少是可以怀疑的……在我看来，这证明马克思在发表他的光辉的著作以后就没有打算写什么续卷。说不定，他原来就是想把他的巨著交给他的继承人去完成，而自己不担负什么责任。”洛里亚简直是无耻之极。

恩格斯决心“拔光”这位帕多瓦教授身上的“孔雀羽毛”，他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和《致康·施米特》等著作中对洛里亚的谬论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洛里亚在《马克思的遗著》一文中写道：“马克思说虽然个别价格会偏离个别价值，但全部商品的总价格始终和它的总价值一致。”“价值既然不外是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相交换的比例，所以单单是总价值这个概念，就已经是荒谬、胡说的。”他还说，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有“这样一种价值，商品既不按照它来出售，也不能按照它来交换”。经过这样一番歪曲，洛里亚便宣告马克思“理论上的破产”。他太得意忘形了，以为“像他这样一个小妖居然能把马克思建立的坚固的大厦举到空中，弄得粉碎。”

恩格斯指出，洛里亚先是把价值同交换价值混

同起来，接着又把价值和价格混同起来，然后再将价格与生产价格混同起来，总之，他的全部“批判”都是建立在歪曲的基础之上的，这恰恰证明了洛里亚是一个“自觉的诡辩家、谬论家、吹牛家和江湖骗子”。

对于洛里亚关于《资本论》第二、三卷是恩格斯编造的无耻谰言，恩格斯未加理睬，这种无赖的造谣在事实面前是会不攻自破的。

洛里亚自马克思逝世后开始的对《资本论》的攻击和诋毁，把他自己的真面目暴露在世人们面前，即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极端狂妄，混不下去时又像鳗鱼一样滑掉；挨了别人的脚踢还充英雄好汉；抢占别人的研究成果；死皮赖脸地大做广告；依靠同伙的吹捧捞取声誉——在这一切方面，还有谁比得上洛里亚先生呢？”

恩格斯坚定地回击了资产阶级文人学者从各个方面对《资本论》的攻击，捍卫了这部科学巨著的历史地位，也传播了《资本论》所阐述的革命理论。

第二十五章 好客之家和欢乐伙伴

恩格斯并不总是为探索深奥的人类问题而冥思苦想，他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对每一个受苦的人都寄予无限同情。对每一种卑劣行为都深恶痛绝，他是一位伟大的救助者和战士，也是一位乐天的哲学家。

——卡尔·考茨基

恩格斯性格豪爽，有人说他家的门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坐落在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的恩格斯的宅第，经常是高朋满座，欢声笑语，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在这里受到热情欢迎，各国从事进步运动的流亡者在这里受到殷勤的款待。

恩格斯在伦敦的朋友和战友很多，经常来往的有艾威林夫妇，流亡英国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英国工人领袖约翰·白恩士、乔治、朱利安、哈尼等，肖莱马也经常从曼彻斯特到伦敦看望恩格斯。

然而，到恩格斯家做客的更多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专程造访恩格斯的各国革命者和进步人士，主要有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拉法格，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辛格尔以及恩格斯颇为赏识的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奥地利的工人党领袖阿德勒，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民粹派活动家查苏利奇也是恩格斯的常客。

恩格斯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东道主，他一直保持着莱茵人那种乐观和善于交际的性格，无论是新朋还是老友，都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特别是对于那些前来求教的年青后生，恩格斯更是慷慨的予以帮助，而从不装腔作势，自诩渊博。

据后来成为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康拉德·施米特回忆，他大学毕业后，把自己认为很了不起的博士论文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很快便回信给他指出了错误并邀请他到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做客。从此，67 岁的恩格斯同 24 岁的施米特开始了忘年交。施米特回忆说：“我常听他坐在壁炉旁侃侃而谈，

这样的时刻我永远也不会忘怀。他知识渊博，使我惊叹不已。凡是愿意听他讲的人他都乐于施教。他妙语连珠，谈话内容涉及政治、历史、军事、语言研究、立法、党史、文学、自然科学、哲学。将近午夜，我才满载无数新的启示，满怀感激和幸福的心情，踏上长达三小时的归途。次日，我记下谈话的要点，在以后的年代，还经常阅读这些笔记。今天每当读到记述这些美好的时刻的回忆，还感到十分新鲜和幸福！”

每到星期日的晚上，恩格斯的朋友们和那些正在伦敦的战友们，都要聚集在恩格斯家里，大家无拘无束地围坐在一起，畅所欲言。人们用英语，德语，法语或其它欧洲语言进行交谈或介绍本国的热点问题，当然也经常开玩笑，当在场的某个人演唱严肃或快乐的歌曲时，其他人就洗耳恭听。每逢这种聚会，恩格斯都要拿出他心爱的波尔多红葡萄酒或冷啤酒招待客人。他的酒窖里经常存放着几十打的酒。酒喝的越多，气氛越活跃，恩格斯这位东道主也就越是喜形于色。有时，他甚至让人拿上香槟酒，亲自唱起一支青年时代唱过的古老的大学生歌曲。在英国歌曲中，恩格斯最喜欢的是一首古老的政治民歌《布雷的牧师》。

这首歌通过一个牧师的口，叙述了他为保持自己的职务，在 1685——1715 年间每当政府更迭时，

是怎样改变自己的教会政策观念和政治观念的。恩格斯不仅喜欢唱这首歌，还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的歌曲集《前进》翻译成德语。《布雷的牧师》的重迭韵，在恩格斯笔下音律优美：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伟大的汉诺威皇朝，
除了信教皇的人妖，
我为它尽忠效劳，
只要它王座不倒，
我的忠诚不再动摇，
除非又得换代改朝，
乔治永远是我明主
直到有谁把他赶跑。

在这种聚会上，《资本论》英译者穆尔演唱的饮酒歌也受欢迎。歌中说的是“三个快活的邮差”，坐在“天龙酒馆”打碎了几个瓶子。歌词完全反映了，“美好英国”的精神面貌：

酒馆老板快拿酒，
斟满杯子任它流，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无洒水为友。

参加过恩格斯家星期日晚会的人，无不对恩格斯卓越的语言才能感到钦佩。有一次，俄国民粹派运动活动家克拉夫钦斯卡娅夫妇到恩格斯家做客，恩格斯用法语、德语和英语同他们交谈，克拉夫钦斯卡娅不会说外国语，当恩格斯转过来同她攀谈时，方知她只会说俄语，所以马上改口用俄语同她交谈，并用俄语背诵了一大段普希金的诗《叶甫盖尼·奥涅金》：

我们求学的途径虽然各不相同，
但都不是不学无术的人，
谢谢上帝的恩典，
使我们都能炫耀一下才能。
按照许多人的意见
(这些评论者都是举足轻重而又苛刻的人)，
都说奥涅金少年博学，
但是过于矜持不逊

他的才华得天独厚，
真可以说应答如流谈笑风生。
重大的争辩他不发一言，
以保持学者应有的身份。
但为了博取夫人小姐的一笑，
突然说句俏皮话像火星那样射出光明。
现在，懂拉丁文已经不算时髦，
不过有个事实要让你们知道，
他拉丁文虽然懂得不多，
不过要讲解铭言箴语却不嫌少。
谈起尤维纳利斯他不会无言以对，
在信尾也会顺手加上一个 Vale（安好）。
《亚尼雅士之歌》他虽然没有熟读，
但其中有两首大体还能记牢。
对于地球上逝去的史实
和编年史中以往的陈迹，
要耐心的加以发掘，
他却没有这种嗜好。
然而从罗穆洛直到如今，
一切朝野小史他却件件知道。

他没有忘我的激情，
为诗文献出自己的生命。

虽然我们为他绞尽脑汁
他却连音韵格律也分不清。
荷马、忒俄克里托斯他都曾咒骂，
但是读过亚当·斯密的作品，
他成了博学多才的经济学家，
也会有条有理地向你说明：
国家怎样才能繁荣昌盛，
它靠什么才能继续生存，
为什么当它拥有普通的产品，
竟会不需要珍贵的黄金。
父亲对他怎么也想不清，
还依然以抵押田地为生。

恩格斯用流利的俄语将这首诗背诵出来后，克拉夫钦斯卡娅鼓掌叫好，但恩格斯却谦虚地说：“唉，我对俄语的了解也不过如此而已。”

每逢圣诞节，恩格斯一家都要做很多圣诞布丁，分寄给各地的朋友，这些朋友包括曼彻斯特的肖莱马和龚佩尔特，泽稷岛的哈尼，俄国的拉甫罗夫，法国的拉法格和龙格，德国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而做布丁的方法更是别致，一般是圣诞节前的两个星期，恩格斯家的女友们上午很早就来到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她们把大量的苹果，核桃、杏仁、牛油

等切成小块，再把大量的葡萄干去核，切碎，弄好后放进一个大桶里。黄昏时，家里的男朋友们陆续到来，每个人都要用一把插在桶里的大勺子把配好的料搅到三次，整个场面极其活跃，热闹。最后，恩格斯为整个活动收场，他走进酒窖，取出香槟酒，大家为预祝圣诞节快乐和万事如意而干杯。

在恩格斯家过圣诞节，更是令人难以忘怀，据经常在恩格斯家过圣诞节的伯恩施坦回忆说，恩格斯家是以英国方式庆祝圣诞节的，和查理·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一书中所作的精彩描述很相似。房间里装饰着各种各样的绿色树枝，在树枝中间合适的地方露出背信弃义的槲寄生树枝。每个男子有权同在树枝下面站着或经过时被抓住的任何女子接吻，至于酒席，主菜是一只很大很大的雄吐绶鸡，如有可能，还有一只煮熟的大火腿作补充。几道副菜都是加了上等烧酒烹调的，其中的甜食叫 tipsy—cake（直译是醉蛋糕），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点。当天的荣誉菜是葡萄干布丁，它是在灯光熄灭以后，放在燃烧着的甜酒里端上来分给大家的。每个人都必须拿一份受过好烧酒洗礼的带着火的布丁。这样就可能使那些一上菜就不断喝酒而不能适可而止的人酩酊大醉。

在恩格斯家的每一次聚会，宾主都要开怀畅饮，

同时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国际语言交谈，有时恩格斯要担任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聚会不仅是朋友欢聚，也是交流思想的聚会。如 1893 年 3 月 31 日复活节这天，倍倍尔，拉法格和白恩士一起到恩格斯家聚会。恩格斯在给肖莱马的信中高兴地说：“三人都是社会主义者——第一次在我这里聚会。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然，即便是这种聚会，席间的话题也决不会局限于社会或政治问题，恩格斯的机智和诙谐使关于任何问题的讨论都充满了欢快的情趣。

在德国大选揭晓的那一天，恩格斯总是主动地把在伦敦的各国革命者请到自己家里来，开怀畅饮。为此恩格斯准备了大桶的啤酒。电报一到，如果是获胜的消息，恩格斯便带领大家为胜利干杯；如果是竞选失利的消息，则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未来的胜利干杯。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对一个来自德国的朋友说：“我真有些招架不住了，社会民主党在补选中获胜的次数也太频繁了。

恩格斯对待每一位来访者都是那么平易近人，他决不允许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互相吹捧和搞个人崇拜。1892 年，俄国年轻的民粹派分子鲁萨诺夫邀应来到恩格斯家，出于对恩格斯的尊敬，鲁萨诺夫一见面就说：“恩格斯公民，请允许我这个俄国社会主义者

向您表示衷心颂扬，你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的朋友，现在你仍然是社会主义国际的精神领袖……我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你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就和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非常重视你的意见，你的每一部新作品刚刚问世我就阅读……看见你就好像觉得马克思依然活着，你是马克思的化身……”

恩格斯未等鲁萨诺夫说完便作了个手势，打断了他的话。恩格斯微笑：“噢……噢……噢……年轻的同志！……够了，在我们社会主义者中间，干吗要这么互相恭维呀？我们就不能更坦率些吗？你这段演讲辞大概也使你喉干舌燥了……请坐下来，喝杯啤酒润润嗓子。”

参加恩格斯家聚会的，并不只限于社会主义者，也有一些民主派人士甚至保守派人士。欧根·奥斯渥特一直是受恩格斯欢迎的人，他是1848年革命的老战士，恩格斯与他是普法尔茨护宪战争中认识的。奥斯渥特一直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赞成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但是奥斯渥特意志坚强，对德国霍亨佐伦王朝决不妥协，因而受到恩格斯的尊重，成为恩格斯家的座上客和酒友。宪章派的领袖朱利安·哈尼1888年返回英国定居后，继续与恩格

斯保持密切来往。哈尼长期在美国居住，对英国工人运动失去了信心，但恩格斯总是耐心劝导他。哈尼没有固定收入，恩格斯经常接济他，有时还把他接到伦敦居住一段时间，临走时，都要亲自把他送上火车。1885年5月，哈尼感激地写信给恩格斯：

“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苦苦思索着，我究竟是凭什么能够得到你那些让我简直意想不到的热情款待和亲切关怀。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出来，你那令人愉快的卧室，丰盛的饭菜，你的酒，你的雪茄烟，这一切固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尽管你自己非常紧张地忙于写作，你对我的体贴入微，总是那么热情友好，并且事事都预先考虑周到。以上这些以及另外一些体现真实友情的事例，不但现在而且永远使我感激不尽。”

1894年6月，德国保守党政治家赫尔穆特·冯·格尔拉赫在伦敦参加青年基督教联合会代表大会期间，多次拜访恩格斯，受到恩格斯的盛情款待。格尔拉赫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尽管我一开始就向他解释，我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基督教社会党人，但他还是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这个年轻人，并一再邀请我到 he 家里去。我原来想象，他或许是个心胸狭窄的狂热党徒，但是，他能如此精辟地，实事求是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是我想象不到的。”格尔拉赫在一

战爆发时，成为反对资产阶级战争的和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这次会见 40 年后，格尔拉赫又投身到反法西斯运动中。

另一个保守党人，经济学家，《柏林评论》的编辑，同时又是攻击《资本论》的洛贝尔图斯的朋友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在伦敦逗留期间，也经常是恩格斯家的座上客。他之所以享受这种权利，是因为恩格斯赞赏他在受到俾斯麦政府的迫害时，宁愿被放逐也不向反动当局屈服的精神。这个典型的易北河东岸人颇有一点儿贪杯，一天晚上，他在恩格斯那里喝了个痛快。他深知自己的地位，一遍又一遍地用有些发硬的舌头喊道：“不，人家会对我说，我这个普鲁士保守派，有一天在伦敦这个地方，在革命的共产党人身边喝醉了。”

能光顾恩格斯家的，并不一定都是些重要人物，普通工人在这里同样会受到盛情接待。有一次，一个名叫马洪的普通工人写信给恩格斯，请求接见他，恩格斯见信后马上回复：“您如能在明天，星期五晚上 7 点到 8 点来我处，同我谈什么问题，我都乐意听取。”

然而，并非所有去拜访恩格斯的人都会受到热情接待。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说：“唯一不能得到恩格斯宽恕的就是伪善。一个不老实的人，尤其是不忠

实于党的人，恩格斯是决不留情的。”甚至会把他们轰出大门去。1888年12月的一个星期日，英国社会主义联盟盟员史密斯·赫丁利窜到恩格斯家，此人曾多次发表恶毒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他到恩格斯家的目的是想借机抬高自己的地位。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说：“这个无赖……在安塞尔和万贝韦伦的保护下，竟厚颜无耻地到我这里来了。施留特尔到你那里，会告诉你我是怎样把他赶走的。”

恩格斯一生没有子女，但他把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看作是自己的孩子。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更是从各方面像父亲一样关心劳拉和爱琳娜。

恩格斯同劳拉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给劳拉写信是他“唯一真正高兴写的信”。他认为，在巴黎只有劳拉“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每逢节日，恩格斯都要给劳拉和燕妮的孩子们寄蛋糕和布丁；劳拉的生日，恩格斯如不能去巴黎，也总要去信祝贺，并寄上一些钱作贺礼。有一次过圣诞节，恩格斯把蛋糕和布丁分为两份统统寄到劳拉家里，寄出后又觉不妥，因为劳拉的丈夫拉法格喜欢甜食，且饭量很大，恩格斯担心他会把孩子们的那一份也吃掉，于是赶紧又给劳拉写了一封信，叫她注意提防拉法格侵吞孩子们的蛋糕。

由于劳拉远在巴黎，不能像爱琳娜那样经常到

恩格斯家里去，所以恩格斯特别想念劳拉，每年都多次写信邀请她到伦敦做客。1886 年秋天，恩格斯写信给劳拉说，肖莱马从德国途径巴黎回伦敦，他保证要把劳拉带到伦敦，恩格斯为了表达他的盛情，在信中还引用了一位老朋友过去对劳拉的溢美之词：“当她走进房间里的时候，就像升起了太阳。”然后恩格斯说：“那么就让太阳在伦敦的上空再一次升起吧！”但劳拉因诸事缠身，还是未能成行。这一年年底，恩格斯又邀请劳拉在圣诞节来伦敦团聚，为了使劳拉无法推脱，恩格斯还随信寄去了 20 英镑。12 月 23 日，劳拉和拉法格终于来了，恩格斯放下手头的工作，同她们痛痛快快地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

由于拉法格和劳拉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从事工人运动，而且还要抚养燕妮的孩子，所以经济拮据，生活颇为困难，恩格斯总是慷慨解囊，像资助马克思那样资助劳拉夫妇，据现有书信统计，仅 1886 年就汇去了 245 英镑。对此，劳拉夫妇感激地对恩格斯说：“您的汇票一向像沙漠里的甘霖一样来得及时。”

对于爱琳娜，恩格斯不仅指导她从事工人运动，对她的个人问题也很关心，在从事工人运动中，爱琳娜与英国社会主义者艾威林产生了感情，两人经常一起到恩格斯家做客，但对恩格斯和琳蕤隐瞒着他

俩恋爱的事，临到他们公开同居时，才不得不向恩格斯等“家里人”公布。恩格斯对劳拉说：这对小傻瓜真好笑，还以为我们看不出来，什么都不知道哩。

恩格斯也很喜欢艾威林，但他认为爱琳娜在决定同艾威林结合之前应先征求他的意见，因为艾威林结过婚，其妻子虽然与别人私奔了，但并未办理离婚手续，爱琳娜与艾威林只能是同居而不能正式结婚。恩格斯并不反对他俩结合，他考虑的是如何应付一些不可避免的后果。既然两个人已经决定，恩格斯认为就应当把这件事公开，不要偷偷摸摸，免得以后被别人当做秘密加以利用。在恩格斯的指导下，这桩婚事没有引起什么风波。

婚后，夫妻两人感情日笃，夫唱妇随，共同致力于英国的工人运动。星期日和其它重大节假日，夫妻两个都要回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与“家人”团聚。这对年轻的夫妇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得到恩格斯关照。

恩格斯喜欢交际还表现在他钟爱旅游这一方面，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和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结伴到各地旅行。1887 年上半年，恩格斯患眼疾，为了完全克服视力衰弱和其它慢性病，恩格斯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到新大陆做一次长途旅行。1888 年 8 月，他邀请老朋友肖莱马同他一起去北美旅行，陪同他

们的是爱琳娜和艾威林。

1888年8月8日下午，68岁的恩格斯同肖莱马和艾威林夫妇登上了邮船“柏林”号，开始了大西泽和北美之旅。恩格斯这次旅行是去游览而不是去宣传，主要是去改换一下空气，等等，“以便完全克服视力衰弱和慢性结膜炎”。所以，恩格斯用了化名，以避免报刊记者的跟踪和采访。

8月17日，恩格斯一行四人到达纽约，在那里住了八天，会见了老战友左尔格和哈尼的夫人。随后他们参观了波士顿，康科德等城市，9月2日到达尼亚加拉大瀑布，在那里呆了五天，尼亚加拉瀑布宏伟壮观的旷世景色使恩格斯赞叹不已。接着，恩格斯一行顺安大略湖驶往圣劳伦斯河，9月9日到达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然后回到纽约洲的普拉茨堡。他们还乘一辆旧式马车游览了海拔两千英尺的阿德朗达克山脉，这给恩格斯四人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我们从来没有像坐在这辆马车的顶上那样哈哈大笑”。9月19日，恩格斯一行从纽约登上了当时最大的远洋客轮“纽约号”，29日返回伦敦，整个旅行历时50多天。

恩格斯称这次旅行是“非常愉快，有趣和有益的”，他在回伦敦途中写给弟弟海尔曼的信中说：“旅行对我好处极大，我感到自己至少年轻了5岁。我的一切小毛病都消失了，眼睛也好转……只要我还能

凑上几个伴，我现在就打算明年再去一次。”

1889年10月，恩格斯回到伦敦后，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卡尔·考茨基同他的妻子路易莎·考茨基要离婚的消息，这使他感到非常吃惊。

考茨基于1883年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路易莎相爱，但这桩婚事遭到了双方家庭的反对，他们最终冲破了家庭的阻力，幸福地结合在一起。这对夫妇曾在伦敦居住过一段时间，经常到恩格斯家做客，由于路易莎聪明、善良、待人热诚，恩格斯、琳蕻和爱琳娜夫妇都非常喜欢她。由于考茨基喜新厌旧，对路易莎渐有厌倦情绪。1888年，他趁路易莎回维也纳照顾生病母亲的机会，在母亲和妹妹的撮合下，认识了阿尔卑斯山区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蓓拉。不久，考茨基提出离婚，并卖掉家俱，在弟弟汉斯的陪同下去找蓓拉。

路易莎写信告诉了恩格斯事情的原委，而且，善良的路易莎并没有责怪考茨基，反而替他开脱，说考茨基如果“没有爱情，没有激情，他的本性就会死亡。”

恩格斯怀着敬佩的心情读了“这封了不起的特别宽宏大量的信”，他感到非常不可理解，他对路易莎说：“总有一天早上，卡尔好象从沉睡中醒来一样，明白他干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恩格斯有句名

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这并不能用来为考茨基的轻浮举动作辩护。恩格斯指出：“关于卡尔，你说，没有爱情，没有激情，他的本性就会死亡。如果这种本性表现为每两年就要求新的爱情，那么他自己应当承认，在目前情况下，这种本性或者应当加以抑制，或者就使他和别人都陷在无止境的悲剧冲突之中。”

恩格斯亲切地对路易莎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有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您具有这样的英勇气概，会克服一切困难并经过种种斗争而成为胜利者。我和尼姆（“尼姆”和“尼米”都是恩格斯对琳蕙的尊称——引者注）的衷心祝愿将伴随着您。我们乐意尽我们的可能为您效劳，您可以无条件地支配我们，如果有朝一日命运又把您带到这里来，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您都可以把我们的家当作您自己的家。”

而后，恩格斯多次给考茨基写信，批评他“干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并希望他们能够处理好这件事。但恩格斯的劝说无济于事，两人于1889年9月正式分手，对此，恩格斯感到“极其遗憾”并认定，考茨基“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同路易莎离婚后，考茨基并未能同漂亮的蓓拉结婚，因为蓓拉看到考茨基的弟弟汉斯更为年轻，英俊和魁梧，便一头倒向汉斯的怀抱，五天之内，两人

便订婚了。考茨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892年，考茨基向恩格斯提出要路易莎不要再用他的姓，改用双姓，即路易莎·施特腊塞尔——考茨基，理由是考茨基的第二个夫人的名字同路易莎接近，而且发音相同，容易引起误会。考茨基的这一无理要求惹恼了恩格斯，他在回信中说：“一个离了婚的妻子社会处境本来就够困难的了，因为按现今的概念来看，为了在公众面前恢复自己的名誉，她还必须拿出证据来，以说明她不是‘有过错的一方’。难道你不懂得，对于一个已离婚的妻子来说，如果他已离婚的丈夫要她在社会上不用自己合法的姓，而用他任意强加给她什么姓，必然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吗？”

恩格斯讥讽地质问考茨基，难道每一个在公开场合用考茨基这个姓的妇女都该是你的妻子吗？由于人们还不知道你现在这个妻子的名字，为了不致使人们把你的母亲当作你的妻子，她是否也要为自己另找一个新的姓呢？在恩格斯的严厉批评下，考茨基收回了他的无理要求，路易莎一直用考茨基这个姓直到1894年同弗赖贝格尔博士结婚，才更改了自己的姓氏。

1890年10月中旬，琳蕻突然得了病，恩格斯伤心地看着这位老战友一天天衰弱下去。自马克思逝

世后，琳蕙就搬到恩格斯家。在这里，琳蕙与其说是女管家，倒不如说是女主人。恩格斯一直把她视为同志，朋友和亲人。为避免琳蕙劳累，恩格斯还雇佣了两名佣人帮助收拾家务。琳蕙喜欢看戏，恩格斯就经常安排她到伦敦公主剧院和利塞乌姆剧院去看表演。琳蕙患下肢风湿病和气喘病后，恩格斯经常陪她去海滨疗养，并请伦敦的名医为她治疗，晚上还给她喝一点儿波尔多葡萄酒以使她早些入睡。

11月4日，死神把琳蕙从恩格斯手里夺走了，这对恩格斯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悲痛的消息，我的善良的，亲爱的，忠实的琳蕙，在得了短期的、不太痛苦的病之后，昨天白天安详地逝世了。我同她在这个房子里一起度过了幸福的七年。我们是最后两个1848年前的老战士，现在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如果说马克思能够长年的而我能够在这七年里安静地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归功于她。我还不知道现在我将怎样。听不到她对党的事务的极衷恳的忠告，我会痛感到是个损失。”

几天后，遵照马克思和燕妮生前的遗愿，恩格斯把琳蕙安葬在马克思和燕妮的墓穴里。他在墓地痛苦地说：“我的房子里一向是阳光灿烂的，现在是阴沉沉的了。”

以后的日子怎么办？一连几天，恩格斯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不愿让自己的晚年落入一个陌生人手里，想来想去，恩格斯想到了路易莎·考莎基，恩格斯对她印象非常好，与她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路易莎正在维也纳一家医院当助产士。

恩格斯给路易莎写了信，在这封信中，恩格斯一反过去那种鲜明，开朗的性格特征，表现得吞吞吐吐，想说又不直说。这样的信在恩格斯所有通信中是绝无仅有的，反映了老年恩格斯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恩格斯写道：

……在此以后我过的是一些什么日子啊？当时我感到生活是多么空虚，多么孤单……于是在我面前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往后怎么办？亲爱的路易莎，这里在我面前，日日夜夜都有一个生气勃勃的使人高兴的形象——这就是你，我像尼米那样讲过：唉，要是路易莎在这里，该多好啊！但是，对于实现这个愿望，我连想也不敢想……

那时我们就能够在这里把一切谈妥，或者作为老朋友留在一起，或者作为老朋友分手。事情由您决定。请把一切好好考虑一下，同阿德勒商量商量。如果我这个幻想没有可能实现（这是我所担心的），或者您认为这给您带来的不便或不愉快多于好处和快乐，那么就请您直接了当地告诉我。我过于喜爱您，

不希望您为我做出什么牺牲……，正因为如此，我请您不要为我做出任何牺牲，并通过您请阿德勒劝阻您不要这样做。您还年轻，有着美好的前途。我再过三个星期就满 70 岁了，毕竟活不了太长了。不值得为此残年而牺牲年轻人的充满希望的生活。而且我还有力量自己度过……。”

路易莎接到信后，马上决定前往伦敦，去承担这个向全世界开放的好客之家的一切。在路易莎的精心安排下，恩格斯的生活又充满了生机。路易莎主要是担任恩格斯的秘书工作，家务事不用她亲自动手，只要做出安排，监督一下就行了；她主要是记录恩格斯的口授和转抄材料；同恩格斯一起探讨一些问题，如化学、语法等，晚上 11 点至 12 点陪恩格斯打牌以消除疲劳。恩格斯对路易莎的工作很满意，他在信中对左尔格说：“这位可爱的女孩子为我做出的牺牲，我是非常感激的。我又能安静地工作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这样，一切都意外地好了起来，使人感到舒适，我的房子里又充满了阳光。”

路易莎刚刚使这所房子又充满了生机，便迎来了一次大规模聚会——恩格斯 70 岁生日聚会。

1890 年 11 月 2 日是恩格斯 70 岁寿辰。祝贺电报、信件和礼物从柏林、维也纳、巴黎、伯尔尼、斯图加特、莱比锡、汉堡、伦敦、曼彻斯特等向瑞琴特

公园路 122 号飞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专程从德国赶来为他祝寿。尽管恩格斯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热闹”，但还是遵照这种免不了的礼节办事，并自我安慰说：“一个人只能庆祝一次七十寿辰。”

11 月 28 日晚上，恩格斯家聚满了欢乐的人群，人们频频举杯，向恩格斯表示热烈的祝贺，恩格斯也兴致勃勃地同老朋友们、亲人们和到此祝贺的伦敦工人代表交杯换盏，他尽力向客人们表示，70 岁的恩格斯依然青春常在、生气勃勃。这次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半才告结束，除了红葡萄酒外，还喝了十瓶香槟酒。

生日过后，恩格斯亲自写信，答谢同志们和朋友们的祝贺，他在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的信中说：“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地知道，这些荣誉大部分我不应该归于自己，归于我的功劳。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因此，我只有庄严地许约，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愿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给予我的荣誉。”70 岁高龄的恩格斯随即又投身到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为他和马克思的崇高理想而奋斗。

第二十六章 第二国际

在巴黎举行了两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机会主义者（以法国的可能派为首）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了，恩格斯（他当时已经 68 岁了）像一个少年人一样投入战斗。

——弗·伊·列宁

1872 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后，国际的活动基本停止了，还在第一国际正式宣布解散的前两年，恩格斯便已经预见到下一个比第一国际有着更高要求的国际，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说：“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许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接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曾经先后召开过一些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讨论重建国际的问题，均未

取得任何结果。1877年9月在比利时根特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再次战胜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了必须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1881年10月，根据比利时社会党人的倡议，在瑞士库尔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再次讨论了建立新的国际的问题，大多数代表认为，各国工人政党正处于形成时期，而且发展不平衡，所以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时机还不成熟。

恩格斯对任何试图恢复和重建国际组织的努力均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旧国际的形式已经过时，任何想使它获得新的生命的努力都是愚蠢和徒劳的。188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贝克尔写信给恩格斯，建议成立一个类似第一国际的工人组织，恩格斯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目前的时机还未成熟。他在给老战友的复信中详细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第一，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在这些国家会引起新的迫害狂潮，除非使这个组织成为秘密组织，但如果建立秘密组织，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阴谋和暴动的欲望，也不可避免地会混进政府密探来。

第二，法国工人运动中的两大派别盖德派和可能派还在争吵不休，马克思和恩格斯寄予厚望的盖

德派在策略上则一而再地犯错误。

第三，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数量非常少，绝大多数工人组织的领导人都是工联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心怀恐惧。

而除了上述国家外，剩下的就不值得花费力气建立新国际。恩格斯认为，尽管国际工人协会已经解散，但国际实际上依然存在，各国革命工人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每一个社会主义报刊都是国际的一个中心，目前尚无必要让这些中心聚集在一个大的主要中心周围，只有在各国工人运动普遍高涨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新的国际。未来的新国际将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了。因此，我们坚决主张，这样一种优越的斗争手段，绝不当在还比较安静的时候，即革命的前夜就使用它，损害它，从而削弱它的作用。”

然而，从 80 年代中后期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运动开始高涨，新的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也普遍组织起来，要求加强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共同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建立新的国际工人组织的时机日趋成熟。

1887 年 10 月 2 日至 6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圣加仑举行秘密代表大会，会上根据倍倍尔的报

告，代表们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责成党的代表，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于 1888 年秋天召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其目标在于为了实行一个国际劳动保护立法，而使一切国家的工人一致行动。”

几乎在同时，英国工联在斯温西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 1888 年 11 月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会代表大会，讨论争取 8 小时工作日斗争问题。这个决议在报刊上发布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表示，如果工联允许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代表大会。德国党将放弃自己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计划。为此，德国党派倍倍尔前往伦敦，在伯恩施坦陪同下，拜会了英国工联领导人，并同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进行了协商，在归国途中，倍倍尔与比利时和荷兰工人党的领导人进行了磋商。

1887 年 12 月 28 日，工联领导人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声称，只有持有正式的工会组织委托书的正式代表才可以参加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实际上是拒绝了德国党参加代表大会的要求，因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俾斯麦政府会立即解散胆敢派代表出席大会的工会组织。1888 年 3 月 1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对英国工联的做法表示抗议，要求德国党的同志，各国工人不要参加伦敦代表大会，并宣布：“我们决定同其它国家工人代表一起，

在 1889 年召开一个全面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选择的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时机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处于非法状态。如果作为国际代表大会的组织者出面活动，将给俾斯麦政府提供延长非常法的口实。

1888 年 9 月 6 日至 10 日，英国工联发起的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参加大会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的工会组织的代表，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关于国际劳动立法的提案应该在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上表决”，大会委托法国的可能派筹办这次代表大会。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书记亨利·里德得意洋洋地说，代表大会一定会成为“新国际的先驱”。

法国马克思主义派对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十分反感。1888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4 日，在波尔多召开了法国工团联合会代表大会，大会委托工团联合会的全国委员会同法国其它工人组织一起，于 1889 年世界博览会期间，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邀请各国工会和社会党参加。为此成立了由盖德、瓦扬、拉法格、龙格等组成的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备这次代表大会。

1888 年 12 月，可能派在各国工人报刊上公布了《关于召开 1889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呼吁书》，明

确宣布：1889 年国际代表大会将“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会议基本内容已由伦敦代表大会拟定，“要清理目前尚且十分分散的社会主义力量，进而把它们团结起来”。

这样，在 1889 年将有三个相互竞争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可能派负责的代表大会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而法国马克思主义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想由自己组织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十分混乱。

刚刚从美国回到伦敦的恩格斯看到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有落入机会主义分子手中的可能，毅然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像一个少年人一样投入战斗”。

恩格斯首先催促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要他们加快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着急地说：“快宣布你们的代表大会吧，在各国社会主义报刊上声张声张，好让人们感到你们居然还存在……如有可能，还可以创办一种小周报，通过这一周报，全世界都会知道你们。”

然后，恩格斯说服德国党，放弃 1889 年在瑞士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计划，而同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合作，将巴黎的国际代表大会开好。1888 年 12 月 9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一篇呼吁书，声明“放弃明年在瑞士召开代表大会的计划，并且决定接

受巴黎代表大会的邀请。”

恩格斯以为有必要向德国党的领导人说明可能派的实质，以使德国党断绝同可能派的联系。他在致倍倍尔的信中说：“可能派同我们这些所谓的马克思派进行着拼死的斗争，自封为唯一能拯救世人的教会，这个教会绝对禁止和别人……进行任何联系和合作……此外，可能派已经卖身投靠现任政府，他们的旅费，召开代表大会和办报的费用，都从秘密基金中支付……如果同这帮人混在一起，就意味着你们背叛了以往奉行的整个对外政策。”

而“在外省占支配地位的马克思派，是法国唯一的反沙文主义的政党，他们由于支持德国工人运动而在巴黎不受欢迎。派代表出席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巴黎代表大会，这等于你们自己打自己耳光。”

然而，德国党的领导人过分迷恋工人运动的统一，特别是李卜克内西，他一直幻想以与可能派联合筹办 1889 年的巴黎国际代表大会。1888 年 12 月 29 日和 1889 年 1 月 11 日，他一连给恩格斯去了两封信，他提议先在法国南锡召开预备会议，每个国家各派一名代表，法国三个工人派别——马克思派，布朗基派和可能派各派一名代表，并称，“如果可能派不派代表参加，我们可以放手去干，如果他们派一个或几个代表，我们也能对付得了，他们服从当然好，不

服从将被孤立。”

恩格斯感到要使德国党认清可能派的真面目还需要时间和实践，因而同意李卜克内西的意见，他将李卜克内西的信转交拉法格，并说：“我看不出你们有对此加以拒绝的可能性……依我看来，你没有什么可埋怨的：相反，这将是迫使可能派服从的绝好机会。”拉法格原则上同意参加预备会议，鉴于当时法国正在进行议会选举，因而要求将预备会议推迟到2月中旬，在比利时某一城市召开。经过恩格斯与各方反复磋商，最终确定预备会议2月28日至3月1日在海牙举行。

1889年2月28日，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马克思派的代表在海牙举行了预备性国际代表会议，尽管李卜克内西反复劝说，可能派仍是拒不赴会，他们把伦敦代表会议的委托当作一张王牌，根本不把海牙代表会议当回事。海牙代表会议出于策略的考虑，承认了1888年伦敦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对法国可能派的委托和授权，同时又提出两个条件：大会的通知书必须由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全体代表共同签署；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证和确定会议议程方面拥有全权。会议委托比利时代表与法国可能派谈判，如果可能派接受上述条件，国际代表大会由他们召集，于7月14日

开幕；如果可能派拒绝，海牙会议的参加者将于 1889 年 9 月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由比利时和瑞士社会党人负责召集，法国马克思主义派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

谈判没有成功，可能派拒绝了海牙代表会议的条件。恩格斯从可能派的拒绝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回合斗争中的胜利，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说：“可能派做得很恰当——对于他们和对于我们来说都很恰当。我曾经担心他们会同意参加，而同时提出一些表面看来并不重要但却完全足以把全部事情搞乱的附带条件来……这次他们给了自己以致命的打击。”

然而，法德两国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积极筹备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代表大会。可能派拒绝海牙代表会议决议后，比利时社会党首先违背诺言，未采取任何措施准备即将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而法国党的领导人拉法格和盖德一味固执己见，违背海牙代表会议的决议，坚持把国际代表大会从 9 月提前到 7 月，即与可能派的代表大会时举行；此时，德国党的领导人坚持 9 月开会，并声称，如果比利时放弃大会的筹备工作，德国人将不参加其他人筹备的代表大会。

本来大好的形势眼看就要由于内部纷争而毁于

一旦，恩格斯不得不耐心地在法德两党中调解。他对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讲，德国党无权向法国党提出最后通牒，并且“德国人承担了义务，不能这样退回来了，比利时人的退缩并不解除其他人相互之间的义务。”接着他又劝告拉法格，既然海牙代表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法国党就不应“背离大家在海牙同意的东西百分之一毫米”，“如果你们固执己见，你们就不得不独自召开代表大会，成为欧洲的笑柄而使可能派大为高兴。”

从与可能派对抗这一角度看，在7月14日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确实意义重大，所以拉法格和盖德固执己见，但他们未考虑如果与可能派发生直接冲突会给德国党的代表带来的人身安全问题。拉法格和盖德的固执使恩格斯很气忿，他在3月27日给拉法格的信中对法国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现在德国人给你们一个机会，不仅可以让你们体面地重新登上舞台，而且可以让欧洲一切有组织的政党都承认你们是法国唯一的社会主义者，并愿意同你们保持兄弟的联系……可是你们是否就用双手抓住这个机会呢？完全不是！你们的行为就象宠坏了的孩子，你们讨价还价，得寸进尺……从而使大家为你们争得的一切都有丧失的危险。

对你们来说：重要的就是要使代表大会开成

——而且就在巴黎开，在这次大会上大家会确认你们是得到国际公认的法国唯一的社会主义政党……。

……

还是接受别人为你们提供的东西吧，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一点：战胜可能派，不要使代表大会的召开受到威胁。不要使布鲁塞尔人有借口，使他们得以摆脱困境、借故推托和玩弄阴谋；再也别搅乱大家已经为你们争得的一切。你们不可能取得你们所要的一切，但你们能取得胜利。德国人为你们尽了一切努力，别使他们灰心失望，无法再和你们共同行动，收回你们改变开会日期的要求吧！办事要像成年人那样，而不能像宠坏了的孩子那样，既要吃蛋糕，又要蛋糕不咬掉，——否则，我担心大会根本开不成，而可能派会讥笑你们，而且笑得有道理。”

在恩格斯苦口婆心地劝说和尖锐地批评下，法国党终于收回了改变会议日期的要求。

1889年4月22日，比利时工人党在若利蒙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既参加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大会，也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这就意味着比利时工人党放弃了海牙代表会议授予他们的筹备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权利。

针对形势的变化，恩格斯建议法国社会党立即

将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任务承担起来，他对拉法格说：“难道您没有看到，比利时人的行为不是给你们恢复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吗？现在只要你们愿意，不是就能够在你们认为最合适的日子（7月1日、7月14日或8月1日）来召开你们的代表大会吗？只要你们的行动跟得上，只要你们是代表一个准备负担必要经费的党（这是不言而喻的），那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不是还一点不晚吗？”

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同意法国社会党在7月14日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倍倍尔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李卜克内西和我已经商量好了，请拉法格和他的朋友们于7月14日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恩格斯催促法国社会党“不要迟疑了”，要放开手脚，“一天也别浪费”。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迅速行动起来，1889年5月6日，拉法格领导组织委员会起草了《告欧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书》，宣布“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定于1889年7月14日至21日举行”。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包括了除可能派以外的所有法国社会主义派的代表和工会组织的代表。恩格斯称赞这份呼吁书“写得短小精悍，需要写的都写进去了，没有多余的话”。他亲自译成德文于1895年5月11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载，这个文件还被印成英文传单寄给各种社

会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活动家。

随后，盖德和拉法格又起草了关于国际代表大会的通知书，5月14日寄给了恩格斯，恩格斯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建议拉法格尽快发表这个通知书。5月24日，他着急地对拉法格说：“请您快把有外国人的签名通知书赶出来吧！无论在这里或是在任何地方，这份通知书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内容无所谓，写得平淡也好，没有华丽的词藻也好，关键在于签名……起草一份大家都能签名的通知书就那么困难呀！”“总之，快把大家签名的通知书赶出来，这是把对方一切诬蔑和谎言压下去的唯一有效方法；而对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国家来说，通知书赶在他们做出决定以前，也是极其重要的。”

由于恩格斯亲自参加，凭借他崇高的国际威望，马克思主义国际代表大会通知书的征集签名活动进展十分顺利，在通知书上签名的有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荷兰、西班牙、瑞士、瑞典、意大利、葡萄牙、俄国等国家社会主义工人组织的代表。6月初，附有代表签名的通知书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报刊也纷纷转载。可能派试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阴谋破产了。6月8日，恩格斯怀着满意的心情对老朋友左尔格说：“除社会民主联盟外，可能派在欧洲没有得到一个社

会主义组织的拥护。”

在协调法德两党筹备国际代表大会的同时，恩格斯还着力回击了可能派和英国的可能派——社会民主联盟对马克思主义派的攻击。1889年3月16日，可能派在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正义报》上发表了《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与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一文，文章攻击海牙代表会议“很像当年瓦解旧的‘国际’的那些卑鄙阴谋”。体现了德国人的国际统治欲望，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不应“拼命嘲笑和辱骂可能派”。

恩格斯认为，必须抓住这篇文章作为反击可能派的突破口，在恩格斯的具体指导下，伯恩施坦写了一篇题为《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的抨击文章，先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载，随后印成了英文小册子，在英伦三岛广为散发，这篇文章详细叙述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来龙去脉，揭露了可能派妄图扮演“法国唯一的社会主义组织”的角色的野心，指出，可能派实际上只是“一个政府党——内阁社会主义者”，正是他们阻碍了工人运动的统一。

这篇文章和小册子在英国工人组织和团体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就好像炸弹爆炸，把海德门——布鲁斯阴谋的密网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而且正

中要害。这里的人们一下子看清了事情的真相，认为是海德门对他们无耻地编造了关于代表大会，关于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关于德国人和关于海牙会议经过的谎言，对他们隐瞒了最重大的事情。海德门被迫承认“可能派或许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犯了错误”。恩格斯高兴地说：“海德门还从来没有这样可耻地退却过。”许多英国社会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联盟的一些成员，逐渐倾向于反对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然而，海德门并不甘心失败，在他的指使下，5月25日，《正义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全部真相》的宣言，宣言歪曲代表大会筹备的全过程，为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大肆吹嘘，并攻击恩格斯操纵、分裂工人运动。在恩格斯的授意下，伯恩施坦写了第二篇论战性文章《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逐条驳斥了《正义报》编织的谎言，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工人运动的团结多次妥协、退让，但都遭到了可能派的拒绝，这篇文章经恩格斯修订，印成英文小册子，并刊登在《工人选民报》上，使可能派及其英国盟友进一步遭到孤立。

在总结同可能派斗争的实质时，恩格斯指出，可能派和海德门派企图通过他们的代表大会，钻入新国际的领导岗位，这就使我们面临一场不可避免的

斗争，“我仅仅在一点上同意布鲁斯的意见：这个过去国际分裂的重演，现在它使人们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巴枯宁的信徒，打的旗帜是不同了，但是他们的装备和策略全是老一套，他们是一伙企图使工人阶级‘屈从’于他们个人目的的阴谋家和骗子；另一边是真正的工人运动。就是这一点，而且也仅仅是这一点，使我对这件事情这样认真……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向世界证明，欧洲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马克思派’，他们被摈弃了。”恩格斯希望在代表大会问题上不再需要他做什么事了。然而这又怎么可能呢？

会期一天天临近，但法、德两党对会议的形式还未取得一致意见。按照德国党的意见，代表大会要公开举行，每天开会5—6个小时，以给代表们参观同期举行的工业博览会的机会。而法国党则主张白天关起门来开秘密会议，晚上再举行群众大会。法国党主要担心由于可能派的竞争，会议大厅的人可能不满一半而被报界大肆张扬。

恩格斯在致拉法格的信中劝拉法格不必为此担心，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在听取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其他人的意见之后由代表大会自己去作决定。”对于德国人来说，“无论如何不能开秘密会议……会议完全公开是防止再次被指控为秘密团体的

唯一保证。”法国社会党“如果因为怕别人议论会场一半空着，就关起门来开”，这样做于事无益，“召开代表大会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多几个或少几个巴黎人毫无关系”。最终使法国党放弃了召开秘密代表大会的想法。

最为复杂的是如何处理两个同时在一个城市召开的代表大会的相互关系。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强烈要求两个大会合并，李卜克内西是有名的“联合狂”，倍倍尔和伯恩施坦也主张两个代表大会合并；比利时，荷兰等国的工人政党和组织也有类似的要求。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法国社会党也被迫让步，拉法格向恩格斯表示：“如果外国代表全力要求合并的话，我们将不反对，而是设法使合并不能实现。”这期间，法、德两党都向恩格斯征求意见。

恩格斯首先强烈批评了德国党盲目联合的热情，他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说：他们（指李卜克内西等人）认为，自从他们解决了自己的内部纠纷以来，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充满了爱和友谊，和平和一致，他们一点也不懂得，代表大会的召开或者意味着屈服于布鲁斯——海德门联盟，或者意味着同这个联盟斗争……他们一味幻想把两个代表大会联合起来（只要代表大会一召开），而又拒绝采取能做到这点的唯一斗争手段，即向布鲁斯——海德门显显厉害

……相反地，李卜克内西却要求姑息他们，不仅大献殷勤，甚至差一点把他们捧在手上了。“看到李卜克内西把德国人好端端的国际地位完全玷污了，也许部分地已经断送了，简直叫人怒不可遏”。

随后，恩格斯又向法国党指出，即将召开的两个代表大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我们的代表大会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而另一个代表大会则是些还没有超出工联主义的人，所以，两个代表大会不可能合并；为了减轻法国党的压力，不妨与对方谈判结成联盟，但“应当好好讨论一下联盟的条件”。但是，无论是可能派还是社会民主联盟都不会渴望联合，所以，“问题的实质始终是要使错误在于对方，应该使对方在破裂时受到谴责”。法国党领导人接受了恩格斯的劝告，并在代表大会期间贯彻了恩格斯的策略。

正是由于恩格斯的亲自指导和多方调解，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代表大会的成功，拉法格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反复强调“是您挽救了代表大会”，可以说，拉法格的话没有半点夸张。拉法格和劳拉多次邀请恩格斯亲临大会，并到家中做客。恩格斯均婉言谢绝了。他说：“至于这个代表大会，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离它远点，它会把我卷入一个新的鼓动运动中去，使我为了各国的利益，背上一大堆可以忙上几年的任

务回来。这些事情在代表大会上是不能拒绝的。可是为了使第三卷出版，我又不得不拒绝。”

1889年7月14日，在攻克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隆重开幕，来自欧美22个国家和地区的393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中有各国社会主义著名活动家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拉法格、盖德、瓦扬、爱琳娜、普列汉诺夫、拉甫罗夫、纽文胡斯等。拉法格代表组织委员会致开幕词，他说：“聚集在这个大厅里的欧洲和美洲的代表并不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他们不是在三色国旗或任何其它国旗的标志下联合起来的，他们是在红旗——国际无产阶级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大会根据拉法格的提议，选举瓦扬和李卜克内西为大会执行主席。

恩格斯虽然没有亲自参加大会，但他在海峡对岸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程。7月17日，他在致左尔格的信中兴奋地说：“我们的代表大会正在开会，这是一个辉煌胜利……不管怎样，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想要各自在法国和英国窃取领导地位的阴谋完全失败了，他们要取得国际领导权的妄想则失败的更惨。”

确实，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失败得很惨，虽然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数比马克思主义派的大会的人数要

多，达 612 人，但光法国人就占了 524 人，外国代表只有 82 人，半数以上是英国社会民主同盟和工联的代表，没有多少国际性。

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由于大会执行主席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一些人有调和情绪，大会通过了与另一个代表大会有条件合并的决议案，由于可能派顽固坚持重新审察马克思主义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谈判最终破裂。对此，恩格斯批评李卜克内西等人说：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这也许会把他们的病医好一些时候。

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了一系列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决议，其中关于五一国际游行的决议被恩格斯称为“我们的代表大会所做的一件最好的事。”

巴黎代表大会没有在形式上通过关于成立新的国际联合组织的决议，但是 1889 年的代表大会实际上标志着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即第二国际的诞生。李卜克内西称这次大会是“第一次看到的工人国际议会”。

第二国际成立后，恩格斯继续关心它的活动，使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1890 年，恩格斯帮助法国党和德国党正确制定了 1891 年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

会的方针，再次挫败了可能派篡夺领导权的阴谋。1891年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作出开除无政府主义者的决定时，恩格斯高兴地指出：“代表大会投票赞成开除无政府主义者，这很好。旧的国际从此结束，新的国际则从此开始。”

1893年春，正当各国工人政党筹备苏黎士国际代表大会时，恩格斯决定到欧洲大陆作一次私人旅行，但并未打算参加苏黎士国际代表大会，他在6月1日回复考茨基的邀请时说：“苏黎士代表大会，你们自己也能举行。”不过，他也想乘各国社会主义者云集的时候，与他们见见面会晤一下老朋友。

1893年8月1日，73岁高龄的恩格斯在他的私人秘书路易莎·考茨基和路易莎的未婚夫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医学博士的陪同下开始了大陆之旅。他们一行经荷兰到达科伦，在这里与倍倍尔夫妇汇合，然后结伴经美因兹、斯特斯拉堡到瑞士的苏黎士。苏黎士代表大会开幕时，恩格斯到达格劳斯登州图齐兹镇他弟弟海尔曼的家里，在那里休养一星期。

在倍倍尔和其他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坚决要求下，恩格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返回苏黎士，并出席代表大会的闭幕式。这也是恩格斯唯一的一次直接参加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活动。当会议主席库里绍娃宣布恩格斯已经到来，大会主席团请他担任名

誉主席并致闭幕词时，大厅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恩格斯怀着激动的心情用英、法、德三种语言致了闭幕词，他谦虚地对与会代表们说：“你们对我的这种意料之外的盛大接待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不是对我个人的接待，我只是作为那个肖像就挂在那上面的那个伟人（指马克思）的战友来接受它的……如果他现在还活着，那么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

最后，恩格斯宣布代表大会闭幕，并带头高呼：“国际无产阶级万岁！”这时，全场爆发出暴风雨般的祝贺声和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与会者全体起立高唱《马赛曲》。

恩格斯利用这个机会，会见了参加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他对各国社会主义者雄厚的后备力量感到满意，特别是看到这么多妇女成为社会主义活动家，更让他感到高兴。他十分赞赏德国的女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认为她“工作能力很强”；维也纳的女工德沃腊克不仅阶级觉悟高，而且面貌“异常媚人，风姿可爱”，恩格斯甚至开玩笑说，“仅仅为了维也纳的妇女，我也永远不会饶恕俾斯麦把奥地利从德国版图中划出去。”

恩格斯本来只想以个人身份旅行，但在苏黎士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后，这一计划落空了。在维也纳、柏林等地恩格斯受到了奥、德两国工人阶级隆重的欢迎，无论走到哪里，恩格斯都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他走到哪里，就把哪里工人群众的革命激情推动到一个高峰。这次旅行成了一次真正的胜利进军。

从这次旅行中，恩格斯也看到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他说：“现在全世界无论做什么事，都得看看我们的神色。我们就是一个使人畏惧的强国，一个比其他强国更能起决定作用的强国。这使我感到骄傲！”

第二十七章 反对战争

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深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9 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欧洲的局势出现了剧烈的大动荡。

1879 年 10 月，德国和奥地利秘密签订针对俄国和法国的军事同盟条约。1882 年，意大利由于在同法国争夺突尼斯的斗争中失败，也加入到这个条约中来，1882 年 5 月，德、意、奥三国正式签订同盟条约，从而在欧洲形成了一个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军事集团。

在德国的威胁下，法国和俄国逐渐接近，1892 年，法、俄缔结军事协约，规定，如果法国遭到德国或奥地利的攻击，俄国应以其全部武装力量支援法

国。法俄同盟正式形成。

恩格斯在谈到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时指出：“如果说并吞亚尔萨斯——洛林使法国投入俄国怀抱，那么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约则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这样，整个情况又改变了。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这一或那一阵营周围。”这是恩格斯对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欧洲的国际格局形成原因的最确切的概括。

两大阵营形成后，双方都进行疯狂的扩军备战。德国平时军队的人数在 1893 年已达到近 59 万人，另外，德国还大力发展海军，准备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法国军队的人数在 90 年代比 70 年代也高出 20 万人，达 60 万人。双方的军事开支也随之激增。与此同时，在法、德两国，沙文主义狂热与军备竞赛相生相伴。德国在 1891 年成立了“泛德意志协会”，公开鼓吹日尔曼种族优越论。在法国，对德复仇则成为各种沙文主义组织的共同口号。

进入 90 年代，欧洲的局势更加险恶，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恩格斯在一系列书信和政论文章中提醒人们注意战争危险。他形象地比喻说：“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

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他又说：“我们确是在装满炸药的地雷上生活，一点火星就能引起它爆炸。”

恩格斯根据对欧洲国际关系和战争根源的分析，以惊人的洞察力预言，“下一次战争，只要一爆发，就绝不会限于局部地区，它在头几个月里就会把大国——至少是大陆上的大国——都卷进去。”1887年3月，恩格斯又指出，由于列强的利益交织在一起，“谁要是首先动手，谁就会挑起一场世界大战”。1887年12月，他在为波克罕《纪念一八零六至一八零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写的导言中又指出，对于欧洲各大国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

恩格斯通过对欧洲历史和国际关系现状的分析，预感到巴尔干地区是欧洲最为敏感的地区，极有可能成为未来欧洲战争的导火线。早在80年代中期，恩格斯就指出：“如果巴尔干的戏剧进入第二幕，俄国和奥地利之间就将爆发一场战争，那时（听其自然吧！）战火可能会燃遍整个欧洲。”1914年7月，恩格斯的预言真的变成了现实。

从80年代中期起，恩格斯开始对未来战争的规模做出预测，他对交战双方投入厮杀的军队人数的

估计一次比一次高。1885 年，他预计双方投入战斗的军队人数可能达 600 万；1887 年则估计为 800——1000 万；1889 年又估计为 1000——1500 万；到 1891 年更增加到 1500—2000 万。恩格斯所估计的数字之所以会直线上升，这反映了当时欧洲列强扩军备战的速度是多么惊人！

恩格斯在基于对战争规模分析的基础上，意识到未来战争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损失将是惨烈的。他说：“这将是一场闻所未闻的流血和浩劫，归根结底是前所未有的大伤无气。”这场战争同时还会“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至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收取。”

对于世界大战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恩格斯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统治阶级将会利用战争状态给予工人运动以沉重打击，并煽动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使工人阶级的斗争偏离方向。1889 年 3 月，他对拉法格讲：“战争将使我们的

运动遭到暴力的普遍的镇压。”

然而，世界大战还有一个毫无疑问的结果，“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恩格斯对各国的“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严正声明：“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跳一场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是不哭泣的。就算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就算它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但是，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末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不可避免。”

1889年12月至1890年2月，恩格斯应查苏利奇的要求，为“劳动解放社创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撰写了《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1890年，这篇文章还分别被译为德文和英文发表在《新时代》和《时代》杂志上。

恩格斯指出，沙皇俄国是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这个代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为了维护沙皇专制制度和进行经济掠夺，不断进行侵略扩张，并将夺取世界霸权作为扩张的最终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从来是不择手段，它可以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重金购买；它“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

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

进入 80 至 90 年代，随着农奴制改革和工业化的推进而成长起来的俄国资产阶级，他们为了不仅使国内市场不断扩大，而且为了在国内产出热带产品，侵略巴尔干半岛和亚洲的欲望更加强烈。侵略巴尔干半岛的最终目标是征服君士坦丁堡；侵略亚洲的最终目标征服英属印度。俄国的资产阶级完全仰仗沙皇政权为其开拓利益，因而它“目光短浅、愚蠢、无知、充满沙文主义情绪，而且贪婪到了极点”，它“甚至比沙皇更急于发动战争”。

不过，到 19 世纪末，由于俄国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1848 年停留在波兰边境上的革命，现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门，而在国内，它也已经有足够的同盟者，他们只等时机成熟就会为革命打开大门”。这将削弱沙皇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基础。

恩格斯认为，俄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将对欧洲的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他甚至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就会全部消失。因为俄国的威胁一旦消除，三国同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德国就会陷于孤立而不敢贸然发动对法国的战争，这就为和平解决亚尔萨斯和洛林问题奠

定了基础。

之后，恩格斯又进一步分析了当时世界战争没有爆发的原因。他认为有两种情况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的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这使得任何一方都没有把握对战争已做了准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胜利。当然，上述两种情况只能暂时地制约战争爆发，只要争夺世界霸权，扩军备战的斗争仍在进行，战争的危险就不会减少，更不会消失。特别是在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高涨时，战争贩子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而只要第一枪一响，就会失去控制，马上就会脱缰飞跑。”

“面对高悬在欧洲各国人民头上的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产阶级政党应持什么态度呢？1893年6月底，恩格斯接受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将为和平而斗争。“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理所当然地要高举和平的旗帜，动员一切力量，积极维护和平，坚决反对一切军备竞赛和战争冒险。因为由于军事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发展，未来这场战争的规模和破坏力将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战争，欧洲将面临灭顶的危险，而首先承受

战争灾难的不是各国的资产阶级，而是千百万劳动群众。

而且，各国统治阶级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借机摧毁社会主义运动。恩格斯曾多次提醒各国工人党注意，一旦战争爆发，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将首先使用暴力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结果，“革命在俄国和法国都会推迟；我们德国党的蓬勃发展会被迫终止，在法国，君主制可能会复辟”。尽管这并不能阻挡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但是，“这要失去多少时间，遭到多少牺牲，克服多少障碍啊”！

相反，和平安定的国际局势则有利于各国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恩格斯坚信，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对人类文明破坏极大的世界大战上。他希望“我们要像自然过程一样不可抗拒和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壮观的，坚定的发展，沿着它自然形成的轨道继续前进。”因此，恩格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时间维持和平局面，时间对于各国工人运动是有利的。他在1893年春天给左尔格的信中坦率地表示：“我倒愿平静地进行到1895年，那时候我们将能取得完全不同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恩格斯呼吁各国工人党“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

但是，恩格斯也清醒地认识到，和平能否维持下去，战争是否会爆发，这不是工人阶级政党所能决定的。这主要取决于各国的统治阶级，取决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等多种因素。1886年9月，恩格斯对倍倍尔说：“我并不希望世界大战——但是历史怎能管得了这些呢？它走着自己的道路，我们应当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对待它。”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不应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和平幻想上。在战争爆发之前，要采取一切手段制止战争、维护和平；在战争成为现实后，又要采取一切革命手段反对战争。为此，恩格斯为各国工人政党制订了战争期间的斗争策略。

90年代初，随着法俄亲善，在法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对德复仇狂潮，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泛滥成灾。法国资产阶级“被琅施塔得的香槟酒灌得晕头转向”（1891年，法国舰队访问琅施塔得要塞，表示法俄同盟初有形成），在塞纳河和马尔纳河之间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战场上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把法国的军国主义情绪推向顶峰，法国联合俄国对德国作战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现实。“为了在这种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的情况下，不致于使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者才之间在紧要关头发生误会”，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向法国社会主义者说明，德国社会主义者对这类

战争应抱什么态度。

从1891年10月13日至21日，恩格斯撇下了其他一切工作，集中精力和时间撰写了《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于1891年底发表在《1892年工人年鉴》上，此后不久，又译成德文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上。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时，恩格斯作了特别说明：

“我认为，不论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还是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我都有责任也用德文来发表这篇文章。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应该让德国的人们知道，可以多么坦率地同法国社会主义者讨论那种会使德国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参加战争，甚至是反对法国的战争的情况，这些法国人是多么没有一切资产阶级党派——从保皇派到激进派——所大加炫耀的沙文主义和复仇热。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因为他们有权直接从我这里知道，我对法国人说了他们些什么。”

实际上，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不仅有助于法国社会主义者反对沙文主义的斗争，而且也有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爆发时确定自己的立场。从更长远意义来说，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确立对待战争的原则亦有重大的帮助。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所阐述的思想的前提是法

国联合俄国对德国作战，这在当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转变为现实的趋势，这就意味着，“所有这些国家的被迫入伍的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相互厮杀”。这种情况，是恩格斯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战争真的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应采取什么行动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恩格斯首先分析了战争的性质。他指出，沙皇俄国是西方各民族的敌人，“如果沙俄匪帮侵入德国，他们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不是发展而是毁灭，不是进步而是野蛮。法国同沙皇携手合作，不可能给德国带来任何自由思想……法国会不得不背弃自己的革命作用。”如果德国在战争中战败了，“如果它被法国的锤和俄国的砧砸碎了，”德意志将被肢解，它甚至会被降到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中强加给它的那个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只有在为恢复本民族的生存条件而准备另一场战争的情况下去才能生存”。到那时，德国将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战斗。

同时，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这场战争又是捍卫行进的德国社会主义成果和前途的战争。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 30 多年的不断战斗，经过难以数计的挫折和牺牲，已经争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取得的地位：“这个地位能保证它在短

期内使政权转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德国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最光荣、最重要的岗位上；它的职责就是保卫这个岗位不受任何侵犯。”

如果法国和俄国结成联盟对德国作战，社会民主党将会成为沙皇，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德国政府本身三者共同对付的敌人，“我们曾经看过梯也尔和俾斯麦怎样在巴黎公社的废墟上握手言欢，我们也许将有机会看到沙皇、孔斯坦和卡普里维（或者他们的某个继承人）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尸体上拥抱”。在种情况下，法俄联盟发动的战争“首先是反对欧洲最强大的、最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战争。”如果德国在战争中战败就“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而且，“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就要停滞20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社会民主党必须同俄国及其同盟者——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进行坚决地、不调和地斗争。而且，只要德国政府进行反侵略战争，社会民主党人就可以向它表示，社会民主党支持一切反对外敌入侵的战争，同意增加军事拨款和要求政府武装全体人民。

在这场对德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战争中，为保证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社会民主党要采取最革命的手段进行战争。必要时，社会民主党要担当起领导者

的作用。在写作《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时，恩格斯曾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去过一封信，着重论述这一问题。他说：“战争进行得越革命，就越符合我们的意图。而且，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企图保全自己财产的资产者和容克们畏缩不前，正是我们将成为唯一真正坚决的主战派。当然，也可能出现下述情况：我们得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在另一封信中，恩格斯进一步阐述说，如果出现上述情况，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将效法 1793 年法国树立的光辉范例，“我们将在表明 1893 年德国工人并不比当年的长裤汉逊色的情况下，庆祝 1793 年的一百周年，而且，如果法国士兵越过我国边境，迎接他们的将是这样的吼声：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引自《马赛曲》）

恩格斯甚至还考虑到无产阶级政党执掌政权后所应采取的政策，他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旦“党取得了政权，如果它不纠正它的前任对其它民族所干的非正义的事情，那它就既不能运用这个政权，也不能巩固这个政权。”社会主义的德国一定要准备恢复被法国资产阶级卑鄙地出卖了的波兰。要让北什列斯维希和亚尔萨斯——洛林按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总之，要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

外政策，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消灭战争。

总的来说，在恩格斯心目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希望持久的和平，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多次强调：“希望和平局面将维持下去。”因为根据无产阶级事业的进展情况，根本无须孤注一掷，而“战争却会迫使我们这样去做”。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乐观的估计，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 10 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也可能使社会民主党遭到彻底失败，至少在 15—20 年内不能复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宁肯选择孤注一掷的战争，而不要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确定可以获得的胜利，那他们必然是丧失了理智”。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无论他属于哪个民族，都不会希望德国政府，法国政府，或者沙皇俄国中的任何一个取得军事胜利。

最后，恩格斯总结说：“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无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憾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致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 10 年或 15 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在各国工人政党中获得很高的评价。拉法格称这篇文章写得好极了，“我们的朋友们对于它是一点毛病都挑不出，甚至他们会发现，这篇文章写得正及时，它对现在的局势作了最清楚的最有判断力的解释，并且在目前，说出真情实况是极为重要的。”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所阐述的无产阶级对待真正的民族战争的态度具有共同的原则性，适合于每一个国家。恩格斯在致法国社会主义者博尼埃的信中强调说：“假如我不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即一旦发生外来的侵犯时，法国社会主义者必将拿起武器保卫他们的家园，那么我的通篇文章就毫无意义了。我要求的只是：一旦俄国发动进攻时，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德国社会党人，即使这个进攻得到官方法国的支持。”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对于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正确地制订工人阶级对待战争的政策具有很现实的意义，特别是当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相互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敌意时，法国和德国的工人政党却能手携手地一致行动。

进入 90 年代，欧洲列强继续扩军备战，世界战争的危险有增无减。因此，在制订工人阶级反对战争的策略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者及

其政党为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制止战争应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这也是恩格斯深入研究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1892年11月，德国政府把新的军事法案提交帝国议会讨论，该法案规定在1893——1899年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增加八万人，并追加庞大的军事拨款。这一大规模扩军行动引起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社会民主党和工人报刊立即掀起浩大的抗议运动。在抗议军国主义浪潮中，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倍倍尔清醒地认识到，仅仅在原则上反对军备竞赛已经远远不够了，为了反映广大人民的愿望，减少战争危险和制止军备竞赛，社会民主党必须提出自己的，与政府相对抗的军事法案，为此，倍倍尔求助于恩格斯，请求恩格斯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军事法案问题上应采取什么立场发表他自己的意见，并为他写一份讲稿。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进行的反对扩军备战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倍倍尔的请求。2月24日，恩格斯告诉倍倍尔，讲稿已经完成，打算分成八篇文章，以《欧洲能否裁军？》为总标题，在《前进报》上连续发表。他还向倍倍尔表示，他本人对《欧洲能否裁军？》这个标题感到不太称心，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可以全盘接受文章的

内容，也可以用《社会民主党的军事法案》。恩格斯指出，25年来，整个欧洲一直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进行武装，每一个大国都力求在军事威力和战争准备方面超过另一个大国。德国、法国、俄国更是竭尽全力进行狂热的军备竞赛，因而“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这不仅使欧洲濒临大战的深渊，而且使各国的人力、物力达到了开始耗竭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承担了全部征兵来源和缴纳大部分赋税义务的广大居民阶层都在呼吁裁军。恩格斯肯定地说：“裁军，从而保障和平，是可能的，它甚至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恩格斯根据对欧洲各国军事技术的发展和军事力量对比的研究，提出了普遍地和全面地裁军建议，同宗派主义的“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裁军建议不同，恩格斯的意见是逐步的裁军。

首先，逐步废除常备军制度而代之以民兵制度。恩格斯认为，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么，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大战”。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逐步废除常备军，是绝对没有任何障碍的，而如果这些军队保存下来，那么这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

虑——“一句话，军队的使命与其说是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是防御国内的敌人。”

其次，恩格斯提出了废除常备军，实现裁军目的具体方法，即通过国际协议来逐步缩短服现役的期限，这是由常备军过渡到组织成民兵的人民武装的最简捷的办法。恩格斯提出：“由大陆各大国协商，对一切兵种的最长现役期作国际性的规定，开头可以规定为两年，但是要预先说明，这个期限在将来一旦认为可能缩短时就立即缩短，并宣布以民兵制度作为最终目的。”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在国际范围内普遍限制军队的最长现役期，对各国军队战斗力的增减是一致的，不会影响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因而不仅无损于任何国家的安全，还会大大减少各国沉重的军事负担。而且，限制服役期的国际协议对各国也容易产生现实的约束力，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掩盖破坏协议的行动，因为每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都会监督协议的遵守情况，他们都不会允许自己的子弟超过法定的期限继续留在兵营里服役。

第三步，在过渡时期，应该把“军中训练的重心必须转移到对青年的教育上来。”即对小学生进行体育和军事训练，使他们掌握必要的军事知识，直到他们达应征年龄为止。这是达到最终裁军的根本途径。

比较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恩格斯提出了加强对

青少年进行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的思想。他说，在各年级学生的四肢很富于弹性和十分灵活的时候，经常教给他们自由体操和器械操，比在 20 多岁的小伙子身上下功夫效果要好得多。而且，中小學生天生就站得挺，走得直，很多对新兵来说是极为可憎的训练，对中小學生来说却是一种游戏和娱乐。如果把夏季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行军和地形练习，不仅可以使他们在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受到专门的军事训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中小學生智力的发展。上述精辟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中小學生的体育锻炼和国防教育，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恩格斯特别重视德国和法国对待裁军的态度，因为德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构成 19 世纪末欧洲大陆各国的主要矛盾，这两个国家对待裁军的态度是欧洲能否裁军的关键。恩格斯主张德国应在征得奥地利和意大利同意的情况下，主动向法国政府提出裁军建议，以事实证明“自己决心成为裁军的首创者”，因为正是德国首先发出了进行武装的信号，在裁军方面它也应义不容辞地走在前面。

可以说，恩格斯的建议在当时确实有一定的可行性，首先来看，奥地利和意大利不会拒绝德国的裁军建议，因为奥地利已经在一部分军队中试行短期服役，并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意大利正被军事预

算的重担拖得筋疲力竭，正在急不可耐地寻求出路，而缩短服役期无疑是最便捷的途径。另外，从法国的角度来看，如果它拒绝关于裁军的建议，“就会陷入德国现在所处的那种受到怀疑的不利地位。欧洲的庸人（而他们是一个最大的强国）就会说，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谁要和平，谁要战争。在这以后，如果一个真正好战的政府在法国执政，它就会遇到一种使它认为（只要它有一点聪明）进行战争绝对不可能的形势”。

然而，由于国际局势继续恶化，恩格斯的裁军计划并未能付诸实施。正如他在 1895 年 3 月致考茨基的信中所指出的：“假使法国和德国达成协议，把自己的军队逐步变成民军，而且训练期限也一样，那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法国和德国由于它们的国内局势，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做到由于阿尔萨斯——洛林的缘故，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一碰到这点整个民军问题就都成了泡影。”但是，恩格斯的裁军计划毕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的非常具体的，并且有一定科学根据的裁军建议，有助于第二国际各国党从事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斗争。

直到临终前的一个多月，恩格斯在接受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采访时仍在关注着欧洲局势的发展，并一再表示：“我们将为和平而斗争。”

第二十八章 巨星不落

只要无产者还在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只要人类还在追求完善，只要还有人在研究科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就将永放光辉。

——爱德华·伯恩施坦

恩格斯在进入七十岁以后的一些时候，他依然身心健康，生气勃勃，高龄对他来说绝不是一种负担。恩格斯身躯高大，步履轻盈，稠密而奇特地斜生的连鬓胡子开始灰白了。可是他栗色的头发却没有一点斑白的地方。爱琳娜说：“从外表看来，恩格斯很年轻，而他的内心却比外表更年轻。他的确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

恩格斯能一直保持健康体魄的原因在于他坚持不懈地进行体育锻炼。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是强身健体的最好的药物。骑马、游泳和不论春夏秋冬的常年

坚持的散步，是恩格斯晚年的主要运动，特别是游泳，恩格斯更是钟爱有加，每年他都要挤出一些时间到南部的伊斯特勃恩海滨浴场休养一段时间。他经常说：“海水浴对我非常有益”，海风也能调节身体的各种机能；在大海的碧波中畅游，然后再躺在金色的沙滩上享受日光浴，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了。1892年1月，恩格斯在给弟弟海尔曼的信中说：“如果我冬季能在这里骑马，夏季又能去海滨，无疑会健壮如初。”

恩格斯晚年能保持健康体魄的一个原因是他能自觉控制烟和酒。从青年时代起，恩格斯就养成了吸烟和饮酒的习惯，并且对这两者均有着特殊的兴趣。在与马克思并肩工作和战斗的年代里，两个人又都是有名的“烟枪”。在饮酒方面，恩格斯总能表现出莱茵人的豪放，拉法格曾把恩格斯称作是“香槟酒瓶的大斩首者，麦酒和其他混合饮料的豪饮家。”每当与客人聚会时，恩格斯最大的乐趣便是与客人一起狂饮葡萄酒或香槟酒，猛抽雪茄烟。

然而到了晚年，大量饮酒、吸烟明显影响了恩格斯的健康状况，特别是烟酒刺激神经，使他经常患失眠症。为了配合医生的治疗，他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开始对烟酒有所节制，有一个时期甚至完全戒了烟酒。他曾对朋友们说：“我必须戒烟，因为抽烟对神经不好，这只要花很小的力气就能办到，现在我两三

天才抽三分之一支烟。”“其实，戒酒和戒烟一样，只要有充分的理由必须这样做，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很大的牺牲”。当然，戒掉已有大半辈子的嗜好，恩格斯有时也觉得有些遗憾，他曾幽默地对老战友贝克尔说：“我只能偶尔允许自己抽一抽烟。您的精致的烟斗躺在壁炉上惊奇地看着我：怎么啦，老头子！”但仅此而已，恩格斯用理智克服了一切有损身体健康的嗜好。

正因为如此，七十多岁的恩格斯仍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使他能够应付大量繁重的工作，即便是在晚年，恩格斯在不闹病的情况下每天仍能工作十六个小时李卜克内西曾描绘这一时期的恩格斯说：“他精神健旺，又幽默，又威武，就象在活泼愉快热情奔放的青年时代一样。”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恩格斯在晚年是多么样的精神隽铄。1894年10月，已接近七十五岁的恩格斯居然还经受了一次搬家的劳累。他的女秘书路易莎于1894年初同弗赖贝格尔医生结婚了，这对新婚夫妇一直住在恩格斯家里，弗赖贝格尔还兼任了恩格斯的私人医生。到10月，路易莎快生孩子了，原来的房子显得有些拥挤，而恩格斯又实在不想在晚年再落入陌生人之手。于是他决定另寻宽敞一些的房子把路易莎和弗赖贝格尔继续留在自己身边。

为了寻找新的寓所和装修房子，恩格斯几乎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同住宅经纪人、律师、包工和家具商人打交道。终于在10月初搬进了新居。新居位于瑞琴特公园路41号，离市区大约有五百步，离樱草丘一百步，离瑞琴特公园入口处更近。房子是一栋四层小楼，第一层是客厅和可以容纳二十四人就餐的餐厅；二层的前侧是恩格斯的书房，靠街有三个窗子，相当豁亮，而且取暖情况相当好，后侧是恩格斯的卧室；三层有四个房间，由弗赖格尔一家居住，四层也有四个房间，供佣人、客人住和存放东西；房子另有一个地下室，可作厨房用。房子前后各有一个花园，环境比原来的还要优越。而且，这种安排，也利于弗赖贝格尔夫妇照顾恩格斯的起居和工作。

1894年11月底，恩格斯在新居度过七十四岁生日，此时，他已经感到了岁月的无情，他在给老朋友左尔格的信中说：“说实在的，进入七十五岁的人，已经不象以前那样精神饱满了。固然，我还算精神饱满，腿脚也还灵活，没有失去对劳动的爱好，劳动能力也较好，但毕竟发觉，从前我满不当回事的胃病和感冒，现在却要求我十分重视了。”

弗赖贝格尔夫妇精心地照顾着恩格斯的健康，特别是弗赖贝格尔博士给他规定了一套适合老年人的生活制度，尽管恩格斯有时要点小孩脾气，小声嘀

咕几句，但基本上还能遵守。1894年12月14日，恩格斯在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阿德勒——也是一位医学博士的信中汇报说：“……请你相信，在生命的第七十五年头我已充分意识并感觉到，今后我没有权利再干那些你责怪我的不慎行为。恰恰相反！我将严格遵守饮食制，注意消化系统，象对待爱唠叨的长官一样，时时按照他的支使行动；而为了避免咳嗽、支气管炎等之类的疾病，就要穿戴暖和，避免受凉，凡是一个有病的老人需要注意的麻烦事都要放在心上。”

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规律，是谁也无法抗拒的。恩格斯也能客观地对待这一自然规律，在衰老和疾病面前保持着革命的乐观精神。1895年1月12日，他在给弟弟海尔曼的信中开玩笑地说：“告诉你一件好消息，我终于成为一个老人了……当不断扩大的秃顶越来越蔑视地从镜子里望着你的时候，你就不能不承认七十四和四十七完全是两回事……但这并不能破坏我的情绪。”

确实，恩格斯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他愈老弥坚，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欧洲革命高潮明日到来。他对老朋友拉甫罗夫说：“七十四岁毕竟不是四十七岁，然而事变应当帮助我们保持生命力；整个欧洲都沸腾了，危机到处趋于成熟，特别是俄

国。那里不会再这样持续很久了。”恩格斯表示，“我还希望看到更多的事情。”

恩格斯很爱惜自己的生命，并且自信还可以多活几年，为革命事业做更多的事情。但他又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点儿也不畏惧死亡。1895年1月3日，他对老朋友保尔·施土姆普弗说：“我还有一个希望——看看新世纪。”然后又毫不避讳地说：“到1901年元旦我就完全没有一点用处了，也许那时就到了末日。”遗憾的是，恩格斯并未看到新世纪的曙光。

为防备意外，恩格斯很早就写下了遗嘱。他第一份遗嘱曾指定马克思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由于马克思先他而去，于是恩格斯在1893年又重新立了遗嘱；他指定穆尔、伯恩施坦和路易莎三人为遗嘱执行人，并遗赠他们每人250英镑以酬谢他们的辛劳。

在遗嘱中，恩格斯赠给德国社会民主党1000英镑，为了符合英国的法律程序，名义上是赠给倍倍尔和辛格尔或他们的继承人，供参加帝国议会选举之用。恩格斯希望倍倍尔等人首先考虑得到这笔钱，然后再考虑不要让这笔钱落入普鲁士人手里。他后来在致倍倍尔的信中还开玩笑说：“在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时，请喝一瓶好酒来纪念我。”

恩格斯的财产，除了将家具遗赠给路易莎和留

给内侄女玛丽·艾伦·罗舍 3000 英镑外，其余 30000 多英镑分为八等分，八分之三给劳拉·拉法格，八分之三给爱琳娜·艾威林，其余八分之二给路易莎。后来，恩格斯特意给劳拉和爱琳娜写了一封信，说明遗赠给她们的钱的用途：“八分之二是给你们自己的，其余八分之一你们要给燕妮（马克思的长女）的孩子们保留，你们和孩子的监护人保尔·拉法格认为如何使用最好就怎么使用……可以按照你们对孩子应有的道义感和爱去做。”这样，恩格斯给亡友的后代留下了一笔足够的生活费用。

恩格斯曾经资助亲戚朋友和党内同志大量的钱，这笔钱恩格斯曾清楚地记在他的那本总帐里，他担心他的遗嘱执行人会去追还这笔钱，因此，恩格斯在遗嘱中明确规定：“凡是我付给这位派尔希·怀特·罗舍，其妻玛丽·艾伦·罗舍，保尔·拉法格，其妻劳拉·拉法格，爱德华·艾威林博士，其妻爱琳那·马克思，奥斯渥特·欧根和弗里德里都应看作是我给其中每个人的自愿馈赠，因而我现在把这些遗赠给他们。”

至于遗著，这是恩格斯最为重视的，恩格斯将他保留的马克思的全部手稿和信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往来信件除外），移交卡尔·马克思的法定继承人爱琳娜·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手稿和全部信件、包

括与马克思往来的信遗赠给倍倍尔和伯恩施坦。恩格斯还把自己的全部藏书（包括恩格斯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和著作权遗赠给倍倍尔和辛格尔。1894年11月14日，恩格斯在致劳拉和爱琳娜的信中对这一点做了专门的说明：

“你们会发现，我大胆地把我的全部书籍，包括摩尔逝世后从你们那里得来的书籍，都赠给了德国党。全部这些书籍构成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科学的独一无二的，同时也是非常完备的文库。如果再让它分散开，那是很可惜的。把它保存在一个地方，而且交给那些想利用它的人支配——这就是倍倍尔和德国社会党领导人早已向我表达过的愿望；他们的确是我所认为的最符合这一目的的人，所以我就同意了。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谅解我的行动，并且也能够表示赞同。”

恩格斯曾经想说服劳拉和爱琳娜将马克思的手稿与他的手稿一起遗赠给德国党，以保持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的完整性，但他很快便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他很难与马克思的女儿们取得一致意见，于是，这两部分本来是浑然一体的遗产就这样被分开了。而且，直到1895年初，劳拉和爱琳娜还在这个问题上同恩格斯搞得有些不愉快。但是，恩格斯在1894年底就已申明，等穆尔夏天回来后就修改遗嘱，把马克思手

稿的事按她们的意见“再明确无误地加以申明”。当时恩格斯自己的身体还足够健康，所以并没有马上修改遗嘱。

1894 年岁末，雄心勃勃的恩格斯制订了未来的工作计划，其工作计划之庞大，也反映了他对自己身体的信心。

首先，他要继续关注和指导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这是恩格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为此，他订阅了三份德国报纸，两份英国报纸，一份意大利报纸和一份奥地利报纸，共七份日报。他订阅的周报有：德国的两份，奥地利七份，美国三份，意大利两份，法国，保加利亚、波兰、西班牙和捷克各一份。除此之外，还要接待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其中很多人都希望从恩格斯这里得到详细的指导。这要占去大量的时间。

其次，恩格斯准备把马克思和他自己的文章以全集的形式重新献给读者，并且不是分册出版，而是一下子出齐若干卷。由于文章和著作数量极大，且散见于不同国家的不同的报刊上，收集起来相当困难。而且，为了出版全集，必须对这些文章进行重新研究，加上必要的注释和说明，以利于读者认真理解和学习。恩格斯反复强调，“重印历史文件以及著作的丛书，不容许任何书报检查——要么完整无损，一字

不改，要么根本不印。在发表马克思和我过去的著作时，我决不能同意做即使是最小的删节以适应当前的出版条件。”这就可能必须要在德意志帝国国境之外找出版商了。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点也不客气的，常常辛辣地抨击当权者和为被视为越轨和犯法的行为辩护。

第三，恩格斯还想亲眼看到《资本论》第四卷的出版，他曾经想帮助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辨认字迹，由他俩负责完成这项工作。但是伯恩施坦忙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恩格斯觉得他不仅太忙，而且疲劳过度，因此不便求他。考茨基曾整理了一部分，但后来为《新时代》忙得不可开交，慢慢地把这项工作放弃了。恩格斯考虑指导马克思的幼女杜西辨认字迹，为整理和出版第四卷作准备。

第四，恩格斯打算亲自撰写马克思的传记，至少是写出主要的几章如 1842—1852 年和第一国际时期。第一国际时期最重要，而且也十分必要，恩格斯打算先写这一章。

另外，恩格斯还打算公布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书信，并为这个书信集加一些注释，他还想再版马克思和他自己的一些重要著作，例如，他曾答应完成《资本论》第三卷后首先整理加工《德意志农民战争》一书，并准备进行更深入的钻研。后来这项工作一直未

能完成。

上述庞大的工作计划需要付出多大的精力，又需要“上帝”赐给多少时间啊。恩格斯曾感慨地对劳拉说：“七十四岁，我才开始感觉到它，而工作之多需要两个四十岁的人来做。真的，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分成一个四十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三十四岁的弗·恩格斯，两人合在一起恰好七十四岁，那末一切都很快就绪。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多些好些。”

恩格斯上述庞大的构想几乎一项也没有实现，进入1895年后，他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这年三月，每到春天就发作的老病又老折磨他，迫使他在床上静养几个星期。不久，弗赖贝格尔医生又诊断出恩格斯患了食道癌，他只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德勒，对恩格斯则是严密封锁消息。

5月初，恩格斯的脖子上发现了肿块，很快便扩散，成为一簇位于深部的由于某种原因凝聚而成的腺体。由于肿块压迫神经，使得恩格斯经常头痛，厉害得时候，弄得恩格斯的头发紧发胀，就像套着一道铁箍一样。这一段时间，恩格斯经常失眠，什么工作也不能做。据伯恩施坦后来回忆说，这一段时期，恩格斯比他临终前几天还要痛苦，他受着剧烈头痛的折磨，彻夜不眠，甚至不能躺下；但他从不向人诉说，

也不愿让他的密友知道。

恩格斯对自己的病一直充满信心，他在5月14日给劳拉的信中说：“目前，消肿的过程还相当良好，只是一部分腺体正在化脓，必须切开；由于它们的部位较深，出到表面上来比较慢，而我们这些老头子又都十分虚弱，所以手术的日期还不能确切地定下来，不过可望在本星期内进行。”恩格斯一直以为肿瘤是良性，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年龄是不可能得癌症的。

面对病魔的折磨，恩格斯表现出惊人的毅力。他默默地忍受着剧痛，依然顽强地工作着，在生命的最后七个月，继续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挥着他独特的作用。

1895年2月中旬到3月初，恩格斯为马克思1850年发表的著作《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了长篇导言。2月底，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说明了这篇导言的性质：“导言……除了对那时以来发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还应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由于德国要实行危及我们的新法律，这点很重要。”恩格斯在导言中总结了1848年革命以来的斗争经验，根据变化了的客观条件，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指出，

由于客观时代条件的变化和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为此，我们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利用选举权，开展议会斗争，并通过议会讲坛宣传无产阶级政党的观点，已成为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在德国、法国等国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应放弃“革命权”这种“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工人阶级必须积蓄力量，以便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投入战斗。特别是当统治阶级使用暴力机器对付无产阶级时，工人政党应坚决地“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

德国社会民主党接到导言后，认为导言措辞还是有些激烈，党的领导人倍倍尔、辛格尔和出版社的负责人理查·费舍认为必须对导言进行删改，以避免被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敌人利用，使帝国议会易于通过政府反动的新法律。并就此征求恩格斯的意见。

3月8日，恩格斯在给费舍的回信中指出：“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虽然我十分愿意理解但还是不能理解……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

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

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并未听从恩格斯的劝告。导言寄到柏林不久，李卜克内西主编的《前进报》便摘要刊登了恩格斯的《导言》，但内容被删节的面目全非。恩格斯看到十分惊讶，也十分生气，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的印象。”

大约在4—5月间，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价值规律、利润率、生产价格等，恩格斯忍着疾病带来的痛苦写了《（资本论）第三卷增补》。5月21日，恩格斯还给考茨基写了一封阐述理论问题的长信，对由考茨基负责编写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一书提出了许多衷恳的意见。

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和顾问，在1895年短

短的七个月中，恩格斯给各国工人活动家和革命者写了七十九封信，这些书信表明，“白发苍苍，病入膏肓的恩格斯，在即将告别人生的时候，仍满怀乐观精神，渴望战斗，充满胜利的信心，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保持着往日的热情。”

6月初，恩格斯满怀信心地去伊斯特勃恩海滨休养，希望海边宜人的气候能帮助他恢复健康。尽管病情一直呈加重的趋势，但恩格斯一直保持着浪漫乐观的情趣。6月18日，他在写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说：“我觉得身体好一些，但是依照辩证法的原理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都在加强。我还强健，吃得多一些，胃口也好了一些，人们说我的气色不错，因而整个状况好转。但是，病的进程也在加快；肿瘤扩大，疼痛加剧，睡眠不好等等。”

这一段时间，劳拉和爱琳娜夫妇先后来到伊斯特勃恩陪伴她们的第二个父亲度过了最后美好的时光。路易莎也带着小娃娃从伦敦来陪伴恩格斯，小娃娃活泼、天真，非常讨恩格斯喜欢。路易莎的丈夫弗赖贝格尔博士精心地照料着恩格斯。恩格斯的老朋友刚刚从非洲返回英国，便来到伊斯特勃恩，给恩格斯带来了许多黑非洲的奇闻异事。恩格斯觉得，就差拉法格没来了，于是在6月29日，他写了一封诙谐幽默的短信：“如果山不到穆罕默德那里去，穆罕默

德就到山里去。如果保尔不愿意到伊斯特勃恩来，伊斯特勃恩就到他那里去。所以说，穆罕默德没有能够实现的，保尔在转瞬之间就能实现。”

弗赖贝格尔为了照顾恩格斯，坚持上夜班，以便白天能够陪伴病笃的恩格斯。当着恩格斯的面，他从不声张病情的真相，只说是病人年迈，身体虚弱，需要好好休养。但是对为恩格斯健康担忧的朋友们和同志们，他不再隐瞒恩格斯已危在旦夕了。6月底，弗赖贝格尔把恩格斯的病情通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德勒，阿德勒也是维也纳著名的医生。当时正在蹲监狱。阿德勒一接到信便向狱长请了假，他决定前往英国，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看望这位可敬的朋友和导师了。为了不使恩格斯联想到他此行与恩格斯病情的关系，他先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恩格斯：前不久才决定让我从下周开始休假约十四天。（我）想借此机会到伊斯特勃恩探望你。除了想看看你，同你交谈，作为党员我也完全应该前来向你求教，这比用文字表达详细得多。秋天我们或者准备选举，或者进行周密筹划的党的活动……在没有听到你的意见之前，我不能制订计划。如果不打扰你，我希望很快见到你。”

阿德勒到了伊斯特勃恩，他同弗赖贝格尔诊断的结果一样，恩格斯的癌症已到晚期，随时都有生命

危险。阿德勒的到来，减轻了弗赖贝格尔的压力，阿德勒陪伴恩格斯一直到7月24日返回伦敦。

直至临终前，恩格斯对自己的病情都充满着信心，并竭力安慰身边的同志和朋友，要他们不必担心。7月23日，他满怀希望地对劳拉说：“看来我脖子上的这块土豆终于到了紧要关头，脓肿处可以切开，那样就舒服了。终于等到了！漫长的道路有希望走转弯处了。”这是恩格斯的最后一封亲笔信。

7月21日，穆尔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等候从伊斯特勃恩赶回值夜班的弗赖贝格尔博士，博士带来的消息是令人沮丧的，他说：考虑到将军的年龄，他的病情已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地步。除了颈腺疾患外，危险可能来自衰弱的心脏，或者来自肺炎——这两者都能突然造成死亡。如果不并发肺炎，他也许还能拖几个星期，如果迸发肺炎，几小时内就会全部完结。

穆尔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十分伤心，他甚至希望是医生们搞错了。因为还有那么多只有将军一个人才能做的工作，因此，他的逝世从社会角度看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然而，弗赖贝格尔和阿德勒这两位医学博士并没有搞错。7月24日，恩格斯在阿德勒的陪伴下回到伦敦的家中，当时，他的身体已极度虚弱，虽然还能

够说话，但讲了半个小时就讲不出来了，他只能利用一块小型记事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虽然如此，他依然精神饱满，怀着痊愈的希望。恩格斯甚至还在记事板上写了一些开玩笑的话，令在场的人都感到十分痛苦和心酸。

8月初，倍倍尔代表德国党去看望恩格斯，此时，恩格斯已无法处理身边的琐事，体力衰竭的很厉害，连穿衣脱衣都要别人帮忙。倍倍尔告诉李卜克内西：“这种状况还能维持一个星期，不过哪一天都可能出事，我们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从8月5日中午开始，恩格斯再也没能恢复知觉。弗赖贝格尔博士一直守护在他床边，但已无力回天，晚上10时30分，死神终于来临，“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恩格斯的追悼会于1895年8月10日在威斯敏斯特桥的滑铁卢车站大厅举行，按照恩格斯的遗愿，追悼会举行的非常简朴，参加追悼会的亲朋好友约八十人。恩格斯的弟弟海尔曼带领几个侄子从德国也赶来了。来自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家和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爱琳娜·艾威林夫妇，拉法格，穆尔，列斯纳，考茨基，伯恩施坦，辛格尔，查苏利奇，克拉夫钦斯基，门德尔森等参加追悼会。

灵柩上盖满了鲜花，周围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送来的花圈，红色宽幅挽带上表达了对自己导师和领袖的深切悼念。

恩格斯的亲密朋友，遗嘱执行人穆尔致了悼词，他含着泪说：“朋友们，我们站在一位伟大人物的灵柩前，这样的人物在生活中是不容易再遇见的……他知识非常渊博，对人十分亲切。”

接着李卜克内西讲话，他说，今天只有少数人参加了追悼会，但是这少数人代表着千百万人，代表着整个世界。恩格斯是文武双全的英雄，和马克思一样，是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伟人。“他既是指路人，又是带路人，既是领袖，又是战士，在他身上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拉法格代表法国工人党致悼词，他泪流满面，悲痛地说：“永别了，亲爱的朋友！我再也找不到一位这样温柔、亲切和耐心的朋友了。你和马克思给了我们《共产党宣言》，你还给了法国无产阶级一个纲领……永别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法国工人将永远忘不了你在1847年教给我们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给我们指出了战斗场所，你给了我们武器和口号。我们将斗争下去，我们一定会胜利。”

恩格斯的侄儿施拉赫坦达尔代表恩格斯家族在

追悼会上讲了话，他很有分寸地赞扬了恩格斯为受压迫者进行的活动，尽管他及其家族并不赞同恩格斯所选择的道路和目标，但是，他对恩格斯在与自己亲人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大度和友爱精神亦高度赞赏。

追悼会后，穆尔，艾威林，拉法格，伯恩施坦，李卜克内西，辛格尔护送恩格斯的灵柩去火葬场，并参加了火葬仪式。

8月27日，艾威林夫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列斯纳，伯恩施坦，乘火车将恩格斯的骨灰罐送到伊斯特勃恩。他们要按着恩格斯的遗愿，把骨灰罐投入大海。这是一个孕育着风暴的日子，他们一行四人驾驶一叶轻舟，在离海滩五六海里的地方将军骨灰罐投入海中。

伟大的恩格斯既没有留下遗体，也没有留下骨灰，但是他的丰功伟绩将永世长存，他的革命精神将与日月同辉，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刻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心目中。

1895年8月7日，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上撰文说：对我们来说，恩格斯“他没有死——他还活着，还在对我们讲话，为我们指出道路，激励我们前进——今天我们在他的墓前重复我们在马克思墓前的誓言：

我们将实现他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将实现你们给我们的教导！——你们两人是不可分的。

我们将用行动证明，我们无愧于你们。”

伯恩施坦在《诚实的雅科布》半月刊上撰文说：“只要无产者还在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只要人类还在追求完善，只要还有人在研究科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就将永放光辉。”

是的，恩格斯这颗巨星并没有陨落，他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我们。